ローマ人の物語

罗马人的故事

XIV

基督的胜利

[日] 盐野七生◎著　徐越◎译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君士坦丁大帝的罗马帝国
逐渐趋向东方国家专治的君主制

一切逆时代的作为都是徒劳
蛮族入侵即在眼前
基督教的光芒成为罗马人的唯一希望
帝国的末日　是基督教的大获全胜

14

王石　王巍　作序

版权信息

书名:罗马人的故事14：基督的胜利

作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徐越

ISBN:9787508639758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银币故事



自从罗马帝国变为基督徒的国度之后，帝国的执政者也从为民众治世变成为上帝服务。

理所当然，按照基督教的教义，皇帝是由上帝选定的，他的权力并不是罗马公民和罗马元老院赋予的。无论是谁，总是对掌控自己命运的人言听计从。

成了基督徒的罗马人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坐在圆形竞技场里，向入场的皇帝发出嘘声，以示不满，彰显民意。

理所当然，民众可以向某个人发出抗议，却不能向一个接受了上帝旨意的人抗议。因为向他抗议，就等于向上帝抗议。

正因为如此，钱币上执政者的脸都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大家不妨对比一下，帝国在基督教国教化之前的钱币。

盐野七生

2010年初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尤里安被称为“叛教者”，时至今日，他仍然是基督教世界里的一个罪人。在罗马帝国逐渐走向基督教国教化的形势下，他是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少数罗马人之一。

然而，他的抵抗，在19个月之后就分崩瓦解了。即便是皇帝，也无回天之力。

不过，必须承认，正因为他年轻，才有这份英雄气概。倘若这枚奥里斯金币上的侧面头像，能有助于大家去理解这位在1700年前匆匆走过一生的年轻人，实属幸事。

现在，我一手拿着金币，一手描写着仲夏夜之梦一般飘逝的尤里安的生涯……

盐野七生

2010年初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无论在基督教国教化之后，还是在此之前，金、银、铜币至少在形状上是相同的，始终都是代表罗马帝国的流通货币。然而，在帝国即将走向终结之际，我深深感悟到一点，那就是宗教并没有挽救经济的能力。

罗马帝国从多神教转变为一神教之后，衰退的经济状况依然毫无起色。尽管货币表面的颜色仍然呈金、银、铜色，但其内在，即代表货币真正价值的材质却日益劣化。

在发掘出来的文物中，极少有这个时代的货币，这证明品质低劣的货币，大家都想赶紧用掉。而那些纯度高的货币就成了民众“压箱底”的宝贝。能在钱币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通常都是那些藏在罐子里长眠多年的硬通货。

盐野七生

2010年初夏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

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
>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
>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

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致读者

从罗马市区前往郊外，只要30分钟左右的车程，就可以看到许多古罗马时代留下的别墅。有一些像“哈德良别墅”（Hadrian’s Villa）那样，经过细致的考古研究之后，如今已成为著名的观光景点。还有一部分则由于特别的理由，比如原屋主赫赫有名、建筑规模宏大壮丽，或者是因为地板的花纹图案极其罕见、大理石圆柱的材料非常珍贵等，因而被列为考古学的重要遗迹。这些地方由意大利以及西欧其他国家的考古队负责挖掘、整理，一般人既无法靠近一探究竟，更别想随意地倚靠在旧石柱上缅怀一下往昔。

不过，名不见经传的遗迹仍然比比皆是。古罗马人对郊外的别墅与市内的住宅同样重视，应该说更偏重于后者。别墅是一个环绕大自然而建的农庄，Villa（别墅）这个词语原本就带有“田园之家”的含义。

由于数量过多，纵使欧美所有大学的考古学者倾巢而出，也不可能逐一理清。因此，有不少遗址委托给地方政府负责观光的部门管理。然而，他们除了对遗迹做一些例行的灌木修剪以及清扫之外，并没有进一步的维修管理。这些地方通常人烟稀少、寂寥幽静。近几年，我养成一个习惯，专门去看这些无人问津的遗址，并不是为了学术调查，仅仅是在这些历史废墟中作独自的冥思。

《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写到第12卷《迷途帝国》时，我的视线和脚步伸展到古罗马帝国的整个疆土，它们涵括了欧洲、中东、北非等辽阔的地区。如今，从罗马去那些地方，坐飞机不过60多分钟，即使是边境地区，时间也不会超过2个小时。每次前往这些地方，总让我不解：为何那些古罗马的精英能够抛弃首都罗马的舒适生活，义无反顾

地奔赴这些条件恶劣的地区，担当起防卫和治理的任务？举例来说，寒冬腊月时我曾经前往多瑙河一带，被俗称匈牙利落山风的寒风冻得几乎全身麻木；相反，当我去参观古代要塞、眺望撒哈拉沙漠时，又被灼热的烈日晒得晕头转向，根本无心再思考什么帝国边界线问题，一心只想仿效古罗马人做一盆清凉的冰沙来消暑解渴。

如今，我一边游走于帝国首都罗马附近的别墅遗迹之中，一边猜测着公元4世纪时住在这里的主人的心情。我仿佛跟随着古罗马人共同思考、一起走过了1000多年，眼看着即将落幕的帝国结局。

眼前这所别墅的主人年龄在40多岁，属于元老院阶层的世家子弟，他本人也在元老院中占有一席。不过，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位于古罗马广场的元老院会场，与议员们的交往仅仅维持在最低限度的接触。他在罗马市内的宅邸，卖给了因经营基督教教会而发了财的新贵，房价由着对方，完全没有讨价还价、恋恋不舍的意思。他单身，无儿无女。像他这样的状况并非特例，在那个对帝国未来不抱希望的时代，许多人选择了终身独身。

原本度假用的别墅如今成了他的日常居所（casa）。别墅的规模不算很大，但还是有足够的面积将主人的居住区和仆人的活动场所隔开，保持一定的距离。别墅忠实地按照古罗马传统的设计，周边种着橄榄树以及其他果树，有专人悉心打理；边上是饲养家畜的牧场以及保证自家用的小麦田。农田附近有涓涓的清溪流过，再往后是茂密的森林，可享受打猎和采蘑菇的乐趣。顺便提一句，罗马人特别爱吃蘑菇。总之，只要不像公元1世纪的美食家卢库勒斯（Lucullus）那般追求奢侈的盛宴，别墅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主人有足够的心思和财力，想模仿早年的富豪们的做派，不远千里地寻来山珍海味，让宾客大开眼界、大快朵颐，在那个时代也没了这个可能。随着“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的结束，大范围的经济活动圈已走向终结，曾经遍布帝国全

境的交通网络，变得支离破碎，蛮族以及强盗的频频袭击，使得运输成本节节上涨，对于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而言，就算不想去刻意追求素朴的生活，现实也迫使大家不得不尽量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

罗马式的别墅原本就是按照自给自足的理念建造的。别墅中有小型加工厂，除了一些需要特别高等技术的东西，一般的产品以及加工用的工具都可以在此制作。

仆人是维持别墅正常运转的关键。他们虽然是奴隶，但都是在主人家出生、成长的家奴，其中一些人甚至是第二、第三代的世袭奴隶，已经成了家族的一员。但奴隶们不会过度地涉入主人的生活，主仆之间谨守礼仪，在和谐、温暖的气氛中，共度郊外别墅的时光。

尽管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主人家却不认为他是弃世隐居或者逃避现实，他只是选择了离开而已。他也不打算奋起反抗，因为一切逆时代的作为都是徒劳。尽管已远离政治的旋涡，毕竟是来自世代担任国政的上层家庭，他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关注时代潮流的变迁，即世间的动态。虽然元老院议员的身份已徒有虚名，自幼接受的领导阶层必不可缺的“教养科目”造就了其敏感的政治触觉。

他如果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或许会跟随着尤里乌斯·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如果是公元1世纪的话，也许会成为奥古斯都的秘书官之一，为各项制度的改革及巩固而劳心劳神，无暇回到别墅享受悠闲的田园生活。或者再晚一点，身处公元2世纪，那么他可能会陪伴着哈德良皇帝在帝国的各个边境视察，重新探讨和部署辽阔的罗马帝国的国防安全以及统治制度，在年富力强时，为国家作出贡献。遗憾的是，他所处的是公元4世纪的罗马。

即使有满腔的热情愿意为国防安全尽一己之力，元老院也没有资格涉入军事。当时罗马皇帝的统治手段，已逐渐趋向于东方国家专制的君主制，对于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来自罗马传统的元老院阶层的

人而言，面前似乎立着一座无形的高墙，就算选择在皇帝手下做一名官员，也是前途莫测。这就是公元4世纪时的罗马的现状。不过，像他这样知识渊博、精力充沛的男子，只要有心，即使在不尽如人意的形势下，仍然有一条光明之路可走。

他可以成为基督教教会的神职人员。是否曾经接受过洗礼并不重要，事实上，许多人都是在担任了神职之后，才接受洗礼的。尤其是像他这样来自上层社会、具有良好的教养和渊博学识的人，甚至不需要从底层做起，直接就可以担任主教。

但是，他不愿意向现实再三妥协。这倒并不意味着他对罗马传统的多神教有强烈的信仰，只是不想皈依基督教而已。在那个时代，和他有着类似想法的人，大多会醉心于希腊哲学的某一神秘的教派。然而在他看来，那些东西不具备宣导、说服人民的力量，完全属于知识人小圈子里的自我满足。他不喜欢与这类人物打交道，就算是聚餐闲聊，也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

他作出了选择。既然现实如此，索性就做一个被基督教徒所蔑视的“异教徒”，度过余生。无论世间如何变化，只要有这个别墅得以安身就好。

生活在时代变迁期间的人们，有以下三种生存方式可以选择：

一、顺势而为。

二、逆流而上。

三、全身而退。

接下来在本书中，我要讲述的就是选择了这三种不同生存方式的男人们的故事。我会站在别墅主人的立场，即选择了全身而退的人的视角来展开论述。这并不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帝国即将终结的命运，

刻意采用这个角度切入主题，而是与其他两种生存方式相比，我对第三种选择更有共鸣。

最后，请允许我再补充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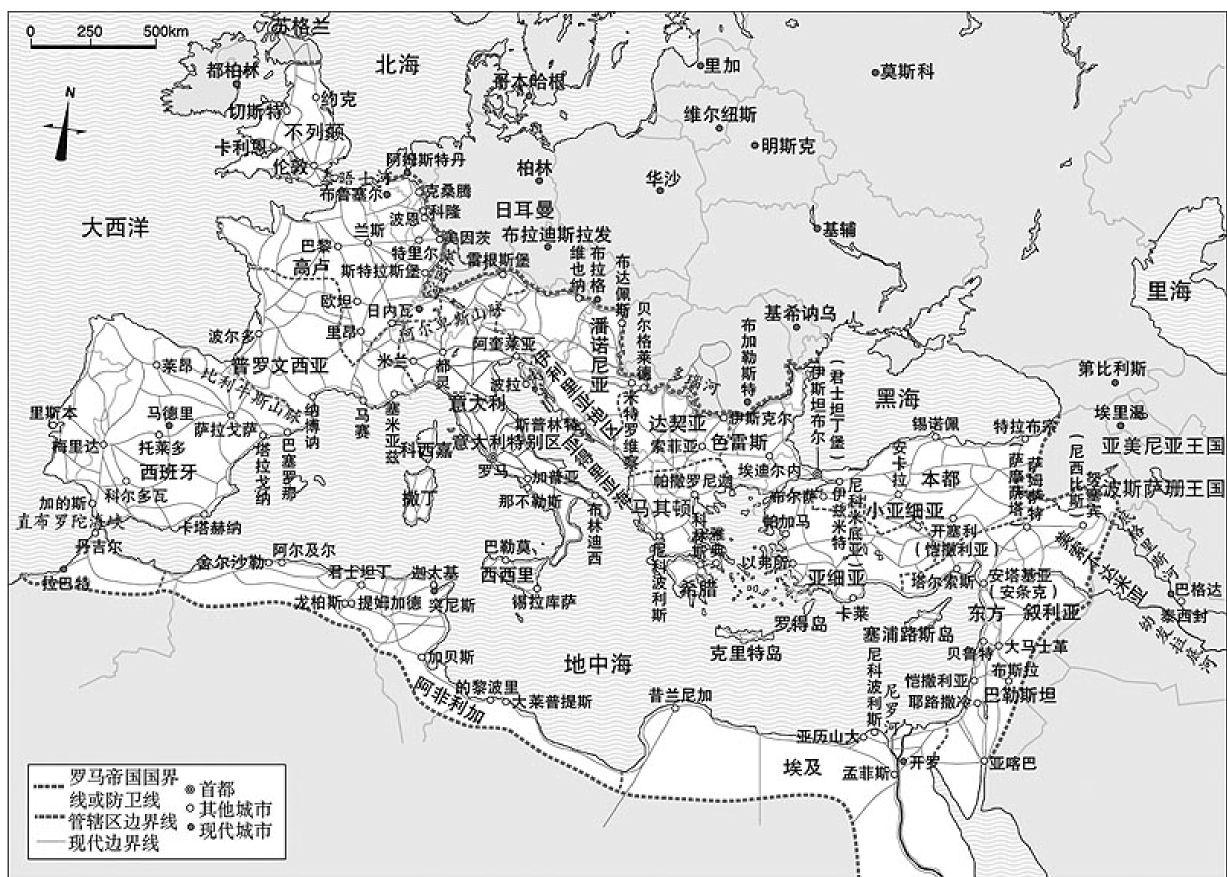
在迄今为止《罗马人的故事》系列的各册中，我都尽量地多向大家介绍一些“罗马人的脸”，希望大家先观察一下古人的脸，再进入故事。本书中介绍的罗马人，与以往出现的各种面孔非常之不同。大家看了或许会有所怀疑：这真是罗马人的长相吗？本书封面挑选的是享有圣人之誉的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Ambrosius，又译安布罗斯）。在公元4世纪的历史名人中，安布罗西乌斯是为数不多的出身于首都罗马的罗马人。与他出身背景相似的，还有在《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的尤尼乌斯·布鲁图、《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争》中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以及《罗马人的故事·恺撒时代》中的主人公尤里乌斯·恺撒。如果各位对安布罗西乌斯的容貌感到不可思议，不妨请参考一下我以下的论述。

在描绘人物的相貌，尤其是统治者的相貌时，除了忠实于事实，作者更想传达的是他对笔下人物的观感。因此出现在作品中的达官贵人或一朝天子，往往都是创作者心目中能够代表时代的人物形象。即使是最接近于事实的照片，它所反映的内容，也会因为摄影者的视角不同而产生背离现实的现象。手工制作的雕像或者镶嵌画之类的作品，就更容易掺入创作者主观的诠释。

我在作品中向大家推荐的，都是领导时代的风云人物的脸，它们都是艺术家们根据那个时代人民理想中的领袖形象制作而成。因此，迄今为止我所介绍的“罗马人的脸”，是主人公实际的长相和人民所期望的形象的混合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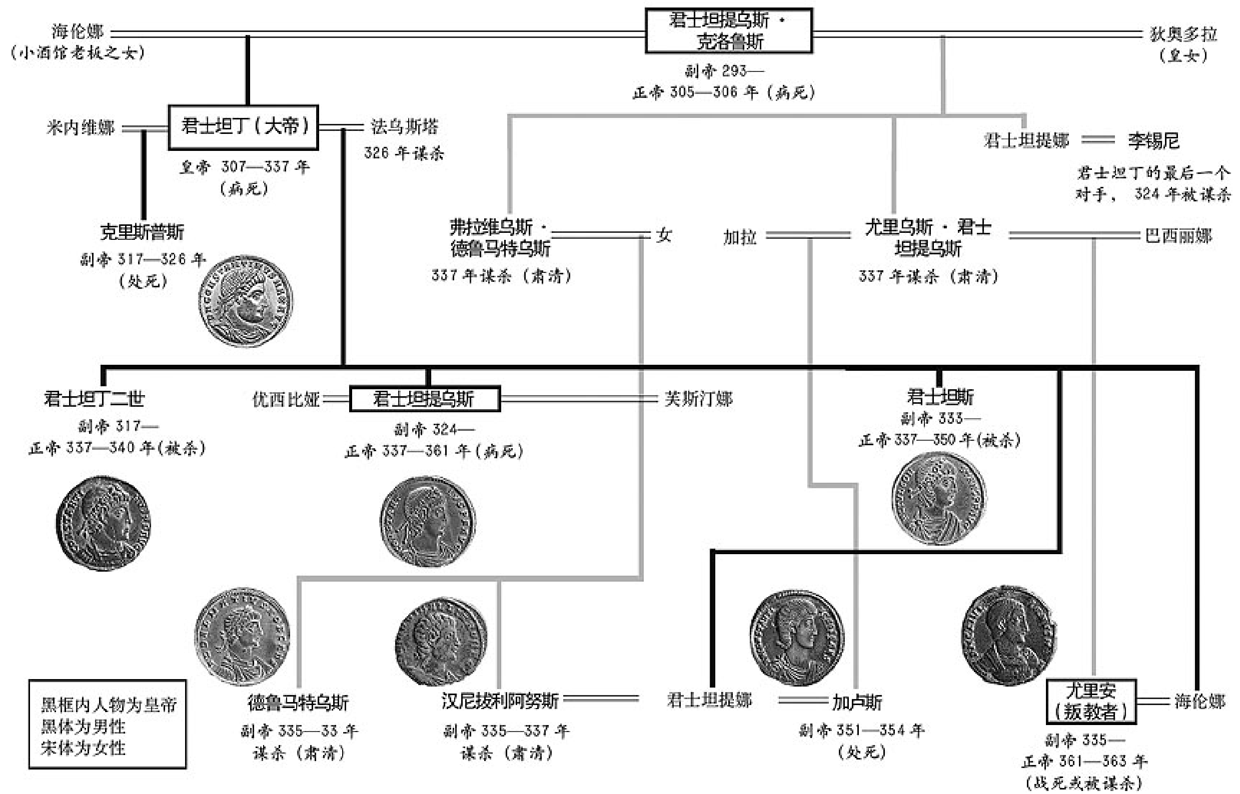
鉴于以上理由，安布罗西乌斯的面容，才会和与他同样出身于首都罗马的西庇阿、恺撒在观感上有如此悬殊的差异。同样，出身于行

省的图拉真、哈德良的风貌，也与出身于首都的公元4世纪的这位圣人千差万别。即使是君临天下的领袖，其容貌也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公元4世纪中叶的罗马帝国版图

君士坦丁王朝族系



海伦娜
（小酒馆老板之女）
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
副帝 293—
正帝 305—306 年（病死）
狄奥多拉
（皇女）
米内维娜
君士坦丁（大帝）
皇帝 307—337 年
（病死）
法乌斯塔
326 年谋杀
君士坦提娜
李锡尼
君士坦丁的最后一个对手，324 年被谋杀
克里斯普斯
副帝 317—326 年
（处死）
弗拉维乌斯·德鲁马特乌斯
337 年谋杀（肃清）
女
加拉
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
337 年谋杀（肃清）
巴西丽娜
君士坦丁二世
副帝 317—
正帝 337—340 年（被杀）
优西比娅
君士坦提乌斯
副帝 324—
正帝 337—361 年（病死）
芙斯汀娜
君士坦斯
副帝 333—
正帝 337—350 年（被杀）
黑框内人物为皇帝
黑体为男性
宋体为女性
德鲁马特乌斯
副帝 335—33 年
谋杀（肃清）
汉尼拔利阿努斯
副帝 335—337 年
谋杀（肃清）
君士坦提娜
加卢斯
副帝 351—354 年
（处死）
尤里安
（叛教者）
副帝 335—
正帝 361—363 年
（战死或被谋杀）
海伦娜









第一章
皇帝君士坦提乌斯

（公元337—361年在位）

铲除异己

第一位承认基督教为合法的宗教、因而被后人尊称为“大帝”（magnus）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us I Magnus）死于公元337年5月22日。当时，他亲自率军参加波斯战争，离开帝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渡海到达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之后不久，一病不起，最终与世长辞，享年62岁。君士坦丁的在位时间，如果从他早年争夺皇位时期算起，长达30年；从他战胜了对手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统治了西罗马帝国之后开始计算，也有25年。而他击败了最后一个对手李锡尼（Licinius），成为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统治者则有13年。可以说君士坦丁是在实现了他一生所有的野心之后离开了人世。因此，世间对他的死亡没有产生疑问，更没有阴谋、暗杀之类的传闻。

不算他最初负责军务的“恺撒”（副帝）时代，从他一手掌握了帝国军政两大权力，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奥古斯都”（正帝）的公元312年开始，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超过了以政权稳固而著名的五贤帝。在历代的罗马皇帝中，他的在位时间仅次于在位40年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皇帝统治时间的长久，意味着其制定的政策大多都能在其生前得到贯彻落实，想来君士坦丁应该是死而无憾。至于同大国波斯的战争，由于还没有正式开战，可以随时中止。当时的形势并非因受到波斯国王的攻击而不得不战，中止战争并不会给罗马带来不利。换言之，波斯王国对公元337年的罗马帝国而言，根本构不成威胁，不过是期望开战的罗马因为最高司令官的死亡，将战争延期罢了。



君士坦丁大帝

虽然君士坦丁在前往波斯战争的途中死亡，却没有给人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印象。罗马帝国西起泰晤士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北沿莱茵河、多瑙河，南到撒哈拉大沙漠的辽阔疆土，在他生前始终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即便不是基督徒，罗马市民大概也不会反对授予他“大帝”的尊称。依照传统，他应该被授予“神君”（divus）的称号，然而一神教的基督教，非但不承认其他神灵，甚至就连近似神的存在也不认同，因此君士坦丁的尊称只能改为与英文great同义的magnus（大帝）。顺便提一笔，君士坦丁在临终前接受了洗礼成了基督徒，所以，他的遗体没有以罗马传统的方式火葬，而是遵照基督教的习惯进行了土葬。

对于最高执政者而言，其任期中最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决定接班人，以及为权力平稳交接铺平道路。君士坦丁大帝生前对此也作了详细的部署。在他去世的前两年，已经将广阔的帝国划分为五个区域，选定了各个区域负责防卫与治理的统治者，并将此决定公之于世。这是君士坦丁为了避免在自己身后发生继承权之争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他自己为了铲除对手，消耗了大半的壮年时期，个人的经历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内乱必须掐灭在萌芽期。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当年点燃内乱之火的，正是青年时期就野心勃勃的君士坦丁本人。

凭借着过人的本领登上权力最高峰的君士坦丁，膝下有四个亲生的儿子。不过，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儿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虽然获得了“恺撒”（副帝）的地位，却因为与继母、皇后法乌斯塔（Fausta）乱伦私通，被君士坦丁处死。同时被处死的法乌斯塔皇后生前与君士坦丁生有三个儿子，按照年龄顺序，依次是君士坦丁二世（Flavius Claudius Constantinus）、君士坦提乌斯（Flavius Iulius Constantius）、君士坦斯（Flavius Julius Constans）。君士坦丁去世时，他们分别是20岁、19岁和17岁，当时都已经拥有“恺撒”的称号。如果君士坦丁大帝将帝国交给自己的儿子们，似乎也很合乎常理，不过他没有这样做。

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Constantine Chlorus）在成为“副帝”之后，与第一任妻子、小酒馆老板之女海伦娜离婚，与时任“正帝”的马克西米安的女儿狄奥多拉再婚。对于君士坦丁而言，继母狄奥多拉所生的孩子，是同父异母的弟弟。君士坦丁去世时，他的两位异母弟弟还健在，并且各自都有两个儿子，他们的这四个儿子与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属于堂兄弟关系。

按照年龄的长幼，这四位堂兄弟分别是德鲁马特乌斯（Dalmatius）、汉尼拔利阿努斯（Hannibalianus）、加卢斯（Flavius

Claudius Constantius Gallus）和尤里安（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两位年长兄弟的具体年龄不详，似乎比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稍大一些，年幼的加卢斯和尤里安，在君士坦丁去世时，分别是12岁和6岁。

君士坦丁在去世前两年的公元335年，授予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恺撒”的称号，这意味着他指定的治理以及保卫帝国的继承人，除了三个亲生儿子，还加上了两个侄子，一共五个人。引发内乱的原因，并非一定是继承人本人的野心所致，很多情况下，是被那些反对现有势力或对现状心存不满的人当成了煽动的幌子。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两人的“皇室血统”，比君士坦丁的三个亲生儿子更加纯正，君士坦丁大帝将一部分权力分给他们，想必是想借此消灭内讧的可能性。在君士坦丁去世的前两年，他们已经在各自的地区，履行起统治者的职责。五位继承人各自所拥有的地域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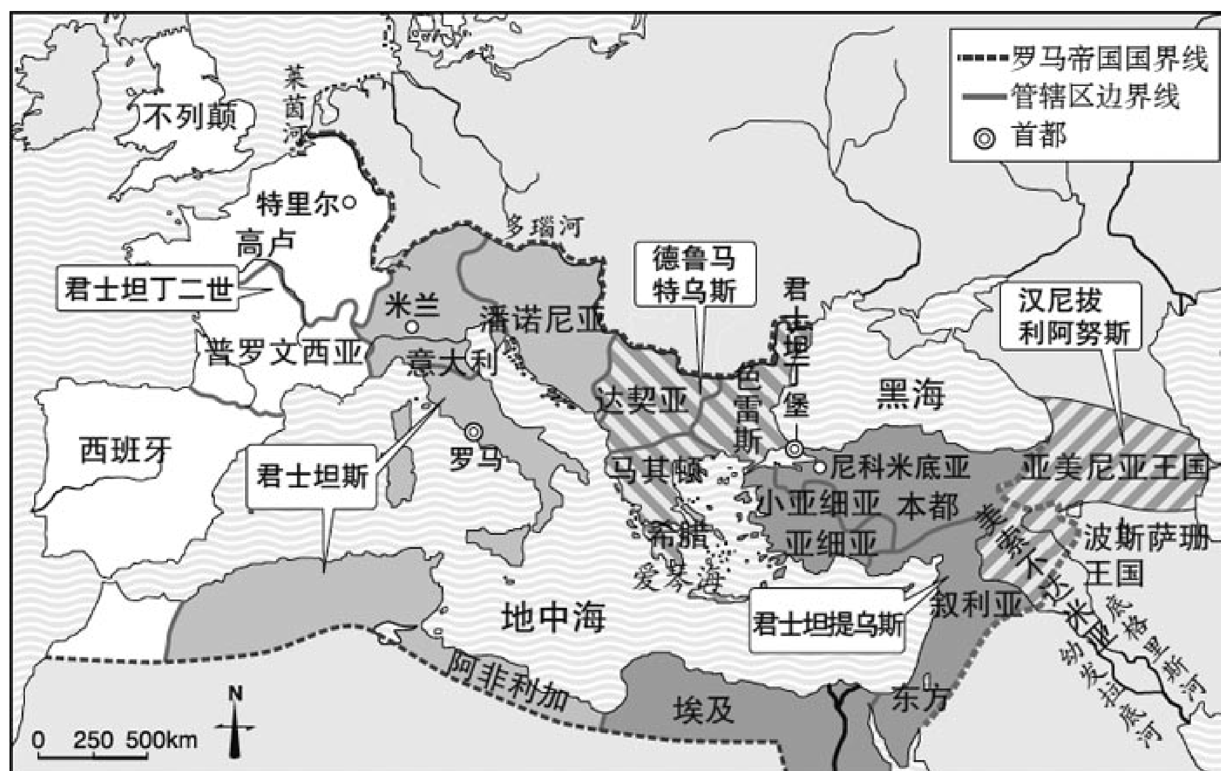
长子君士坦丁二世——高卢、西班牙、不列颠。

次子君士坦提乌斯——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

三子君士坦斯——意大利本土、潘诺尼亚、北非。

侄子德鲁马特乌斯——达契亚、色雷斯、马其顿、希腊。

侄子汉尼拔利阿努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亚美尼亚王国。



君士坦丁大帝的继位人事图

当时的亚美尼亚是由亲罗马派的国王所统治的独立王国。君士坦丁大帝远征波斯的真正用意，除了要战胜波斯王国，强化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势力之外，或许还希望彻底掌控亚美尼亚的统治权。因为波斯王国对这个地区觊觎已久，这里经常成为罗马与波斯战争的导火线。

如果能够实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其背后的亚美尼亚王国一体化，那么东方大国的心脏地带、富饶的美索不达米亚整个地区就尽在罗马掌控之下。按照现代的地理位置，这个地区是约旦、叙利亚以及土耳其三国，从地图上看，正好是从西、北两面包围住伊拉克的地形。君士坦丁大帝打算在这项战略目标实现之后，将这个地区交给侄子汉尼拔利阿努斯。为了加深与这位未来的亚美尼亚国王的关系，他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尼拔利阿努斯。这样，未来的亚美尼亚国王，不仅是罗马皇帝的侄子，还是他的女婿。

以上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安排的继位者人事。这项计划如果能够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大帝去世之后，就不会发生流血事件，皇位可以和平地转交到继承人儿子以及侄子们的手里。

大帝的遗体运回到帝都，大约是在5月底6月初前后。他是在5月22日去世的，从尼科米底亚到君士坦丁堡的距离不到100公里，因此，运送过程应该不需要花费太久的时间。尼科米底亚和君士坦丁堡都是临海城市，走海路似乎也很合情合理。不过，皇帝死后依然是光环人物，既然生前出行都要威风凛凛地率领着大批的军队，那么死后的葬礼势必也会声势浩大。所以，我觉得，运送大帝的遗体不太会选择便利但不引人注目的海路，而是选择陆路，穿越街道、村镇，行进在川流不息的大路上，引来众人的注目。如果是用牛车陆路运送，至少需要5天的时间。

据史料推测，君士坦丁的葬礼是在6月初举行的，自然是采用了基督教的形式。除了从安条克赶回来的次子君士坦提乌斯，其他两个儿子都没有能够出席。那时，长子君士坦丁二世正在莱茵河附近的特里尔，小儿子君士坦斯在多瑙河一带，由于距离君士坦丁堡路途遥远，又时值夏季，不宜拖得太久，最终，只有以下五位亲人出现在君士坦丁大帝壮观的葬礼上：

三位拥有“恺撒”称号、身兼副帝和皇位继承人身份的年经人——大帝的次子君士坦提乌斯、侄子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

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的生父，即已故大帝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弗拉维乌斯·德鲁马特乌斯。

弗拉维乌斯·德鲁马特乌斯的胞弟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Julius Constantius）。他是12岁的加卢斯和6岁的尤里安的父亲。两个孩子可能因为年纪太小，没有出席葬礼。

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期间，他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都没有能够凭借皇室成员的特殊身份而获得显要的公职或者担当过重要的国务，似乎是一直待在皇宫里虚度人生。

按照惯例，先帝的葬礼结束之后，元老院就应该立即作出决议，将“恺撒”升格为“奥古斯都”，即副帝晋升为正帝。然而，不知何故，元老院没有在公元337年6月通过这个决议。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正帝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就在这个时候，帝都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内发生了一场血腥的惨案。由于没有任何历史记录，所以无法确定惨案发生的具体时间，根据推测大约在7月的某一天。

除了君士坦提乌斯之外，出席葬礼的皇室成员全部遇害。大帝的其他亲属中活下来的只有12岁的加卢斯和6岁的尤里安。或许是因为他们年纪太小，让凶手动了恻隐之心，也可能是这场惨案的幕后凶手下令要保全两个孩子的性命。两位少年在无人保护的情况下，能够躲过一劫，其中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原因。

除了大帝的血亲，他生前的亲信也成了这场惨案的牺牲者，近卫军团长官阿布拉维乌斯便是其中一人。在公元4世纪的罗马，近卫军团长官虽属军职，实际却担任着首相的职务，权力次于皇帝。与阿布拉维乌斯同时遇难的，还有他手下的不少高官。

众多的位高权重者一夜之间死于非命，按常理判断，凶手必定在事前经过了周密的安排。如果背后没有一个清晰的指挥系统，皇宫内的屠杀行动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

然而，这场发生在帝国首都的皇宫内、死亡人数据说超过50人的血案，最终能够确认身份的只有四五个人而已。事情究竟发生在何月何日，直接行凶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一概不明。既然连这些基本的情况都不明不白，当然就更别想了解谁是真正的幕后主谋。即使众人心中存疑，在那个时代也只能噤声不语，更不敢留下只字片语。

包括两位副帝在内的大帝的四位亲属以及众多的重臣遭到了杀害，君士坦提乌斯终究不能够装聋作哑。毕竟，案发当日他人在现场的事实，众所周知。于是，这位19岁的年轻人发表了简短的声明。

声明表示，虽然他本人案发时在皇宫，但与此次事件毫无关系。凶手们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发动了这场暗杀，因为他们认为罗马帝国的皇位应该由先帝的三个亲生儿子来继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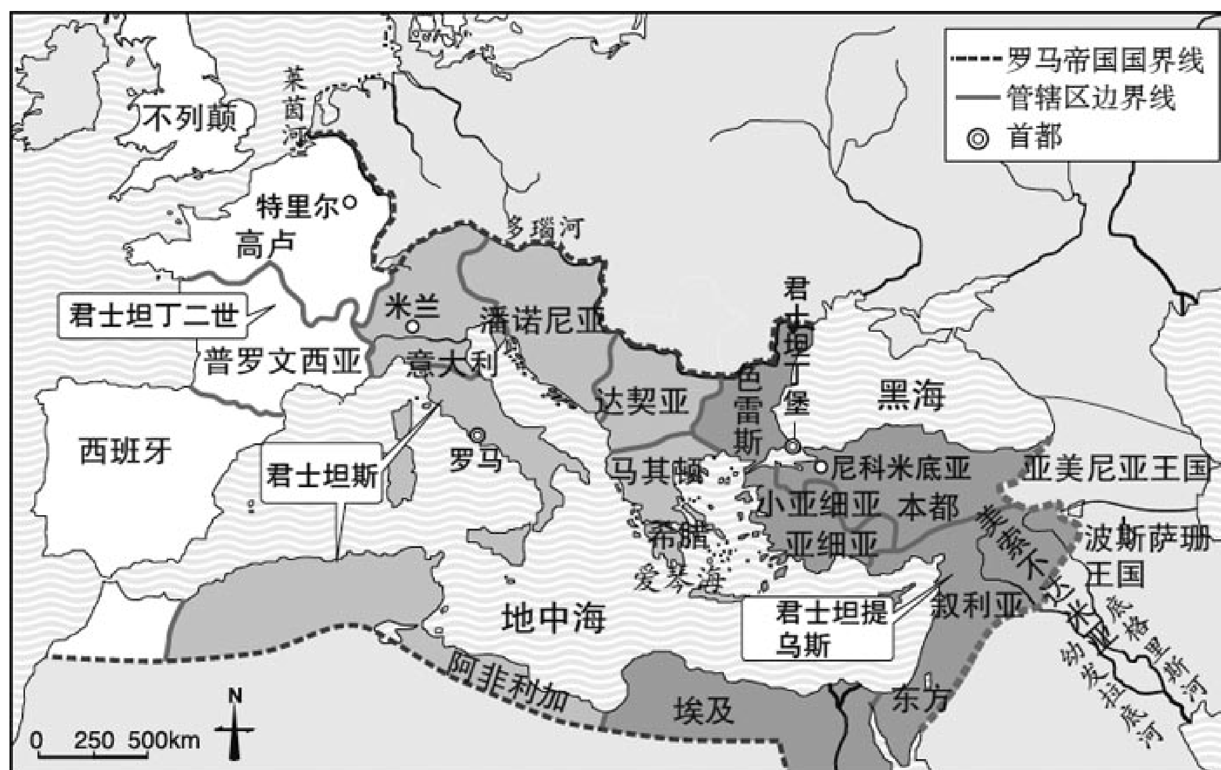
自打一开始，大家就认定大屠杀的行凶者是君士坦提乌斯手下的官兵。但是这些人的姓名从未被公开，也没有任何人因此受到惩罚。灾难中幸免的12岁和6岁的两位少年，托付给了由尼科米底亚主教晋升为君士坦丁堡主教的优西比乌（Eusebius），正是他为临终前的君士坦丁大帝主持了受洗仪式。优西比乌是与三位一体派对立的阿里乌斯派（Arianism）的代表人物。他非常清楚，君士坦提乌斯将两位王子交给他，并不是希望他能够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而是要他监视这两位潜在的皇位竞争者。优西比乌日后对于两位王子的管教异常严格，这种执着似乎不像是出于对皇帝的忠诚，而是来自他个人对基督上帝虔诚的信仰。

尽管皇室半数的成员以及众多的高官在一夜之间惨遭杀害，世间的反应却表现得异常迟缓，准确地说是沉默。仿佛巨大的岩石落入湖中，却没有溅起半点水花，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或许是因为事件之后需要一段冷静期，让那些双手沾满了鲜血、处于异常亢奋状态的刽子手逐渐恢复平静。尤其是这些人原本就以杀人为业，为了避免他们激烈的情绪进一步上扬而导致局势失控，必须加以严格管制。这对幕后主谋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事后处理。

血案的善后具体用了多少时间，不得而知。估计在一个月左右。因为9月之前，君士坦提乌斯离开了帝都，前往潘诺尼亚行省，他的胞弟君士坦斯在那里等候他。同时，长兄君士坦丁二世也从高卢出发，

来到这个濒临多瑙河中游的地区，这里军事基地的官兵人数远远超过了驻守帝都的部队人数。三位亲兄弟在大帝死后，首次展开了会谈。

被官方认定为由士官们自作主张杀死的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所属的领地，三兄弟经过磋商之后重新将它们分割。原本属于德鲁马特乌斯的多瑙河下游地区，作为抵御北方蛮族的防线，处于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如上图所示，被称为达契亚的多瑙河南岸以及南方的马其顿、希腊，划分到三弟君士坦斯的管辖之下；多瑙河汇入黑海的一带区域则归次子君士坦提乌斯所有。而原本属于汉尼拔利阿努斯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理所当然地被君士坦提乌斯所吞并。



君士坦丁大帝的三个儿子分别所属的帝国领土

三兄弟在领土分割问题上达成协议之后，立即派人携带文书，前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要求元老院承认他们从“恺撒”晋升为“奥古斯都”，即从副帝升为正帝的资格。两帝都的元老院毫无悬念地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

就这样，只有君士坦丁大帝的三位嫡子最后成功地获得了“奥古斯都”的称号。这也是继君士坦丁大帝之后，他的儿子们治国的开始。

帝国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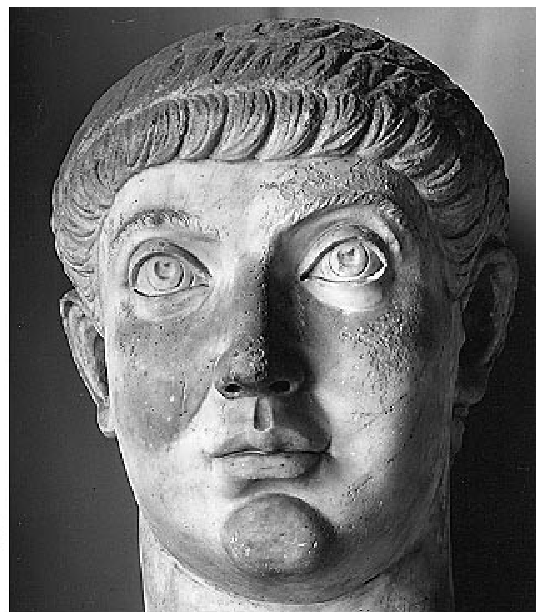
卓越不凡的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们继承了他的皇位。在经历了君士坦丁30年的统治之后，国家交给了年龄分别为20岁、19岁以及17岁的三个年轻人，自然会有许多人对此感到忐忑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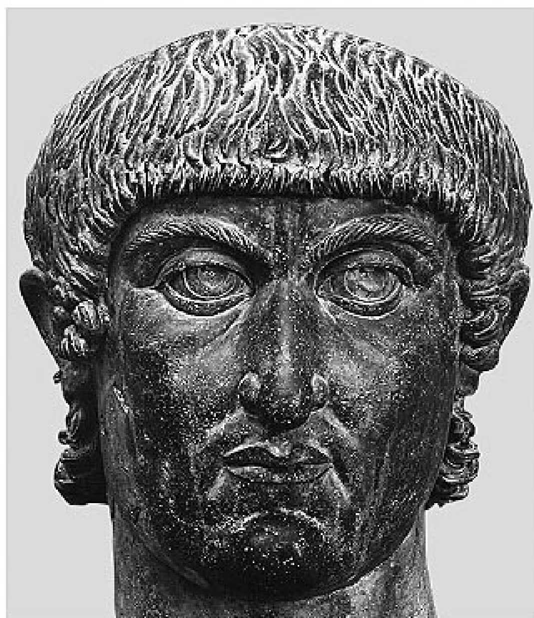
“皇帝”一词来源于军事用语“凯旋将军”（Imperator）。由此可见，罗马皇帝的首要责任是保卫帝国全体民众的安全。换言之，就是抵御外敌，以防国土遭受侵略。然而，继承了皇位、正式成为“恺撒·奥古斯都·皇帝”的三兄弟都没有上过战场。对此或许可以解释说，他们刚到入伍的年龄，或者是在父皇君士坦丁大帝强硬统治的时代，他们的少年时期没有发生过足以威胁帝国安全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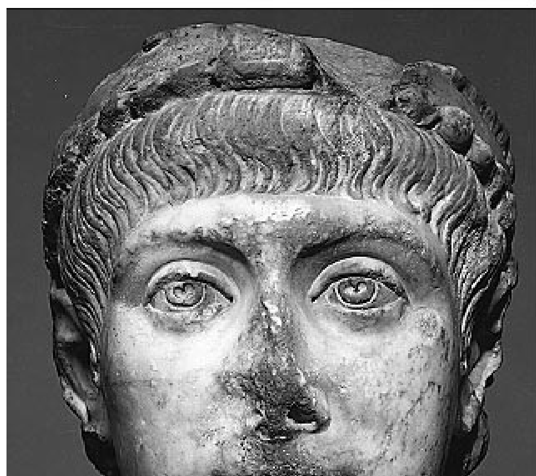
话说回来，将军的战绩通常取决于他在率兵打仗前建立起的人际关系。而探究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往往有助于了解其成年后的人际关系。然而，在君士坦丁大帝生前，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儿子，他们的私生活却完全不为人所知。不知道这是不是帝国末期的一个特征：对神灵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而对人的兴趣却日益消退。

这三位同胞兄弟，与亲信之间的关系非常之不同。长兄君士坦丁二世，在这方面完全不用心思，相反，次子君士坦提乌斯又用心过度，他甚至偏执地认为一旦做了皇帝，就是与最亲近的人也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性格谨慎但阴郁。而小儿子君士坦斯，则是典型的上流社会子弟的做派，一起打猎、吃喝聚会的玩伴，就是这位17岁阳光少年的知己。

要说三兄弟的共同之处，除了都没有军事上的实际成绩之外，还有另外两点：首先，他们都没有真正的朋友。其次，他们都是在宦官把持的宫廷中成长的。“宦官”希腊语称为Eunuchus，他们不仅是用来伺候统治者的妻妾，由于生理上的缺陷，被认为没有正常男人的野心，所以还是放在统治者身边的理想人选。重用宦官原本是东方专制君主国家的习俗，西方的罗马国家，不消说共和时代，就是进入了元首制时代，也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


长子君士坦丁二世


次子君士坦提乌斯





三子君士坦斯

然而，罗马帝国从戴克里先（Diocletianus）时代开始，皇帝的作风趋向于东方君主，皇宫内开始出现了宦官。不过，当时宦官的职权还仅限于类似官邸内的管家，直到进入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他们的权力才开始变大。从戴克里先皇帝开始的后期帝国，皇帝刻意与臣子拉开距离。而能够在两者之间穿针引线、为数不多的人物就是宦官，他们的重要性因此不断得到提升。

宦官们并没有放弃之前作为管家的权力，在君主专制的制度下，越是接近权力者，所能获得的利益就越丰厚。他们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集团和组织机构。这意味着，于公于私原本都应该属于皇帝的皇宫内，如今却布满了宦官的势力。

这股宦官势力，较之其他的小圈子更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虽然喜怒不言于表，但他们的内心都充满了对健全男人的仇恨。这种情绪发展的结果，自然就会在组织内形成一种与憎恨互为表里的嫉妒情绪。嫉妒容易演变为阴谋，为了自保而建立起的排他性组织，最终往往会变成间谍组织。公元3世纪的罗马皇帝们，如果对士兵的不满掉以轻心，会引来杀身之祸；而在公元4世纪，皇帝们则要时常提防着宦官们的嫉妒之心。日趋东方化的皇宫，没有宦官会陷入瘫痪，但过度听信他们的谗言，又可能会将国家的栋梁之才送上刑场。

一人退场

公元337年9月在潘诺尼亚行省，由三位“奥古斯都”（正帝）决定了分治帝国的方针。由于这是亲兄弟之间的协议，所以大家都认为能

够持续长久。何况，当初会谈的气氛平和，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争执。可是在议席上爽快答应的一个人，不久之后就开始起了疑心，感觉自己吃了亏。这种事后反悔型的人，身边如果有人能及时地给予提醒，让他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不过是一种被害妄想，那么事情可能也就到此结束了。可惜，君士坦丁二世的身边没有这样能够作出冷静判断的亲信，或者是因为这位才20岁出头、政治经验不足的年轻人，过度听信了宦官们的谗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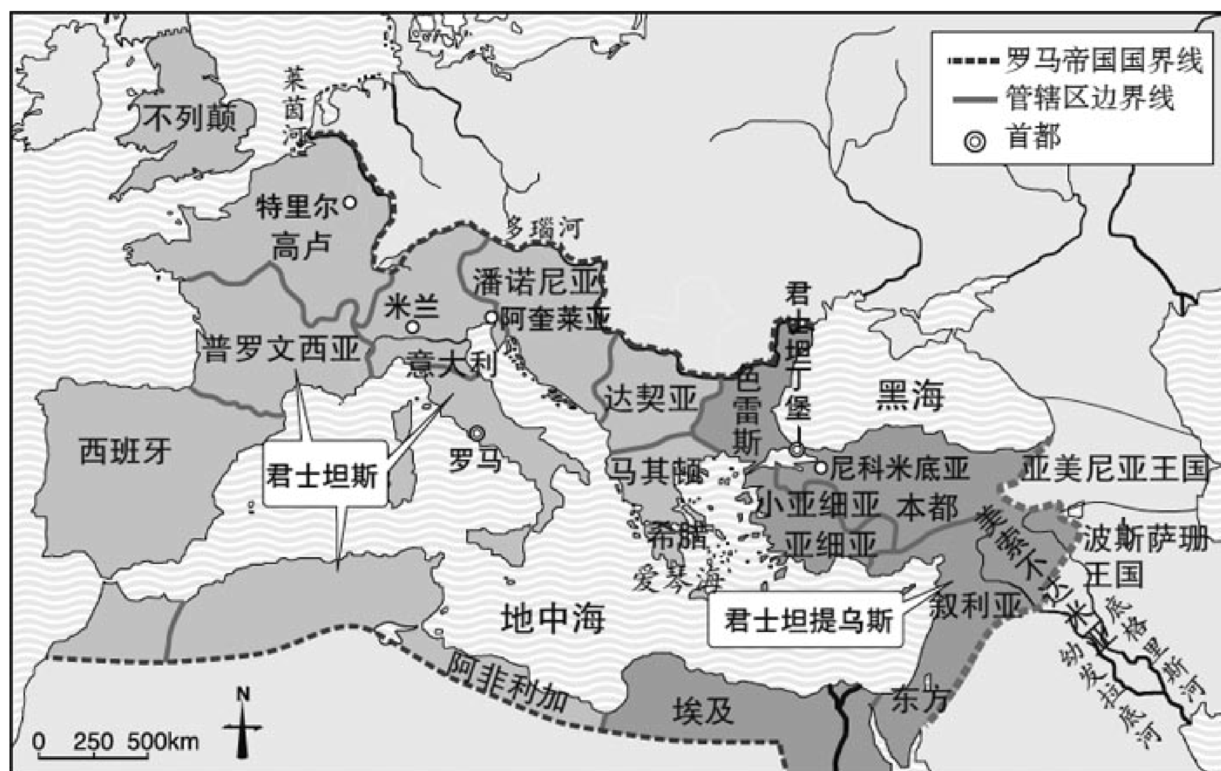
兄弟三人的会谈结束了，从多瑙河中游一带回到莱茵河地区没过多久，长兄君士坦丁二世满脑子全是受骗上当的想法。二弟君士坦提乌斯不仅全盘收获了被杀的汉尼拔利阿努斯所属的领地，而且还将德鲁马特乌斯所管辖的色雷斯也占为己有。三弟君士坦斯则接收了包括达契亚、马其顿以及希腊在内的德鲁马特乌斯所属的半数以上的区域，扩大了原本的势力范围。而君士坦丁二世作为长兄，却没有任何的改变，这让他深感不满。按理说，如果有什么要求，应该在事情决

定之前提出。不过，君士坦丁大帝的这位长子的性格似乎爱事后反悔。他向三弟提出了割让北非的要求，被君士坦斯一口拒绝。此刻，唯一能够介入兄弟之争的君士坦提乌斯又远在东方，波斯王国利用大帝死亡之际，正频频地发起挑衅，形势不容他返回西方调解兄弟间的纠纷。

于是，大哥与小弟之间就北非归属权问题争吵不断，小弟对大哥的要求好像没有完全当真，态度上有些敷衍了事，大哥终于忍耐不住了。

君士坦丁二世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攻入了意大利北部。这场军事行动尽管利用了君士坦斯前往达契亚、人不在军营的好机会，却没有在事前作好周密的部署。最初军队轻松地穿越了北意大利，但在前往君士坦斯的大本营潘诺尼亚的途中，遭到了君士坦斯部队的阻击。

这场发生在阿奎莱亚（Aquileia）附近的战斗，很快就决出了胜负。打了败仗的士兵四处逃散，无人护驾成了光杆司令的君士坦丁二世被俘，像一名小卒般地遭到杀害，遗体被扔进附近的河里。人在达契亚的君士坦斯，是在事后才从手下那里得知了长兄率兵袭击以及战败身亡的消息。君士坦丁大帝一世的长子，就这样早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年仅23岁。由于没有找到遗体，所以身后连墓碑都没有一块。他没有接受过洗礼，基督教教会对他的死也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君士坦丁二世死于公元340年，与他父皇的辞世仅隔了三年。



兄弟二人分治帝国

君士坦丁二世死后，有关他所属区域的分割，剩下的两兄弟竟然没有经过协商，三弟君士坦斯名正言顺般地接收了曾经属于长兄的不列颠、高卢以及西班牙。这位20岁的年轻人，如上图所示，占有了罗马帝国三分之二的疆域。作为二哥的君士坦提乌斯容忍了弟弟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甚至没有作出口头上的抗议。

一方面是因为他要全力以赴对付步步紧逼的波斯国王，没有余暇去处理帝国西部疆土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避免亲兄弟之间的纷争。虽然不是出于单纯的亲情，可眼下最要紧的是维持父亲留下的帝国的稳定，不断重复上演手足相残的惨剧，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轻率地挑起战争的长兄，在没有将整个帝国的西部卷入长期内战之前就离开人世，站在维持帝国安定的立场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幸事。而失去了统领的不列颠、高卢以及西班牙的全体军政要员，也非常不可思议地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新主子君士坦斯。

自此，罗马帝国三分之二的领土归属于君士坦斯，余下的三分之一由君士坦提乌斯管辖。这种局面从公元340年至公元350年，维持了10年，继位时年仅20岁的君士坦斯已经是30岁的成年人。

归属君士坦斯的帝国领土，按照现代地理位置，涵盖了西欧、中欧以至北非。一个年仅20余岁的年轻人竟然能够统治以及保卫着如此广大的地域，何况其中还包括了经常会遭受北方蛮族侵略的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这一点不得不让人钦佩。

君士坦斯并不像那些古代名将才华横溢，但在与入侵的蛮族的对抗中，他还是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战绩。其父皇君士坦丁大帝是一名优秀的战将，三兄弟中继承了父亲这份才华的，似乎只有君士坦斯。

包括了属于危险地带的莱茵河以及多瑙河在内的罗马帝国三分之二的领土，在一位非军事天才的年轻皇帝的统治下，国土安全之所以能维持10年之久，其实另有原因。君士坦斯的手下有一批优秀的将领，这些人都是先帝君士坦丁留下的遗产。大帝在选拔军事人才上，彻底贯彻了实力主义。不仅对罗马人不问社会阶层，即便来自蛮族，同样也有晋升将军的机会。

这项政策的执行，使得罗马军团作战会议的大半席位，都被那些一听名字就知道是蛮族出身的将领所占。当时的罗马军队，延续了元首制时代的政策，异族出身的军人，只要晋升为大队长，就能获得罗马公民权。若是掌握了罗马军的公用语拉丁语，这些异族人就是名副其实的罗马将军了。

但是，与公元1、2世纪时罗马军中那些行省出身的将领相比，公元4世纪的这些蛮族出身的军官，没有强烈的归属罗马帝国的意识。可这并不代表他们仍然心系故乡。莱茵河以及多瑙河的对岸，住着他们少年时的伙伴，阻击这些时常渡河入侵的同胞，正是他们的职责所

在。而在执行任务时，他们往往要比那些纯正的罗马人更加勇猛善战。

如果将这些蛮族出身的官兵算做一类的话，那么投入罗马皇帝麾下的蛮族军人还有另外一类。前者属于独狼般的独行侠，后者则是由族长率领整个部落，成了罗马军团的雇佣军。他们与罗马皇帝签下契约，在罗马军官的指挥下执行任务。对罗马军团而言，这些人增强了军队的实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这些人在为罗马军团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负面的影响。由于他们是以部落为单位集体行动，如果不以明确的方式让他们感受到加入罗马军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一旦他们集体投向敌营，十有八九会导致罗马军失利。

也许有人会不解，在元首制时代，除了行省出身的将官，罗马军中不是同样也有来自蛮族的士兵吗？他们的情况与当下有何不同呢？其实，在那个时代，罗马军队有足够的实力向投诚的异族人，提供各种他们乐于接受的条件。

第一，罗马军实力强大。虽然不能说百战百胜，但获胜的几率很高，这意味着军人活着服完25年兵役的可能性极大。

第二，主力军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士兵担任。行省以及蛮族出身的军人，只作为辅助兵力。所以，即使这些异族人叛变投靠敌方，也不会给罗马军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第三，作为保卫帝国的报酬，向异族军人颁发的罗马公民权，在当时有着相当的魅力。

军团规定，由行省民组成的辅助部队的大队长可以列席作战会议。或许是因为参加会议的人需要相应的身份，所以，在晋升大队长的同时，立刻就能获得罗马公民权。就算是一名下等士兵，在服完25年的兵役退伍之后，同样也可以得到罗马公民权。尽管后来卡拉卡拉

（Caracalla）皇帝修改了政策，向除奴隶之外的帝国全境所有的自由民颁发了罗马公民权，不过，这项唯独军人才能享受的特权，一直延续到公元212年。对于行省或蛮族出身的人而言，仅仅是不用再缴纳占收入一成的行省税这一项优惠，罗马公民权就有足够的吸引力。

罗马在共和时代，已经是“公民法”与“外国人法”并立的国家。公民权相当于现代人的国籍，因此外国人一旦取得了罗马公民权，就意味着他与世代拥有罗马国籍的本地人拥有平等的地位。倘若有足够的实力和运气，甚至可以敲开元老院的大门，成为其中的一员。

至于第四点好处，是退伍军人回归平民之后的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这个保障来自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制定的、在古代历史上唯有罗马帝国实施的军人退役金制度。即便只是一介士卒，退伍时一样可以以现金或土地的方式获得退伍费，这项制度既解决了退伍军人可能沦落为社会边缘人的人道问题，又消除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然而，元首制时代充分发挥了功效的以上四大优势，在公元4世纪的罗马帝国，完全适得其反。

其一，罗马军队获胜的机会很少。换句话说，打败仗已成为家常便饭，这意味着士兵战死或被俘的风险增大。

其二，行省或蛮族出身的军人成了主力军。

其三，罗马公民权不再限于有特定资格的人，帝国境内的出生者人人皆有，因此很少会有人为了获取公民权而冒死参军。

其四，由于退役金制度的瓦解，军人只希望尽可能长久地留在军中以获取俸禄。正规军20年的兵役期，已经成为历史旧话。当然，还是会出现一部分被淘汰、不得不退役的军人，这些人最终的出路就是作奸犯科，成为社会的败类。

以上就是公元4世纪罗马军的状况。率领这样的军队作战，那个时代的罗马皇帝们所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只要稍有闪失，就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人的退场

公元350年，君士坦丁大帝留下的帝国在长子死后，由次子和小儿子分治的局面，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此时，负责管辖帝国东部的二哥君士坦提乌斯32岁，帝国西部的统治者、小弟君士坦斯也已经30岁。这10年，君士坦提乌斯是在应付波斯王国不断的攻击中匆匆度过的。而统治西方的君士坦斯，为击退北方蛮族周而复始的挑衅，几乎消耗了所有的精力。君士坦斯将这10年的战果归功于他个人的军事才华，得意忘形之际，犯下了把内政交给他人管理的大错。所谓的他人，就是由宦官们结成的黑暗势力，他们像蜘蛛网一般布满皇宫。在君士坦斯统治的地区，征税者的利益不断膨胀，纳税人的生活每况愈下。这个地区可不是什么弹丸之地，而是占据了帝国三分之二的疆土。

留意到民众不满和绝望情绪的，是这10年来在君士坦斯皇帝麾下与蛮族人打仗、同样也是来自异族的将领。在罗马军中服役的异族军人中，他们属于第一类，即很早就与自己的部落断绝了关系，天涯孤独，无牵无挂。他们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与同胞厮杀，但是无法忍受最高司令官完全无视他们所作出的贡献。

虽然无法考证这些蛮族将官对皇帝的不满，是在何时爆发、又是如何酝酿而成的，但可以明确的，是君士坦斯手下蛮族出身的将领，同时也是主谋者的马格嫩提乌斯（Flavius Magnus Magnentius）在决定起兵造反时，得到了手下的支持。谋反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由谁来接替皇位。马格嫩提乌斯似乎预料到，如果由蛮族出身的他本人继位，

会伤害罗马民众的感情，因此他挑选了意大利出身、一直在君士坦斯手下担任行政官僚的马塞利努斯（Marcellinus）作为接位人。这个人好像世代都是罗马公民。

君士坦斯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击退来袭的蛮族，因此不会长久地驻扎在一地。一旦发现敌情，必须立即开拔。所以，军队长年累月不停地在转换战场。公元350年，君士坦斯率领的队伍由里昂前往巴黎，向北行进了约三分之一的路程，中途在欧坦宿营休息。

那一夜，不知是由哪一位出面招待，皇帝手下的所有将官都收到了宴会的邀请。然而，宴席上却没有看到他们的长官——君士坦斯皇帝的身影。大帝的这位30岁的小儿子喜爱打猎，每当部队换防到达一个新地方，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骑着马去营地附近的山中寻找猎物。众人同食共饮的宴会原本是与手下进行交流的一个好机会，可是君士坦斯优先选择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继承父位13年，屡屡击败蛮族发起的大规模侵略，也许是这些功绩让他产生了过度的自信，放松了警惕。

废除君士坦斯、拥立马塞利努斯继位，好像就是在那晚的宴会上决定的。宴会侍应的一个小奴隶听到将领们的对话，偷偷溜出会场，向君士坦斯作了通报。

得知消息的君士坦斯连夜逃跑。莱茵河附近的基地有其他的军团宿营，按理说他应该往东北方向逃，可不知为何他却选择了朝西南走。或许他打算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沿着西班牙行省一路南下，渡过古代称为“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抵达北非，然后以富饶的北非作为根据地，伺机卷土重来。

可是，君士坦斯在逃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山脚下时，被一队骑兵追上，骑兵队长大概接到了格杀勿论的指令，君士坦斯在被俘的同时遭

到杀害。尸体被遗弃在山野中，成了野狗的食饵，这就是统治了帝国三分之二领土10年之久的罗马皇帝的最终命运。

10年前兄长被杀，10年后小弟重蹈覆辙。君士坦丁大帝的三个儿子，如今只有次子君士坦提乌斯还在人世。罗马历史上大多时期是由一位皇帝统治整个帝国，所以目前的状况也可以看做是恢复了常态。君士坦提乌斯的父皇，在位最后的13年，也是帝国独一无二的奥古斯都（正帝）。

刚开始，32岁的君士坦提乌斯也打算独自一人担当起治理及保卫整个帝国的大任。可是，形势又不允许他在中东和西欧同时树敌。一面与波斯王国开战，一面又要歼灭欧洲的皇位篡权者，这绝对是无能为力。就算是帝国鼎盛时期的五贤帝时代的皇帝们，都尽量避免在距离遥远的两地同时开战，何况公元4世纪的罗马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



君士坦斯

君士坦提乌斯决定向波斯国王沙普尔（Shapor）提出休战，先解决大权被蛮族将军马格嫩提乌斯所操控的帝国西部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蛮族人的叛乱，帝国西部的不列颠、高卢、西班牙以及意大利，毫无疑问地会被日耳曼人占领。那么，大帝留下的罗马帝国在他儿子这一代就不得不失去西方的版图，只能屈尊为东罗马帝国。

我认为君士坦提乌斯优先解决西方问题的判断非常正确。这就像考试，先从那些易解的题目开始答起。对于公元350年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而言，虽然同时面临东、西两面的敌人，但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东方之敌波斯王国虽然不断挑衅，却没有进一步侵略到罗马境内。两国开战的战场，不是在长久以来作为罗马帝国与波斯王国疆界的幼发拉底河流域，而是在位于东面的底格里斯河附近。

相反，西方的敌人则是皇帝的手下，大多是蛮族出身的将领，因此是渗透在帝国内部的敌人，铲除他们是首要的任务。

其次是战场的所在地。仗是在对方的地盘上打，还是在本国境内，情况大不相同。如果想解决波斯问题，势必要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向位于其中部的首都发起进攻，这意味着战场在敌方境内。与之相比，欧洲本土有着完整的后勤供给系统，在国内打仗拥有相对的优势。



沙普尔二世

还有一点是君士坦提乌斯作为皇帝拥有的优势，那就是皇帝有权以叛国罪惩处杀害正统皇帝君士坦斯的谋权篡位者，加上叛乱者是军队的将官，所以还可以对他们再追加一条反叛最高司令官的罪名。也就是说，这些人同时触犯了帝国法律的刑事法和军事法。因此，皇帝作为帝国司法和军事的最高执行者，率军西进讨伐叛逆者的行为名正言顺，足以获得帝国民众的认可。民众认可等同于支持。这代表战争期间皇帝的军队在军粮补给等各方面都不会有后顾之忧。

出乎意料的是，波斯国王沙普尔爽快地答应了君士坦提乌斯提出的停战协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波斯军队向罗马最东端的城塞尼西比斯（Nisibis）发起的进攻接连失败，让亲自指挥战斗的沙普尔颜面扫地。古罗马时代的尼西比斯，现今是与叙利亚国境接壤的土耳其的努塞宾（Nusaybin）。公元338年，波斯军队曾经对这个城市发起了连续60天的进攻，之后在公元346年用了80天的时间以及眼下的公元350年消耗了百日以上，每每以失败告终。这主要归功于罗马军的顽强抵

抗，然而，在波斯方面看来，12年间发起三次进攻，都无法攻破尼西比斯这样一个小城塞，实属无能，沙普尔在宫廷内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战场失利的同时，波斯王国的东北部又遭到蛮族的入境。这个地区如今位于伊朗和阿富汗的北部。如果罗马的边境多瑙河流域遭到蛮族的大举侵略，罗马帝国的皇帝无论人在罗马还是在君士坦丁堡，都不能坐视不理。同样，波斯国王沙普尔也无法对设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在今伊拉克境内）的首都的危机袖手旁观。特别是像波斯王国那种君主专制色彩浓厚的国家，心怀不满的臣子们经常会利用外敌入侵的机会推翻现有的政权。因此对于波斯国王而言，对付侵略国土的北方蛮族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

鉴于以上的原因，罗马皇帝提出的停战协议，对于波斯国王沙普尔而言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停战协定之所以能够迅速地签署，正因为双方利害关系一致。这样，罗马皇帝无须担心东方的战情，集中精力对付西方的敌人，而波斯国王也可以心无旁骛地迎战来自北方的蛮族。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率军西进的消息，也传到了高卢的僭主马格嫩提乌斯那里。最初他考虑到自己是蛮族出身，恐怕引发民众的不满，推举了罗马的行政官僚马塞利努斯继位。可不久之后，这位傀儡皇帝便销声匿迹，最终还是由马格嫩提乌斯本人登基称帝。马格嫩提乌斯称帝之后，整个局势变得更加混乱和复杂。驻守在伊利里亚防卫多瑙河中部流域的军团，得知蛮族人称帝大为不满，进而也拥立了自己的司令官维特拉尼奥（Vetranio）为王。原本君士坦斯一人独占的地区，因此出现了两帝并立的情形。对形势深感不安的马格嫩提乌斯，向正朝西压进的君士坦提乌斯提出了和谈的建议。

马格嫩提乌斯提出的条件是，任命他本人为“恺撒”（副帝），负责高卢、不列颠以及西班牙行省的统治和防卫。作为交换，他的军队

绝不会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向东扩张。

君士坦提乌斯将马格嫩提乌斯派来谈判的使节团成员统统关进了大牢，只留下一个人，叫他把拒绝谈判的答复带回给马格嫩提乌斯。第二天，君士坦提乌斯召集重臣，发表了一段讲话，他表示拒绝谈判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君士坦提乌斯的这种手法，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托梦”曾是君士坦丁大帝生前最擅长的伎俩。

32岁的皇帝是这样说的：

> 昨晚就寝之后，君士坦丁大帝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双手抱着我惨遭杀害的弟弟君士坦斯，用他那熟悉的声音要求我，向杀害他儿子的人复仇，不得向任何人割让帝国的领土。他说，只要我听从父皇的忠告，他就会保佑我获得最后的胜利和不朽的荣光，戴上正义的冠冕。

在场的重臣们无人表示异议。既然是君士坦丁大帝托梦传达旨意，自然无法抗拒。君士坦丁大帝辞世13年，其荣威依然不减，而他儿子君士坦提乌斯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君士坦提乌斯虽然不打算与叛军妥协，但也没有立即出兵反击。他面前有两个敌人：一个盘踞在多瑙河中游地带，这个在后世被称为巴尔干的地区。这里在罗马时代盛产精兵猛将，君士坦丁大帝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另一个敌人尽管有着蛮族血统，但他目前所拥有的资源足够弥补他先天的不足。这位马格嫩提乌斯占据了高卢、不列颠、西班牙，这些是帝国疆域中罗马化历史进程最长、最富裕的行省。再加上拥护他的官兵大多也来自蛮族，很容易吸引居住在帝国境内的原蛮族人，或者边境附近的异族部落加入，在兵源上也占有优势。可以说，马格嫩提乌斯手中握有的兵力，完全不输给皇帝亲自率领的军队。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马格嫩提乌斯的部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公元4世纪的高卢已经成为一个饱受蛮族蹂躏的地区，既有渡过莱茵河从东而来的敌人，也有从北面的北海口逆流而上的。因此，负责这个地区防守的军人，个个都是身经百战。拥有这样一支强大军队的马格嫩提乌斯，在遭到君士坦提乌斯拒绝和谈之后，剩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开战。他一声令下，军队即刻投入了备战状态，只等第二年，即公元351年开春之后，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向东发起进攻。

如果在高卢的马格嫩提乌斯与在伊利里亚称帝的维特拉尼奥联手的话，君士坦提乌斯几乎没有胜算。因此，他决定先解决掉其中一个。他避开军事冲突，选择了外交谈判的方式。他准备谈判的对象是维特拉尼奥，此人具体年龄不详，能确定的是当时他已是一位年迈的老将。维特拉尼奥大半的军旅生涯似乎是在君士坦丁大帝麾下度过，因此，32岁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再一次利用了父皇的影响力。

君士坦提乌斯向维特拉尼奥提出了直接见面的请求。两人会谈的场所选在古罗马时代称为撒尔底迦（Sardica），即现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Sophia）。老将维特拉尼奥率领2万名骑兵以及数量超过2万人的步兵，总计4万多人的军队出现在索非亚。另一方的君士坦提乌斯也带着直系部队抵达会场。然而，庞大的军队不过是壮大声势的表面形式，首脑间真正的会谈，通常都是在桌面下展开。不知道私下的交涉中，君士坦提乌斯是否又言及了大帝托梦的内容，总之，老将很快就表明了态度，只要保证他引退后安全地生活，他愿意将军队完整地交还给君士坦提乌斯。

第二天早上，双方的军队聚集于索非亚的郊外，象征性地上演了一场集会仪式。首先由年轻的皇帝向老将喊话，要求他停止反抗皇帝的行为。紧接着，君士坦提乌斯手下的官兵们不停地欢呼、鼓掌，以示支持。受到气氛的感染，维特拉尼奥一方的士兵也开始加入呐喊的

行列。见此情景，君士坦提乌斯手下的几个士兵高呼口号，带动全场同声高呼：

“誓死打倒篡位逆贼！祝大帝之子胜利、万岁！我们愿在他的旗帜之下，奋勇杀敌！”

等到场面到达最高潮时，老将维特拉尼奥这才走到前方，取下头戴的王冠，放在了君士坦提乌斯的脚下。

集会前还拥戴维特拉尼奥皇帝的伊利里亚的4万名驻军，仪式一结束就并入了君士坦提乌斯的军队。从那以后，维特拉尼奥隐居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城镇普鲁萨（Prusa），在享受了6年的安逸生活之后离开了人世。

君士坦提乌斯解决了一个敌人，还剩下另一个更强势的对手，这个人也是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

马格嫩提乌斯似乎下定了决心，要与君士坦提乌斯死战到底。他任命自己的弟弟德森提乌斯（Decentius）为“恺撒”（副帝），自封为“奥古斯都”（正帝）。另外，君士坦丁大帝的女儿君士坦提娜（Constantina）也与这位蛮族出身的篡位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君士坦提娜在丈夫被杀之后，移居罗马，她可能是利用君士坦提乌斯远在巴尔干地区的机会，与在高卢的马格嫩提乌斯频频接触。

君士坦提娜的丈夫是原本要成为亚美尼亚国王的汉尼拔利阿努斯，在13年前的皇宫血案中遭到杀害。丈夫死后，君士坦提娜一直过着寡居的生活。她对杀害了丈夫、让她失去了亚美尼亚王后宝座的兄长，一直充满了仇恨。可能她认为嫁给称帝的马格嫩提乌斯，就可以成为帝国西部统治者的妻子，得到作为大帝之女原本应有的地位。至于她准备再嫁的这个男人，是不是杀害她另一位兄长君士坦斯的凶手，对她来说已经无关紧要。

对于君士坦提娜的示好，马格嫩提乌斯的态度显得十分积极。他非常清楚，自己即便称帝，毕竟出身不佳。若能与君士坦丁大帝的亲生女儿结婚，会给他带来莫大的利益。而对于君士坦提乌斯而言，他必须在妹妹的计谋得逞之前，歼灭马格嫩提乌斯。但是，这时候的君士坦提乌斯，又面临着另一个让他烦恼的问题。

没人能够保证波斯国王沙普尔会坚守停战协议。按照以往的经验，一旦波斯国王成功地击退了从东北方入侵的蛮族，他的注意力势必又会转回西方。如果形势果真如此发展，那么驻守东部的罗马军，在最高司令官缺席的情况下，很难说能抵抗得住波斯军队的攻击。而西部的对手马格嫩提乌斯，又气焰高涨，不知何时才能决出胜负。东部的安全问题让君士坦提乌斯始终放心不下。

终于，君士坦提乌斯决定要任命“恺撒”。他打算派副帝驻守叙利亚的安条克，负责监视波斯王国的动向，治理和保卫帝国东部的领土。如果东部有副帝把持，那么他这个正帝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对付西部的敌人。

可这个决定又让另一个新的问题浮上台面：帝国目前没有适当的副帝人选。

副帝加卢斯

公元351年，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中，唯一在世的就剩下年届33岁的君士坦提乌斯。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这位人物给我的印象，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让人啼笑皆非。他的确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不过，这似乎也不能完全代表他的性格。他做事毛毛糙糙，顾头不顾尾。偏偏这又并非出于他的本意，所以才会让人啼笑皆非。在付诸行动之前，他通常会考虑再三，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有违初衷。到头来，

他不得不为自己一手造成的恶果而不停地补救。追溯此人的一生，真是苦笑连连。

由于没有确凿的历史资料，研究人员通常都会回避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从历史研究，而是从犯罪调查的角度分析，大帝死后不久，血洗皇宫的幕后凶手，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君士坦提乌斯。大帝的这位当时20岁的次子，可能以为只要除掉两位堂兄弟，帝国就可以属于自己亲兄弟三人，所以才会大开杀戒。但结果又如何呢？兄弟三人坐拥天下的局势维持了不到三年，长兄便死于非命，10年之后小弟又遭杀身之祸，只剩下他孤身一人留在人世。

如果父亲死后，他没有杀害两位堂兄弟的话，他们中的一人汉尼拔利阿努斯就会成为亚美尼亚王国的国王，那么当他在西部讨伐马格嫩提乌斯时，汉尼拔利阿努斯势必会代替他，担当起统治东部领土的职责。汉尼拔利阿努斯管辖下的北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亚美尼亚王国直接面临波斯王国的威胁，因此，击败波斯的最大获利者不是管辖整个帝国东部的君士坦提乌斯，而是汉尼拔利阿努斯。

同样，如果德鲁马特乌斯没有成为皇宫血案的牺牲者，处理效仿马格嫩提乌斯称帝的维特拉尼奥，或许就不需要君士坦提乌斯亲自出马。因为当初君士坦丁大帝分给德鲁马特乌斯的多瑙河下游地区，就在维特拉尼奥的军事基地的边上。

君士坦提乌斯杀了这两位有足够的条件和资格来与他分担治国大业的堂兄弟。结果，他为了全力对付西方的敌人，不得不与波斯国王缔结休战协议。其实当时的战况有利于罗马，对于士气高涨的罗马军和当地民众而言，中途停战是一个非常令人惋惜的决定。

但是，放弃了胜利在望的战果，并不等于波斯王国就一定会信守协议。如果皇帝及其军队长期滞留西部，免不了会造成无视东部的印象。杀了两位堂兄弟，又失去了两位亲兄弟的君士坦提乌斯左右为

难，偏偏身边又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33岁的君士坦提乌斯膝下无子，就算是选一位挂名的“恺撒”，也找不到一位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人。

一筹莫展的君士坦提乌斯终于想到了他要找的人。在他父亲死后遭到肃清的君士坦丁家族中，有汉尼拔利阿努斯和德鲁马特乌斯两位“恺撒”，以及他们的父亲和叔父。叔父的两位年幼的儿子在那场灾难中侥幸存活，他们后来被送往邻近亚美尼亚的小亚细亚山区，在基督教主教的严格看管下，过着实为囚禁的生活。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君士坦提乌斯曾经关心过这两位少年，看来他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才想起了他们的存在。他杀了他们的父亲，现在却不得不提拔他们中的一人为自己的副手，君士坦提乌斯作出这个决定时，心情一定是百般纠结。

公元351年，被擢升为副帝的加卢斯在帝国东部最大的城市安条克，开始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新生活。父亲被杀时年仅12岁的他，此时已经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加卢斯成为“恺撒”的同时，也奉命娶了皇帝的胞妹为妻。此女子就是被杀的汉尼拔利阿努斯的未亡人君士坦提娜，她因为与马格嫩提乌斯关系密切而让其兄焦虑不安。君士坦提乌斯大概是在决定代替他本人负责帝国东部的人选时，就想好要将这位惹是生非的妹妹一并打发。加卢斯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年届20岁的尤里安。加卢斯荣升副帝，让他也摆脱了禁闭的生活，获准在小亚细亚以及叙利亚附近做一名哲学门徒。

也许是因为放下了东部这块心中的大石头，君士坦提乌斯重新恢复了与马格嫩提乌斯决战到底的信心。总司令的态度感染了官兵们的情绪，春夏两季与敌方对峙相持不下、陷入胶着状态的军队，又重新燃起了跃跃欲试的斗志。

叛将马格嫩提乌斯

公元351年，在巴尔干地区与君士坦提乌斯对决的马格嫩提乌斯及其军队，曾经立下赫赫战功，可谓久经沙场。士兵的人数虽然不到4万人，但是除了高卢人、西班牙人这些罗马军团中传统的异族军人之外，还有日耳曼人、法兰克人、撒克逊人。这些人对于4世纪的罗马人而言，是国境对面的野蛮民族。在元首制时代，罗马军团的主力军由罗马公民担任，如今则是由高卢、西班牙以及法兰克和撒克逊等异族所组成。原本罗马人组成的军队清一色的深褐色头发和眼睛，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金发碧眼。率领这支罗马人与蛮族人混合军团的，正是蛮族出身的马格嫩提乌斯。尽管军队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实力却足以和数量在2倍以上的君士坦提乌斯的军队抗衡。对于这个事实，就是君士坦提乌斯手下的官兵也不得不承认。

两军对决，战场选在了由德拉瓦（Drave）河与多瑙河冲积而成的一块辽阔的平原，这里位于现在匈牙利与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交界处。君士坦提乌斯之所以执意挑选此地作为战场，是因为24年前，他父亲君士坦丁大帝就是在这里击败了其生命中最后一个对手李锡尼。水量充沛的德拉瓦河从这里注入宽阔的多瑙河，流域附近的平原正适合打仗。不愧是君士坦丁大帝，挑选战场的眼光也是一流。

然而，君士坦提乌斯与他擅长快攻的父皇不同，做事小心谨慎。尽管手中拥有着超过敌人2倍以上的兵力，却迟迟不发出进攻的命令。两军在按兵不动、互相对峙的情况下，度过了春夏两季。直到秋天，君士坦提乌斯的态度才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那是因为副帝加卢斯接手东部，消除了他的后顾之忧。这位才30岁出头的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不像是一位年轻人，心里稍有一点事，行动就会受到影响。他本质上是一位胆小怯懦的人。

所幸的是，他父亲去世14年，余威犹在。具体来说，就是军中还有不少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老兵。其中一位法兰克人出身的骑兵团团长西尔瓦（Sylvanus）带着他的手下，抛弃马格嫩提乌斯，投奔了大帝之子君士坦提乌斯。马格嫩提乌斯的兵力因此减至3.6万人，相反，君士坦提乌斯的队伍则超过了8万人。

发生在公元351年9月28日的会战，没有如君士坦提乌斯所愿，在他父亲赢得最终胜利的幸运之地西巴莱（Cibalae）展开，而是在距离西巴莱以北30公里的穆尔萨（Mursa）平原上。马格嫩提乌斯的阵营，从左面可以望到德拉瓦河，君士坦提乌斯的队伍则部署在相反的一侧。

按照惯例，总司令君士坦提乌斯向蓄势待发的士兵发表了一通激励军心的演讲，然后离开战场，退到后方的教堂，一边祈祷，一边等候战报。而他的对手马格嫩提乌斯则自始至终站在前沿阵地。

清晨太阳升起时，双方就开始列阵，但直到阳光照到头顶，仍然没有动静，两军就这么互相对峙着。

正午之后，按兵不动的局面终于结束，不清楚是哪一方先发起了进攻，会战这才正式开始。以往罗马军会战时，既能坚守一贯的战略，同时又有多种随机应变的战术。然而，这场会战却毫无组织性，士兵像一群脱缰的野马，乱冲乱撞。进入公元4世纪之后，罗马军的战斗风格似乎也偏离了传统，日趋蛮族化，仅依靠暴虎冯河的匹夫之勇，不讲求战斗技术和用兵法则。正因为如此，这场穆尔萨会战打到日落之后，依然不分胜负，直到君士坦提乌斯的骑兵团打垮了马格嫩提乌斯的步兵部队，这才彻底地扭转了局势，输赢终于定局。

由于长时间的正面冲突，双方死伤惨重。马格嫩提乌斯3.6万人的手下有2.4万人战死，胜利一方的君士坦提乌斯8.5万人的军队也有3万人横尸沙场。两军合计总共损失了5.4万人。这是一场内战，死去的官

兵都属于罗马军团，根据仅有的一些历史资料记载，他们大多是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这就是为何一场内战，却让后世视为导致罗马帝国军事力量根本衰退的原因。

尽管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马格嫩提乌斯还是成功地率领着残余的部队逃离了战场。他们一路沿着德拉瓦河上游，翻越古今都称为“尤里安阿尔卑斯”（拉丁语：Alpes Iuliae，意大利语：Alpi Giulie）的山脉，进入意大利境内，一直逃到意大利半岛最北端的重要城市阿奎莱亚。如果以现代地理位置来说，马格嫩提乌斯一行，等于是沿着匈牙利边境，横穿克罗地亚，经过斯洛文尼亚，最后抵达意大利。或许不能说马格嫩提乌斯是逃亡，而应该称之为撤退。他虽然出身蛮族，但无疑是一位具有军事才华的将领。马格嫩提乌斯打算以这个意大利北部城市作为基地，准备东山再起。

而另一方，生性小心谨慎的君士坦提乌斯没有乘胜追击。话说回来，在当时的形势下，他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君士坦提乌斯没有立即攻打马格嫩提乌斯盘踞的意大利北部，而是优先选择了夺回属于敌人势力范围的西班牙和北非。这就是所谓的“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马格嫩提乌斯在意大利苦候一年，却无所作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的军队在夺回北非之后，又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收复了西班牙。

如果伊比利亚半岛再落入皇帝的手中，他势必会攻打到比利牛斯山脉一带。原计划在意大利北部迎击君士坦提乌斯军队的马格嫩提乌斯，明知自己的老巢高卢已岌岌可危，还是决定返回，将根据地设在了里昂。

400年前的公元前1世纪，尤里乌斯·恺撒征服了高卢，将它划归罗马版图。他对高卢采用了罗马式的统治，允许被征服的各个部落（包括零星的小部落在内，数量超过了100个）在他们原来的居住地继续生

活。之后，继承了恺撒遗志的奥古斯都，又在那里建设了类似于现代高速公路的罗马式道路网，将这些部落的根据地连接在一起。因此罗马时代的高卢地区即现代法国的主要城市，基本上都是在被恺撒征服之后，从原本的部落村庄发展成罗马式的城市。唯有里昂是一个例外，它完全是由罗马人兴建而成。最初这里似乎也有一些零散的部落，但规模很小，不能与占据高卢各地的其他族群相比。总之，里昂是按照罗马人的思路，从无到有打造出的一个新型城市。



吕格杜努姆复原模型图

打开在古罗马时期被称为“吕格杜努姆”（Lugdunum）的里昂地图，我们马上就能明白，罗马人为何会决定在此地建造新的城市。这里位于索恩河（Saone）与罗讷河（Rhone）的交汇处，两河之间的半岛面积超过了巴黎。在军事上具有防卫的意义，同时又能作为都市而发展。罗马人最喜爱这种概念上看似矛盾、实际上却能同时达到目的的地理环境。所以，罗马帝国时代的里昂，不仅是里昂行省的省会，还被视做整个高卢地区的首都。

在元首制时代被称做“防线”的莱茵河流域，沿线都设有军团基地，因此，在高卢内部的城市几乎看不到罗马士兵的踪影。只有里昂始终保持了一个大队的驻兵，人数在1000人。在帝国西部的领地上，

有军团大队常驻的城市，除了里昂之外，就是迦太基。迦太基是丰富的北非物产的集散地，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而里昂，则早在开国皇帝时代，就建有钱币铸造厂，专门铸造管辖权属于皇帝的金币和银币。

元首制时代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驻守莱茵河沿线的军队总司令官，如果冬季休战期间不返回罗马，就会回到里昂的总司令官的官邸过冬。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就是在其父德鲁苏斯担任总司令期间，于里昂出生的。公元1—2世纪时期的里昂，重要性远远超过巴黎西（Parisii）人的根据地巴黎，也就是现在法国的首都。正因为如此，出身蛮族但极其熟悉高卢的马格嫩提乌斯，才会决定坚守住里昂这个大本营，准备与皇帝的军队决一死战，只不过他的英勇气概没等到真正发挥的那天，就已灰飞烟灭了。

尽管高卢一些城市的人民，曾经一度追随马格嫩提乌斯，但他们对局势变化非常敏感。首先是特里尔（Trier）变节，向被马格嫩提乌斯立为共同皇帝的德森提乌斯关上了城门，接着其他城市纷纷效仿，他们对马格嫩提乌斯本人的态度也不同以往。公元353年8月11日，回到高卢一年的马格嫩提乌斯，对日益恶化的形势深感绝望，在里昂自杀。德森提乌斯闻讯后，在第二天的早晨，步兄长之后尘上吊自尽。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用了3年的时间，终于平定了弟弟君士坦斯被杀后引发的内战，在35岁时像其父皇那样，成了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皇帝。他最后的对手是自杀身亡，可以说是不战而胜。然而，君士坦提乌斯对这个结果并不满足，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就地处死了马格嫩提乌斯的所有部下，连将这些人关进大牢似乎都觉得是多此一举。整个行刑的过程残酷无情、完全彻底，其他一些非军职人员，虽然幸免一死，却没有能够逃脱流放以及没收家产的命运。像君士坦提乌斯这种生性怯懦的人，反而会有比常人更暴虐的一面。

经过这一场彻底的肃清，高卢实质上变成了不设防地区。军队仅靠士兵的人数，并不足以构成军事力量，必须要有指挥的将领。公元

351年发生的穆尔萨会战以及公元353年进行的这场屠杀，使得驻守莱茵河以及在北海防线抵御北方蛮族侵略的罗马军团丧失了几乎所有中上级的将领。此时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虽然一兵未发就成功地击败了敌人，可是情况并没有好转，高卢的形势还是和造成了5.4万人死亡的穆尔萨会战结束后一样，非常之糟糕。接下来让他烦恼的，当然就是如何处理无防卫状态下的高卢的安全问题。

所谓的组织，规模无论大如帝国，还是小至数名工匠组成的手工作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必须要有协助者。因此，如何找到优秀的协助者，对于组织的领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追溯罗马的历史，可以发现统治者们在使用协助者时，通常会有以下两种不同方法:

一、如果第一次失败，还会再给第二次机会，并且发现对方的所长，给予发挥的机会。

二、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没有下一次。做不好即刻换人。尤其是罗马帝国后期的皇帝，统治手段趋向东方君主专制国家，失败者通常都会遭处死。

君士坦提乌斯自公元337年继承皇位到公元361年死去，在位24年。虽然最初的3年是兄弟三人分治，之后的10年与弟弟分担帝国的东西两部，但他始终是正帝“奥古斯都”。因此作为皇帝，他统治国家的时间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他的父亲，享有大帝尊称的君士坦丁，在成为“奥古斯都”之后，治国时间也有25年，罗马帝国有半个世纪掌握在他们父子的手里。

父子二人统治国家的手段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最明显的不同，可能就是对于协助者的态度。儿子君士坦提乌斯最擅长的就是使用上述的第二种方法。

公元353年夏天，出身蛮族的将领马格嫩提乌斯自杀身亡，这对君士坦提乌斯而言，既报了杀弟之仇，又收回了被占领的西方领土，性格阴郁的他，也因为喜悦和安心而变得开朗。虽然花了3年的时间才解决了篡位者，但他毕竟没有对帝国西部的混乱局势置之不理，当初决定与波斯国王休战，优先解决西部问题，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然而，君士坦提乌斯虽然只有35岁，但他的精神年龄并不年轻。他思想僵化，不懂得随机应变，在他看来，所有的麻烦都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处理。

这种性格的人，通常会将心中的不安隐藏起来。尽管大多数人都看不出来，但他身边的人可以察觉到。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比他父皇所教导的更加遵守礼仪规范。他父亲生前始终与臣子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他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与属下之间沟通，唯一的渠道就是高等宦官优西比乌。也就是说，臣子们要向君士坦提乌斯通报，都必须通过优西比乌。

由于宦官没有子嗣这类血亲，因此在视忠心高于才能的专制宫廷中被委以重任。同为权力者的手下，他们依附于主子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正常的男子。

正因为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宦官们有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最关键的就是操控主子的情绪，使之向有利于自己一方发展。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主子始终心怀不安。只要烦恼不断，主子就会不断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宦官优西比乌尤其擅长此道。他虽然长得肥头大耳，却心思缜密，手段巧妙，或许这是他唯一的生存方式。

兄弟之间

加卢斯是在公元351年3月25日就任“恺撒”（副帝）的，因此事情的原委要追溯到两年之前。当时帝国的东部缺少负责军事安全的统领，长年被强行幽禁的加卢斯，突然收到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召唤，不出几日，就被正式任命为“恺撒”。

君士坦提乌斯任用的加卢斯是14年前被他杀掉的叔叔之子。君士坦提乌斯将这位堂弟提拔到地位仅次于自己的副帝，完全是因为要全力以赴地对付马格嫩提乌斯而做出的无奈之举。君士坦丁大帝的血亲中还在世的只剩下当时26岁的加卢斯和他20岁的弟弟尤里安，所以这个任命并非基于当事人的能力。当然，临危受命的一方如果能够善用机会，有所发挥，也可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实力。可是，加卢斯似乎缺乏这种志向。

作为皇宫血案的牺牲者，加卢斯的父亲已经去世14年，而他的母亲在他年幼时就不在人世了。母亲死后，他父亲再婚，生下的孩子就是尤里安。君士坦丁大帝死后不久发生的那场虐杀，兄弟俩虽然侥幸逃生，但是他们的父亲、伯父以及两位堂兄弟都死于非命。这对12岁和6岁的兄弟成了孤儿，而他们的监护人正是杀害他们父亲的凶手君士坦提乌斯。

父亲死后最初的六七年，他们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某处生活，之后迁居尼科米底亚的外祖母家中。他们过着毫无自由的生活，不得做出任何违反监护人君士坦提乌斯意志的事情，甚至连读书的课本，都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按照君士坦提乌斯的指示，兄弟俩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这位皇帝虽然没有受过洗礼，却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

所幸的是，在尼科米底亚生活期间，两兄弟的教师除了严格的阿里乌斯派的圣教徒，还有一位名叫马多尼乌斯（Mardonius）的去势奴隶。马多尼乌斯是斯基泰（Scyths，Skythai）人，曾经是尤里安亡母

幼时的家庭教师。相比于高高在上的神父，这位奴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教师。

古代被称为斯基泰的地区，位处现在乌克兰的南部。出身于斯基泰的马多尼乌斯怎么变成了去势奴隶，无从查考，他是在何时何地学习了希腊文化也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就是这位老奴隶尽心尽力将他热爱的希腊古典哲学和文学，传授给了两位少年。马多尼乌斯向兄弟俩朗读古希腊哲学家们的作品，解释其中的含义，并且要求他们阅读和背诵荷马、赫西奥德（Hesiod）、品达（Pindarus）的作品。马多尼乌斯不仅要求他们阅读文学作品，而且希望通过背诵，让孩子们完全沉浸到文学的世界里，充分享受文学带来的乐趣。两个学生中，像海绵吸水般吸取知识的，是弟弟尤里安。这段学习经历使他没有成为一个跪拜在至高无上的基督脚下的教徒，而是在充满人性的希腊诸神的围绕下快乐成长。

在哥哥加卢斯十八九岁、弟弟尤里安十二三岁时，两人的生活发生了突变。由于没有确凿的史料，只能说他们大概是在这个年龄，从帝国东部屈指可数的大都市尼科米底亚，被转移到小亚细亚的山中古堡生活，其中缘由不得而知。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受皇帝之命监视兄弟俩的主教的去世，也有人认为是收养他们的外祖母的亡故。更有甚者指出，这是宦官优西比乌向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进言，让这对兄弟留在人多口杂的尼科米底亚是一种危险。总而言之，从这个时期开始兄弟俩的生活环境一落千丈。

他们被遣送之地是卡帕多西亚的马塞鲁（Macellum）。不过，199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Barrington Atlas of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巴灵顿希腊罗马世界地图集》。——译者注）中并未记载此地。卡帕多西亚附近的恺撒利亚（Caesaria）是一个拥有四条罗马大道的都市，但位于近郊的马塞鲁则是个王孙贵族们外出狩猎时才会去的地方，充其量算做一个比较热闹的村落。马塞鲁被认定是卡

帕多西亚国王狩猎时所用的城池，它在卡帕多西亚成为罗马行省之前应该就已经存在，有300余年的历史。这里在成为罗马行省之后，归属于罗马皇帝，但从没有一位罗马皇帝在这座古城堡中滞留，享受狩猎的乐趣。当年哈德良皇帝曾经前往邻接同盟国亚美尼亚王国的卡帕多西亚行省，巡视边境防卫线。热爱打猎的哈德良皇帝，也没有挪步前往这个矗立在荒野中的马塞鲁古堡。虽然说这里四周没有郁郁葱葱的森林，但打猎并非一定要选个鸟鸣水清的地方。譬如说，在非洲的草原上，以猎杀猛兽为乐；而在古代中东人的定义中，打猎就是打老虎和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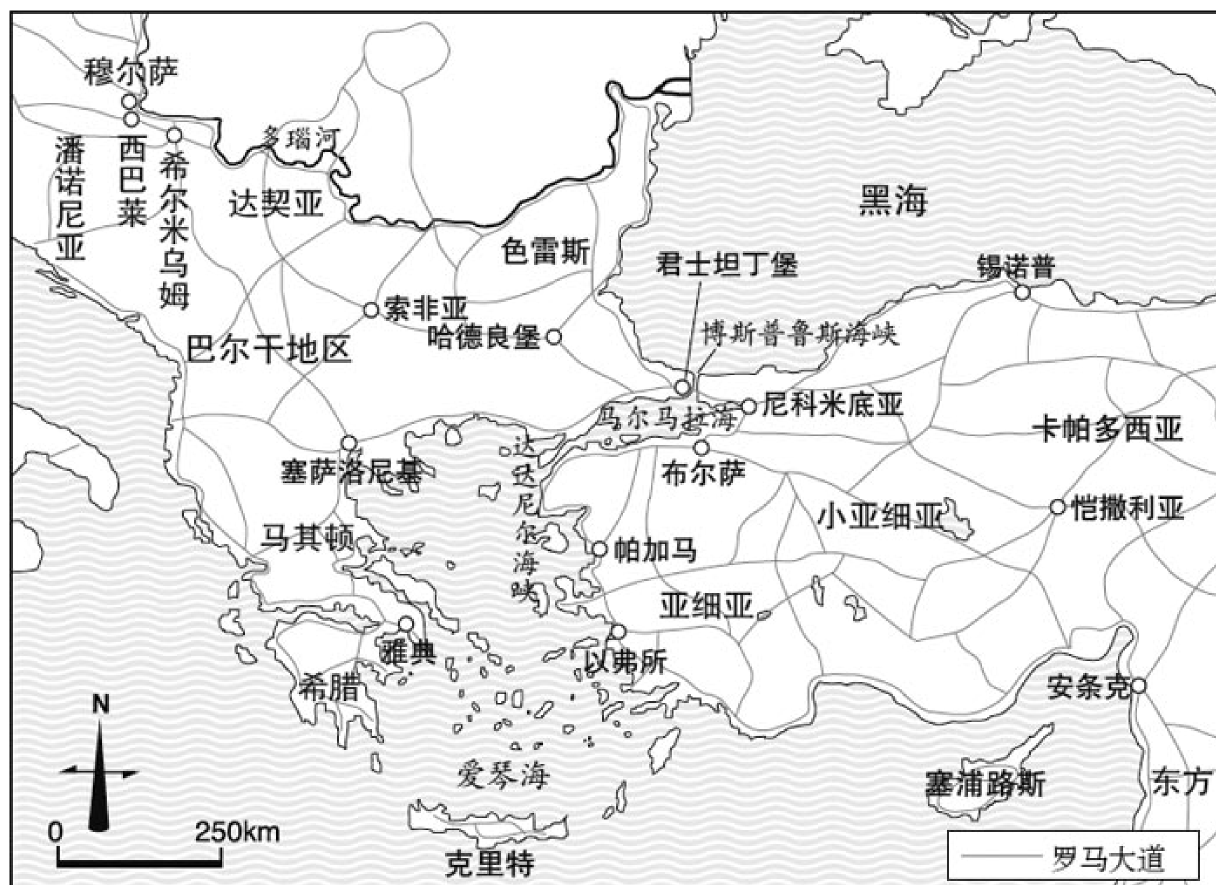
话说回到两位十几岁的少年。他们来到的古堡，周围是荒山野岭，城堡内鲜有人烟，想必也是一片荒芜。负责监管他们的人，这次换成了卡帕多西亚的主教格奥尔吉乌斯，没有他的许可，少年们甚至不能前往邻近的城市恺撒利亚。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兄弟俩能够接触的就是负责警卫的一队士兵，以及打理家务的奴隶一家。原来的家庭教师马多尼乌斯没有获准与兄弟俩同行。多年之后，尤里安曾写下在马塞鲁的这段经历，他说那是一段被监禁、隔离的岁月，远离学问，就连运动和竞技，也只有奴隶的孩子陪伴而已。

这就是当朝皇帝的血亲们所遭遇的囚禁生活的实况。7年时间，哥哥加卢斯从18岁长到25岁，弟弟尤里安则是从12岁长到19岁。兄弟俩一生中最多愁善感的时期就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度过的。即便是一个神经非常健全的人，也免不了会精神崩溃。

要在严酷的现实中生存又能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关键在于是否能创造一个远离现实、属于自己的世界。弟弟尤里安有幸受到马多尼乌斯的启蒙，能够沉浸于古希腊哲学和文学的世界之中。哪怕身边没有人指导，曾经背诵过的那些早已铭记于心的作品，像一个收满藏书的图书馆，占据了他的脑海。卡帕多西亚的主教虽然是一个比已故的尼

科米底亚主教更为狂热的阿里乌斯派信奉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古书收藏的爱好者，偶尔也会拿出少许的书籍借给尤里安阅读。



巴尔干·小亚细亚及其周边

在那个时代可以称做“古籍”的，自然不是有关新兴基督教的书籍，而是流传了几百年的古希腊的作品。尤里安因为拥有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才避免了现实对精神的摧残。

然而，哥哥加卢斯却无法做到。当初身边有老奴隶悉心教导的那段时期，他对哲理、文学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一旦生活环境发生剧变，面临严酷的现实，他完全失去了得以支撑的精神世界。他喜欢带着士兵和年轻的奴隶们在荒野上策马奔驰，从而练得一副健美的身体。可是在遭遇那些无形的压力时，他的心还是会受伤，那些肉眼看不见的伤口久久不能愈合，长期地留在了身体里。在父亲被杀之前，他是属于君士坦丁大帝一族的王子。与只做了6年王子的尤里安相比，

享受过12年皇族待遇的加卢斯，对于过去，有着更多的眷恋和回忆。在被任命为副帝的时候，加卢斯的性格已经扭曲。

不过话说回来，担任副帝时加卢斯才26岁。如果他能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发挥所长，结果又会如何呢？比方说，波斯国王撕毁了停战协议，大举进攻欲抢夺北美索不达米亚，那么奔赴前线、率兵迎击、保卫半个世纪都属于罗马领土的北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定是握有帝国东部罗马军总指挥权的加卢斯。

虽然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离开东方西行，但大半的将领仍然留在原地。原本群龙无首的军队，如今有了加卢斯。这位年轻人尽管缺乏哲学和文学上的造诣，但是在山野中骑马打猎的技能毫不逊色。当然打猎与打仗不能混为一谈，不过它们基本上都属于动态的行为。

如果加卢斯是在战场上开始他的“恺撒”生涯，想必不爱静坐思考的他，会很快地适应这种生活。军旅生活，无论是对他追回失去的14年的光阴，还是提升个人的修养，维护自己的地位，以及他所管辖下的帝国东部的领土安全，都会起到正面的作用。如果在担任副帝、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他不是居住在安条克豪华的皇宫中，而是生活在野外的军营，那么他心中那些曾经遭受的无形的创伤或许能够痊愈，扭曲的性格也会逐渐趋向平和，这些转变如果最终能促成他创下良好的战绩，势必可以让他重拾信心。只有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才能对他人保持公平。

然而，不知是否由于疲于应付入侵的蛮族，波斯国王始终信守着与罗马皇帝的休战协定，这反而使得加卢斯的生活越来越远离野外军营。

当然，远离战场并不等于无所事事。作为副帝，加卢斯的地位仅次于正帝，是统治和保卫帝国东部的领导者。以他如今的身份，只要有心，大可利用波斯国王偃旗息鼓之际，前往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

里斯河之间的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前线基地寻访、视察，为国防安全尽心尽力。

可是，从卡帕多西亚的古城中移居到安条克的皇宫，禁锢着加卢斯的那堵无形的高墙并没有就此消失。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原本就生性多疑，加上加卢斯又是被他杀害的叔叔之子。虽然迫于形势，擢升加卢斯为副帝，但他用尽一切手段，阻止副帝与其手下的官兵建立起紧密的关系。君士坦提乌斯害怕加卢斯掌握军权后，会举兵造反。作为皇帝近臣的宦官优西比乌，与掌握安条克皇宫大权的宦官们暗中联手，变本加厉地隔断加卢斯与外界的联系。而加卢斯偏偏又不是一个有坚强的意志力、可以打破这座无形高墙的人。

在哥哥荣升副帝、移居安条克不久，弟弟尤里安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这位20岁的青年并没有得到任何公职，他被获准作为一名哲学研究的门徒，生活在小亚细亚西岸称做爱奥尼亚（Ionia）的地区。这一带是希腊文明的发祥地，有很多像以弗所（Ephesos）那样由希腊人建造的城市。这对尤里安来说真是万幸。哥哥加卢斯从卡帕多西亚的古堡移居到安条克的皇宫，实际却仍然过着受监禁的生活，而尤里安则是名副其实地获得了自由。兄弟俩就这样天各一方，开始了不同的生活。

处死副帝

为击败篡位的马格嫩提乌斯而返回帝国西部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不断听到从东部的安条克传来的坏消息。

副帝加卢斯与安条克皇宫的那些老臣们，事事针锋相对，关系十分恶劣。对于臣子们的进言，加卢斯一律当它们是假借皇帝之威，向他发出的警告。刚开始，君士坦提乌斯对东部宫廷内的这种状况还装

聋作哑，渐渐地就变得忍无可忍。副帝与大臣的不和，不再是皇宫内部的问题，它已经成为安条克上流社会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情。

男人之间的矛盾，哪怕只要有一个女人介入，马上就会从权力斗争演变为街头巷尾人们津津乐道的八卦。加卢斯在被任命为副帝的同时，娶了君士坦提娜为妻。这位女子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女儿、当朝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妹妹。她的前一任丈夫汉尼拔利阿努斯，在大帝死后不久发生的那场血案中惨遭杀害，之后她又与蛮族将领马格嫩提乌斯暗中勾结，给其兄君士坦提乌斯带来不少的麻烦。最后，哥哥把这位妹妹嫁给了加卢斯。君士坦提娜好像比加卢斯年长几岁，她对他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我们不甚清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稳定年轻丈夫的情绪上，她没有给予过正面的帮助。上任后来到安条克的加卢斯，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尽管加卢斯处境不佳，但毕竟身居高位，属于发号施令的人物。下达指令的人与执行指令的人交恶，绝对不利于国家政策的推行。安条克是一个大都市，由于各种原因，市场上经常会发生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加卢斯担任副帝的时期，这个问题尤为严重，以至于陷入绝望的民众发起了暴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加卢斯制定的政策不得要领，而具体负责实施的部下疏忽怠慢，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管怎么说，决策者必须承担最终的责任。人在欧洲的正帝收到的呈报，统统是暗指副帝治国无能的内容。

随着皇宫生活日趋煎熬，加卢斯性格中残忍的一面逐渐地显露出来。对于那些居住在帝国东部的犹太教徒而言，目前以基督教为主流的生活环境，反而不如以前信仰多神教的元首制时代。犹太教和基督教虽然都属于排他的一神教，但是基督教与其前身的犹太教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基督教徒十分憎恨害死耶稣的犹太人，这种敌视情绪让

犹太教徒深感不安，神经变得异常敏感，偏偏副帝加卢斯又不知出于什么理由，偏袒基督教一方。

引发事端的是犹太人集中的巴勒斯坦地区的某个城镇，发生了一场原因不明的暴乱。维持帝国东部内部局势稳定，是副帝职责所在。在加卢斯的指挥下，军队很快就平息了这场暴乱。问题是事后对叛乱者的处罚过于残酷。

加卢斯下令处死了所有的居民，无论他们是否参与了暴乱。整个城镇变成了尸骨累累的坟场，宛如死城。

君士坦提乌斯比其副帝加卢斯更倾向于基督教。有关他继承父亲的意志、不遗余力振兴基督教的事迹，我将会在以后的章节中展开论述。不过他在位的公元4世纪中叶，公元312年颁布的“米兰敕令”依然有着法律效力。这意味着不管皇帝们多么厚待基督教，罗马帝国的人民无论是信仰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或者其他的多神教，都享有平等的地位。

其他宗教一律被视做邪教，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是公元4世纪末期之后的事情。因此，在公元4世纪中期，仅仅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不能成为剥夺其生命的理由。即使为政者心中有所偏袒，但在这个时期，加卢斯下令大量屠杀了犹太教信徒，站在官方的角度，无论如何是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完全有足够的法律根据予以惩处。罗马帝国的后期，敕令形同国法，对副帝同样有效。加卢斯再一次在政治上失了分。

安条克皇宫的生活进入第三年的时候，加卢斯心中蓄积的仇恨已经严重到了无法克制的程度。宫廷中有两位官员最令他痛恨，其中一人是君士坦提乌斯派来的。加卢斯派一队士兵逮捕了这两位官员，在安条克市中心游街示众后将他们杀害，尸体扔进了城镇边的奥龙特斯河（Orontes River）。这已经不是可以用行为不当就能搪塞过去的事

情。而加卢斯做出这个没有任何狡辩余地的疯狂举动之时，正是在西部三年的君士坦提乌斯彻底解决了马格嫩提乌斯的时期。29岁的加卢斯的命运因此而定，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虽然君士坦提乌斯已经下定决心更换副帝，但在具体实施时，他采取了与他36岁年龄很不符合的异常谨慎的步骤。

首先，为了缓解加卢斯的不安，君士坦提乌斯以兄长的身份，给堂弟写了一封充满手足之情的信。同时，他又在暗中布局，设法调离这三年来直属于加卢斯的军队。就在加卢斯眼睁睁地看着形势朝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又无计可施之际，他收到了来自米兰的邀请信。重新收回西部失地的君士坦提乌斯，将大本营设在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公元354年这一年，在米兰的罗马帝国的正帝向其副帝发出了邀请。

事至如此，加卢斯心里也很明白，这个邀请的真正用意是要遣送他回国。因此他让妻子先行一步，希望她能以妹妹的身份，为他向皇兄求情。可是，君士坦提娜在从叙利亚前往意大利的长途跋涉中病倒，很快就离开了人世。

加卢斯在妻子启程之后不久，也离开了安条克，斜穿过小亚细亚，抵达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他不仅带着军队随行，在君士坦丁堡滞留期间，还主办了一场运动会，在他离开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当日，元老院全体议员为他送行，可以说这一路上充分享受了作为罗马帝国副帝的待遇。不过，在他到达哈德良堡[Hadrianopolis，现土耳其埃迪尔内（Edirne）]时，等待他的是一封来自皇帝的命令。

正帝命令加卢斯跟随着10辆国营邮政马车前往米兰。当时的政府要员公务远行时，通常会把国营邮政马车作为交通工具。加卢斯清楚，这个命令意味着他的身份已经从副帝降格为一介官员。他成了被

押送的罪犯，而且押送的目的地也不知何时作了变更，不再是米兰，而是位于亚得里亚海深处的伊斯特里亚（Istria）半岛的波拉城堡。

时至21世纪的今日，波拉城中依然随处可以看到以圆形竞技场为代表的各种古罗马时代的遗迹。在罗马帝国的后期，这里以皇帝处置内亲的行刑地而闻名。28年前，君士坦丁大帝就是在波拉，以通奸罪之名，对时任副帝的长子克里斯普斯执行了死刑。副帝加卢斯一到波拉，就被摘下副帝的徽章，强行脱去披风，身上只剩下一袭短袍。他被带进一间房间，在那里等着他的不是正帝君士坦提乌斯，而是宦官优西比乌。宦官没有按照罗马法规定的程序对加卢斯进行审讯，而是采用了类似于中世纪异端裁判所那样的拷问形式。加卢斯在刑讯逼供之下，承认了自己图谋杀害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罪名。这场非法的审判过程，一字不落地被记录下来，送到了坐镇米兰的君士坦提乌斯的手里。从米兰方面传来的回信是皇帝批准了审判官的裁决。

加卢斯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双腿跪地，被处以斩首之刑。当年同样遭到斩首的克里斯普斯，至死都在为自己的清白大声辩护，而蒙受了不白之冤的加卢斯却在沉默中迎接了死亡。他死于公元354年12月，年仅29岁。

对于36岁的君士坦提乌斯而言，加卢斯既是自己的副帝，又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堂弟，他究竟是抱着怎样的心态，下令处死加卢斯，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他只是出于单纯的政治考虑，能力欠缺的人必须淘汰，哪怕是自己的左右手。按照人之常情，加卢斯无论如何都是他还在世的仅有的几位亲人之一。不过，君士坦提乌斯是一位习惯了失去亲人和杀害亲人的人物。

公元337年，君士坦提乌斯在父亲君士坦丁大帝死后不久，虐杀了大批的亲属，其中包括当时的副帝汉尼拔利阿努斯和德鲁马特乌斯，这两位都膝下无子。

公元340年，君士坦提乌斯的长兄、年仅23岁的君士坦丁二世遭到杀害，他生前也没有诞下一男半女。

公元350年，弟弟君士坦斯被蛮族出身的叛军将领马格嫩提乌斯所杀，死时30岁，没有后裔。

公元354年，29岁的加卢斯被处以死刑，无后。

最后是这位君士坦丁大帝唯一健在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他也没有孩子。36岁的君士坦提乌斯，虽然经历了两次婚姻，却从未诞下一男半女。哪怕贵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生子这件事上，似乎也是身不由己。

“恺撒”这个称号，除了代表是皇位继承者，即皇太子之外，还有副帝的意义。副帝的意义，是罗马帝国晚期、3世纪末到4世纪初的“四帝共治制”时代所认定的。

然而，身为“奥古斯都”（正帝）的君士坦提乌斯似乎没有将“恺撒”视做自己的继承人，而是将之诠释为不遗余力执行自己意志的协助者。因此，协助者一旦不能为己所用，立即排除；若稍有违抗之心，马上消灭，绝不手软。其实，这正是君士坦提乌斯失算之处，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让他既找不到继承人，也没有协助者。要说继承人，还可以期待两年前迎娶的第二任妻子优西比娅（Eusebia）皇后为他生产，可是治国的协助者一刻不能等待。

加卢斯是在公元354年12月被处死的，他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355年年初，其弟尤里安收到了来自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召见令。以哲学研究为业的尤里安此时23岁，他已听到兄长不幸的消息。这个时候，接到君士坦提乌斯要他去米兰的指令，尤里安惶恐不安的心情可想而知。

哥哥加卢斯是以企图谋害正帝主凶之罪遭斩首的。身为弟弟，他不得不作好被当做共犯的心理准备。对于从监禁生活中释放出来、刚做了三年学者的尤里安而言，迄今为止的生活经验及其所处的环境，根本不可能想到皇帝需要一个新的协助者这种政治打算。何况，那时的皇帝还没有决定是否有必要再立一位副帝。

从小亚细亚西岸的以弗所前往米兰，必须走与兄长生前所走的路相同的路径。不清楚皇帝是派来了专车，还是让他乘坐国营邮政的马车，总之，对这位23岁的年轻人来说，这一路沉重无比。在即将进入意大利境内时，马车如果此刻转道向左，那就意味着目的地将是位于伊斯特里亚半岛尖端的波拉。所以，当尤里安发现马车没有左转，而是继续往西的时候，一定是如释重负。至少这证明他的目的地是米兰。

可是，经过长途跋涉好不容易抵达米兰的尤里安，过了两个多月也没见到当初令他进宫的皇帝。被扔在皇宫一角的他，见到的是以深受皇帝宠信而出名的宦官优西比乌。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似乎是想通过他来试探尤里安。其实，想要清楚地了解兄弟俩的不同之处，最好的办法还是皇帝本人亲自出马。何况对尤里安而言，再也没有比接受优西比乌的审查更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位宦官正是将他的兄长加卢斯送上刑场的“法官”。

困在米兰两个多月动弹不得的尤里安，究竟是会遭遇与兄长相同的命运，还是能够无罪释放，可谓命悬一线。只要宦官向皇帝报告，说他怀有为兄长复仇之心，那么他立即就会被送往波拉城，步兄长之后尘。

最终，是皇后优西比娅救尤里安脱离了危机。优西比娅出身于希腊贵族之家，年轻、貌美又有着极好的教养。虽然没有能够为求子心切的皇帝生下一男半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皇帝对她的宠爱及尊重。

生性胆怯、阴沉内向又残忍的君士坦提乌斯，唯有对优西比娅，表现出难得的一份真情实意。

也许是优西比娅同情这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尤里安所遭遇的不幸，向皇帝说了什么，在米兰皇宫内望眼欲穿等了两个多月的尤里安，终于得到了皇帝的召见。他在皇帝面前尽力为自己辩护，表示除了学问别无所求。又强调自己与兄长性格迥异，并非同母所生，兄弟之间并无深厚的感情。无论尤里安的表白是否言不由衷，谁都没有资格去指责这位23岁的年轻人。他面对的是一个可以毫不留情地残杀亲人的冷血动物，他不得不尽其所能让这位生性多疑的皇帝打消对自己的猜疑。何况，唯有这一天，他不用通过宦官优西比乌这层过滤网，直接向掌握着自己生杀大权的人辩白。

面对面的对话，似乎真的产生了效果。那次会见以后，皇帝虽然没有和尤里安作进一步的接触，却同意他去希腊的雅典学习哲学。这个恩准足以让尤里安感到心满意足。可惜，在哲学圣地雅典尽情享受自由的日子，只有从春到秋短短的半年时间。就在秋天即将结束之时，他再一次收到了皇帝的召见令。

在尤里安去雅典的这半年中，君士坦提乌斯始终举棋不定，局势的变化使得设立副帝的必要性变得越来越迫切。

目前还算太平无事的，只有与波斯军队相互对峙、按兵不动的东部防线。而以多瑙河为防线的欧洲中部地区，随时随地都面临着河北岸的北方蛮族大举入侵的威胁。形势比多瑙河地区更令人绝望的是莱茵河一带，在那里被称做“防线”或“防卫墙”的Limens已不复存在。

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流入北海的莱茵河，成为罗马帝国的领土防线是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恺撒征服高卢之后，至今已经400多年。几百年以来，作为军事意义上的防线，莱茵河一直守护着广阔的高卢

地区。这些地区按照现代地理位置划分，分别是荷兰的南部、比利时、德国西部、瑞士和法国。

当然，作为后人，我们非常清楚，莱茵河作为“防波堤”充分发挥其功效的历史只延续至公元2世纪。进入史称“3世纪危机”的公元3世纪之后，莱茵河防线就不断地遭到蛮族的破坏。不过，尽管如此，一直到3世纪末的戴克里先皇帝时代，罗马还是尽力以莱茵河为防线，阻击外敌的侵略。

罗马彻底放弃固守莱茵防线的战略，是在进入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之后。这一改变，并不意味着君士坦丁大帝在军事上采取了新的策略，对来袭的敌人采用“请君入瓮”、各个击破的战术，而是在经历了整个3世纪之后，帝国已经丧失了固若金汤的防卫能力，只有在遭到敌人入侵之后，才会出手反击。君士坦丁大帝不过是将这个不争的事实，制定成罗马军的常规战略而已。这个军事战略上的改变，使得那些在元首制时代星罗棋布般集结于莱茵河沿岸的军事基地，大多变成了无人之地。而那些还有士兵防守、不至于完全人去楼空的基地，也降格成了农军兼用的简陋要塞。如今的莱茵河沿岸，已经沦落到不能再称之为“防线”的境地。

话说回来，君士坦丁大帝也并非完全放弃了军事防卫，而是在策略上作了调整。事实上，与军力逐渐减弱的基地成反比的，是直属皇帝的游击军团日益增强。原蛮族出身的罗马军人成为这支实力雄厚的游击军团的主力，就是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开始的。尽管这些军人来自蛮族，但与其出身的部落几乎断绝了关系。因此，深得大帝的信任。

化敌为友、为我所用是一种领导才能。然而，这种才能延续到第二代的例子少之又少。公元350年发生的原蛮族将领马格嫩提乌斯杀害大帝三子君士坦斯的事件，就是异族军人向身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宣

泄不满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在罗马放弃了军事战略中最具代表性的“防线”的同时，军团内部的局势也日益动荡不安。

异族官兵的叛乱，虽然在三年后因主帅马格嫩提乌斯的自杀而最终失败，但这三年的内战让罗马军损失了大量优秀的军人。这些阵亡的军人大多像马格嫩提乌斯那样来自蛮族，担当着罗马军的主力。他们的牺牲是导致罗马军力急速衰退的直接原因。

军力衰退最严重的，当属莱茵河以西、曾经作为马格嫩提乌斯根据地的高卢地区。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高卢地区在三年内战中，至少损失了3万人的兵力。要填补这3万精兵强将的空缺，实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正因如此，广阔的高卢地区的军事防卫力量才会发生根本性的衰退。不过，最早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似乎并不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而是盘踞在莱茵河以东、虎视眈眈地对着西岸的蛮族部落。

353年8月，马格嫩提乌斯在里昂自杀身亡，内战终结。

354年12月，副帝加卢斯遭斩首。

355年2月，尤里安应召前往米兰。5月起，在雅典求学。

355年11月，再次被召回米兰的尤里安，被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正式任命为“恺撒”（副帝）。

尤里安成为副帝

公元355年11月6日，这一天是尤里安24岁的生日。可是，没有人为他庆贺，甚至没有人记得他的生日。通常出身于罗马上流家庭的孩子，幼年时会有陪读的奴仆，成年后，这些下人会继续陪伴左右，照

顾其日常起居。可是，从6岁开始一直到20岁，经历了长期隔离的尤里安，连这样的贴身奴隶都没有。

这一天，从未在公共场合出现过的尤里安，作为副帝被介绍给了应皇帝之令而集结的罗马官兵。就在前一天，他还留着属于希腊哲学家招牌形象的长胡子，而此刻，已经被剃得干干净净，看上去就像一只刚被剪了毛的山羊。他的打扮也从平民百姓穿的天然色的托加和皮凉鞋，换成了罗马将军的正装——白色的短袍外穿戴着皮质的盔甲，外披大红色的斗篷。可能是因为紫色的染料比较昂贵，紫色的斗篷只有正帝才能使用。而副帝和其他将军们按规定只能穿红色。



身着军装的皇帝

一身正装出现在罗马官兵面前的尤里安，既没有伟岸的身材，也没有堂堂的气势，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印象。再加上他首次穿上军装，将士们对他的观感，与其说是觉得滑稽可笑，还不如说是惊讶万

分。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的最高司令官皇帝的任命，士兵还是按照罗马军传统的方式，用持剑的右手敲打左手拿着的盾牌，以示拥戴。

尤里安就任副帝的同时，奉命完婚。他妻子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女儿、当今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妹妹海伦娜。她似乎比24岁的尤里安年长许多。同年11月3日，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副帝，翻越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前往高卢。

对于尤里安的副帝身份，以及就任后即刻被派往高卢一事，小说家通常描绘成是皇后优西比娅对皇帝的影响。顺便提一下，由于尤里安的一生充满了叛逆和戏剧性，因此有许多以他为主角的历史小说问世。日本作家辻邦生曾经写过一本《叛教者尤里安》，而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所著的《朱里安》（Julian）的内容更为精彩，不愧是畅销全球的作品。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描写了皇后优西比娅对尤里安的深切关怀，或者是对他怀有爱慕之心。

小说家们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在不得不作出决定时，君士坦提乌斯的态度往往会表现出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爱妻的建言，或许推动他朝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话说回来，即便没有爱妻的推举，君士坦提乌斯也有充分的理由，需要找回尤里安，擢升这位唯一在世的血亲为副帝，并派往高卢。

所幸的是，帝国东部目前还安然无恙，无须担心波斯国王的进攻。让人担忧的是，日耳曼人的多个部落，正从多瑙河的北面向南、莱茵河由西往东，不断地压进。

以君士坦提乌斯一己之力，无法承担多瑙河与莱茵河两条防线的任务。用现代地理位置来说明的话，就好像是一面在法国对抗肆虐的蛮族，同时又要在巴尔干地区击退入侵的敌人。很明显，君士坦提乌

斯如果不借助他力，那么多瑙河、莱茵河两条防线都无法保全。君士坦提乌斯在是否选择尤里安做副帝这个问题上，犹豫再三，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才作出决定。君士坦提乌斯再怎么踌躇不定，作为保卫帝国的最高责任者，他已别无选择。

君士坦提乌斯没有将多瑙河防线交给尤里安，而是让他负责莱茵河。这个决定很符合他一贯的行事作风，他把最困难的地区交给了副帝。所谓困难，并不是指敌人的数量庞大，而是自家军队的素质及数量都极其薄弱。尤里安被派去的地方正是因三年内战而损失了大批精兵强将的高卢。他不得不率领着一支缺乏战斗力的部队，迎战企图渡过莱茵河的蛮族，以及那些已经入侵到境内的蛮族。

按照小说家们的见解，这是因为君士坦提乌斯不希望看到尤里安成功，故意没有给他安排足够的兵力。我个人觉得这似乎对君士坦提乌斯有欠公平。君士坦提乌斯指挥下的多瑙河防卫军，尽管没有高卢损失严重，毕竟也因为三年内战而丧失了大量优秀的官兵。在对抗大举进攻的蛮族的同时，君士坦提乌斯还必须时刻关注着东部的局势，只要波斯国王那边稍有风吹草动，他必须立刻赶往东部应对。罗马帝国皇帝的首要责任在于保卫帝国全境的安全，与担当区域防卫的副帝不同，身兼军队最高司令官的正帝，负有保卫整个帝国安全之责任。因此君士坦提乌斯必须对帝国东西的形势作全盘的考虑，他手中需要握有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

另一方面，尤里安是一位新手，从未上过战场，也没有学过任何的战争理论，更没有接触过士兵，年仅24岁就成为高卢地区的罗马军总司令。如果要赌尤里安未来的前途，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赌他失败。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应该是在不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将尤里安送上了战场，自然也不会提供足够的兵力，更何况公元355年的君士坦提乌斯，确实也没有充裕的兵力可以调配。

当时的高卢地区，蛮族横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而罗马军则东躲西藏，尽量避免直接与敌人遭遇。尤里安可谓是单枪匹马来到了这里。不受期待通常也意味着自由无羁。但是，成了副帝的他，仍然需要避开正帝君士坦提乌斯怀疑的眼光，小心翼翼地行使他的自由。

君士坦提乌斯与基督教

军事才能无法与父亲君士坦丁大帝比拟的君士坦提乌斯，在对新兴宗教基督教的贡献上，称得上是优秀的接班人。他不仅忠实地沿着父亲既定的路线，而且将其发扬光大。



君士坦提乌斯

在具体叙述这条“路线”之前，我们必须重新回顾一下它的起跑点“米兰敕令”。“米兰敕令”于公元313年6月，由君士坦丁大帝与当时还在世的李锡尼联署，颁发帝国全域。尽管“米兰敕令”的全文，在《罗马人的故事13 ·最后一搏》中已经有所介绍，这里我仍然不想省略，再完整地复述一遍。这有助于我们去思考它的始作俑者的动机和思想。

> 很久以来，我们二人（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始终认为信仰自由不应受到限制，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信念和愿望，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宗教。因此，在我们所管辖的帝国西部，基督教早已得到承认，并允许他们为加深其信仰而举办有关仪式。然而，这种意愿在法律实施时给执行者带来了困惑和混乱，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此问题作明文的规定。
>
> 我们，正帝君士坦丁和正帝李锡尼于米兰相聚，共商帝国大事。我们一致认为，在所有事关万民的大事中，首先应该作出规定，保证尊重对神的信仰。
>
> 无论基督徒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国民，个人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皆应得到完全的认可。无论哪一方天神，都应得到崇拜和尊重，只要它能为作为统治者的皇帝及其臣民带来和平与繁荣。从有利而且明智的角度出发，我们一致同意，我们二人属下的所有臣民，都应该得到宗教自由的权利。
>
> 自今日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虔诚的信仰，以及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不受任何干扰和干预。无论是何等神明，我们都期望它以至高无上之存在，普降幸福于万民，引领帝国全体走上和平与融合之路。

从下文开始，敕令的内容从宣布国家新政转为具体指令，是给那些负责实际贯彻落实的帝国各地的行政长官们：

以上是我们二人之决定。故自今日起，以往颁布的有关基督教的所有法律规定（主要是指戴克里先皇帝制定的镇压基督教的诸法）一概无效，凡基督教信仰者可以无条件地保留其信仰，不受任何干扰。

给予基督徒的信奉其宗教的绝对自由，同样也适用于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我们认为，全面承认宗教信仰之自由，有利于帝国的和平。而且，任何神明和宗教，其名誉和尊严都不容遭到诋毁。

基督徒曾饱受不平的待遇。在此特别规定，基督徒之前被没收的聚会祈祷的场所，必须立即予以归还。另外，那些曾经属于教会或者教区的资产，也即刻物归原主。依照上述规定，对那些以拍卖方式购买了教会财产的人，在交还财产后，国家将以公平的价格补偿其经济损失。

这道敕令有以下两个关键点：

一、承认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有同等地位。

二、归还基督教遭受迫害时被没收的财产，必要时国家给予补偿。

总之，这是罗马帝国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敕令颁布10年以后，李锡尼战败身亡，敕令的主导人君士坦丁成了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

表面上看，“米兰敕令”保证了所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仔细推敲，还是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其真正的用意，即赋予基督教官方的地位。事实上，君士坦丁掌权之后，执行的就是以基督教为上的宗教路线。

君士坦丁拿出一部分所谓的皇帝财产，其实就是国库的资金，建造了教堂捐赠给教会。君士坦丁不仅在他所建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修建了教堂，帝国主要城市中的许多教堂，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耶

路撒冷的圣墓教堂等都是由他兴建的。这意味着基督徒聚会、向天神祈祷的场所，是由皇帝亲自提供的。

教会需要的不仅是场所，举办各种活动还需要经费。经济问题依靠教徒们的捐赠，是一种不错的运作方式。不过，如果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经济基础就更为理想了。在古代，最好的经济基础是农地，其次是原材料加工的手工业以及销售商品的店铺。君士坦丁将这些产业也捐赠给了教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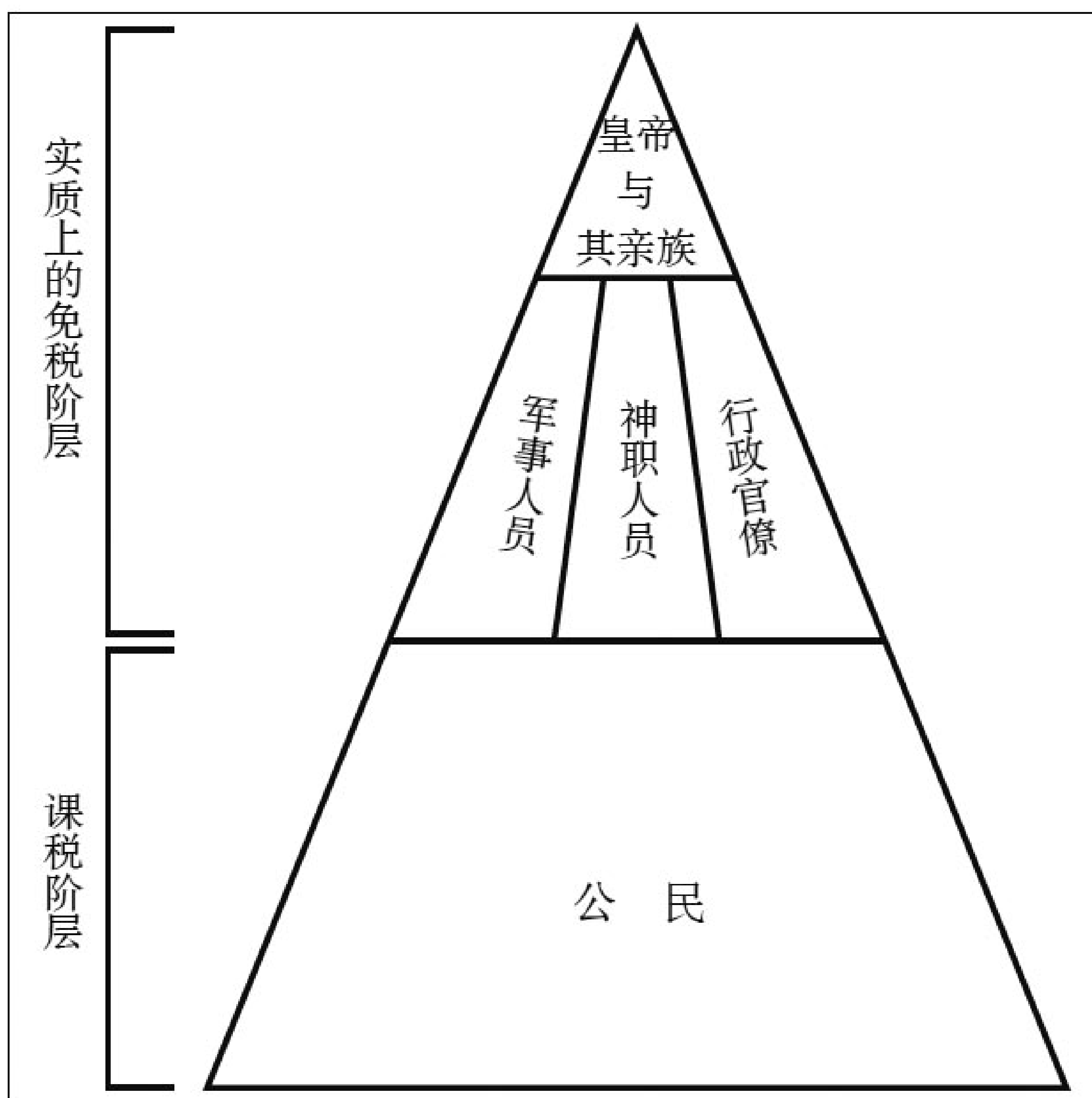
有关这些产业对振兴基督教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3 ·最后一搏》中已作了详细说明，就不再赘言。这里我只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与传统的罗马宗教不同，基督教拥有专业的神职人员。因为神职人员没有其他的谋生渠道，所以提供保证他们生活来源的赞助者，对教会是极其宝贵的。

除此之外，君士坦丁大帝还立法，免除了基督教神职人员担任公职的义务。其依据是："神职人员不应受到其他公务的纷扰，专心于其光荣职务。这将会为国家带来莫大的贡献。"

既然"神职人员不应受到其他公务的纷扰，专心于光荣职务"，接下来的动作，自然就是给予神职人员免除税金的权利。"光荣职务"没有报酬可言，因此也不会产生什么纳税的问题。君士坦丁大帝对基督教的优惠政策，从免除公职和税金开始，最终发展到废除了元首制时代针对独身者所制定的不利条款。君士坦丁力图通过扶植基督教，使之成为"统治者的工具"（instrumentum regni），因此扶持政策上不断升级的趋势，属于情理之中的事情。

上述一系列政策得到落实之后，君士坦丁大帝将治国大任交到了儿子的手里。君士坦提乌斯处处喜爱效仿父亲，就连临终前受洗也与父亲如出一辙。权力交接之后，君士坦丁大帝生前所制定的国策路线，正如某学者所言，"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

公元346年，继位9年多的君士坦提乌斯，修改了其父制定的针对基督教的免税政策，免税对象从原本教会的主教、祭司、执事，扩大到为教会服务的农场、工厂以及商店等的周边人员。他们的名字从“纳税人名单”（census）中消失了。当时罗马帝国的主要税赋包括人头税和地租税两项，新政策决定免征教会相关人员的人头税。



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图

皇帝日益加剧的偏袒行为，让教会的态度变得趾高气扬。在里米尼（Rimini）召开的公会上，有不少主教提出，应该一并免除地租。

皇帝没有立即予以采纳，还是坚持了仅免除人头税的原则。不过仅仅两年之后，就颁布了新法令，实现了主教们的愿望。

尽管现代社会把政教分离看做是文明国家的象征，但同样存在着宗教法人免税的制度。纵观人类社会长久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光荣职务”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往往会出乎意料地远远超过了非“光荣职务”。尽管如此，人类对于带有宗教色彩的事物，总会不由自主地妥协、让步。有关这个议题，我们暂且不深入探讨。还是回头看一下公元4世纪的罗马，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正如上图所示呈金字塔般的构造。这是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推行的不断深化基督教优惠政策所带来的结果。

以往的神职人员不允许拥有私人财产。按照规定，一旦担任神职，之前所持有的财产要么捐赠给教会，要么转让给亲属。从君士坦提乌斯时代开始，神职人员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得到承认。这一法令，对那些富有的神职人员所造成的心理影响真是难以估计。

首先，人拥有的财产越多，对其的占有欲就会愈发地强烈。其次，财产原本属于课税的对象，但是只要持有人成为神职人员，根据有关法律，便可享受免税的权益。

基督教教会不仅是穷人们避难的场所，也成了富裕者们的“救赎”之地。

瞄准目标

由于君士坦提乌斯“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先父的路线，因此他的亲基督教的政策，势必会发展为排除其他宗教，尤其是敌视罗马自古以来的传统宗教。“米兰敕令”推出的当初，并不反对迄今为止的传统

宗教，然而，随着皇帝们扶持基督教的政策风向日益明朗，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夜间的献祭仪式被禁止。传统宗教中屠宰并烧烤珍贵的家畜，在烟火中向天神祈祷的仪式，等同于基督教徒点燃蜡烛做祷告。如今，夜间不能再举行这种传统的宗教仪式。

紧接着，通常在白天举行的官方祭典及其相关的献祭仪式也遭到了禁止。

不过，这两项禁令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三年之后，国家不得不再次发布禁令。第二次禁令明确规定，违法者将被处以死刑。

在同一时期，还颁布了一项禁止偶像崇拜的新法令。“偶像”是由希腊语或拉丁语的“想象”一词派生而来，根据词典的解释，偶像崇拜的定义如下：

一、尊崇象征宗教信仰的某具体物像。

二、尊敬象征绝对权威的某特定人物。

偶像崇拜的禁令将天神之王宙斯、海神波塞冬、智慧女神雅典娜以及神君恺撒、神君奥古斯都等都视做偶像，禁止崇拜。不过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或者圣彼得以及天使们似乎就不在其列。顺便提一下，英语的“idol”（偶像）和“idiot”（笨蛋）都是源自意大利语的“idolo”。

偶像崇拜禁令颁布之后，紧接着皇帝又推出了关闭神殿的法令。除了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必须关闭之外，叙利亚的太阳神殿、埃及的伊希斯女神殿都在禁止之列。为反对关闭令，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居民曾经发起过暴动，但伤害最严重的还是罗马国内那些在数量上占绝对

多数的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基督教徒口中所谓的“异教”，指的就是传统的希腊罗马的多神教。

遭到关闭的神殿，毫无疑问地很快便面临新的厄运，那就是破坏。尽管君士坦提乌斯没有明确下令拆毁异教神殿，却允许建筑用的材料可以从神殿中获取。很明显，这个许可令是为摧毁神殿而采取的第一步策略。试想一下，神殿的圆柱被拆走了，神殿还能存在吗?

不过，在公元4世纪中叶，虽然禁止偶像崇拜，但还未发展到损坏象征偶像的雕像的地步。

雕像没有立即被拆除是另有原因的，因为在君士坦丁大帝一手打造的帝国东部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城内充斥着数以万计的“偶像”。在建都之初，君士坦丁就打算把这里建成基督教的首都，因此，没有建造一座奉献给希腊罗马天神的神殿。可是，在古代，尤其是古罗马人的观念中，没有雕像林立的地方，称不上是城市。欲将君士坦丁堡打造成“新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最终也从以希腊为中心的帝国东部境内，征集了大批的大理石雕像，用来装饰新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个基督教的首都，在建都的当初，应该是一个基督教教会与希腊罗马天神共存的城市。希腊人相信裸体是世上最美的形象，这个最美的形象首先应该奉献给天神，因此希腊神像大多是以全裸或半裸的姿态出现。虽然对基督教而言，教堂与裸体的雕像比肩而立，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其实站在人性客观的角度，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景象。可惜，这些裸体神像只存在了不到半个世纪。

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两代皇帝相继推动的以振兴基督教为目标的各项政策，依照时间顺序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承认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享有同等的地位。

第二阶段，推出有利于基督教的措施，政策走向发生明显的改变。

第三阶段，目标明确，排挤打击罗马传统的宗教及其他形式的宗教。

第一阶段以及第二阶段实质的部分是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完成的，第二阶段余下的部分以及第三阶段则是君士坦提乌斯继位后实施的。这个儿子虽然在很多方面都不如父亲，但是在推行基督教的政策上倒是坚定不移、贯穿始终。

凡界的君主态度如此坚定，按理说，圣界一方应该对此深表感激，不遗余力地支持君主。可事实并非如此。在遭到迫害的公元3世纪后期，基督教教会内部已经出现了相互争斗的局面，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之后，内斗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就在这个时期，以贤德而著名的基督教隐修士（圣）安东尼在西奈半岛（Sinai Peninsula）的修道院，走完了他超过百年的漫长的人生。安东尼出生于埃及中部的埃拉克雷奥波利斯（Herakleopolis），是基督教修道主义的创始者。或许是沙漠地区比较容易找到天然洞穴的缘故，在埃及以及叙利亚，修道主义信仰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们住在山洞里祷告、冥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如果基督教教会提供的历史资料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安东尼这位沙漠隐士应该生于公元250年，在公元356年去世。他的一生经历了基督教惨遭迫害的戴克里先皇帝时代以及鼓励扶持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可是，在记录他一生言行的《圣安东尼传》中，他对于罗马皇帝，不管是反基督教的还是支持基督教的，总共只提到过一次。安东尼在红海附近建了修道院之后，前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所以他不会孤陋寡闻、不清楚世间的局势。从《圣安东尼传》一书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帝国东方的基督教的发展形势有着相当的了解。

然而，这位沙漠隐士大声抨击的，并不是镇压基督教的罗马皇帝，而是基督教教会内部的“异端”。

圣人安东尼憎恶的，不是外敌，而是基督教教会内部的敌人。相对于异教徒，更让他深恶痛绝的，是那些身为基督教徒却谬解教义的同门兄弟。有一次，安东尼离开他生活的沙漠地区，专程前往亚历山大城，当面斥责了掌管当地教会的阿里乌斯派的高级主教，称他们是最坏的异端，是反基督（Anti- Christ）的先锋。紧接着，他又告诫那些慕名而来见他的信徒，不要和阿里乌斯派的人来往，阿里乌斯派的思想完全违背了十二使徒所宣导的教义，是恶魔的理论，是毫无根据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在其他场合，一向宣导提倡和平安详的信仰生活的安东尼，只要话题涉及异端，立即会变得暴跳如雷，他痛骂阿里乌斯派“连说出名字都嫌脏了嘴！”阿里乌斯派也不甘示弱，他们袭击、破坏了阿塔纳西乌斯派（Athanasius，主张三位一体，因而也称为天主教）的教堂和修道院。在当时，各教派之间因对教义的解释不同而产生对立。这种相互敌视的情绪逐渐上升，最终演变为暴力的事件层出不穷。问题的关键是无论阿里乌斯派还是阿塔纳西乌斯派，每一个教派都对自己的教义坚信不疑，而把对方的解释看成是谬论。

我们翻译成“异端”的这一词语，词典的解释是：偏离了正统的宗教、思想、学说；“视为异端”，是指作为异端被排斥的事物。如果要追根求源，“异端”这个词源自希腊语，之后发展为拉丁语的“haeresis”。

然而，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使用这个词语时，都意指“选择”。这代表着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异端”是指“深思熟虑之后所选择的宗教、思想、学说”，而不是“偏离了正统”。既然“异端”只是一种选择，那么就不应该遭到排斥和打击。但是，随着一神教成为主流宗教，就失去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正确，要么错误，异端成了不堪入目的东西。如果异端意味着“选择”，那么大家就

有共生的可能，承认对方有其一定的道理，作出让步。可是当“异端”代表了错误，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共生、让步，只能在被排斥之前，先排斥对方。

互相视为异端，不仅发生在神职人员之间，平民百姓同样如此。中东地区是世界三大宗教中两大宗教的诞生地（尽管公元4世纪时伊斯兰教还未诞生）。在那里，就连市井小民也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息。难得有一位不受这种气氛感染的人，曾经就当时的社会现象作了以下的描述：

> 无论是在街角还是在广场，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热心地讨论着我们无法理解的问题。卖布料的、卖食品的、兑换钱的，人人参与其中。如果你想问商品的价格，那么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在得到答案之前，你得先听一番他们对圣父、圣子、圣灵的观点。“这位客人，您认为子的地位次于父吗？”
>
> 如果你在浴室，问那里的下人水温如何，他可能会这样回答你：“您认为圣子是怎么诞生的？”如果你去买面包，店主会先高呼一声“啊!全能的天父”，再告诉你面包的价钱。

阿塔纳西乌斯派与阿里乌斯派的争论在于，前者主张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本体，即三位一体，而后者则认为圣父与圣子二者有别。以上是街头版的教派争论。

教会内部各派别之间相互敌视的状况，让一心想让基督教取代罗马传统多神教的皇帝伤透了脑筋。基督教只有全体一致、上下统一，才能成为帝国的支柱。尽管当初君士坦丁大帝在召开尼西亚公会议时，已经把三位一体定为正统的教义，不过，在教义争论的问题上，大帝的威信似乎只限于他在世期间，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继位之后，就不得不经常召开大公会议，试图调解各派之间的矛盾。如果仔细推敲这些大公会议上的论战内容，我们就会发现，传达上帝旨意的高贵的

主教们和那些平民信徒有一个共同之处——不肯倾听他人诉求的排他性。其实无论是三位一体派占了上风，还是阿里乌斯派最终获胜，其结果都是一样，因为一神教的本质就是排他。基督教势力不断壮大的罗马帝国也因此逐渐走向排他化。

以上就是“米兰敕令”颁布半世纪之后的基督教教会的现状。尤里安就是在这个时代登上了政治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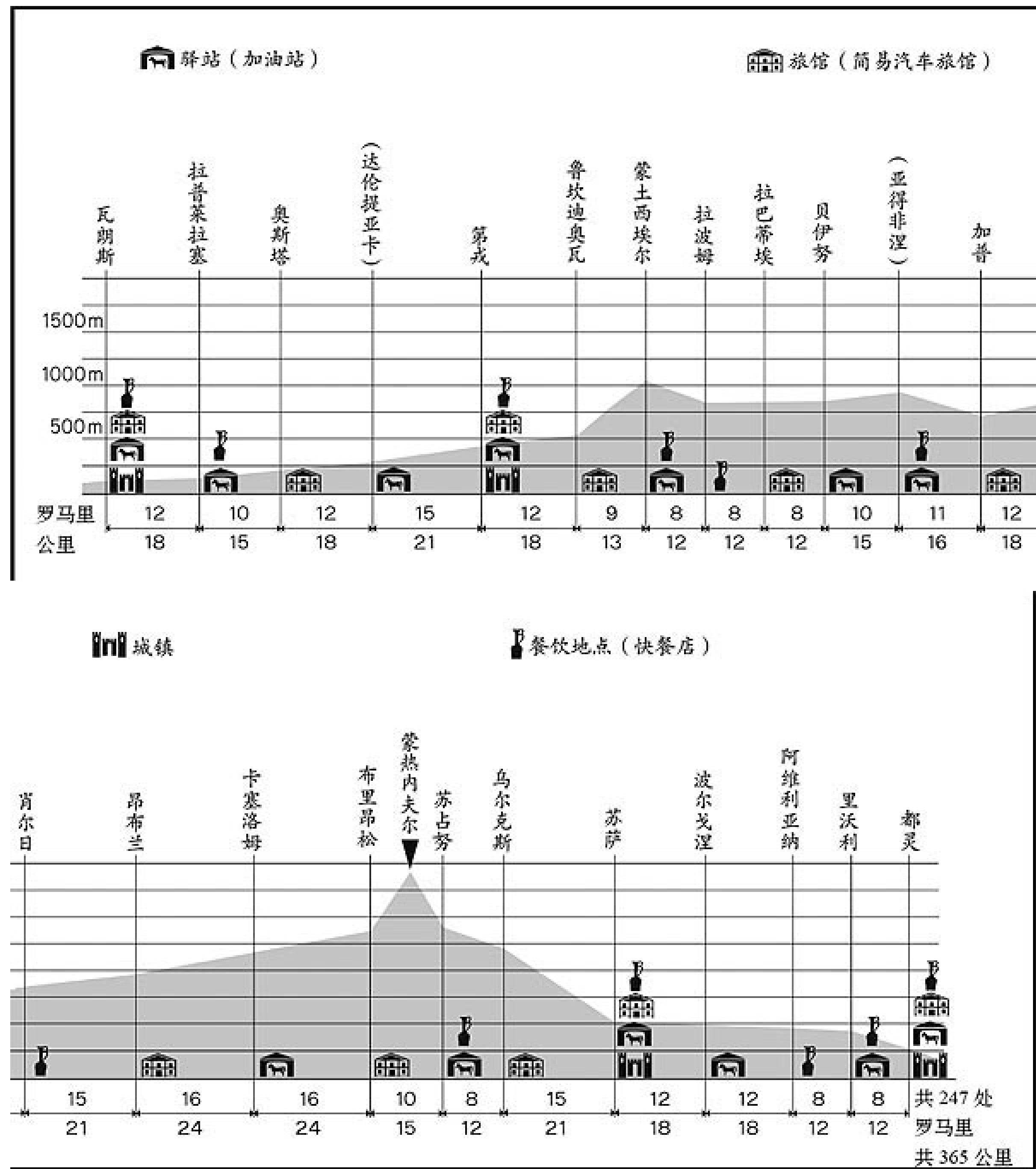
高卢的尤里安

即便是平民，也会尽量避免在寒冬腊月时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至于军人，正如“冬令营”一词所示，冬季可以在营地休息，不用打仗。尤里安是地位仅次于“正帝”的罗马帝国的“副帝”。君士坦提乌斯在米兰任命这位年轻的堂弟为副帝的日子是公元355年11月6日。按照常理，尤里安可以等到第二年开春之后，再去高卢赴任。何况他刚娶了正帝的妹妹海伦娜。虽然说这场婚姻是奉皇帝之命，但毕竟还在新婚期。可是，尤里安在11月30日就离开了米兰，并且没有带上新婚的妻子随行。当时的他没有行动上的自由，副帝上任未满一个月就前往高卢，可以说完全是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决定。与刚满24岁的尤里安同行的，只有360人的卫队。

这是因为高卢形势已经迫在眉睫，还是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心里多少有些置尤里安于死地的想法?

如果以上两种假设都不成立的话，那么尤里安严冬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理由或许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为了开春后的战斗，利用冬季休战期进行军队的整编。

尤里安出生于君士坦丁堡，在小亚细亚长大。20岁之后获得了一些行动的自由，不过活动范围仅限于小亚细亚、叙利亚以及希腊这些帝国的东部地区。他生平第一次体验到的欧洲，就是乌云笼罩的米兰的冬天，以及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



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罗马大道沿线的各种设施（瓦朗斯至都灵）

从米兰出发，翻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前往罗讷河沿岸的维埃纳（Vienne），有两条路可走。

之一，从米兰往西到奥斯塔（Aosta），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格勒诺布尔（Grenoble）。从格勒诺布尔去维埃纳，一路上基本都是平坦的大道。

之二，首先从米兰到达都灵（Torino），经过苏萨（Susa）山谷的山道，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下山后向前走，就是罗马时代称做格拉提亚诺波利斯（Gratianopolis）的格勒诺布尔。

想必在公元355年的冬天，奔赴高卢的尤里安走的就是其中一条路径。这两条道都是罗马式道路，相当于那个年代的高速公路。

Infrastructure在日语里被翻译为社会基础、社会资本、下部结构等。它指的是规模超出了个人能力范围、须由国家或地方自治体施行的事业。用罗马人的话说，是“为了让人过上人一般的生活所必需的重大事业”。所以，它不是铺了路就万事大吉那么简单。罗马人概念中的社会基础，还包括了提供路上行人安全和舒适的保证。从上图可见，即使是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这样艰险的路线，沿途相关设施的齐全程度，也足以和现代高速公路相媲美。

然而，只有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这些设施才充分地发挥了效能。我们根据遗留下来的史料可以发现，罗马道路能够维持定期维修的最后时期，正好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终结的年代相重叠。之后，虽然对部分道路进行了数次维修，但仅持续到公元375年。以后，道路就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既然道路的状况每况愈下，那些依靠道路为生的，像旅馆、驿站、马车修理厂等周边设施，势必也是日渐凋零。换言之，与元首制

时代相比，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出行的舒适度和安全度都大幅度地下降。

基础建设有一个特性。如果在建造当初，基础打得扎实的话，就算是之后无人打理，在一定时期内，仍然能够自主地发挥功效。罗马时代的那些负责公共建设的工程师曾经留下豪言壮语，说他们建造的道路，即使没有大规模的翻修，也能保证百年的品质。虽然罗马大道以及道路周边设施的服务质量有所下降，但是它们的功能还是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前面附图就是根据公元333年，一位从高卢南部的波尔多出发，前往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的勇敢的朝圣者留下的记录制作而成。

由此可见，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结束150年之后，当初建造的公共设施，尽管质量有所下降，但依旧能够正常运转。公元333年，不过就比尤里安首次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早了22年。当然，历史上的现象，仅凭一些数字往往是无法追究其实质意义的。公元333年前后，大约是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前的4年，这位皇帝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在他统治时期，在抵御蛮族侵略上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尽管无法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相比拟，至少还是维持了“和平”（Pax）的局势。正因为如此，像上述朝圣者那样的平民百姓，才可能只身完成从西欧到中东的长途旅行。

可是，这种“和平”局势在公元350年发生了巨变。蛮族出身的将领马格嫩提乌斯叛乱，杀死了君士坦斯皇帝，紧接着马格嫩提乌斯与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打了三年的内战。马格嫩提乌斯死后的两年中，罗马帝国因军事力量的削弱，遭到了蛮族大规模的侵略。在帝国境内，阿尔卑斯山脉西面的高卢被蛮族把持，东面的意大利则由罗马军防守。自此，阿尔卑斯山脉不再是一条“道路”，而是一道屏障。自然而然地，人和物资的流通停滞，常驻的人口以及马匹也随之削减，最终导致沿途的各种服务水平发生明显的下降。而尤里安正是在这种情形

下，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脉。在20年前，一般人翻山通常只需要10天左右，如今，就算副帝一行一路受到特别的礼遇，估计也要10天以上的时间才能翻过高山。而他下山后到达的高卢，也不再像20年前那样，可以让一个普通的朝圣者安全便利地旅行。

所幸的是，尤里安很年轻，因此他把这次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前往高卢的旅程，当做是了解帝国西部的绝好机会，在此之前，他只到过帝国的东部地区。

掌管高卢全域的副帝的目的地是维埃纳，而不是由此北上沿着罗讷河20公里之外的里昂。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高卢的局势有多么糟糕。里昂在元首制时代曾经是整个高卢地区的首都，金币、银币的铸造厂就设在此地，可见它有着极高的安全性。但是5年前，马格嫩提乌斯在这里杀死了君士坦斯皇帝，挑起内战，之后始终混乱不断，以至于罗马帝国的副帝也不敢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大本营。

公元355年年末前后，尤里安到达了维埃纳。维埃纳在罗马时代称做维娜（Vienna），是从格勒诺布尔前往里昂途中的一个小镇。谁也没有料到，它竟然会取代里昂成为副帝的所在地。副帝所谓的皇宫徒有虚名，不过是一间较大的宅子，但对于只被允许带四个下人的他而言，这样的居所反而更符合目前的处境。

与尤里安随行的四个下人，包括两名侍从、一名御医和一名书童。御医与尤里安是知心好友，有他陪伴左右，至少不会太寂寞。尤里安离开米兰时，携带了大量瞒过了检查的书籍（当时的书籍是卷轴装），负责管理这些书籍的就是书童。除此之外，书记员和秘书的工作也由书童兼任。在那个年代，皇帝出巡通常都会带着大批的随从，尤里安副帝那简陋的宫廷，势必让那些来迎接他的人感觉到其无足轻重的地位。

整个宫廷中，能让尤里安相信的就是他带来的四个随从。后来他又召了两名哲学家入宫，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跟着尤里安来高卢的还有数名宫廷里的人，对尤里安而言，得将他们视做皇帝的密探，时刻提防着为好。在高卢，同样布满了宦官的人马，所以在维埃纳恭候副帝的那些大臣大多也是一丘之貉，尤里安必须随时保持警惕。

西尔瓦（Sylvanus）的悲惨下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法兰克人出身的西尔瓦原本是马格嫩提乌斯手下的一名大队长，穆尔萨会战前夕，他背弃了马格嫩提乌斯，带着手下投奔了君士坦提乌斯，因此，被君士坦提乌斯晋升为高卢地区的骑兵团团长。可是，这个骑兵团团长做了还不到四年，皇帝接到通报，说西尔瓦欲拥兵谋反，夺取皇位。君士坦提乌斯刚扳倒了一个蛮族出身的叛将，所以一听说又有异族将领谋反，顿时变得怒不可遏，对那些宦官的谗言深信不疑。被皇帝当成了第二个马格嫩提乌斯的西尔瓦别无选择，只有据守科隆举兵反抗。为了对付这位在帝国西部立下赫赫战功的勇将，皇帝不得不从东部调来同为罗马名将的乌尔希西努斯。就在尤里安到达高卢的三个月之前，西尔瓦被处决了。

西尔瓦的死亡，使得罗马军队又损失了一名大将。不过对于生性多疑、封闭又绝对专制的君士坦提乌斯而言，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证皇位的安泰，因此，无论真实与否，一旦发觉端倪，立即将它掐灭。兄弟三人中，唯有君士坦提乌斯能够长期在位，正是因为他不断地肃清任何可能成为他对手的人。父兄都遭此毒手的尤里安，最需要防备的就是不要落入这位年长他13岁的堂哥所设的陷阱。

尤里安在周遭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开始了他在高卢的生活。很幸运，他遇到了一位凡事能够相谈、商量、不遗余力协助他的人。这个人名叫弗拉维乌斯·塞孔杜斯（Flavius Sallustius，又译萨路斯特），是一位高级军官，如果尤里安算高卢军队总司令的话，他就相当于实际

担任军事指挥的副总司令。塞孔杜斯一向远离宫廷政治，是一位生性秉直的武将。就是他教导了尤里安如何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战场上。据说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尤里安，因为要来高卢，特地学习了尤里乌斯·恺撒写的《高卢战记》。多亏了这位刚正不阿的塞孔杜斯的帮助，24岁的副帝不仅在军事上，对高卢的内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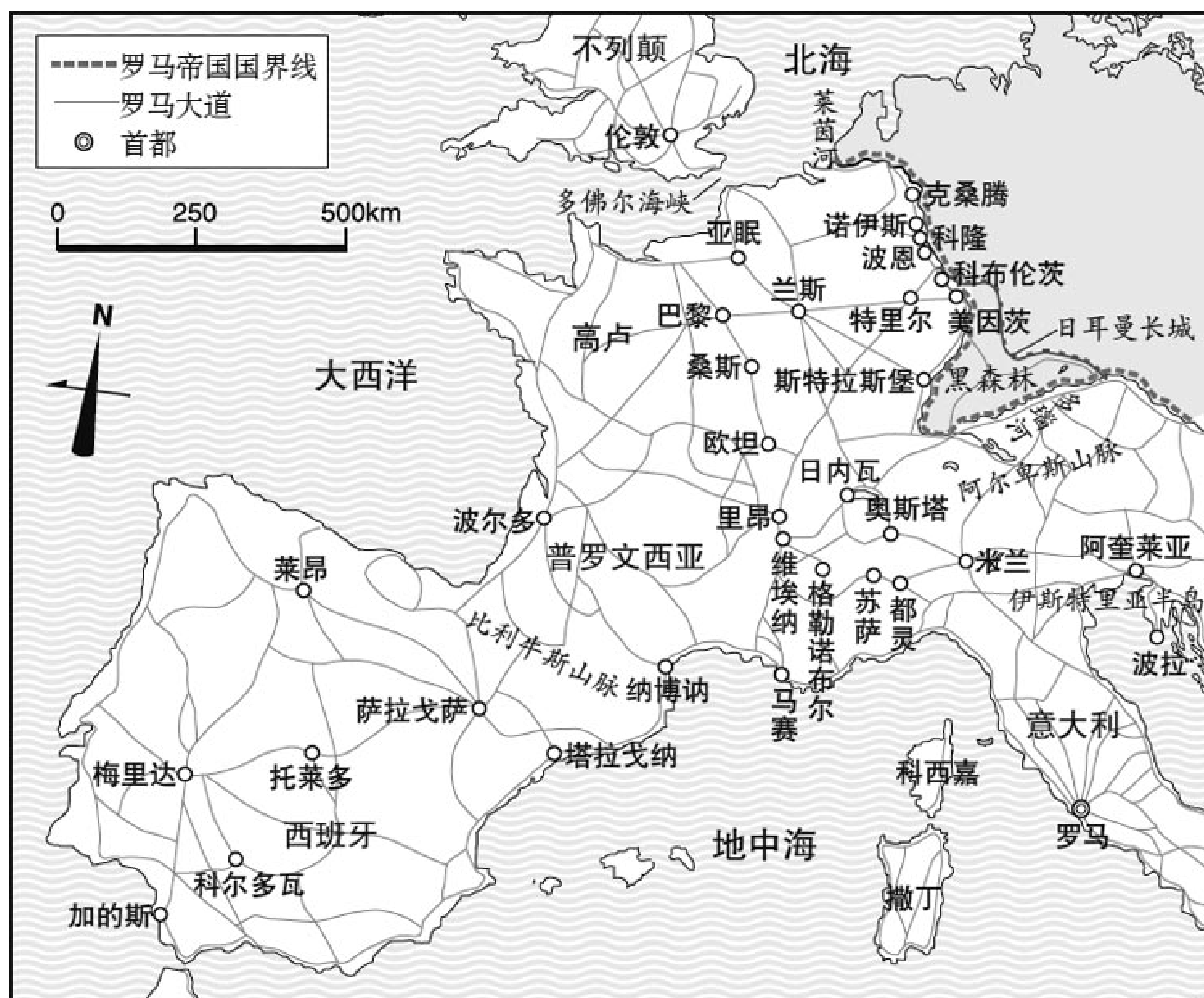
副帝尤里安所管辖的地区，包括高卢、不列颠（Britannia）以及西班牙（Hispania）三个行省。从军事防卫的角度来看，不列颠和西班牙的安全完全取决于高卢地区是否能够恢复安定。而威胁帝国这些行省安全的，就是越过高卢东部国界线莱茵河的北方蛮族。

事情轻重有别，不列颠和西班牙的问题可以暂且搁置，首先需要集中精力恢复高卢的安全。而源自阿尔卑斯山脉、注入北海的大河莱茵河两岸则是重中之重。

最初将莱茵河定为“防线”的人，是征服了高卢的尤里乌斯·恺撒。之后，在恺撒的后继者奥古斯都引导下，走向元首制的罗马，将莱茵河的西侧，以摩泽尔河（Moselle）为界，分成上、下游两部分。上游地区称为“高地日耳曼行省”（Germania Superior），下游地区叫“低地日耳曼行省”（Germania Inferior）。两行省都冠以“日耳曼”之名，是因为在恺撒征服高卢时，莱茵河的西岸已经有不少入侵的日耳曼人定居在此。

鉴于以上的原因，罗马在公元1世纪进入元首制最初的时期，将莱茵河定为国境。罗马军团的基地通常都会沿着国界线建立。以莱茵河为例，低地日耳曼行省的基地设在克桑腾（Xanten）、诺伊斯（Neuss）、科隆以及波恩；而高地日耳曼行省则设在美因茨（Mainz）、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军团基地几乎是沿着国界线连成了一串。

到了公元2世纪时，黑森林（Schwarzwald）一带也划入了莱茵河与多瑙河的上游地区。罗马人在此建起了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以抵御蛮族的入侵，因此，古代称为摩功提亚库姆（mogontiacum）的美因茨以及叫做阿真托拉特（Argentorate）的斯特拉斯堡，就不再是国界线上的军事重地。美因茨和斯特拉斯堡演变为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之后，以前的军营并没有消失。活用历史遗产，也是城市充分发挥其效能的手段之一。城中不仅仍然有军队驻守，而且还建起了连接日耳曼长城的道路网，一旦发现敌情，军队可以迅速到达战场。这些罗马式道路四通八达，因此，奔赴前线的军队能够顺利地通过终不见天日的黑森林地带。这就是罗马人对基础建设的要求：要做就要做得有效、彻底。



罗马帝国西部

日耳曼长城曾经在150年间发挥了完美的功效，直到后来发生了罗马当朝皇帝被波斯国王俘虏的前所未闻的大事件，本土处于危急状态，没有能力再去顾及其他地区的安全问题。受此影响，这个铜墙铁壁才被放弃。在放弃了日耳曼长城之后，公元260年美因茨和斯特拉斯堡再次成了军事重地，这意味着当地的居民又不得不再一次面临敌人的直接威胁。

然而，这里的防线也只维持到公元350年。公元355年的年末，尤里安来到高卢时，这里的局势更加恶化。民众以前只是担心外敌的侵略，而如今蛮族早已闯入家园，烧杀掠夺。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公元350年发生的杀死君士坦斯皇帝及其主谋者马格嫩提乌斯挑起的军事叛变。为了抵抗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率领的讨伐部队，马格嫩提乌斯3.6万人的军队损失了2.4万人，这些人原本都是防守莱茵河的官兵。这个时期，蛮族越过莱茵河入侵罗马境内尤其严重的原因，主要是高卢的防守兵力减少了三分之二。马格嫩提乌斯挑起的叛乱，在公元353年以他自杀而告终。然而，平息战乱之后的高卢并没有能够恢复到战前的形势。这场罗马军队自相残杀的内战，造成了高卢的防守军力严重削弱。

尤里安被派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形势下的高卢，而且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以多瑙河的战事需要兵力为由，没有给他支援的兵力。虽然有一些招兵买马的军费，不过，皇帝批准的金额与实际的需要相差甚远。按常理判断，无论他如何努力，高卢地区最多也就是维持现状了。如果尤里安满足于身上那件副帝的斗篷，那么他只需小心谨慎，不引起正帝的猜疑，就能保住这个挂名总司令的位子，太平无事地坐守“政府”所在地维埃纳。万一发生不测，维埃纳地理位置良好，能确保他能成功逃离。他可以翻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意大利东部，也可以沿着罗讷河南下，到达古称“普罗文西亚”（Provinciàe），即现在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那里当时还没有受到蛮族的侵略。

积极作战

24岁的尤里安放弃了所有可以让他安身保命的选择。第二年一开春，人和马匹刚开始有了精神，他就即刻离开了维埃纳，既不向东也不向南，而是直奔北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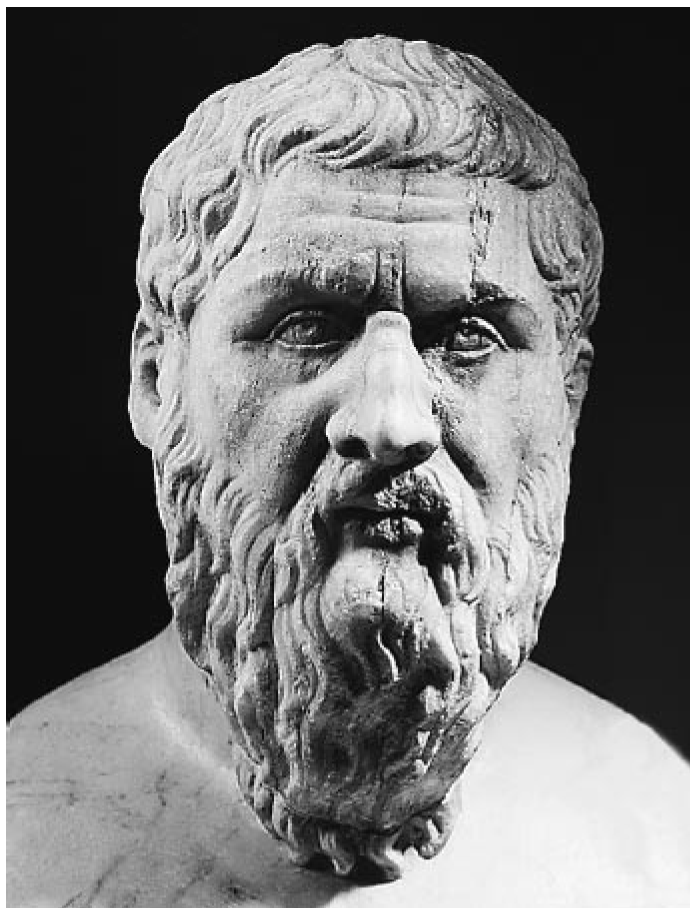
公元356年是尤里安就任副帝的第一个年头。这年他接获的第一个报告是：欧坦城（Autun）遭蛮族大举侵犯。所幸的是，居住在当地的退役军人重新拿起武器，支援守备部队，避免了全城陷落的危机。当时尤里安手里只有一队弓箭手和一队重装骑兵，但他没有任何犹豫，带着军队开赴欧坦。

从维埃纳到里昂，如果走大路，只需要沿着罗讷河往北，从罗讷河与塞纳河交汇处的里昂继续北上就是欧坦。不过，大路行军容易暴露，总共才千余人的军队，要是遇上万人以上的敌人，必死无疑。尤里安决定放弃平地，改走直线距离较短但道路艰险的山路。势单力薄的小部队也有着机动灵活的便利之处。

欧坦在罗马时代称为奥古斯托杜努姆（Augustodunum），四周城墙高筑，城防要塞处还建有监视塔。城内不但有模仿罗马斗兽场而建的圆形竞技场，还有两座半圆形的剧场。两条主干道在市中心广场交接，从这里经过四方形的城门，就是城外。欧坦的民宅，按照罗马式的都市结构均匀地分布在城内的各处，街道垂直交错，犹如围棋盘上的直线，一旦敌人来袭，军队可以毫无障碍地迅速集中，投入战斗。整个欧坦似乎就像一座罗马军团基地。虽然蛮族人多势众、勇猛顽强，但是他们缺乏战略，也就是说不懂得有效地运用兵力，而且在当时又尚未掌握多方进攻的战术，因此像欧坦这样一个兵力不多的中等规模城市，也能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成功地击退敌人。尤里安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只要没有遭到频频的进攻，像欧坦这种小地方也可能靠仅有的兵力自保安全。既然如此，与其坐等敌人来袭，不如主动出

击。尤里安决定一路向北追击敌人。他下令除了普罗文西亚之外，所有散布在高卢全境内，准确地说，是躲在高卢境内的残余部队，在兰斯（Reims）集合，他本人也离开欧坦前往兰斯。

兰斯古称杜罗科托鲁姆（Durocortorum）。古罗马时代，这里是七条罗马大道的交会处，在北高卢地区属于数一数二的重要城镇。散落在各地的军人来这里集合不仅便利，军队由此向东，经过连接着的罗马大道，就可以抵达目的地高地日耳曼行省。莱茵河上游以西的广大地区盘踞着大量的阿勒曼尼人（Alemanni），尤里安将他们定为第一个扫荡的目标。



柏拉图

据称，最终有2万名左右的罗马士兵在兰斯集结，这批人即将挑战的是日耳曼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阿勒曼尼人。按照正常的思维，

尤里安的这种行为属于有勇无谋。然而年轻可以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不过，年轻人也容易动摇，上一刻还自信十足，下一刻就可能变得忐忑不安。这个时候，尤里安都会放声大喊，宣泄一下压力：“啊！柏拉图！柏拉图！我这一介哲学门徒怎么能做这样的大事！”

在统称为北方蛮族的日耳曼人中，尤里安要面对的阿勒曼尼人属于人多势众、力量强大的一支。当时活动在莱茵河流域的蛮族，下游一带主要以法兰克人（Franken）为主，而中、上游地区就是阿勒曼尼人。而从北向南侵入多瑙河一带的日耳曼人主要是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夸地人（Quadi）以及强大的哥特人（Goth）。如果将他们视为威胁多瑙河防线的敌人的话，那么莱茵河一带要对付的日耳曼人就是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

罗马帝国灭亡时，法兰克人将法国占为己有，法兰西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同一个时期阿勒曼尼人也占领了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地区。这里之后成了德国与法国的兵家必争之地。“阿勒曼尼”这个名称带着浓厚的德意志色彩，而法兰克人则被视做法兰西人的祖先。不过追本溯源，这两个民族都是来自日耳曼的同胞兄弟。因此，对于试图恢复高卢安全稳定的罗马帝国副帝的尤里安而言，不管是阿勒曼尼人还是法兰克人，都是北方蛮族。

这两个部族一个从下游入侵，另一个从中上游入侵，虽然入侵的地点不同，但他们最后都越过了莱茵河，一路烧杀掠夺，沿岸的城市科隆、波恩、美因茨、斯特拉斯堡，以及摩泽尔河上游的特里尔无一幸免，至于那些防卫能力无法和城市相比的乡村，最终只剩下一片无人的废墟。

因此，尤里安以古代称为鲁特西亚（Lutetian）的巴黎为界，将高卢分为东、西两块，把击退蛮族的战场选在界线以东的东高卢。他的这个战略是正确的，准确地说，是除此之外别无他选。

于是，24岁的副帝率领着在兰斯集结的几乎全部的人马，向东搜寻敌人。然而，阿勒曼尼人长年出没于这一带，十分熟悉当地的情况，神出鬼没，难见踪影，而年轻、经验不足的尤里安，又没有出奇制胜的战术。那一天，他们行走在乌云密布的丘陵上，队形拉得又细又长，仿佛在没有敌人出没的后方行军。

尤里安骑着马，走在队伍的前列，不断地给身边的士兵打气。而此时后面的队伍已经遭到了大批悄然而来的敌人的猛烈袭击。当他发现情况时，大部分的殿后官兵已经倒在了阿勒曼尼人的弓箭、标枪之下。根据记载，尤里安损失了2个军团。公元4世纪时一个罗马军团的规模，既不是共和时期的4000人，更没有元首制时代的6000人，最多也就在千人左右。即便如此，2000兵力的损失，对尤里安而言仍然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这次的教训让他深深地体会到，战场上光靠勇敢是不够的，谨慎和警戒才是关键。

尤里安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因首次的出击不利而畏缩，而是坚持了以攻为主的战略方针。任何人都难免失败，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尽早地挽回失败。他率领的部队没有撤退到安全的兰斯，而是继续往东前行。与此同时，尝到了胜利滋味的阿勒曼尼人，决定与罗马军展开正面交锋。

第二次战斗完全在罗马人的意料之中，因此采用了他们传统的会战方式，获得了胜利。尽管没能将敌人一举歼灭，但这次胜利让尤里安在军队中树立起了威信。当这位年轻的副帝下令继续朝莱茵河方向前进时，没有人提出反对。

历经6年左右的时间，罗马军终于重新回到了莱茵河沿岸。但是映入他们眼帘的科隆，是被敌人蹂躏之后倒塌在凄风苦雨中的一片废墟。不仅当地的罗马人逃离了这里，蛮族人在烧杀抢劫之后，也弃之而去。科隆破落不堪的景象，让来到这里的罗马军人无言以对。

当时科隆正式名字叫“科洛尼亚·阿格里皮娜”（Colonia Claudia Ara Agrippinensium），后人将拉丁语中意为“殖民都市”的Colonia转译成德文，才有了如今科隆这个名字。与前身是军团基地的美因茨、斯特拉斯堡不同，科隆的兴起与恺撒有关。当年恺撒在征服高卢之后，发现居住在莱茵河东侧的日耳曼人中的乌必耳（Ubier）一族倾向于罗马，于是令他们一族集体迁移到莱茵河西岸，渐渐形成了科隆这一城市。科隆是在克劳狄乌斯皇帝时代才升格为“科洛尼亚”，即殖民都市。不过在此之前，它已经属于莱茵河防线的重地，经常成为在前线越冬的司令官及其部队的冬令营。卡利古拉（Caligula）皇帝就是在其父的科隆军营中长大的。这里顺便提一句，与科隆相似的城市还有伦迪尼乌姆（Londiniensium，伦敦），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取代了由军事基地发展而成的约克、切斯特，成了不列颠行省的首府。

寒冬不断逼近，冷雨潇潇中的科隆如死一般地沉寂。可就在不久之前，这里还是车水马龙、人和物产交流频繁的热闹城市。科隆沦为废墟，意味着莱茵河防线已经不复存在。站在废墟之上、亲眼目睹惨状的尤里安，恐怕到这个时候才真正下决心，他要重建莱茵河防线，恢复周边惨遭破坏的地区。尤里安命令部队掉头向西，前往桑斯（Sens）越冬。可是，当部队平安抵达桑斯、士兵刚被送到冬令营不久，又遇到了阿勒曼尼人的袭击。

桑斯位于巴黎东南100公里、兰斯西南150公里处。这里也建有城墙，但城镇整体规模不及兰斯，因此冬令营只能建在附近的村镇。桑斯不像里昂或巴黎，有可以退守的沙洲，一旦敌人围城，很难坚守得住。当阿勒曼尼人袭击桑斯时，尤里安向在附近冬令营的骑兵团长官发出了紧急救援命令，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援兵，他只能依靠手中仅有的兵力以及当地居民的协助，来打这场凶多吉少的仗了。

所幸的是，蛮族围攻30天未果，悻悻然退兵离去。他们虽然来自北方，习惯了寒冷的气候，但是寒冬腊月在毫无遮掩的平原上安营扎

寨，毕竟还是太严酷了。30天的保卫战，再一次让尤里安赢得了声誉。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他表现出的无所畏惧、坚持到底的精神，受到了官兵的赞赏。想来年轻的副帝也通过这次教训，学到了冬令营选址对于战争的重要性。

日耳曼民族

公元357年，春天来临之际，尤里安迎来了他在高卢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他25岁。

在率军开拔之前，尤里安已经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解除了原来的“骑兵团长官”（magister equitum）马塞勒斯的职务，由经验丰富又勇敢擅战的老兵塞维鲁斯（Severus）取而代之。桑斯告急之际，尤里安给马塞勒斯发出了求援令，马塞勒斯百般搪塞，最终没有执行命令。因此，作为高卢地区总司令的尤里安，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除了马塞勒斯的官职。为了有效地击退频频来犯的北方蛮族，当时罗马军的主力，已经从传统的重装步兵转为骑兵，骑兵团长官的角色可谓是重中之重。尤里安对马塞勒斯的处置，相当于总司令革了副总司令的职。

这种事情，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引发震动，何况尤里安的这一举动势必会触怒宫廷。但他还是冒死作出了决定。高卢地区绝大多数的高官都是由君士坦提乌斯皇帝钦定的，尽管作为副帝，尤里安握有高卢的人事权，解任手下合情合理，但他自己的脑袋能否保住，完全要看正帝乐不乐意了。

尤里安的兄长加卢斯，在担任副帝派驻叙利亚期间，曾经以过激的手段除掉正帝派来的两位官员。他将这两个人像祭品般地丢在大庭广众之下，让情绪失控的民众活活地将他们杀死。加卢斯的行为，正

好给那些希望他倒霉的人制造了机会，而他的结局也证明了一点：胆敢违背正帝意志的人，一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尤里安是加卢斯的弟弟。加卢斯最终是被斩首处死的，而下令杀死他哥哥的正是当下唯一的最高权力者君士坦提乌斯。所以，尤里安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作出了以上人事决定的。

在维埃纳的时候，尤里安发现那些主管内政事务的官员虽然没有露骨的反抗，但对他始终是阳奉阴违。不仅是文官，在这一年的军事行动中，那些高级武官的行为多半也是消极怠慢。因此，尤里安拼死也要向所有的人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果让这种消极的态度在军中继续蔓延，击退蛮族的目标就会化做泡影。尤里安杀鸡儆猴，解除马塞勒斯的官职，向全军显示了他的决心。

与兄长加卢斯不同，尤里安是以总司令的身份解除了骑兵长官的职务，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虽然当初任命马塞勒斯的是君士坦提乌斯，但那是尤里安做副帝之前的事情。尤里安上任之后，高卢的人事权就属于他的权力范围。尤里安的行动证明，想从阴谋的旋涡中脱身而出，选择堂堂正正地从正面突破，大多要比察言观色、步步为营来得更有效。结果，尤里安曾经再三请求也没求到的援兵，这一次皇帝竟然欣然点头答应。

尤里安决定延续前一年的做法，公元357年的军事行动也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不过，鉴于去年的失败教训，他在部署上做得更为谨慎。

首先是兵力。尤里安的军队，精确的人数是1.3万人。在元首制时代，除指挥官之外，现役（Juniors）军人的年龄定为17岁到45岁。帝国进入公元3世纪以后，20年兵役期的规定已形同虚设。“老

兵”（veteranus）在元首制时代，是退役军人的代名词，到了后帝国时代，兵役期限模糊不清，“老兵”的意思变成了现役军人中超龄的老战士。另一方面，利用非敌对的蛮族作为雇佣军，已成了军队的常态。在规定的时间内当兵，退伍之后恢复平民生活，这种罗马军人传统的生活形态，这些蛮族人几乎完全没有共鸣，因此也不存在退不退役的问题。

尤里安掌握的1.3万人的兵力，之所以说数字精确、不含水分，是因为这些人是按照元首制时代“现役”军人的概念挑选的。换言之，这1.3万人是实打实的精兵强将。

话说回来，就算是精兵强将，1.3万人也只相当于元首制时代的2个军团。这种规模的军队，交给军团长指挥即可，根本不需要总司令亲自出马。即便是局势最为稳定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如果皇帝亲自出征，至少要带5万人以上的军队。

不幸，主导世界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成为历史，进入了一个混乱不堪、无秩序的年代。罗马帝国的副帝不得不率领区区1万余人的军队亲自出征。5年前，蛮族出身的将领马格嫩提乌斯率军对抗正帝君士坦提乌斯时，他手下都有3.6万人。这些人最终有2.4万人战死沙场，他们大多都来自高卢。当下的罗马帝国，即使面临外敌的严重威胁，也没有能力再去补充因内战而损失的兵力。而阿勒曼尼人族长克诺多马（Chnodomar）此时正率领着3.5万人的大军，等候着尤里安这1.3万人的到来。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年的战役尤里安得到了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支援，巴尔巴提奥（Barbatio）将军带着3万人马，已经从米兰开拔，往北行进。

尤里安与巴尔巴提奥联合作战的计划原本是这样的：

首先是尤里安率领1.3万人的军队，从桑斯出发，向东直抵斯特拉斯堡。阿勒曼尼人在这两三年中，以攻占邻接莱茵河西岸的斯特拉斯堡为目标，将这里作为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前线基地。

另一边，巴尔巴提奥率领的3万大军，从米兰出发，渡过阿尔卑斯山脉中的大小湖泊，穿越险境，到达斯特拉斯堡以北的莱茵河沿岸城市巴塞尔[Basil，罗马时代称为巴塞利亚（Basilea）]，从巴塞尔附近渡过莱茵河，向北进军。这一带原本属于日耳曼长城的内侧，如今已经成了阿勒曼尼人的大本营。



高卢东部

如果大本营失守，盘踞在斯特拉斯堡周边的阿勒曼尼人为了保卫后方家园，势必会渡过莱茵河往东撤退。这个时候，尤里安就可以伺机领兵追击。虽然只有1.3万人，但足够用以追击节节败退的敌军。这

次联合作战的目的就是通过南、西两面夹攻，一举歼灭渡过了莱茵河、在高卢内部肆虐的阿勒曼尼人，直捣他们的老巢。

可是，在行军前往斯特拉斯堡的途中，尤里安接到报告，说巴尔巴提奥的军队攻打到阿勒曼尼人的大本营附近，突然停了下来。部队在原地待命了数日之后，掉头回米兰去了。而且他们在待命期间，曾遇到阿勒曼尼人的一支分队，却完全没有行动，任由敌人扬长而去。

巴尔巴提奥为何做出这般让人不可思议的举动，其理由无人可知。根据后世的历史学家推论，可能是巴尔巴提奥猜想正帝君士坦提乌斯不希望看到尤里安建功，所以在他成为战争英雄之前，以“久候不至无奈撤兵”为由，撤回了米兰。所谓的猜测，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去诠释他人的内心。君士坦提乌斯是一个从不肯暴露自己内心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绝对专制的弊害之一，就是臣子需要去猜测主子的心思。总而言之，原本至少可以解决一半问题的联合作战，还没开始就灰飞烟灭了。

如果说这次事件还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让尤里安深刻地体会到，依靠他人的力量是一件多么徒劳的事情。25岁的副帝下定了决心，以1.3万人的兵力去迎战3.5万人的敌军。

斯特拉斯堡大捷

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战争时间拖得越长，对弱势的一方就越不利。有一种战略是如果不能一战定乾坤，大获全胜，可以通过每一次的局部胜利累积战果，最终达到目的。但是每一次的胜利，都会伴随着牺牲，结果是捷报连连，死伤惨重。这个现象欧洲人称为“皮洛士的胜利”（Pyrrhic victory）。这句话的典故起源于希腊伊庇鲁斯（Epirus）国王皮洛士。公元前3世纪，罗马正在争夺意大利半岛的霸

主之位，皮洛士是他们的强敌之一。尽管战场上皮洛士不断地打败了罗马人，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不得不撤兵逃回伊庇鲁斯。罗马最终能够打败皮洛士这位军事天才，是因为它的社会制度发挥了功效，可以在短时间内弥补战争中的损失。

然而，所谓尽快挽回损失的是最后赢家的理论，并不适合在敌占区作战的场合。在兵站不能充分发挥功效，即后勤供给不足的敌方打仗，将军们通常会采用速战速决的战术，平原布阵，在士兵雄壮的呐喊声中拉开序幕的会战方式，就有这样的优点。

被后人推崇为名将的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以及恺撒都喜欢通过会战的方式一决雌雄。这并非他们天性喜好壮观的场面，而是因为都在敌方的根据地打仗。更重要的是，他们都非常明白小隙沉舟、滴水穿石的道理。即使少量的损失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虽然说尤里安的仗是在国内打，但就各种实际情况而言，形同在敌方作战。这位25岁的总司令唯一的选择，就是一仗决胜负。

斯特拉斯堡古称阿根图拉特（Argentorate）。由此向西北约30公里处。有一个叫做“托雷斯·达维那”（意为路边小饭馆）的小镇。它是罗马大道沿线提供旅人落脚住宿的村镇之一。莱茵河的支流从这里经过，地势平坦，适合作为野战的战场。战役发生的具体时间没有记载，从后续的行动推测，应该是在春末初夏，气候上也有利于战情。

为了迎战罗马军，阿勒曼尼人的族长克诺多马带着1.5万人的兵力，从大本营出发，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渡过莱茵河，到达斯特拉斯堡。当初他们从罗马人手中夺得这里，将之作为罗马境内的前线基地，因此势必会安排自己人在此驻守，加上这些人，克诺多马在战场上投入的实际兵力应该超过了4万人。

斯特拉斯堡作为罗马军团的基地已经有350年的历史，高墙四起的军营占了半个城市，犹如城中之城。这里的军营建立于元首制时代，一个军团编制为6000人。由于经济力量强大，军营造得坚固扎实，设施完备。因此，不管是哪一方拿下这座城镇，都会将此地作为前线基地。阿勒曼尼人自然亦是如此。由于阿勒曼尼人在人数上占了优势，所以，当老当益壮的族长克诺多马建议出城打野战时，所有的人都表示赞同。这对尤里安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要他1.3万人的军队去攻破那牢不可破的军营，可以说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罗马军编成两路密集的纵队，向着对面横向排列、人数在他们3倍以上的浩浩荡荡的阿勒曼尼大军主动发起了进攻。尽管队形狭窄，罗马军还是以传统的方式，排成左翼、中央、右翼的阵势。左翼由塞维鲁斯指挥，总司令按照惯例负责中央，由辅助兵打头阵，主力军紧接在后。尤里安和他率领的200人的近卫队，站在前卫与后卫之间的位置。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能被敌人包围。“斯特拉斯堡会战”中，先发制人的是罗马军团右翼的骑兵团，位于中央的步兵团紧跟其后往前冲锋，而塞维鲁斯指挥的左翼却按兵不动。他们必须等到躲藏在丘陵后面的敌人现出原形，才能发起攻击。

蛮族人的战术到了公元4世纪仍然非常原始，就是骑兵团冲锋在前，步兵大批人马紧跟在后，一鼓作气冲进敌阵。这种单纯的作战方式，在“斯特拉斯堡会战”中也相当奏效，眼看着胜利在望。

双方骑兵的厮杀，一开始蛮族人明显占了上风。罗马骑兵虽然顽强抵抗，但终究不敌，放弃了战场，逃回自己的阵地。与此同时，敌军的中间部队也突破了罗马军前卫的防线。

此刻的尤里安，从总司令变身为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勇猛的战将，他带着200名骑兵策马扬鞭，一边呵斥着逃跑的骑兵，一边激励着

乱了阵脚的前线步兵，及时地扭转了几乎败北的战局。所幸的是，骑兵团迅速地重整了队伍，作为主力军的后卫，面对大批压上的敌人，没有丝毫的退缩。而躲在丘陵后面的敌军右翼部队，终于按捺不住纷纷现身，正好被等候多时的塞维鲁斯指挥的左翼部队逮个正着。

形势至此，就是罗马军控制战局了。战场上的输赢，往往不是哪一方人多，而是看谁能掌控主导权。当1.3万人的罗马军发起全线进攻时，3.5万人的阿勒曼尼军队节节败退，仓皇逃命。他们企图越过莱茵河逃回对岸，罗马军则紧追不放，一直追到莱茵河边。

阿勒曼尼人包括族长克诺多马在内的大批官兵被俘；6000余人战死沙场，还有很多人被莱茵河的激流卷走。罗马军方面，牺牲了4名队长以及243名士兵。这次“斯特拉斯堡会战”是罗马帝国后期战史上，少有的一次大获全胜的战役。



尤里安

会战结束后，尤里安接见了被俘的克诺多马。年轻的副帝对这位老族长，一直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不过，他还是将克诺多马与胜利的战报一起送给了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克诺多马后来被转送到罗马，在西里欧（Celio）山丘上的军营度过了余生。

“斯特拉斯堡会战”为尤里安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威望。在官兵们的眼里，他是无上荣光的大英雄。尤里安觉得士气可用，趁着冬天未到，领兵渡过了莱茵河攻入敌境。所谓的敌境，原来是日耳曼长城的内侧地带，就在百年前，这里还属于罗马帝国的领土。当年罗马军留下的军营、要塞随处可见，如今已经是人去楼空。这一次由于时间和兵力上的限制，尤里安的军队没能彻底捣毁敌军的老巢。然而，年轻的副帝能够目睹帝国昔日的荣光，已不虚此行。打败蛮族、获得斯特拉斯堡大捷的尤里安，眼下是名副其实的罗马帝国的“凯旋将军”。

副帝及其军队用比蛮族人更野蛮的方式，破坏了阿勒曼尼人的根据地之后，随着秋天的到来，渡河回到了莱茵河西岸。准备在鲁特西亚（Lutece，今巴黎）的冬营地度过公元357年年末到358年年初的休战期。

公元356年以及357年，当副帝尤里安以莱茵河畔为舞台，勇敢对抗阿勒曼尼人的同时，在多瑙河沿线，正帝君士坦提乌斯也在积极应战，履行着罗马帝国皇帝保家卫国之职责。他的对手是萨尔马提亚人和夸地人，早在元首制时代就不断地骚扰、威胁着帝国国境。同为指挥官，君士坦提乌斯与始终战斗在前线的尤里安不同，他几乎一直待在远离战场的大后方米兰。

他们两人之间的这个差异，不仅是因为正帝与副帝的地位不同，更主要的是尤里安只有1.3万人的兵力，而君士坦提乌斯手里掌握着10万大军。因此，皇帝可以放心地将战场的指挥权交给手下的将军。不过，敌情吃紧的时候，他也会在战场露个脸，给战士们打打气。这个事事效仿父亲的人，与他身先士卒的父亲不同，通常都是在战斗打到

尾声才会出现。当侵入多瑙河以南大片土地的蛮族被击退之后，他才亲自出马，率军渡过多瑙河北上追击。

或许是因为多瑙河沿线的战役胜利在望，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357年的春天首次造访了罗马，此行公开的目的是举行凯旋仪式。他的这个举动，似乎也是模仿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提乌斯及其随行，从米兰出发，穿过埃米利亚大道到达亚得里亚海。渡海之后，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直行，在4月28日到达罗马。39岁的君士坦提乌斯生平第一次目睹了这座不朽的城市。

罗马最后的凯旋仪式

帝国首都罗马的人民，自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的凯旋仪式之后，45年来首次看到了皇帝的身影。罗马城作为帝国的首都，已有1110年的历史。但是，当70年前帝国走向君主专制化之后，罗马这个“国家大脑”的角色也被他城取代。曾经被世人憧憬的“世界之都”，如今却沦为专制的君主为举行凯旋仪式，心血来潮过来看看的地方。

有关君士坦提乌斯在罗马的情形，我将引用一位军人的文章来代叙，从他当时所处的立场来看，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在场证人。

这位军人的名字叫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是出生于叙利亚安条克的希腊裔罗马人。他的出生年月不详，通常被认为是在公元330年。若真如此，那么他与尤里安同龄。在商业城市安条克，那些社会地位高贵、经济基础良好的上流社会出身的人，通常都会选择经商。但阿米阿努斯选择了从军之路，他好像是刚成年就加入了罗马军团。

由于出身高贵，阿米阿努斯一入伍，就获得了将官级的待遇，成为罗马帝国东部著名的战将乌尔希西努斯将军的幕僚。他跟随这位将军，打过西面的多瑙河战役，也奔赴过东面的幼发拉底河战场……历经了几十年东征西战的戎马生涯，在45岁左右离开了军队。他引退的理由我们不得而知。之后，他游历帝国各地，也曾经在罗马小住。

做回一介平民的阿米阿努斯开始写作。他雄心壮志要续写塔西佗记述到公元69年的《历史》（Historiae，亦译作《罗马史》）。如果读希腊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接力赛式的记述方式，对古代的历史学家而言，似乎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与塔西佗的作品一样，阿米阿努斯所著的《历史》（Rerum Gestarum Libri，亦译作《晚期罗马帝国史》。——译者注）也没有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最初的13卷不知下落，所幸的是，从公元353年的加卢斯副帝时代到公元378年哈德良堡战役大败25年间的文卷还在。这个时期，对阿米阿努斯而言，是他亲身经历的“当代史”，他留下的这段记录，正可谓是“同时代人的证言”。

尽管罗马帝国是一个双语国家，但对希腊裔的阿米阿努斯而言，希腊语才是他真正的母语。不过他著书时却使用了拉丁语。我认为其中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因为阿米阿努斯出身贵族，罗马上层社会的教育，向来是要求同时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其二，他要续写的是塔西佗的作品。塔西佗被称为拉丁散文第一人，既然是接力，那么就应该按照前者的语言续写历史。其三是阿米阿努斯曾经历过长年的军团生活，习惯了使用拉丁语。当时帝国皇帝颁布正式公告，采用了多种语言，帝国东部是希腊语，帝国西部则是拉丁和希腊双语。唯有罗马军团内一律采用拉丁语。

这位武将出身的历史学家文笔不错。文体虽然不是精心雕琢，但文字简洁明了，很符合其军人的气质。所以，后人将他视做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史学家。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访问罗马时，如果阿米阿努斯是随行之一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段叙述，就是当年这位27岁的武将的亲身感受：

> 西部和东部的问题尚未解决。然而，雅努斯神殿的大门好像已经关闭；敌人似乎已经彻底被消灭，君士坦提乌斯打算在罗马举行凯旋仪式。所谓的凯旋，其实是马格嫩提乌斯之乱引发的罗马人之间的流血斗争，依照罗马的传统，根本就没有资格举行这个凯旋仪式。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打败了外敌，就算获胜，那也是他手下将军们的功绩。没有任何人在危险的战场上见到过他的身影。即便如此，他还是要举行凯旋仪式。……
>
> 为了这场凯旋仪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力。从北而来的行列，距离罗马城墙还有130公里，却已经整好了随时可以冲锋的队形。全副武装的士兵延绵不断，占据了整个街道。看到这久违的景象，沿途的百姓不禁欢呼、鼓掌，欢迎他们的到来。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战车上的皇帝。
>
> 尽管皇帝的队伍还远在天边，元老院议员和罗马的贵族们全体出动，早早恭候在罗马城门前。这些只剩下昔日光环的人，对皇帝恭敬的态度和不遗余力的赞美，让他感到深深的满足。当他看到这些人后面的大批民众时，他没有掩饰住惊愕的表情。他终于明白，帝国没有一个城市能像罗马这样，容纳如此众多的民族和人种。
>
> 皇帝的战车穿过人群，一路前行。镶满了宝石的黄金战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绣着金龙的紫色皇帝旗，伴随在战车左右，迎风吹起的旗帜像一条不停扭动的长蛇。战车的两侧有两个纵队的士兵护驾，他们的头盔、胸甲和盾牌为了今天的凯旋仪式，特地磨得锃亮。穿着波斯式全身铁甲的骑兵队，看上去不像真人，宛如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制作的铜像。
>
> 被士兵簇拥着的君士坦提乌斯，无视民众的欢呼，纹丝不动地站在战车上，由始至终维持着君主在臣民面前的威严形象。战车造得实在太高，穿过拱门时，连小个子的他也不得不低下头才能通过。罗马人喜欢用拱门来装饰街道，所以一路上他得不停地低下头

去。这是他唯一的一个动作，战车上的皇帝始终眼望前方，目不斜视，似乎脖子得了不能转动的毛病。如果此时有谁说那不是真人，是座雕像，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会深信不疑。

途中，有一根车轴出了故障，车身突然倾斜，但这也没让君士坦提乌斯改变姿态，甚至脸上的表情。这一路上，他没有吐过口水，没有摸过鼻子，没有动过嘴巴，连手指也没有动过一下。

这是性格封闭的他用来炫耀的方式。他相信这种伫立不动的姿态，是显示他至高无上地位的最直接、最佳的表现方式。在位期间，他从不与人同坐一辆马车，也绝不和任何人分享他所占有的公权力。这些之前的皇帝都能做到的事情，他却因为那近乎病态的虚荣心而无法办到。

皇帝的队伍终于开进了罗马城，这个竭尽人类之能创造的帝国圣地。

队伍笔直地向城中心前行，通过街道，进入了罗马广场。密密麻麻矗立在广场上的那些象征着罗马曾经辉煌和荣光的纪念碑，到底还是让君士坦提乌斯震撼得目瞪口呆。他的视线所到之处，都是承载着罗马历史的建筑物。注视着这些建筑，回顾成就它们的那些光辉时代，势必会让后人备感压力。

君士坦提乌斯先在位于广场一角的元老院会场，对议员与权贵们发表了演说，又在会场外的讲坛上，面对聚集的民众再次演讲。当他到达历代皇帝居住的帕拉蒂尼山时，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君士坦提乌斯面无表情的脸部，终于因得到了渴望已久的快乐而变得有些松弛。

接下来的数日，按照历代皇帝的惯例，君士坦提乌斯主办了竞技大会，颁布了几条利民的政策。这些利民政策事先作过周全的考虑，既取悦于民却又没有过度放纵，以免百姓陷入毫无节制的生活。话说回来，皇帝对其他城市的人民的一些限制，并没有强加给罗马市民，想来是考虑到这座城市曾经的历史和现状所作出的决定。

皇帝在罗马逗留期间，连日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这座由七座山丘所组成的城市，不仅是城中，就连远离市区的郊外城墙都不落下。他似乎有一种今天不看，明天可能就再也看不到这美好景象的紧迫感。不过，他的这种不安，到了次日必定会被再次出现在眼前的壮观场面所拭去。

矗立于帕拉蒂尼山之上、奉献给众神之神朱庇特的壮丽的神殿，令人深感天神之永恒和人类之有限；巨大的公共大浴场，仿佛可以容纳整整一个行省的人民；使用蒂沃利（Tivoli）产的巨石所建造的圆形竞技场（Colosseum），规模之雄伟使人为之目眩神驰，献给天地诸神的万神殿（Pantheon）那令人叹为观止的穹顶以及柱身环绕浮雕，柱体内有螺旋楼梯直通柱顶的图拉真记功柱（Trajan’s Column）和马可·奥勒留皇帝的纪念柱，还有众多的神殿、广场、半圆形剧场、音乐厅和竞技场……点缀“永恒之都”（urbis aeternae）的所有的景象，皇帝无一错过。

某一天，皇帝造访了图拉真皇帝广场（Forum Traiani），这个由人类创造、足以让诸神也赞叹不已的气势恢弘、独一无二的地方。君士坦提乌斯惊叹得哑口无言。他似乎觉得贵为皇帝只会赞叹有失身份，提出要效仿位于广场中心的图拉真皇帝的骑马像，为自己也建造一尊雕像。此时，站在他身边的流亡的波斯国王子奥米斯达（Ormisda）回答说：“皇帝，在雕塑骑马像之前，何不建造一个不亚于这个广场的马厩？好让您骑的御马，有足够的空间昂首阔步。”

奥米斯达的揶揄让君士坦提乌斯不得不闭上嘴巴。但他似乎又不肯服输，便反问奥米斯达这几日对罗马的观感。于是这位波斯的贵族说了下面这段话：

“当我想到创造出如此宏伟大业的人们，最终也不免一死，心情总算平静了一些。”

遍布于“永恒之都”的各种壮观的建筑物，在共和时期由凯旋将军、在帝制时代则是由皇帝兴建，献给人民，即献给国家。39岁的君士坦提乌斯感到，既然举行了凯旋仪式，也应该依循前例做些什么，但他不知道送什么东西好，罗马城中已应有尽有。他那个仿照矗立在巨型图拉真广场中央的图拉真皇帝骑马像的想法，不过是黄粱一梦，然而身为凯旋将军，不留下点什么纪念有违传统，就连他父皇君士坦丁大帝，也曾经在这里建造了一座规模较小的公共浴场。

经过反复的思考，他决定在大竞技场边上建造一座方尖碑（obelisk）。这座方尖碑原本是君士坦丁大帝令人从埃及内陆找来，打算建在君士坦丁堡的，因大帝病故而被一直放置在亚历山大港，现在君士坦提乌斯将它运到了罗马。大竞技场边上其实已经有一座方尖碑，那是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打败了安东尼——克娄巴特拉联军后，从埃及带回的战利品。能够容纳15万人的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是为了战车竞赛而建，罗马人除了热衷于勇士斗剑之外，同样也热爱赛车。跑道的中央有一段横向延伸的、被称为背骨的带状区域，君士坦提乌斯所赠送的方尖碑就被安放在这里，与奥古斯都所建的方尖碑并列而立。顺便提一下，奥古斯都的方尖碑后来被移到人民广场（Piazza del Popolo）保留至今，而君士坦提乌斯的那座，目前竖立在罗马四大教堂之一的圣乔万尼大教堂（San Giovanni in Laterano）的广场前。

在罗马逗留了一个多月之后，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动身前往北方。多瑙河前线再次告急，若放任不管，之前刚举行的凯旋仪式就变得像一纸空文。幸好手下的将官们成功地阻击了来犯的蛮族，君士坦提乌斯得以回到米兰越冬。

另一方，在巴黎越冬的尤里安决定在下一年，即公元358年，将战线移至莱茵河的下游。从公元356年到357年，他用了两年的时间，狠狠打击了盘踞在中上游地区的阿勒曼尼人，接下来的目标是法兰克

人。这一次的准备，已经不像最初时那般辛苦，在高卢第三次越冬的尤里安与他手下的官兵，已经建立起了相互信任、同心协力的良好关系，对他们而言，下一场仗不过是之前战役的延续而已。这时候的副帝总算有了余力，将心思转到高卢内部的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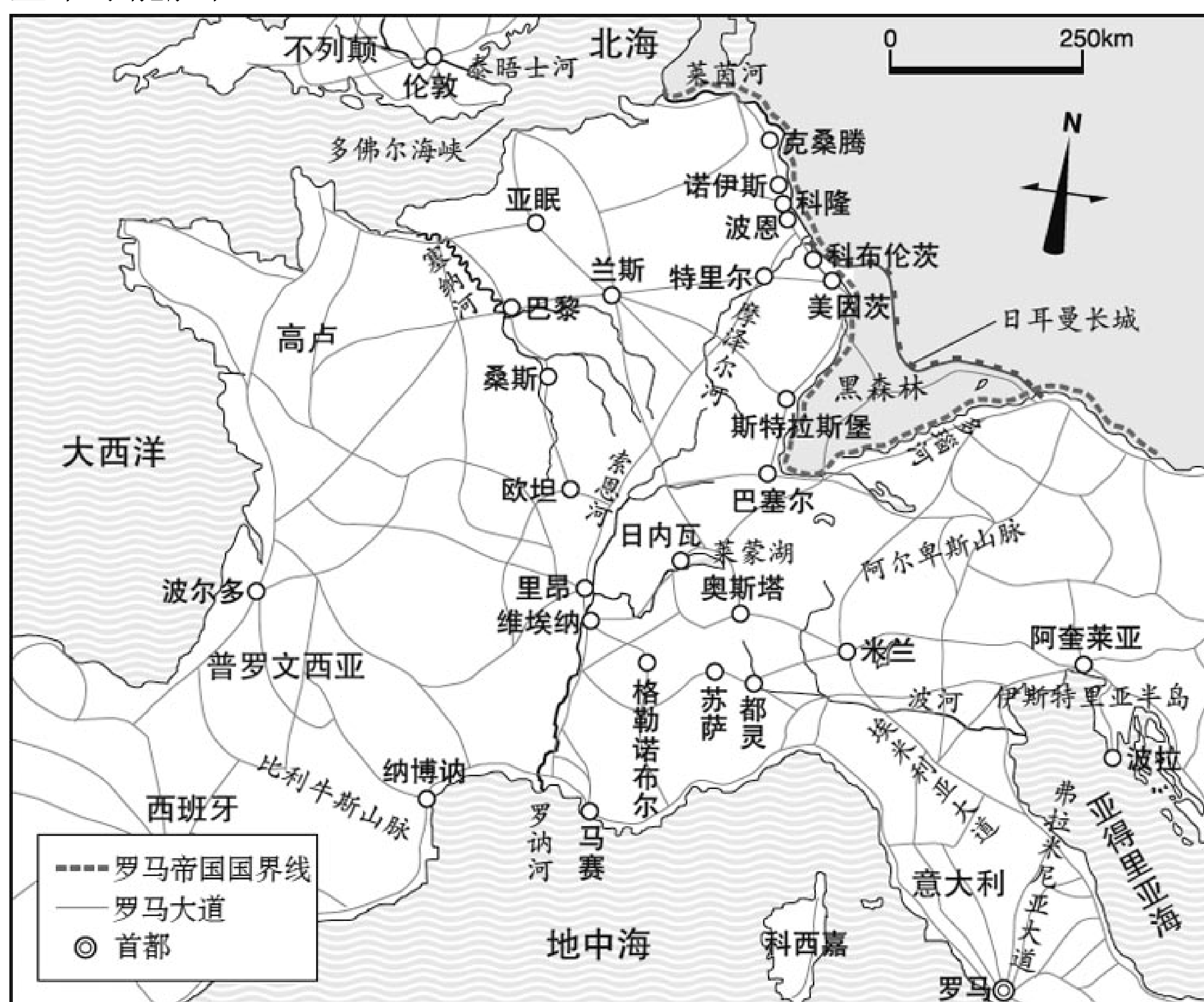
高卢的复兴

半个世纪以来，罗马帝国的公职体系，始终是担任行政的文官（civilian）与担任军事的武官（military）界限分明、各司其职。然而，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还是遵循了元首制时代的做法，同时身兼文武两职。这种安排是有道理的。如果生命安全得不到保护，日常生活就不可能成立。即使是在现代，军队的最高负责人，通常都是由总统或总理兼任。在古罗马，无论是共和时代的执政官，还是帝制之后的皇帝，向来都是统揽军事和民事。

尤里安是副帝，所以，他也不能将高卢的内政管理与军事防卫两项职责完全分开。当然，他可以根据季节的不同，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比如说，春秋两季把精力放在对付蛮族的战役上，秋末到第二年的开春之前这段不适合打仗的时期，则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内政事务上。这种机动性的调整，也只是一个大致上的安排，对于统领高卢、不列颠以及西班牙地区的尤里安而言，他仍然需要同时关注着军事和内政的发展形势，否则会有其中一方拖垮另一方的危险。

在公元356年到357年最初的两年间，他集中精力歼灭了侵入莱茵河西岸的阿勒曼尼人；然后，从公元358年起，将战线转移到莱茵河的下游地区。我们从他选择的越冬地点，就可以大致了解他的策略，第一年在维埃纳，第二年北上前往桑斯，第三年继续往北，将冬营地定在巴黎。

尤里安选择巴黎越冬的目的，可能是他在彻底打败阿勒曼尼人、获得斯特拉斯堡之战胜利之后，想去解决不列颠的问题。不管怎样，事实上他一直带着军队和行政官员们，不断地将政府的根据地向北迁移，想来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向手下明示自己的政策——先剿外保障安全，然后着手整顿安全地区的内政，最终使高卢地区，乃至整个帝国西部得到复兴。如此大业，也只有身兼军、政两职的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才能胜任。



高卢及其周边

尤里安实施的第一项政策是重建遭到蛮族破坏的主要城市。包括里昂、欧坦、斯特拉斯堡、美因茨、波恩、科隆、诺伊斯和克桑腾。除了里昂和欧坦之外，其他地方都是从莱茵河沿岸的军事基地发展而

成的城市。因此，重建这些城市，也就等于再次巩固了“防线”。除了上述的城市之外，尤里安还修建了十几处城防要塞，重新派驻军队进行把守。

消除了蛮族的威胁，民众的生活开始好转。虽然环境不比从前，但日常生活还是在一定程度得到了保证。统治者要做的就是提振人民重新投入生活的信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尤里安决定从公正执法和公平征税两方面着手进行改革。由于裁判制度已彻底瓦解，所以对公正执法的成效，不能有过分的期待。好在皇帝同时也是最高裁判长，他可以通过监督，进行逐步的改善，而对税赋制度，就必须推出十分明确的政策方针。

在《罗马人的故事13 ·最后一搏》中我已提及，帝国后期的税制结构，是与元首制时代背道而驰的。

如果把税制的认知看做是一种哲学的话，那么元首制时代的罗马人的税收哲学就是，“国家”根据税收金额，办力所能及的事情，“地方自治体”尽地方政府之责，这两个“公家机关”不曾涉及的领域，则交由私人打理。这个制度最好的例子，就是遍布帝国各地的罗马道路网。国家建设的道路有8万公里，地方自治体建设了15万公里，由私人铺设的对外开放的道路则达7万公里，它们共同组成了罗马道路网。此外，道路的运行最重要的就是日常维护，这方面也是根据上述的三种形式进行的。打个比方，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身作则捐出私财，全面改建了通往北方的主干道之一弗拉米尼亚大道，某个由奴隶翻身成为新贵的人就会效仿皇帝，捐出一部分钱来，作为通往南方的阿皮亚大道的某个路段的维修费。

正因为施行了“国家”（res publica）、“地方”（municipia）、“私人”（privatus）三足鼎立的制度，罗马国家才能长期保持直接税10%、关税5%、消费税或者说营业税1%的稳定税率。奥古斯都的税收哲学是制度简单明了、征收范围广，但税赋轻，因此才能贯彻落实。

然而，从历史学家们称为“罗马帝国后期”的戴克里先皇帝时代开始，罗马帝国的税收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所有的税种都由国家统管，税额也作了相关规定。地方自治体的功能只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向纳税人征税，再将所征收到的税金上缴国家机关而已。不仅如此，如果税金没有达到规定的金额，地方议会的议员们还必须承担自掏腰包填补缺口的义务。因为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是地方官员的职责所在。这个制度给社会造成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罗马帝国在元首制时代，行省出身的有志之士的理想，是有朝一日能成为元老院议员，而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则是希望能当上地方议会的议员。尤里乌斯·恺撒制定的开放的人才政策，为那些退伍军人以及解放奴隶开辟了担任地方公职的方便之门。然而，到了帝国后期，这些公职却让人们敬而远之。于是戴克里先皇帝及其后继者君士坦丁大帝施行了职业世袭制，规定必须子承父业，不得抗拒。这一政策从而衍生出一种帝国后期特有的逃税手段。

这个手段就是为了逃税而转行担任神职。公开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两位皇帝，对基督教实施了免税的优惠政策。地方上的权贵们，像雪崩一般纷纷加入基督教的真正原因正出于此。

帝国后期，士兵以及行政官僚的人数倍增，国家开支原本就庞大，如今又多了教会这样一个非课税的特殊阶层。农业是古代国家的主要产业，而莱茵河、多瑙河沿岸一带，由于常年遭受蛮族的破坏，导致生产能力降低，最终结果就是税收不足。

但是，糟糕的现状并没有让皇帝改变税收制度。官员们在皇帝要求弥补税收不足的压力下，自然地就会巧立名目，以特别税、附加税等名义另外征税。

所以，罗马帝国后期的税收制度非但不是简单明了，反而日趋复杂，从广泛的薄赋变成了狭隘的重敛。在这种税制下，个人还怎么可能积极地去参与公益事业？公益事业昔日之所以是国家经济三大支柱之一，那是因为那些个人认为他们的成功源自社会所提供的机会，所以才会以捐赠的方式来作为报答。用现代语言讲，就是回馈社会。无论是凯旋将军还是皇帝，甚至解放奴隶，曾经都有着同样的回馈社会的理念。

尤里安为政时，元首制时代的三大支柱体系已不复存在。他手上拿着的是官员呈报上来的增税提案，内容充满了官僚味，实质上就是一个名称好听的特别税。报告指出高卢的局势不稳，连带影响了不列颠地区的税收，要改善现状，除了增税别无他法。官员们试图逼迫副帝接受提案。

尤里安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增税案，并立即施行了以下几项政策：

第一，杜绝不必要的开支，节省目前的经费。政府机构中到处存在着浪费的现象。无论是军方还是行政部门，一旦机构扩张，就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力量，开始增加无用的部门和费用。尤里安下令大幅度地精简人员和费用，他本人以身作则，坚持素朴的生活方式，他以适应高卢的冬天为由，拒绝在家中使用暖气。

第二，公正的征税。在征收的过程中，执行者往往会对有钱有势的人网开一面，却对低收入群体严厉苛责。尤里安以严惩的方式让执行人员不敢厚此薄彼。

第三，非但不增加特别税，还减轻现有的税赋。尤里安认为税收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高卢东部地区遭受蛮族的破坏使生产力降低。如果继续推行新的特别税政策，那么即便是击退了蛮族恢复了和平，也无法带动地区经济的繁荣。相反，采取减税的政策，会刺激当地人民

积极劳作的意愿，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看到税收增加的实际成果。这就是尤里安的税收哲学。

副帝的减税政策，最先从“人头税”开始实施，从原本的25苏勒德斯（Solidus）减至7苏勒德斯，这可谓是一项大胆、创新的税制改革。相信它对激励民众的劳动意愿起到了正面的影响。

在大胆推行减税政策的同时，尤里安又下令整顿高卢东部的农耕地。土地本身并不能成为生产力，必须配以相关的灌溉渠道、防洪堤坝才能形成生产要素。由于蛮族的侵略和内战，这些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有5年以上无人问津。莱茵河西岸一带土壤肥沃，只要这些土地重新变回农耕地，就会出现丰硕的成果。在尤里安看来，振兴高卢的关键是恢复土地的生产能力。

元首制时代的繁荣，归功于罗马帝国广大的经济商圈的形成。然而它的先决条件在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而如今的高卢，北方的蛮族不仅越过了莱茵河和多瑙河，更有部落从北海登陆。这些人拥有高超的行船技术，势力范围已经扩张到了高卢与不列颠之间的多佛尔海峡。高卢与不列颠之间的交流受阻，就是因为有这些蛮族海盗的出没。

尤里安下令建造了600艘新的船只，一半属于军用船，用来打击海盗，剩下的则作为运输船，将不列颠的物产重新运来高卢。歼灭横行在多佛尔海峡的蛮族，就等于连带铲除了从北海威胁高卢北部的敌人；不列颠的物产运往莱茵河沿岸城市的通路，除了横贯高卢的陆上公路之外，如今又重新开启了北海——莱茵河的水路；莱茵河沿岸城市的重建，意味着莱茵河航线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尤里安的这一系列措施，用现在的话说，是通过刺激内需来拉动经济。

生活安定了，民心也随之安定。要重新恢复安全保障系统的功效，除了军事防卫之外，民心安定这股软实力也必不可缺。时隔150

年，尤里安在高卢，恢复了这个罗马人传统的综合安全保障的哲学。

当时坐镇米兰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对副帝的功绩颇为认可。作为援助，给他送去了2000罗马磅（libra，相当于650千克）的白银。尤里安用这些白银支付了拖欠士兵的薪饷。

另一方面，那些对尤里安拒绝征收特别税、干涉内政而深感不满的官员，不时地向君士坦提乌斯打小报告，搬弄是非，而君士坦提乌斯也愿意听取他们的谗言。

不久，塞孔杜斯的长官职务遭到解除，调回米兰。他是尤里安在军事和内政上最好的顾问，也是副帝在皇宫中能够信任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尤里安虽然保住了脑袋，却失去了左右手。这无疑是宦官们在背后操作，他们的手段一向阴险毒辣。对于这一股黑暗的宦官势力，是放任还是制止，完全取决于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可偏偏他又不是一个独立自主、勇于承担责任的人。世上有一类人，对别人作出的成绩总喜欢半褒半贬，他们借用这种方式，来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换句话说，这是一群没有勇气的人，而君士坦提乌斯正是其中之一。

幸好尤里安不是这样的人。尽管失去了塞孔杜斯这位得力的助手，但他并没有退缩。公元358年到359年的尤里安又一次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胜利之师永远不缺志愿者，他的军队从一年前的1.3万人增加到了2.3万人。这一次他们痛击了盘踞在莱茵河下游、频繁侵入高卢北部的法兰克人，将他们逐出高卢，退回到河对岸。不仅如此，法兰克人位于莱茵河东面的根据地也遭到了尤里安率领的罗马军团的致命性破坏，几乎尽毁。曾经称雄莱茵河东岸的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这两大部落，经历了罗马军团的大扫荡之后，彻底失去了战斗力，从此再也不敢靠近莱茵河。

尤里安的战略是先将侵入国内的敌人赶出国境，紧接着进攻到敌方，摧毁他们的根据地。从公元356年开始，他用了4年的时间，达到

了目的。莱茵河沿岸仿佛回到了元首制时代，再次成了罗马帝国牢不可破的“防线”。元首制时代被称为铜墙铁壁的“防线”，并不是单纯地仅靠士兵守住基地、击退来敌，罗马军在防守的同时，频频越过防线，攻入敌区，不断削弱对方的实力，才形成了所谓的铜墙铁壁。尤里安在公元357年、358年、359年的三年里，三度跨过莱茵河捣毁敌人的老巢，元首制时代的军事战略，多年之后再次得以重现。

这位年轻副帝的作为，不仅在军中赢得了声誉，在民间同样深得人心。或许是人民对未来重新产生了希望，高卢地区甚至连出生率也节节上升。

24岁来到高卢的尤里安，在这里迎来了28岁的生日。他在20岁之前一直过着实为囚徒的生活，虽然兄长加卢斯成为副帝使他获得了自由，但只是做一名哲学门徒，不要说在战场上指挥打仗，就连带少量士兵的经验都没有。在政治方面他同样也是一个门外汉。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够在军事、政治两方面都获得成功？这个问题让很多史学家百思不解。为何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年轻人，在突然被擢升为副帝之后，能够作出超出人们想象的成就。对此，大多数人的观点是认为他潜藏的才华得到了发挥。通常，要有一个强大的动机，才能引发深藏在体内的能量。那么，又是什么样的东西成就了他呢？

我个人认为，是对责任的自觉性以及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亢奋。那个时期的尤里安曾经给他学生时代的友人写过这样一封信：

> 作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门徒，我还能做别的事情吗？我能将管辖下不幸的臣民弃之不顾吗？保证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人在这里，就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
> 难道我不应该责无旁贷地保护他们，让他们免遭皇宫内那些除了横征暴敛一无是处的强盗的伤害吗？战场上，一个放弃战斗的大

队长会被处以死刑，剥夺为其举行葬礼的荣誉。拥有更神圣高贵的地位和更为重要的责任的我，如果放弃了职责，应当受到如何的惩罚？如果是诸神赐予了我这个机会，那么我相信他们会引导我、守护我。如果我终必遭受苦难，我将会因为自己拥有一颗纯洁、正直的心而感到欣慰。

失去塞孔杜斯这样的顾问，的确让我苦不堪言。我现在只有一边尽责一边祈祷能有机会再遇到像他这样的人。不过，我连是否会有人来接替他都不清楚。如果他们认为应该派个人来，我很愿意与他同心协力。我也想尽可能地利用这段凡事必须亲力亲为的特殊时期，多做些好事。现在我只身一人，可以自由地推动有益于民的政策。虽然这只是长年笼罩着的乌云，露出一小块缺口的短暂之时。

尤里安的责任感以及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所感受的亢奋，可能是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在成为副帝之前，只是一个学习哲学的门徒。因为喜爱哲学，才选择了这条路。24岁之前，他肯定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要成为副帝。

因为喜爱而作出的选择，只是忠实于个人的意愿而产生的一个结果，并没有包含他人的因素。也就是说，尤里安选择哲学，纯粹是为己，而不是为他人。但是，在成为副帝之后，他第一次觉察到自己是一个他人所依托的存在。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当一个人发现别人需要自己时，会感到十分欣喜。24岁的尤里安首次尝到了这种喜悦。

亢奋感会给年轻人带来力量，做出那些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一介哲学门徒竟然可以打赢战争，曾经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是可能的。当年轻人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所获得喜悦和自信是无与伦比的。亢奋就是情绪高昂，这多发生在人生经验尚浅的年轻人身上。当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做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同时这些事情又为他人带来了幸福，他们将会视之为使命。我想大概就是这杯责任感与亢奋感混合的鸡尾酒，让尤里安醉心于此。

原本只发生在阿尔卑斯山脉西面的尤里安奇迹，因为某个事件，延伸到了山的东面。事情发生在他赴任高卢第五年，即公元360年，24岁成为副帝的尤里安，此时29岁。



第二章
皇帝尤里安

（公元361—363年在位）

古代的东方

古罗马人概念中的“orient”（东方）是现代称为“中东”的地区。在共和及元首制时代，罗马帝国东部的国界线与称霸东方的大国帕提亚邻接。这意味着，那个时期罗马在东方的头号敌人是帕提亚王国。

这种状态从公元227年起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一年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击败了帕提亚，从此罗马的敌人不再是帕提亚，而变成了夺得中东霸主地位的波斯。这个大国的主要机构都集中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无论是之前的帕提亚还是波斯，都把首都设立在这个被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围绕的地区，也就是说，这里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这个古代“东方”的中心，就是当今的伊拉克。

然而，帕提亚和波斯先后被罗马当做头号假想敌的真正理由，并不是因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肥沃，而是因为这里作为首都集聚了国家中枢机构的同时，其东面还有着相当于现代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三个国家面积总和的广阔的腹地。古罗马人视为强敌的大国，等同于现代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四个国家的总和。顺便提一下，如今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耶路撒冷、约旦以及埃及，当时都在罗马帝国的境内，构成罗马帝国的东部。如今位于土耳其东端的地区，那时是罗马帝国的同盟国亚美尼亚王国；而现在的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边界线，几乎就是罗马帝国东部与波斯萨珊王朝的边界线。这不知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有其必然性。总而言之，在古代的确存在过一个相对于现代四个独立国家总和的东方大国。虽然它的统一性不如罗马帝国，但如果我们忽视了它的存在，就不能理解古希腊人

以及古罗马人对“东方”的认识，当然，就更无法理解他们在东方的一系列举动。

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这位马其顿出身的年轻人立下了打倒大流士王、征服波斯的志向，因此在击败大流士王之后，为了彻底征服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他必须不断地东进，一直打到印度边界的印度河为止。

不过，罗马与帕提亚以及波斯萨珊王朝之间的关系，同亚历山大所属的希腊城邦与它们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在亚历山大之前的200年前，希腊就饱受波斯的侵略。正如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波斯战争》中所述，就连城邦的首都雅典，都曾经一度被波斯军队占领，招致毁灭性的破坏。亚历山大率军东征，对希腊人而言，是对波斯的反击战。尽管亚历山大手下的士兵大多来自马其顿，但他出征时军队用的还是希腊城邦联合军的旗帜。

而罗马对“东方”的战争，并不存在反击或防卫的意义。在亚历山大登场前的半个世纪，罗马的首都也曾被敌人攻破，侵略者是来自北方的蛮族高卢人。罗马人没有退缩，犯我者必歼，最终由尤里乌斯·恺撒征服高卢，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因此，罗马不同于希腊，对帕提亚以及波斯萨珊王朝并不抱有恐惧以及复仇的感情。而且，罗马人从本质上来说是“occident”（西方）民族。虽然“东方”人也制定了法律，建设了道路，但是将其功能网络化、系统化、扩大化以及长期化的，却是罗马人的独创。是否追求事物的合理性以及有效性，是“东方”与“西方”的一个分水岭。罗马之所以没有占领印度的企图，有两个理由：一、罗马已称霸西方，拥有了辽阔的疆土。二、罗马人在计划领土扩张时，始终将是否能固守防线作为重要的判断标准。

当时罗马市内出售给旅行者的地图上所标示的帝国疆土，西起不列颠，东至亚历山大也未曾涉足过的恒河、锡兰岛（Ceylon）。实际上那时罗马帝国东部的边境是叙利亚（现叙利亚）和阿拉伯（现约

旦），地图上不仅包括了波斯，甚至延伸至东印度。带着这种地图出门，大概是会走入迷途的。美索不达米亚对大多数的古罗马人而言，恐怕是一个“只闻其名，不知其地”的存在。

到了罗马人将地中海称为“内海”的年代，这两个东、西大国变成了邻国，国界线的划分自然就成了至关紧要的问题。然而，罗马人并没有吞并这个强大的邻国的意图，他们采取的邻邦政策，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种是像奥古斯都、尼禄以及哈德良等皇帝那样，倾向于使用外交手段。首先，把国界线定为幼发拉底河，以此作为帝国的“防线”并加以强化。同时，不遗余力地支持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亚美尼亚王国的亲罗马派，帮助他们稳固王权，从而达到从西到北，紧紧包围东方大国的首都所在地美索不达米亚的目的。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最大版图（公元前500年前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路线



4世纪中叶的罗马与波斯

第二种是像图拉真、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戴克里先等皇帝，依靠军事手段强行占领，在有利的地形上建立起防线。恺撒当年如果没有遭到暗杀，如期出发远征帕提亚的话，他应该就是这条路线的开创者。除此之外，在远征途中病故而导致战争中止的君士坦丁大帝也属于战争派，他原本讨伐波斯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先帝戴克里先建立起的防线。喜好这种对外政策的皇帝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擅长打仗。

采用武力征服时的战略战术，主要是与亚美尼亚组成联合军，从西和北两个方向，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在攻陷其首都泰西封（Ctesiphon，Taysifun）之后，要求战败者割让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地区，将此地锁定为针对东方的最前线。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比邻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山区，在上游分流，沿着不同的路径，流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河在中部的泰西封一带拉近距离，之后再次分道扬镳，最终汇入波斯湾。两条大河在上游一条向东、一条向西分流的中间地带，就是北美索不达米亚。罗马之所以要将这里收为领地，是因为不管敌人是帕提亚还是波斯萨珊

王朝，就在眼皮底下，一览无余。从军事战略角度而言，这里的确是绝佳的位置。

另一方面，罗马帝国如果控制了北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王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就会随之降低。亚美尼亚王国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都接近于波斯。为了维持同盟国的关系，长年以来，罗马对亚美尼亚在各方面都是煞费苦心。一旦北美索不达米亚握在罗马手中，形势就会改变，罗马可以从西向北建立起完全由自己掌控的防卫系统。换言之，罗马可以从西和北两面包围住敌人的中枢地带。

相反，站在波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局势。萨珊王朝的沙普尔作为波斯王国的国王，对先王所受到的耻辱，绝不能视若无睹，无论如何他也要打破这个对国家安全极其不利的局势。

鉴于以上理由，北美索不达米亚注定要成为东西两大国的必争之地。罗马方面把它看做是保卫帝国东部安全的关键，而首都功能集中于中部的波斯，当然也不能将这里置于随时遭受敌人侵袭的危险之中。总而言之，两国都是基于各自安全保障上的考虑。因此这个地区难以建立起国际秩序意义上的“和平”。

波斯萨珊王朝

如果将年代设定在公元4世纪中叶的话，那么这个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局势，是罗马占了上风。因为在公元297年，时任罗马帝国副帝的伽列里乌斯（Galerius）战胜了波斯国王，两国之间签署了至今仍然生效的和平条约。和平条约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两项：

一、以尼西比斯及其东南的辛格拉（Singara）为最前沿，由此往西的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即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由波斯割让给罗

马帝国。古代的尼西比斯，现称为努塞宾，位于土耳其境内，紧邻叙利亚，而辛格拉如今是伊拉克的瑟奈尔（Senjar）。现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国界线就是从这两个小镇之间穿过。

这项割让条款，即使在古代也是意义非同一般。在和平条约签署的9年之前，戴克里先皇帝依仗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波斯谈判，在没动一刀一枪的情况下，迫使波斯默认了罗马对北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权。然而，默认与割让的性质还是不同，默认只是将北美索不达米亚当做缓冲地带，罗马不能在此设立一系列的要塞，建立帝国的防线。但一旦割让给了罗马，那就是由罗马人自己说了算了。

二、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五个地区的统治权，由波斯转交给罗马。

这意味着流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大河的上游流域完全控制在罗马手中。按照现代地理位置，这个流域包括了约旦、叙利亚、土耳其三国，可以从西和北两面监控伊拉克。在防卫战略意义上，罗马帝国首次获得了绝对的胜利。

波斯国王不得不签下如此屈辱的合约，是因为他惨败给伽列里乌斯。自公元297年条约签订，直到君士坦丁大帝统治的末期为止，两大国之间的非战状态保持了40年，始终未被打破。这要归功于戴克里先皇帝，他不是那种会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他不仅强化了这一地区的防卫力量，甚至重新加固了北美索不达米亚以南，即原本就属于罗马领地的叙利亚以及约旦的边防线。古罗马人非常清楚，“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不是凭空而来的。

不过，面对这种状况，波斯不会就这么一直忍气吞声。当年君士坦丁大帝年过60岁还需要亲自率军前往波斯，说明40年之后的波斯显示出反攻的姿态。那时的波斯国王已经换成了性格强悍、手段高明的沙普尔二世。

君士坦丁大帝死后，罗马帝国交由他的三个儿子分治。负责帝国东部的是次子君士坦提乌斯。他一继位，就必须面对波斯咄咄逼人的反攻之势。

在大帝死后的第二年年初，沙普尔率领波斯军队，集中兵力攻打尼西比斯。尼西比斯位于底格里斯河以西，行军大约需要两天的时间，属于罗马领地最前沿的要塞。四周建有三层城墙，墙外有深水护城河。数万人的波斯军队包围尼西比斯，猛攻强打了60天，终究没有攻下这座城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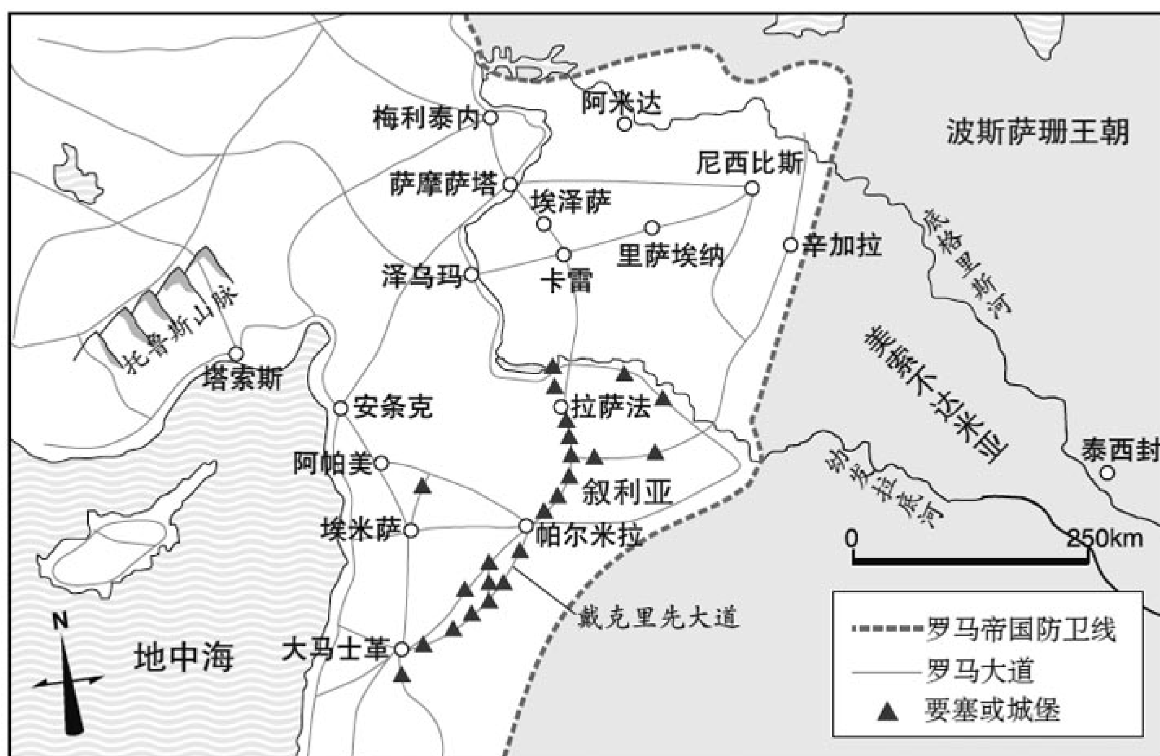
6年后，公元344年，沙普尔的军队对辛格拉发起攻击。辛格拉也是罗马的前沿要塞城镇，距离尼西比斯东南方100公里左右。这一年的战争，君士坦提乌斯亲自出征，在前线指挥了两天的战役。波斯军队听说罗马皇帝亲自参战，攻势愈发猛烈，前半场战役打得非常漂亮，可是之后遭到了罗马军顽强的抵抗，结果波斯国王不得不撤兵放弃。

在这场辛格拉攻防战中，发生了一件罗马军团罕有的不光彩的事情。波斯一位年少的王子在激战中被俘，遭到一队罗马士兵严刑拷打，最终被杀。据说这些士兵是基督教徒，他们把波斯国王子视为邪教徒而凌虐至死。

两年之后，沙普尔率军再次攻打尼西比斯。这一次的攻城战长达80天，最终撤兵的还是波斯国王。

四年后的公元350年，波斯第三次攻打尼西比斯，甚至带来了印度的大象兵团。这一次的战役持续了100多天。尼西比斯坚固的城墙被打得千疮百孔，守城的罗马士兵被猛烈的炮火轰击得几乎睁不开眼睛。攻城的波斯一方也不能幸免，牺牲惨烈，死亡人数超过2万人。这位勇猛的40岁的波斯国王沙普尔，最后还是偃旗息鼓、罢战休兵。就在他率军在尼西比斯与罗马军决一死战的时候，来自亚洲的蛮族乘机大举进攻，侵入了波斯的东部边境。这让沙普尔深感不安。

另一方的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也面临着棘手的难题。其弟君士坦斯遭蛮族出身的将军马格嫩提乌斯杀害，高卢落入了叛军之手，他必须率兵讨伐叛军。公元350年，波斯国王能够与罗马皇帝很爽快地签署休战决议，是因为这两位在国内都有更麻烦的事情需要处理。当然，这也意味着等他们解决了国内的问题后，会再度回到对决的战场。这个对决的时间发生在公元359年，从阿米达（Amida）战役开始。



美索不达米亚与周边

罗马与波斯，都是由多人种、多民族所构成的庞大帝国，但是两国的制度不同，军队的组织也不同。相对于拥有常备军的罗马，波斯的常备军数量甚少，大多数军人是从地方领主的军队招来的雇佣兵以及农奴。因此，一旦波斯招兵买马投入备战，立刻就会成为众人皆知的事情。罗马根本不需要派遣间谍打入敌人内部，只要向那些在东方做买卖的商人打听一下，基本上就能了解敌情。时隔9年，波斯国王沙普尔集结兵力，准备再次大战，一雪前耻，这情报早就被罗马人获

知。那时候的沙普尔即将50岁。在那个年代，50岁的人如果还没有什么成就，就意味着此生一事无成。按理说，君士坦提乌斯是应该预想到波斯国王誓死一战的决心，可是，这位比波斯国王年轻10岁的罗马皇帝不仅没有积极准备迎战，就连原本正常运作的帝国东部的基础防御系统，也像滚动的车轮下塞进一根木棒，被迫停了下来。主要问题有二：

一、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宫廷中，臣子们因遭中伤、毁谤而丧命的现象，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这种状况在国家面临危机之时，依然持续。不少有才能的将领被指控图谋暗杀皇帝，招致处死。将军们的命运势必会影响到其手下的中层军官。缺少了中坚力量的组织，是无法充分发挥功效的，这比缺少士兵更严重。这意味着罗马军团的战斗力，因将官大批被处死而逐渐减弱。

二、实战中不能没有指挥官。被处死的将官的空缺需要有人代替。然而，挑选军官的标准并不是以能力而定，而是取决于宫廷里一些人的喜好。这是君士坦提乌斯重用宦官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与国王亲自率军的波斯军队不同，作为罗马军最高司令官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留在了多瑙河中游的巴尔干地区。派往东方担任总司令的，是颇受官员们好评的萨比尼阿努斯（Sabinianus），熟知东方情况、又有实战经验的乌尔希西努斯则屈居副手。副手对总司令必须唯命是从，战场上瞬息万变，需要及时地调整战略和战术，如果正副长官的意见不合，势必不利于战事。

另一方的波斯沙普尔国王，在作好充分战斗准备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大量收集情报。他将一位投靠了波斯的安条克商人安排在身边，从此人那里详细地了解到北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西靠幼发拉底河、东临底格里斯河的北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城市，被罗马人改建成了要塞，它们最初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期由希腊人所建，是东西贸易

往来的频繁之地。居住在安条克的希腊裔罗马商人，对这一带的情况自然是了如指掌。

沙普尔放弃了三次攻城未遂的尼西比斯，将目标改为其北面的阿米达。这是否与那位安条克人的建议有关，不得而知，想必是有其原因的。

阿米达位于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在现代称做迪亚巴克尔（土耳其语：Diyarbakir）。它是古代的一座重要城市，之后历经长时期的衰败，直到近代才恢复了其重要地位。一些虽已没落但曾经是历史重镇的城市，即便现在归属伊斯兰文化圈，通常都还会延续古代的地名，不会作太大的改变。比如说著名的历史古城安条克，如今土耳其语称为安塔基亚（Antakya），两者只是发音上稍有不同而已。阿米达虽然战略地位不如尼西比斯，但仍有着特殊的价值。

君士坦提乌斯在他十几岁还担任副帝的时期，就将阿米达彻底改建成军事重镇。他甚至考虑过要更改地名，冠以自己的名字。阿米达位于山脚下，背靠险峻的山岩，流经城东的底格里斯河处于上游，水流湍急，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障壁，因此只要牢牢守住西、南以及北面三处，这里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防御之地。

对于波斯国王沙普尔而言，攻下阿米达城相当于给罗马皇帝一个狠狠的教训。沙普尔率领10万大军经过尼西比斯，没作任何停留，直奔北面的阿米达。显然，这一次他很有信心赢得胜利。

但是罗马方面没有看出沙普尔的用心。他们或许认为既然尼西比斯可以承受住波斯三度的猛攻，比尼西比斯防守更坚固的阿米达应该没有问题。军队最高司令官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留在了多瑙河附近的希尔米乌姆，派往东方的总司令萨比尼阿努斯，虽然渡过了幼发拉底河，但到了埃德萨（Edessa）之后，再也不肯往东多移一步。而成为敌人攻击目标的阿米达，就在距离埃德萨东北方150公里处。战斗的双

方，一方是国王亲自出征，另一方不仅皇帝本人留在西方，连他任命的司令官也远离战场150公里。不过，萨比尼阿努斯以前线司令官的名义，向部队下达了以下两项指示：

第一，阿米达一带实行焦土化战术，断绝敌人的粮草。强制转移附近的农民，让他们带上家畜到后方避难。

第二，派副司令乌尔希西努斯前往阿米达，不过，只有一支小分队同行。总司令的用意似乎不是让他们去支援前方，而是去侦察敌情。

从君士坦提乌斯担任副帝的年代开始，阿米达地区一直驻守着第五军团1000人左右的兵力。在接到波斯军逼近的消息之后，又另外调来了6个军团总共6000人左右的援军。这些人既不出身于中东，也没有在这一带打过仗，他们是原来在高卢执勤的罗马士兵，因为协助马格嫩提乌斯叛乱而受到惩处，执勤地从莱茵河沿线调至幼发拉底河，实际上就是流放。所幸的是，这些剽悍的日耳曼人的男子汉，并没有因完全陌生的东方气候、地形以及风俗习惯而丧失了勇猛的天性。

加上骑兵团，罗马军在阿米达的军力有7000人左右。如果再算上那些既有勇气也有能力上战场的当地居民，人数达2万左右。与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城市一样，这里的妇女和孩子早在听说敌人可能来袭时，就已撤退到安全的后方城市，埃德萨也是避难场所之一。这意味着，留守阿米达的2万人都是真正的战士。这2万人将要抵抗人数超过10万的波斯大军。

阿米达攻防战

一旦开战，敌人不仅会出现在前沿阵地，至少战场的方圆50公里左右，都会有侦察兵或调集粮草的军队出没。受命前往阿米达的乌尔希西努斯一行，在途中就遭遇了敌军。他们虽然成功地脱身，却彻底地暴露了行踪。乌尔希西努斯判断，整个部队不可能进入已经被波斯军包围的阿米达城，他将队伍一分为二，一支由年轻的军官带领，继续向阿米达前进；他自己则带着剩余的部队，暂时先退回后方。

我想那时的乌尔希西努斯大概已经感觉到阿米达城难保。他是一位非常熟悉东方的将军，只要从远处眺望一下波斯军的阵势，看看有多少诸侯、豪绅的旗帜，就能估算出敌情。如果那些实力雄厚的地方霸主都参与其中，说明波斯是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共敌罗马。这些旗帜的多寡，既可显示波斯国王作战的决心，又能预测守城的战势。所谓保卫战，是要敌人彻底放弃攻击、撤兵走人，才算赢得真正的胜利。

接下来的这部分属于我个人的想象。乌尔希西努斯可能想让司令官萨比尼阿努斯放弃消极守卫的战略，派出一部分军队绕到敌军的后方，打一场夹击战。否则，那位听从命令、率军前往阿米达的青年军官，起码有那么一瞬间，会认为副司令是让他们去白白送死。但是，从史料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年轻的军官毫不迟疑地执行了副司令的命令，后来他在攻防战中担当了防守的任务。

这里插一句，我们后人之所以能清楚地了解阿米达攻防战的整个经过，正是因为这位青年军官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这位军官就是在前文介绍君士坦提乌斯访问罗马时，我引用的文章的作者——出生于安条克的希腊裔罗马人，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阿米达之战时，他大约29岁。

对阿米阿努斯而言，这不是他第一次面对波斯军。入伍之后，他一直跟着长官乌尔希西努斯四处征战。乌尔希西努斯是当时的罗马名

将之一，除了一次被派往欧洲之外，戎马生涯几乎都是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度过的。

看到波斯国王亲自率领的庞大的军队时，就连跟随乌尔希西努斯多年久经考验的阿米阿努斯也深感震惊。沙普尔大概是打算凭借强大的阵容，压垮守城的罗马军的气势，在阿米达城的周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波斯军。整个平原延伸至地平线，所见之处全是波斯的士兵、战马、印度的大象以及各家诸侯的旗号。国王率领众诸侯从建在平原正中的金碧辉煌的大帐篷出发，扬鞭策马向城墙进发。走向阿米达城门的沙普尔，头戴雄羊模样的黄金头盔，头盔上镶满了宝石，在阳光下耀眼夺目。

波斯国王及其近卫队，还有那些诸侯组成的大队人马非常之大胆，他们靠近到弓箭射程的位置。从城墙上，甚至可以看到雄羊头盔下沙普尔脸上的皱纹。不过波斯人的示威行动未能得逞，守城的罗马军万箭齐发，逼得波斯国王无功而返，把决战延后到次日。

攻防城墙的首日之战，从一开始就激战连连，直打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才鸣金收兵。两军都死伤惨重，而波斯一方因损失了一名诸侯之子，气氛更是乌云笼罩。这位刚成年的年轻武将，是波斯数一数二的名门之后。为了满足丧子之痛的父亲的心愿，沙普尔以举行葬礼、服丧为由提出了休战七天的请求，守城的罗马军接受了这个请求。

休战期结束之后，攻防战再次打响。对罗马军威胁最大的就是波斯军的攻城器械。这些器械都是波斯人以前从罗马的要塞、城市中掠夺而来，罗马军等于面对自家武器的攻击。尽管如此，守卫的官兵和市民们依然斗志昂扬，城墙外的波斯军陈尸累累。

这个时候，乌尔希西努斯正在努力地说服司令官萨比尼阿努斯，将驻守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军队，调往底格里斯河附近的阿米达，从背

后包围波斯军。但是，萨比尼阿努斯认为行动过于危险，不肯接受他的建议。乌尔希西努斯还是不肯放弃，萨比尼阿努斯拿出了君士坦提乌斯的手谕，上面清楚地写着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调动军队。谕旨在此，乌尔希西努斯只能俯首听命。他被派往美利提尼（Melitene）的军团基地。萨比尼阿努斯还特别指示，没有他本人的命令，不许调动驻军。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发源地都在亚美尼亚的山岳，越往上游，两条大河就越接近。美利提尼基地位于幼发拉底河沿岸，而阿米达则在底格里斯河附近，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00公里，但乌尔希西努斯无法向阿米达派去一兵一卒。

无论在共和时代还是帝制时代，罗马军的前线司令官都被赋予极大的自主权。一是因为战情千变万化，需要随时作出调整；二是那个年代因交通等原因，向后方请示所需时间过久。对罗马军的这项传统，后世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曾经赞赏不已。然而到了4世纪中期，这条规定被废止。在元首制时代，即使皇帝也不会对前线统帅的调兵遣将指手画脚，但进入4世纪之后，前线不能做出超越后方命令的任何事情。后方对前线自主权的限制，倒是给那些不愿承担责任的人一个极好的借口，他们不用主动去作决定。阿米阿努斯或许在进入阿米达之前，就知道了乌尔希西努斯的夹击战计划，可是他在前方左等右等，也不见乌尔希西努斯率领的援军。

那些在阿米达拼死抵抗的防卫军，似乎深信援军不久将至，面对数量超过自己5倍以上的敌人，顽强不屈，抗争到底。其间，有一名逃兵被波斯人抓获，供出了通向城门的地下通道的秘密。70名波斯士兵突然出现在城墙内，其中一人不停地挥舞着红披风。看到这潜入成功的信号，城外的波斯军队发起了猛攻。不过他们期待中的城门并没有被打开，那70名士兵，还没有靠近城门，就倒在了罗马军的刀剑之下。

罗马军并没有被动地守在城中。那些天下无敌的高卢士兵，经常乘着夜黑溜出城外，发动突然袭击，给波斯军带来了不少的损失。

然而，攻防战的时间拖得越长，牺牲越多，形势对兵力不足的一方就愈发不利。当波斯军建造了高过城墙的攻城工事、从上至下压过来时，战斗就变成了肉搏战。城内既没有安置阵亡者的场所，也没有人手处理这些事情。城中尸体遍野，从而引发了疫情，战斗力一路衰退。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城墙倒塌了。虽然倒塌的城墙只是一小片，但这好似堤坝决口，波斯军犹如狼入羊圈般地攻进城内，罗马军几乎全军覆没。

阿米阿努斯决定逃出城外，与他同行的只有两名士兵。三人在没有马匹的情况下，靠着双脚幸运地逃脱了。他们一直跑到阿米达城外15公里处，靠近罗马大道边上的国营邮局，才算松了一口气。邮局已遭破坏，空无一人，所幸水井还在。由于汲水的工具也遭破坏，其中的一名士兵只好撕开绑在头盔下的布条，垂入井中，三人轮流吸吮着布条上的水解渴。

阿米阿努斯等三人沿着山岳地带一路逃跑，最后来到了幼发拉底河附近。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队巡逻的罗马骑兵，被带回美利提尼基地，阿米阿努斯终于又见到了久违的老长官乌尔希西努斯。

经过波斯军73天的攻击，阿米达终于陷落。根据沙普尔的命令，城中一半人被杀，剩余的做了俘虏，被押送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中部地区。他们将作为修建苏珊城的劳役。除此之外，好像还有部分士兵也像阿米阿努斯一样成功地逃离了阿米达，但都下落不明。

当初阿米阿努斯在前往阿米达的途中，曾经遇见过一名退役的罗马兵。他是鲁特西亚（巴黎）出身的高卢人，之前被派到叙利亚执勤。他自称是在沙漠行军中与大队走散，实际上可能是逃兵。罗马士兵在无法归队的情况下，大多会与在当地结识的波斯女子结婚，就此

落户生根。那些参加阿米达攻防战、侥幸脱身的高卢士兵，有些人最终的命运可能会与这位巴黎出身的士兵相似。

阿米达城在2万名勇士的顽强奋战之下，终究不敌。作为胜利一方的波斯军，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73天的攻城战，波斯军的阵亡人数据说达3万人之多，这意味着，参战的每3名士兵中就有1人阵亡。不过话说回来，沙普尔国王不惜一切代价攻下阿米达城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占领阿米达，意味着北美索不达米亚的罗马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所谓的“防线”，要完整连接才能发挥其功效，哪怕只出现一个缺口，就不复存在。如果任由事态继续恶化，那么北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戴克里先皇帝强迫波斯默许、君士坦丁大帝不顾高龄依然御驾亲征的军事战略重地，将在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的手上再次易主。此刻的君士坦提乌斯，再也无法悠然地待在米兰或多瑙河畔的城市享清福了。

尤里安奋起

君士坦提乌斯听闻阿米达城陷落，决定亲自率军远征波斯。既然是皇帝亲征，又遭受了阿米达之战败北的奇耻大辱，那么这次战争的目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收复失地。纵观以往的战争，皇帝们亲自率军的战役，在攻下波斯的首都泰西封、大肆破坏敌人的大本营之后，会主动撤军，最终目的是再度巩固以北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北方的亚美尼亚王国为最前沿的帝国东部的“防线”。打这种大规模的战役，首先要投入能够与敌军10万人马相匹敌的军力，再者，由于攻击的目标，即敌人的首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因此事先必须安排好后勤供给线，这是在敌方作战必不可缺的条件。对于来自欧洲的罗马军队而言，在环境陌生的中东沙漠地带作战，有着先天不足的劣势。因此，

准备10万大军，并非为了满足总司令官皇帝的虚荣心，的确是形势所迫。

如果君士坦提乌斯时代仍旧延续了由戴克里先皇帝创立、君士坦丁大帝继承的增兵政策，那么当时罗马军的总人数应该在60万人左右。就算除去防守各地所需的兵力，聚集10万大军远征东方，并非一件难事。

正因为如此，后世的史学家才会将君士坦提乌斯向尤里安借兵一事，看成是正帝故意打压副帝。事实上，公元359年抵达高卢的一纸谕令，的确让副帝错愕不已。皇帝要求他派往东方战场的兵力见下：

一、4支辅助皇家卫队（auxilia palatina）。所谓的辅助皇家卫队，是与罗马签约、以部落为单位的蛮族雇佣军。

二、其他部队每个单位选拔出300名士兵。

三、从专属副帝称为scholae的近卫骑兵团中抽出两队。

皇帝要求的4支蛮族雇佣军，都明确地注明了部落名以及所属部队，他们以勇猛著称。除此之外，所谓的“选拔”，其实就是各部队中的精兵强将。最终被派往东方的人数，由于没有任何一位史学家可以提供准确的数字，我这里也只能作一个估算。估算的基准有二：其一，当时尤里安实际拥有2.3万人的兵力。其二，每一个部队在1000人左右。根据这两个条件，正帝要的兵力大概在9700人到1万人上下。

尤里安总共才2.3万人的军队，要被调走1万人，而且都是精锐，剩下的1.3万人虽然不能说都是无用之才，但也不是最优秀的官兵。刚满28岁的尤里安面对如此状况，的确是要手足无措的。

这道下给罗马帝国第二号人物副帝的命令，并不是皇帝亲笔书写，也没有详细的说明。皇帝只派了一位低阶位的公证人前往高卢，

由他向尤里安传达旨意。仅凭这一举动就可以看出，君士坦提乌斯并没有把尤里安看做副帝，只当他一介下臣。尤里安心中再不满，以他的身份也只能服从命令。

但是，被选出派往东方的士兵，却不打算从命。特别是4支蛮族部队，反应异常激烈。他们强调，当时与罗马军签订的契约中，明文规定了勤务地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西侧，他们绝不会抛妻弃子、背井离乡地远赴东方。除了这些蛮族兵，其他的官兵也不乐意离开副帝，去听任正帝的指挥。4年前，当时24岁的尤里安生平第一次穿上司令官的正装、出现在这些战士面前时，他们极力克制发出嘲笑之声，而如今，他们真心愿意在尤里安的麾下效忠尽职。战士们相信，皇帝这次的命令，是他欺压副帝采用的一贯手段，大家对副帝充满了同情。

这局面让尤里安陷入困境。如果顺从了士兵的心愿，就等于抗旨。可要是服从了皇帝的命令，又可能引发蛮族士兵的叛乱。每当尤里安举棋不定时，以往总能够帮忙商议对策的塞孔杜斯，此时已遭解任，现在他身边只有一些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希腊哲学家。

就在尤里安左右为难之时，那些蛮族士兵成群结队地在副帝的皇宫前，静坐示威。所谓的皇宫，不过是尤里安在巴黎临时安置的大本营，既没有防止过激的士兵闯入宫内的设施，也没有充足的保安人员。

这种胶着状态持续了一个月。其间，尤里安曾经数次出宫，企图说服那些静坐的士兵。他向士兵提议，如果他们不愿意与家人分离，可以用国营邮政马车将家属运往东方。不过士兵的抗议另有原因，面对这些习惯了野营的战士，尤里安几度交涉都以失败告终。

一个月就这样虚耗过去了。公元360年2月，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士兵面前的尤里安，冷不防地被一队士兵抱上了盾牌，他们大叫着：“尤里安·奥古斯都！”

士兵扛着坐在盾牌上的副帝，一边游行一边高呼：“尤里安·奥古斯都！”呐喊声传遍了各个角落，随即全体战士发出了同一个声音。其中有一位士兵，从脖子上摘下立功所得的金锁，仿佛给国王加冕似的，戴在了坐在盾牌上摇晃不定的尤里安的头上。就在这个瞬间，万众高呼“正帝尤里安”，震天动地的声音一直传到古罗马称为塞广纳（Sequana）的塞纳河的对岸。

将自己的首领举在盾牌上游行，是尤里乌斯·恺撒征服高卢前当地人的习俗。历经了400年的罗马统治，高卢已经完全被罗马同化，连高卢人都不觉得自己是高卢人，而是罗马人。对那些来到高卢时日尚浅、驻扎在罗马行政当局称为“日耳曼”的莱茵河西岸一带的日耳曼人士兵而言，尤里安是他们这4年来生死与共的战友。可能他们认为用这种高卢传统的方式更能表达自己的情感。总而言之，尤里安是第一位以蛮族人的方式被拥戴登基的罗马皇帝。不过，他那天显得异常惊慌，被人从盾牌上放下之后，直接逃进了皇宫，第二天也没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事发当日六神无主的尤里安，事后却作了冷静思考。如果他接受官兵们的拥戴称帝，毋庸置疑，会被另一位正帝定为反叛罪。他仿佛看见了宦官优西比乌在君士坦提乌斯的耳边悄悄地说着什么，那双陷在一脸横肉里的小眼睛，闪烁着诡异的光芒。尤里安清楚，这是要让他步其兄之后尘。就在5年前，正是这位优西比乌将叛国的罪名套在了时任副帝的加卢斯的头上，而且他本人还亲自前往波拉城的监狱，对加卢斯进行了严刑拷问，最后将其斩首。宦官身上那股独特的阴气，似乎漂到了塞纳河。曾经保护尤里安躲过宦官中伤的优西比娅皇后已不在人世，君士坦提乌斯的妹妹、尤里安的妻子海伦娜也因两次流产，健康严重受损，在高卢病故。尤里安虽然不爱妻子，但对她还是十分尊重。他遵照妻子的生前愿望，将她的遗体送回罗马下葬。这两位女性的辞世，使得正帝与副帝之间的关系益发疏远。

终于，尤里安作出了决定。他出现在士兵面前，向大家宣告，他接受“奥古斯都”的称号。时逢公元360年2月，24岁之前只是一介哲学门徒的尤里安已经29岁。依照传统，为纪念登基，尤里安向官兵们发放了临时奖金。尽管具体金额不详，但无疑是罗马皇帝的登基方式。

同一天，尤里安提笔写信给君士坦提乌斯，开始了书面谈判。他试图通过辩解以及寻找折中之道，来取得君士坦提乌斯的认可。在信中他详细地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强调自己登基实属迫不得已。他恳求君士坦提乌斯，能承认他为帝国西部的“正帝”。戴克里先皇帝的“四帝共治制”时代曾经有过帝国东西两帝并立的先例，尤里安希望能够遵循旧例，在帝国东部的“正帝”为上的前提下，维持两帝并立的“二帝共治制”。每次在信尾的署名，他都按照以往的习惯，谦称“恺撒”（副帝）。

说“每次”，是因为尤里安与君士坦提乌斯的书面谈判，持续到了第二年。那时的君士坦提乌斯正在波斯战争的后方基地安条克。地处叙利亚的安条克与高卢距离遥远，就是快马加鞭，来回一趟也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不知道君士坦提乌斯是否看过这些信，反正，人在巴黎的尤里安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他曾经一度将信交给君士坦提乌斯所信仰的基督教阿里乌斯派的主教代转，希望他能从中斡旋，不过也是白费了心思。

尤里安的书面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君士坦提乌斯根本没有打算同他谈判，而是把他视为篡位者，决定像对付蛮族出身的将军马格嫩提乌斯那样，出兵讨伐。这一年，为了西征尤里安，他同波斯国王沙普尔签订了休战协定。

对于休战协定，沙普尔究竟提出哪些条件，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最终表示同意，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罗马皇帝之间的内斗是波斯国王求之不得的好事；其二，波斯需要时间去巩固刚占领的阿米达以

及北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势力。再者，罗马大军离开东方的休战期间，正是威胁利诱亚美尼亚王国的最佳时机。

公元361年春天到来之际，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及其军队已经作好了返回西方、歼灭尤里安的战斗准备。

尤里安也并非把时间全用在给君士坦提乌斯写信、等待回音上。这一年，他不仅扫除了高卢境内的入侵蛮族，而且两次渡过莱茵河，袭击了阿勒曼尼人以及法兰克人的根据地。赢得胜利回到高卢之后，他又立即召集各地的行政官，积极地推动税制以及司法公正性的改革。就在一年快结束时，他接到消息，君士坦提乌斯的先遣部队已经离开安条克，正奔西而来。

准备内战

尤里安再次陷入了抉择的困境。这一次不再是要不要接受士兵对他的拥戴登基称帝，而在于是否应该为保住皇位，不惜打一场内战。根据他之后的行动表现，我估计那时候的尤里安是这样想的：既然君士坦提乌斯没有派出少数部队采用快攻的方式西征，那么就算没有将集结于东方的10万大军全部带上，规模也不会小。这批人马再与多瑙河的守卫军会合，那么总共才2.3万人的高卢军队绝对没有胜算的可能。尤里安能够做的，就是乘多瑙河守军还未与大部队会合之前，将他们争取过来。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速战速决。

尤里安的想法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事实上，他很快地作出了以下决定，并立即付诸行动：

一、与以阿勒曼尼人、法兰克人为首的日耳曼蛮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对于5年来遭受尤里安军队沉重打击的蛮族而言，是求之不得

的事情，因此他们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二、从2.3万人中，挑选1.3万人向东进军，准备在途中与君士坦提乌斯的大军作战。这1.3万人就是一年前以合约规定为由，不肯离开阿尔卑斯山脉西侧，离开家人远赴东方战场，在皇宫前静坐示威的蛮族部队。当他们得知这次东行牵系着尤里安未来的命运，似乎完全忘记了一年前他们“罢工”的起因，欣然受命。

1.3万人又分成两军，其中1万人由在罗马军中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的法兰克人出身的内维塔（Nevitta）率领，从南高卢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穿越北意大利向东。这条路线虽长但安全，途中不会遭遇蛮族人的袭击。剩下的3000人由尤里安亲自率领，冒着极大的危险穿过黑森林，以最短的距离抵达多瑙河的上游，在当地调集船只，沿河经过文多波纳（Vindobona，维也纳的古称）、阿昆库姆（Aquincum，布达佩斯的古称）等城市，一路顺流而下。

两军会合的地点定在多瑙河中游的城市希尔米乌姆。希尔米乌姆是帝国后期的一个重要城市，地处贝尔格莱德（Belgrade）以西五六十公里，现在称为米特罗维察（Mitrovica）。

由此可见，尤里安的目的是在君士坦提乌斯大军到达之前，抢先控制多瑙河防线的军事基地米特罗维察，阻止皇帝的大军与这里的守军会合。无论对君士坦提乌斯还是尤里安，成败的关键，就是看谁先到达希尔米乌姆。

尤里安的军队赢得了时间上的比赛。当1.3万人到达希尔米乌姆时，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多瑙河的守军，表示愿意加入尤里安的阵营。预想中的内战不但没有发生，甚至没有流一滴血。



尤里安（发行于希尔米乌姆的金币）

驻守多瑙河防线的官兵已经得知尤里安被拥戴称帝，但让他们作出决定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尤里安这5年来创下的辉煌战绩。他成功地打击了莱茵河沿岸的蛮族，也为东面的多瑙河防线战事带来了正面的影响。以往多次渡过莱茵河入侵的阿勒曼尼人以及法兰克人，在遭到打击势力衰减之后，那些以多瑙河为目标、从南而来的萨尔马提亚人、夸地人也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胆大妄为。多瑙河的守军之所以轻而易举地投诚哗变，是因为他们敬佩尤里安现场指挥的能力。当然，要获得人心，前提是行动必须快于敌方。

君士坦提乌斯的性格，说客气些是慎重。他在判断以及行动上往往都表现得犹豫不决。他从安条克出发，在抵达小亚细亚的西里西亚（Cilicia）时，得知尤里安已经到达希尔米乌姆，他并没有及时地采取对策，紧接而来的就是多瑙河守军全军哗变，以及尤里安率军离开希尔米乌姆，沿着东南主干道向东行进的消息。显而易见，尤里安的

目的地是君士坦丁堡，他要占领帝国东部的首都。君士坦提乌斯维持了24年的皇位，如今岌岌可危。

君士坦提乌斯突然病倒了，御医们对他的病情深表绝望，束手无策。君士坦提乌斯和父亲君士坦丁大帝一样，在死前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基督徒。公元361年11月3日，君士坦提乌斯病逝。

君士坦提乌斯究竟死于何种疾病，至今没有结论。不过，一直以来，都定调为因病自然死亡。尽管43岁的人生过于短暂，但他在位时间长达24年。罗马皇帝长年累月身负国家重任，积劳成疾，即使身逢太平盛世，在位时间最长也就是20年，五贤帝时代的皇帝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君士坦提乌斯临终前不仅接受了洗礼，据说他还留下遗言，指定尤里安为继承人。如果此事属实，那么一定不是因为尤里安的才华，而是出于血缘上的考虑。无论君士坦提乌斯再怎么不乐意，他也只有尤里安这一位血亲。另一个理由，是他需要尤里安来照顾他即将诞生的孩子。一直为膝下无子而烦恼的君士坦提乌斯，直到最近，他的第三任妻子才刚为他怀上了孩子。这对于登基伊始便大肆屠杀血亲的君士坦提乌斯而言，实在是一个充满了讽刺意味的人生结局。君士坦提乌斯这位在父亲死后诞生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格拉提安（Gratianus）皇帝。

尤里安在率军前往首都的途中，接到快马送来的君士坦提乌斯的死讯。这简直是上天赐给他的好运，他手上不用沾一滴血就获得了皇帝的宝座。

尤里安命令部队继续向首都前进。另一方，先帝君士坦提乌斯的遗体也从东方运回首都。

公元361年12月1日，成为合法皇帝，同时也是罗马帝国唯一最高统治者的尤里安，在民众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君士坦丁堡。数日后，先帝君士坦提乌斯的遗体也运回首都。前去迎接灵柩的尤里安，以皇帝的身份亲自为他举行了基督教的葬礼，然后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圣使徒教堂内，其父君士坦丁大帝也长眠于此。

虽然尤里安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受到了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不过，民众在最初对统治者都会给予欢呼和掌声。相对于留下失误的前任，继任者的最强之处，就是还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因此，新官上任之初的好评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宫廷的官员，对新主子向来都是先表示拥护，再静观其行。他们往往被简单地当做是一群“被统治者”，殊不知，这些人也有其高明的求生之道。

针对这些被统治者，新上任的统治者的应对策略大抵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在不刺激既得利益者的情况下，加强和巩固自己刚到手的权力。这种做法，换句话说就是妥协。因此，之后也较难展开大规模的改革。

第二，获得权力后即刻实施改革，趁着既得利益者以及无利益者都还没搞清状况的时候，推出各种政策并立即付诸行动。

改革的困难之处是，当既得利益者发现改革对他们不利时，会表现出强烈的反对，而因改革最终会受益的非既得利益阶级，却一时半刻不清楚新政策好在哪里，因此会采取观望或者阳奉阴违的态度。为了避免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当政者要像表演障眼法那样，迅速并且接二连三地采取行动。尤里安皇帝就是采用了这第二种手段，想来他也是考虑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很多人热衷于讨论，说喜爱哲学的尤里安没有权力欲。我个人觉得这种讨论一点意义没有。他在21岁之前过着幽禁的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权力可言。其后4年学习哲学的生活，同样也过得战战兢兢，只要君士坦提乌斯一句话，他的脑袋随时不保。担任副帝的5年，他在履行职责的同时又要忍受皇帝的百般刁难。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尤里安，怎么会不懂得掌握权力的意义。

所谓的权力，是以自己的意志控制他人的一种力量。在众人共存的社会中，为了防止无秩序状态的发生，这种力量是必不可缺的。问题是善用还是滥用权力。30岁成为皇帝，获得至高无上权力的尤里安认为，不应该消极地去排斥权力，而应积极地予以善用，这并不违背希腊哲学的教理。

裁员大战

皇帝尤里安进入君士坦丁堡之后随即展开的宫廷改革，起因于下面这段小故事：

尤里安发现头发和胡子长了，于是他命令皇宫中的理发师来为他修剪。结果，仿佛高官云集般的，一群穿着华服的人出现在他房门口。尤里安以为自己的意思没有被正确传达，再次强调，他只需要一位理发师。这时，花团锦簇中最前列的衣着尤为显眼的人走出来禀报说，他就是理发师。尤里安问：“那其他这些人是谁？”这位皇宫的理发师非常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他们是我的助手。”

如果放任自流，官僚机构就会变得越来越臃肿。对官僚而言，没有比保住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事情。与其他领域不同，官僚并不是通过提升自己的能力来巩固地位，而是采用了拉帮结派，换言之，就是通过增加“寄生虫”的方式，来壮大自身的势力。因此，期待官僚主动

进行内部改革完全是一种妄想。官僚机构的改革，只有能够实施“强制服从”的人才能办到。

尤里安决心对宫廷内部进行改革。不仅是理发师，甚至裁缝、厨子以及马夫，宫廷内各部门繁琐的分工，简直到了令人哑口无言的程度。他对宫廷所有的部门都进行了精减。

以上文提到的那位理发师为例，他不仅能获得价值坚挺的金币的年薪，另外还有每天的补贴、维持20位助手的经费，甚至还拥有类似交通补贴的20匹马。在职务繁琐复杂的宫廷内，像他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职责不明却凡事都要插一手的宦官集团。这个集团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权力金字塔，站在塔尖的人物就是将加卢斯逼上死路并且始终与尤里安唱反调的君士坦提乌斯的宠宦优西比乌。这个以优西比乌为首、在宫廷内兴风作浪的宦官集团一年的花费，相当于那些在高卢浴血奋战的士兵年俸的总和。见此状况，尤里安已经不是目瞪口呆，而是勃然大怒。

宦官集团遭到解散，全员被赶出宫廷。皇宫内各部门所需的人手，被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那位理发师虽然没有失业，但他的助手全都被扫地出门。因此，坊间盛传，巨大的皇宫变得空空如也。

皇宫原本是罗马皇帝执行任务的指挥本部，使它变成这样一个臃肿不堪、错综复杂机构的始作俑者，是戴克里先皇帝。他主张皇帝应该与被统治的国民拉开距离。从他开始罗马皇帝的作风趋于东方的专治政体，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更是变本加厉。之后，君士坦提乌斯继续了父皇的治国路线，罗马皇宫东方化的历史长达77年之久。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就是享受了77年特权的那些人。要推翻这个特权阶级并非易事，那些与权力无缘的市井小民，会为冷冷清清的皇宫感到有趣，而与皇宫密切相关的人就笑不出来了。

“叛教者”尤里安

历史上通常称尤里安为“Julianus Apostata”，我们翻译为“叛教者尤里安”。Apostata是由希腊文衍生出的一个拉丁词，它出现于基督教势力日益强大的罗马帝国后期，意为“抛弃信仰者”。所以，译成“叛教者”应该是准确的。

不过，如果说抛弃，那么之前他必须信仰过基督教。公元361年11月3日，君士坦提乌斯病死，而后登上国家最高权力高峰的尤里安，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基督教扩张的措施。如果他以前不是一位基督徒，应该不会背上一个带有明显侮辱色彩的Apostata（叛教者）之污名。那么，尤里安在30岁之前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呢?

时值公元4世纪中期，希腊罗马多神教尚未被当做邪教遭到排挤。公元313年颁布的正式承认基督教的“米兰敕令”中有以下这样一段文字：

> 自今日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虔信的信仰，以及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不受任何干扰。
>
> 给予基督徒信奉其宗教的绝对自由，同样也适用于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我们（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两帝）认为，全面承认宗教信仰之自由，有利于帝国的和平。而且，任何神明和宗教，其名誉及尊严都不应遭到诋毁。

说服正帝李锡尼颁布了“米兰敕令”的另一位皇帝，就是执政30年之久、身后被尊称为大帝的君士坦丁。之后其子君士坦提乌斯继承皇位，统治国家的时间也长达24年。大帝的这位儿子将执行父皇路线当做头等大事，因此，“米兰敕令”颁布以来的半个世纪，至少在官方场

合，宗教信仰自由是得到保护的。事实上，军队以及政府官员的选拔没有仅限于基督徒的类似规定，不少高官都是基督教眼中的异教徒。

不过，基督教教会尊称君士坦丁为“大帝”，并非因为他颁布了“米兰敕令”，正式承认了基督教的地位。“米兰敕令”中所谓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官话，君士坦丁真正的用意在于振兴基督教。敕令颁布之后，他推出了一系列优待基督教教会的政策，这才是基督教教会赠与他“大帝”称号的真正原因。

君士坦丁死后的半个世纪，罗马帝国沿着“大帝”的路线继续前进，而尤里安也是大帝的亲属之一。尽管宗教信仰自由在公开场合得到承认，但从尤里安生长的环境来看，假扮成一名基督徒应该会对他的安全比较有利。他是皇族的一员，6岁时因父亲被杀，过了14年实为囚禁的生活。在获得自由后的10年里，仍处于君士坦提乌斯的淫威之下。在副帝时代，如果他表现出任何一点反基督教的态度，恐怕早就落进了盼着他倒霉的优西比乌的圈套里。尤里安30年来，不得不战战兢兢地隐藏住真实的宗教信仰。如果知道自己被定义为“叛教者”，他一定会感到愤愤不平。

公元4世纪时，幼儿洗礼尚未普及。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都是在临终前才接受了洗礼。主教及神父们也都是在成年后接受洗礼成了神职人员。在《罗马人的故事13·最后一搏》中我曾提及，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普及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废除了犹太教的割礼。如果基督教像犹太教一样，规定在出生后的第28天要行割礼，勉强还能忍受，要是在成年之后再举行这样的仪式，那种疼痛是无法想象的。基督教将仪式改为朝头上洒水，真是一个令人赞叹的贤明之举。无论44岁时接受洗礼的安布罗西乌斯主教，还是32岁受洗的奥古斯丁（Augustinus）神父，如果入教时必须行割礼的话，真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成为基督徒。正是因为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临终前受洗才不会被当成特例。所以，尤里安在登基前很有可能没有接受洗礼。

然而，从基督教教会的立场来看，尤里安之所以能成为皇帝，是因为他是亲近教会的大帝的血亲。如今，他推出反对基督教的政策，就是对教会的背叛。所以，才会愤怒地骂他是“叛教者”。

日本作家辻帮生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叛教者尤里安”的历史小说，而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小说名，则用了尤里安的英文发音“朱里安”（Julian）。除了小说，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也多以“尤里安”、“皇帝尤里安”为题，以“叛教者尤里安”为书名的作品为数甚少。因为“叛教者”是基督教对异己的蔑称，如果从不同于基督教的角度去描述尤里安的话，自然就不会使用“叛教者”这样的字眼。辻帮生的小说，书名虽然用了“叛教者”，但内容并没有偏袒基督教的倾向。有着深厚的欧洲文学造诣的辻帮生，或许只是沿袭了基督教为主流的欧洲人通常的习惯而已。

顺便说一下，我们翻译为“异教徒”的paganus一词，原本是基督徒对希腊罗马多神教教徒的称呼，词意中含有“仍然相信迷信的乡巴佬”的贬义。因为相对于都市，基督教当时在乡村的普及率较低。paganus会成为历史学上的固有名词，与后来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有着一定的关联。“异教徒”一词虽然已经成为惯例无法改变，但追究其词源，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

尤里安是被后世学者称为“基督教与异教抗争的最后一个世纪”即公元4世纪的罗马帝国的一位人物，准确地说，他是那个时代的主人翁之一。

被污蔑为“叛教者”的尤里安所推出的反基督教政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让罗马帝国国民的宗教信仰重新回到“米兰敕令”颁布时的状态之下。

尤里安再次承认了所有信仰的存在，无论是希腊罗马多神教，还是埃及的伊希斯神以及起源于叙利亚的密特拉教（Mithraism）和犹太

教，甚至是基督教内部因对教义解释不同而产生对立的三位一体说的阿塔纳西乌斯派及其反对派的阿里乌斯派等教派。总而言之，信什么都可以。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完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所谓的“叛教者”的蔑称、排斥异己的“异端”思想都全盘遭到否定。尤里安皇帝颁布的这条敕令，直译为“全面宽容”。

英文的tolerant以及意大利文的toleranta源自拉丁语tolerantia。我们只能一概翻译为“宽容”，词意指包容与自己看法不同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它与一神教的不同。

以基督教、犹太教以及之后诞生的伊斯兰教为代表的一神教的特征，是只承认一神存在。“摩西十诫”的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而对多神教，词典中只是简单地解释为“相信众神存在，并对其崇拜的宗教”。这样的说明其实很容易引起误会。古代的多神教并非相信所有的神灵。像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以及哲学家西塞罗、历史学家塔西佗等，他们崇拜的是希腊罗马诸神以及家族保护神，并不信仰犹太教或者高卢、日耳曼的神灵。不过他们尊重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这好比是经过寺庙，可以不进去烧香拜佛，但不会做出失敬的行为。这种宽容，是在多元化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一种智慧（另一个是法律）。正因为眼看着这种智慧逐渐消失，尤里安才颁布了“全面宽容”的敕令。

尤里安不仅下令重新修建了遭基督徒破坏的多座希腊罗马多神教的神殿，而且对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大神殿也进行了整修，这座供犹太教徒寄托灵魂的神殿，在300年前遭到了罗马帝国的破坏。当年反对罗马的犹太教徒在这里抵抗到最后一刻。镇压叛乱的提图斯（Titus）皇帝下令摧毁了神殿，之后，神殿一直被禁止重建。尤里安的这道敕令，让那些因基督教势力不断扩大而遭到排挤的犹太教徒，欣喜不已。

尤里安认为，既然承认所有宗教信仰同等的地位，那么国家就有义务为信仰迥异的人民提供平等生存的环境。“米兰敕令”颁布以来的这半个世纪，唯有基督教享受了特别的优惠，现在这些政策都必须废止。

30岁的皇帝，决心扭转这50年来迅速成长、势力范围不断扩大、逐渐走向基督教国教化的局势。

对于尤里安为何要反对基督教一教独大的理由，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他是如何做到的，则是另一个议题。简单地说，尤里安无所畏惧，他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东西。

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企图让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理由，在《罗马人的故事13 ·最后一搏》“君士坦丁与基督教”的章节中，我曾经作出过假设。单纯地从个人的角度而言，信教可以作为“找到真正的信仰”来理解，但是，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力图将基督教国教化，一定有其特殊的原因。或者说，没有原因反而倒是问题。仅因为个人的信仰而改变共同体未来的命运，这是共同体的其他人不能接受的。因此，一定有其背后的动机。

我认为，君士坦丁决定基督教国教化，是他觉得，这于公于私都是一个良策。

从公的角度考虑，可以维持政局的稳定。君士坦丁出生于公元275年前后，他经历了被我称为“迷途帝国”的公元3世纪后期的乱世。那个时代死于非命的皇帝，远远多于自然死亡的皇帝。每一次统治者的更替都会引发局势的动荡，因此戴克里先皇帝试图找到摆脱迷失的途径，其继承人君士坦丁同样也认为，政局稳定才是维持罗马帝国持续的关键。

对君士坦丁大帝而言，私利就是保证日后自己三个儿子的皇位安泰。与凭借自身实力获得帝位的他本人不同，他儿子们的继位仅仅是因为血缘关系。因此，他需要获得世袭正当化的权力。但是，从表面上握有国家主导权的罗马公民（包括有罗马公民权的士兵）和元老院这样的“世俗之人”那里获得此权，似乎不利于罗马皇帝的形象。因为“世俗之人”在赋予皇帝权力的同时，也拥有杀死或者剥夺其权力的资格。

然而，基督教就不同了。在公元1世纪中叶，基督教势力还相当弱小时，引导基督教脱离犹太教，转型走向世界性宗教的圣保罗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在我们的教诲中，不认同除上帝以外的权威。凡存在于现实世界里的权威，都是上帝所赐予。服从权威，就是顺服君临权威之上的至高无上的天主。

这意味着赋予现实世界，即凡界支配权的不是人，而是神。君士坦丁能够从基督教的教诲中发现为我所用的元素，如此灵敏的政治嗅觉，真是令人惊叹。按照这种思想，无论是赋予权力，还是剥夺权力，决定者并非“可知”的人类，而是“不可知”的唯一的天神。

既然统治权是由在现实中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天神所决定，那就必须要有某一个能够接受天意的人，将它的指示传达给人间。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上帝的指示是通过神职人员传达给普罗大众。而神职人员中充当这个通天媒介的，既不是日常生活中与信徒有频繁接触的神父，也不是孤独修炼的修道士，而是有资格出席大公会议，解释、整理及统一教义的主教。换言之，根据基督教教会的制度，上帝是否赐予凡间君主统治权的意志，是由主教向人类传达的。因此，只要将主教拉入自己的阵营，就等于是让上帝站在自己的一方。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变得很简单，只要考虑如何拉拢主教即可。

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继承人君士坦提乌斯，在半个世纪中，实施了一系列基督教优惠政策。如建设教堂、不向教会资产及其服务人员私产课税、赋予主教在其教区的司法权等，其真正的目的，就是通过拉拢“上帝”来取得皇位世袭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如果授予皇位的是上帝而不是凡人，那么就不会出现叛乱、谋杀皇帝的事情，政局因此得到稳定。

尤里安继位时，基督教优惠政策已经推行了50年。而他本人又是在通过实施恐怖政策，从而维持统治地位24年的君士坦提乌斯时代下成长的。因此，他自然会对为了安定政局而不顾社会现状的国家政策深感怀疑，毕竟他只有30岁，还是一位充满理想的年轻人。

这位才30岁出头的年轻人，妻子病故后没有再婚，身边甚至见不到女人的影子。尤里安没有孩子，在这一点上，与为了传宗接代而结了三次婚的君士坦提乌斯又一次形成鲜明的对比。哈德良皇帝曾经说过，儿子不能选，但继承人可以选。想来尤里安也认同这个观点。

也许尤里安根本不相信政治世界中存在什么“上帝的旨意”。尽管君士坦丁大帝借由“上帝的旨意”确保了世袭的正统性，然而他的长子因为一时的冲动，轻易地就死在了一介大队长的手里，小儿子则因为手下蛮族出身的军人叛乱而死于非命。二儿子君士坦提乌斯虽然最后是死于病榻之上，但倒在了讨伐反叛的副帝的路途之中。纵观这一切，自然是很难让尤里安相信“上帝的旨意”存在的合理性。何况，他从来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信仰者，而是一个以怀疑为上的哲学门徒。

总而言之，尤里安不需要讨好传达上帝旨意的主教们，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废除了持续50年的基督教优惠政策，而且贯彻落实得非常之彻底。

向基督教宣战的诏书

根据尤里安的政策，迄今为止利用国家财产资助教会活动的一切行为，遭到全面废止。如建造教堂以及向教会捐赠资产（包括附带农奴的耕地、配备工匠的手工业以及配备店员的商铺等），等等。

除此之外，教会财产及其从业人员的个人财产免税的特别优惠，也毫无例外地一律废除。从此以后，主教大人将与一般平民一样成为纳税人，原来以教会活动经费为名目而免税的教会财产，和其他的农工商行业一样，必须向国家缴纳税金。

不过，尤里安并没有下令没收这50年来由国家出资建造的教堂，也没有向教会及其人员追缴之前被免除的税金。虽然这让教会占了“先来先得”的便宜，不过尤里安的企图似乎只在于阻止基督教教会继续扩张，而废除优惠政策已经可以达到目的。正如恺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在《基督教教会史》中所指出的那样，4世纪的罗马帝国，有很多人因为私利私欲而改变信仰，成了基督徒。

正如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的真正动机在于振兴基督教教会，尤里安皇帝的“全面宽容”也有着表面和实质的两面性。他的真正目的，当然就是复兴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尤其是被基督教认定为“异教”的希腊罗马多神教。

尤里安决定重建那些长年废弃、濒临崩溃边缘的神殿，并归还原属于神殿的土地。罗马人习惯把神殿建在市井之中，它不仅是参拜的场所，更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与之相反，希腊人喜欢将神殿建在悬崖峭壁之上，即便是在大海上，也能眺望到崇高的神灵。或者是将神殿建在溪水潺潺、绿树丛林的大自然中。而神殿周边的土地，与其说是维持神殿所需的财源，不如说是奉献给天神的居所来得更有意义。

罗马帝国的东部，在受到罗马人统治之后，通用语言仍然是希腊语，由此可见，这里始终属于希腊文化圈。要在帝国东部重建神殿，必须一并归还其周边的土地，否则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同时，尤里安还制定了国策，恢复了在神殿举办官方祭拜的仪式。

罗马帝国的后期，皇帝颁布法令即敕令，无须等待元老院的审议、核准。因此，将恢复“异教”定为国家政策，并非一件难事，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具体实施。尤里安颁布的几项法令就面临着贯彻落实的困境。

公元313年颁布的“米兰敕令”让一部分政治神经敏锐的人首先觉察到了形势的变化，而到了公元324年，击败宿敌李锡尼，成了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皇帝的君士坦丁大举兴建基督教堂的行为，使得平民百姓都能够感觉到时代的变迁。在君士坦丁大帝去世的公元337年之前，优待基督教的一系列政策已经得到全面完善，原本对宗教并不热衷的人们，也能从中体会到顺应时代的好处。加入基督教有益，就意味着坚持做异教徒会非常之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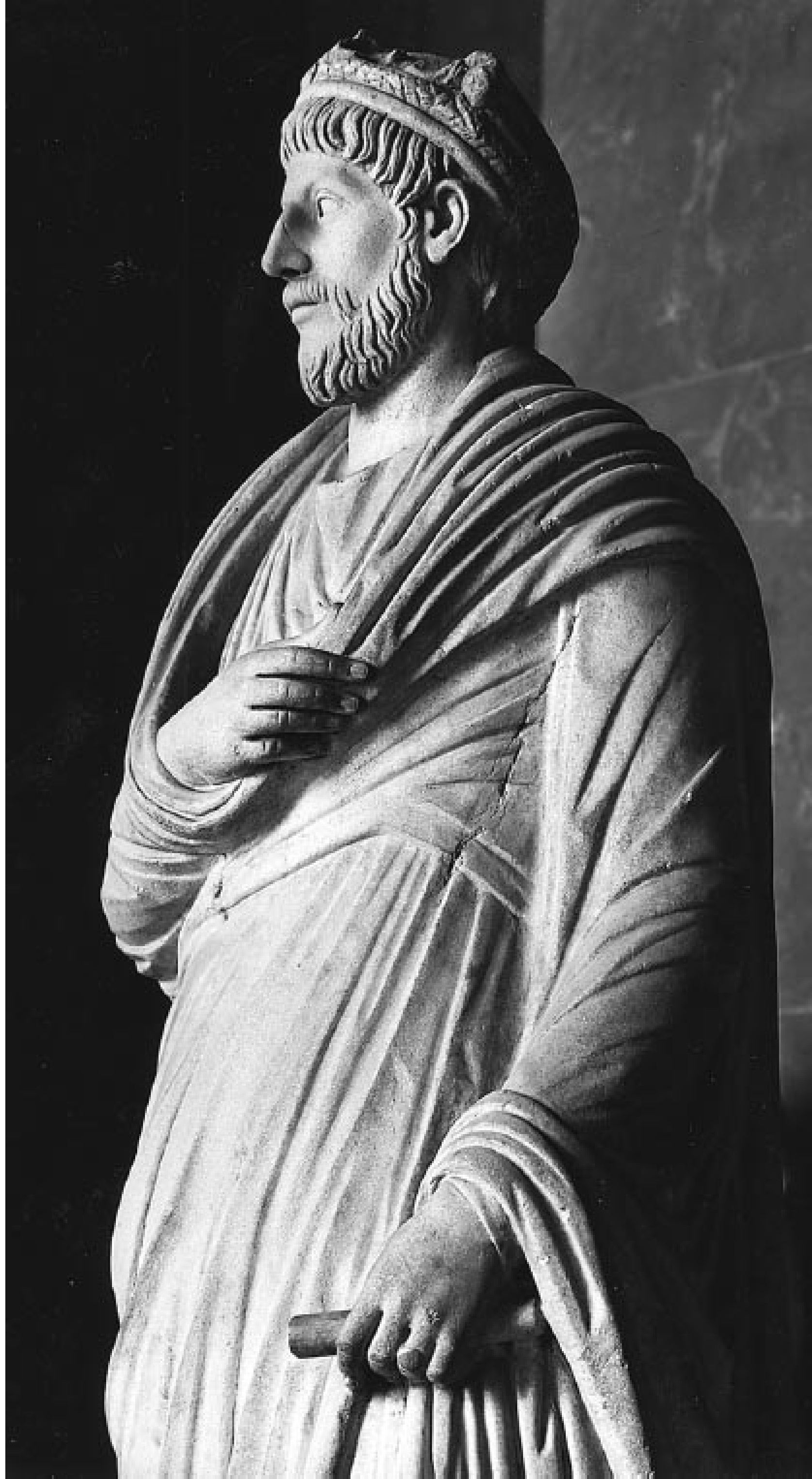
大帝死后，他的三个儿子继承了皇位，分治天下。长子因被杀，很早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从公元340年开始，帝国由二儿子和小儿子两人共同统治。管辖帝国西部的小儿子君士坦斯，在341年就颁布了禁止异教祭祀活动的敕令，可是到了第二年的342年，他又发布了以下禁止首都罗马市民破坏神殿的命令：

> 尽管所有的迷信活动都必须遭到排除，但城外的神殿应该保留其现状。虽然战车竞赛以及田径运动起源于奉献神灵的仪式，但是破坏举行这些仪式的竞技场及其附属的神殿，就等于剥夺了人民长年以来所享受的娱乐之权利。

比拳击运动更残酷的角斗士决斗、堪比现代F1赛车的四轮或两轮战车的竞赛，以及在近代以奥林匹克方式恢复的田径比赛，最初的出现都是以奉献给希腊罗马诸神为目的。因此，在比赛之前，选手们照例要先去附属于竞技场的神殿参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是神殿附属于竞技场，而是竞技场附属于神殿。所以，破坏神殿很可能会影响到竞技场，君士坦斯皇帝之所以提出保护神殿，是不想因娱乐场遭到破坏而得罪了天下百姓。

这段逸事发生在基督教渗透速度低于东部、狂热的基督徒数量极少的帝国西部，而且是在被称为异教圣地的首都罗马。相比之下，帝国东部不仅基督徒人数众多，而且三位一体派与阿里乌斯派因对教义的诠释不同而纷争不断，异教神殿所面临的形势，势必要比西部来得更为严峻。

事实上，若干年之后，因弟弟君士坦斯遇刺而成了罗马帝国唯一统治者的君士坦提乌斯，很快就颁布了夜间进行祭祀的禁止令，紧接着白天的祭祀活动也遭到了全面禁止。由于“米兰敕令”规定了一切宗教信仰的自由，所以，君士坦提乌斯禁止异教公开祭祀所用的理由是：“为了防止善良的人民因崇拜偶像而犯罪。”



尤里安

在尤里安实施宗教改革之前，如果违反禁令，举行或参加祭拜仪式的人将被处以死刑。除此之外，国家虽然不允许拆毁神殿，但默许民众将破损的神殿中的圆柱等材料拿去建造私宅。民众为了获取石材，往往会存心去破坏神殿。

总而言之，尤里安的宗教改革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根本无法实现。

先说重建神殿，由于神殿内部材料大多被人拿走，必须开山取石从头开始做起。

再讲那些神殿周围的土地。如果对神灵不存敬畏，那么这些地方就无异于其他土地。由于神殿多远离人烟，因此适合作为农田或墓地。既然不相信神灵的存在，那么土地转为它用，对使用者而言完全没有心理障碍。

就算是恢复祭拜仪式，实际上也没有想得那么容易。首先是因为长年以来的法律规定举办祭祀活动为死罪，加上希腊罗马多神教没有专门的祭司阶级，祭祀活动在久遭禁绝的情况下，以前那些兼任祭司的市民也因年事已高而陆续死去，人数不断减少。

尤里安还是哲学门徒时，就有人对他的说话方式有所非议。说得客气一点，叫滔滔不绝，说得刻薄一点，就是修辞速度赶不上脑海中不断冒出的想法，口不择言。当了皇帝之后，他的这种习惯也没有改变。凡是这种说话方式的人，做事也容易急躁。

尽管年仅30岁就成了帝国最高统治者，但是尤里安似乎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或许是使命感让他觉得，如果不好好地利用现在的时机，就无法掌控未来的局势。他的焦虑的确是有事实根据的。何况他所推行的改革，在很多领域都受到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强烈反对，即使在一些没有遭到正面冲击的地方，也层出不穷地出现了消极怠工的情

况。但是，尤里安并没有退缩。他在赶走了大批下人而变得空空荡荡的皇宫中，取消了登基庆典以及各种属于皇帝的奢华享受，接二连三地推出并实施了多项法律政策。

有一本古籍叫《狄奥多西法典》（Codex）。它是在公元431年，由时任皇帝的狄奥多西二世制定的法令大全。这部法典汇集了从君士坦丁大帝到狄奥多西二世百余年来历任皇帝所签署的宪令。一个世纪后，查士丁尼（Justinian）大帝在此基础上，编纂了一部正式名称为《查士丁尼法典》的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在《狄奥多西法典》成书的公元431年，基督教获得全面胜利，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宗教已经30年。《狄奥多西法典》中所汇集的是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以后的法律，因此，都是与基督教国家化相关的内容。

鉴于以上原因，尤里安制定的有关全面废除优惠基督教的法令，自然是不会出现在法典中。尤里安死后，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曾经实施的基督教优惠政策陆续恢复。我们后人就是通过这本《狄奥多西法典》，才能了解到优惠基督教的具体措施。

尤里安制定并实施的反基督教的政策，在他死后立即遭到了废止，因此这些相关法令自然是不会记载在案的。

不过，《狄奥多西法典》中也包括了52项由尤里安签署的条令。被视为“叛教者”的人所制定的法律之所以还能出现在法典中，按照研究人员的见解，主要是因为内容都是与基督教无关的行政法。在首都君士坦丁堡仅仅滞留了三四个月的尤里安，除了反基督教的相关政策，还制定了52项其他的法令，可见他是埋首于国家大事，心无旁骛，这也让人感觉到他争分夺秒的紧迫感。

在尤里安死后被废止因而没有收入《狄奥多西法典》的宪令中，有一条驱除信仰基督教的教师的规定。尤里安对此作了以下的注解：

> 教师的职责在于教书，而书本教材都是希腊文或拉丁文的作品。这些希腊以及罗马的作者，对天神怀有敬爱和崇拜之心，其作品正是这种精神的结晶。然而，基督教将这些天神看成魔鬼，对此笃信不疑的教师如何指导学生去领会作品中所蕴含的希腊罗马精神的真谛？

言下之意，将宙斯、波塞冬、阿波罗、雅典娜视为邪神的人，怎么能教群神登场的荷马的作品？据说他曾经讲过："信仰基督的教师可以去教会教书，用他们深信不疑的《圣经》当教材。"

对于尤里安的上述言论，就连现代的罗马历史学家也认为"理论上相当正确"。对此，我倒是有点按捺不住，不禁想问问这些专家，作为热心的基督徒，你们是否又能体会罗马精神的真谛呢？

话说回来，尤里安驱逐基督徒教师的政策，却从意想不到的地方传出了反对的声音。反对者竟然是那些非基督徒的教师。他们不赞成的理由是，基督徒大多热心于孩子的教育，如果赶走信仰基督教的教师，家长们就不会再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当时的学校以私塾为主，对教师而言，学生的学费是他们的生活来源。结果证明，这些教师的担心不过是虚惊一场，法律公布之后，基督徒让孩子接受教育的热情并未因此而减弱。

根据罗马帝国的教育制度，在完成了读书写字算盘等初等教育之后，就要进入现代称为liberal arts的"artes liberals"，即教养学科的学习阶段。学生就读的年龄从八九岁开始一直到十六七岁，这段期间他们会接受以下科目的教育：

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语法——准确且优美的叙述能力所不可欠缺的基础。

修辞学——加强言辞或语句效果，恰当地表达思想所需的技能。

辩证学——说服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所需的论理性。

其他科目还有：数学、几何学、历史、地理。

以上这些科目所使用的教材，大多是前人的著作。在当时被认为是“classics”（古典）的著作，大约是从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到公元2世纪的塔西佗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之所以适用于做课本，主要是因为其内容的完整性。

中上层社会的基督徒，大多属于新兴阶级。这些人热衷于对孩子们的教育。在公元4世纪时的罗马帝国还有一个现象，多数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将来能成为政府高官或律师。要达成这个愿望，首先必须接受artes liberals（教养学科）的教育。因此，不管教师是不是基督徒，家长们仍然愿意将孩子送到私塾学习。

被踢出校门的基督徒教师们，也曾试图作出一些反击。他们修改了教材，将原本出现在《荷马史诗》、希腊悲剧以及《苏格拉底对话录》中的诸神和人物，改为《圣经》或《使徒行传》里的人物。结果当然是以失败告终。世俗化的希腊罗马多神教文化背景下的神和人，与严格遵守教义、一丝不苟的基督教徒，实在是无法互换角色。

这件事情最终也就是一场闹剧。基督徒们指责的所谓的异教徒，是即使自己不信也不会反对他人信仰的多神教的民众。在他们看来，仅仅是因为基督徒就要被迫离开教坛这件事本身，就脱离了“宽容”的精神。因此，即使在基督徒的学生数量没有减少的状态下，仍然有一些“异教徒”坚持反对尤里安的这项政策。这些人中包括军人出身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不过，尤里安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希望通过异教徒教师的教育，让那些来自基督教家庭的孩子了解到，这个世界除了基督教的理念之外，还有其他的价值观存在。

尤里安为阻止基督教势力的扩张，连续推出的一系列法规条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将帝国的社会秩序恢复到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的时代。比如说，禁止使用国家资源建造教堂，撤销教会财产以及神职人员私人财产免税的特惠等。

第二，在元首制时代完全不曾涉及的一些新政策。因为那时的基督教势力还很微弱，不需要制定专门法律予以治理。像上述禁止基督徒担任教师的法令，就属于这一类型。接下来我要论述的另一项政策，性质也是如此，即这些法律都是尤里安独创的。

在尤里安看来，希腊罗马多神教陷于劣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没有一个专门的祭司阶级。与之相反，基督教的势力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扩大，正是由于它有一个金字塔般的组织结构，各教区的主教位于塔尖，下面依次是祭司、副祭司。

身为皇帝的尤里安，同时也是大祭司。因此，他在各地任命了专职的祭司，祭司之下还配有专门的祭司。这样，罗马的传统宗教也能形成一个抗衡基督教教会的类似的组织机构。

这些专职祭司的开支由国家承担，所以他们必须遵守帝国法律并信仰希腊罗马多神教。与以往民间人士兼职的祭司不同，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大祭司和祭司不得前往剧场、竞技场观赏戏剧、战车竞赛和角斗士角斗表演，禁止与深受百姓喜欢的演员、竞赛选手等人物交往，也不能享受打猎的乐趣。对罗马人而言，这等于禁止过正常的市民生活。

尤里安推出的这些法令，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否真正懂得罗马文明。

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神教，要求人们按照唯一真神的教诲去生活。然而，所谓神的教诲，就像占星术或者是抽签卜卦那样，充满了随个人感受去自我诠释的内容。占星术、卜卦的内容可以随便说，但宗教不能放任信徒“随个人感受”去理解。放任意味着失去秩序，没有秩序就不能形成组织。

一神教之所以要形成一个独立的祭司阶级，就是因为需要有一批专业人员，去调整、统一神的教诲，并将之传达给民众，避免教义“随个人感受”被任意诠释。

另一方面，多神教中的诸神并不具有引领人类生活的意义。他们充当的是帮助人类分忧解难的角色，从来也不存在什么神的教诲。因此，既没有解释教义的必要，更不需要有专门的人员来负责整合，并传达给信徒。罗马自建国以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专业的祭司阶层，正体现了忠实于多神教的罗马人的精神，也是罗马文明的精髓所在。即便是以抗衡基督教为目的，强行建立专业的祭司组织，终究是与罗马传统精神背道而驰的行为，这种政策自然是不可能深入人心、维系长久的。

不过，话说回来，尤里安这项政策的失败，并非源于这些理论上的原因，而是在实际中遭受到了以下的阻力：

第一，即使成了希腊罗马多神教的大祭司或祭司，这些人也不能享受私有财产免税的优惠待遇。尤里安废除基督教相关人员私产免税，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所有的宗教团体都必须接受同等的社会待遇。既然皇帝大张旗鼓地推行这种自由平等的理念，也就无法对希腊罗马多神教另眼相看。

第二，几乎与基督教的修道士的清规戒律相同，大祭司以及祭司必须远离尘世。他们既不能去剧场看戏、出入赛车或竞走的竞技场，也不能举行或出席宴会，与亲朋好友大快朵颐。这在世俗的罗马人观念中，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尤里安自己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就认为别人亦可如此，这位年轻皇帝对人性几乎是一无所知。

尤里安推行的对抗基督教教会的各种法律中，还包括了与福祉有关的条令。他发现，基督教教会主导的救济贫民以及孤儿寡母的活动，对于扩张势力有明显的帮助。

在他看来，基督教教会之所以可以做这些慈善，主要是因为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开始实施的用国家经费援助教会的政策。当然，教徒也会有个人捐赠，但是真正让教会确保慈善事业财源的，还是前朝皇帝们捐出的大笔钱财和大量耕地。尽管国家资助教会的禁令已经推出，但并未没收之前捐赠的资产。因此，基督教教会依然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可以一如既往地继续慈善事业。为了打破教会独占的局面，尤里安决定以国家名义开展福祉活动，也就是说，国家和教会争相救济贫民。不过，这项法律，除了尤里安亲自落实了两三条具体的措施，就再也没有后续的跟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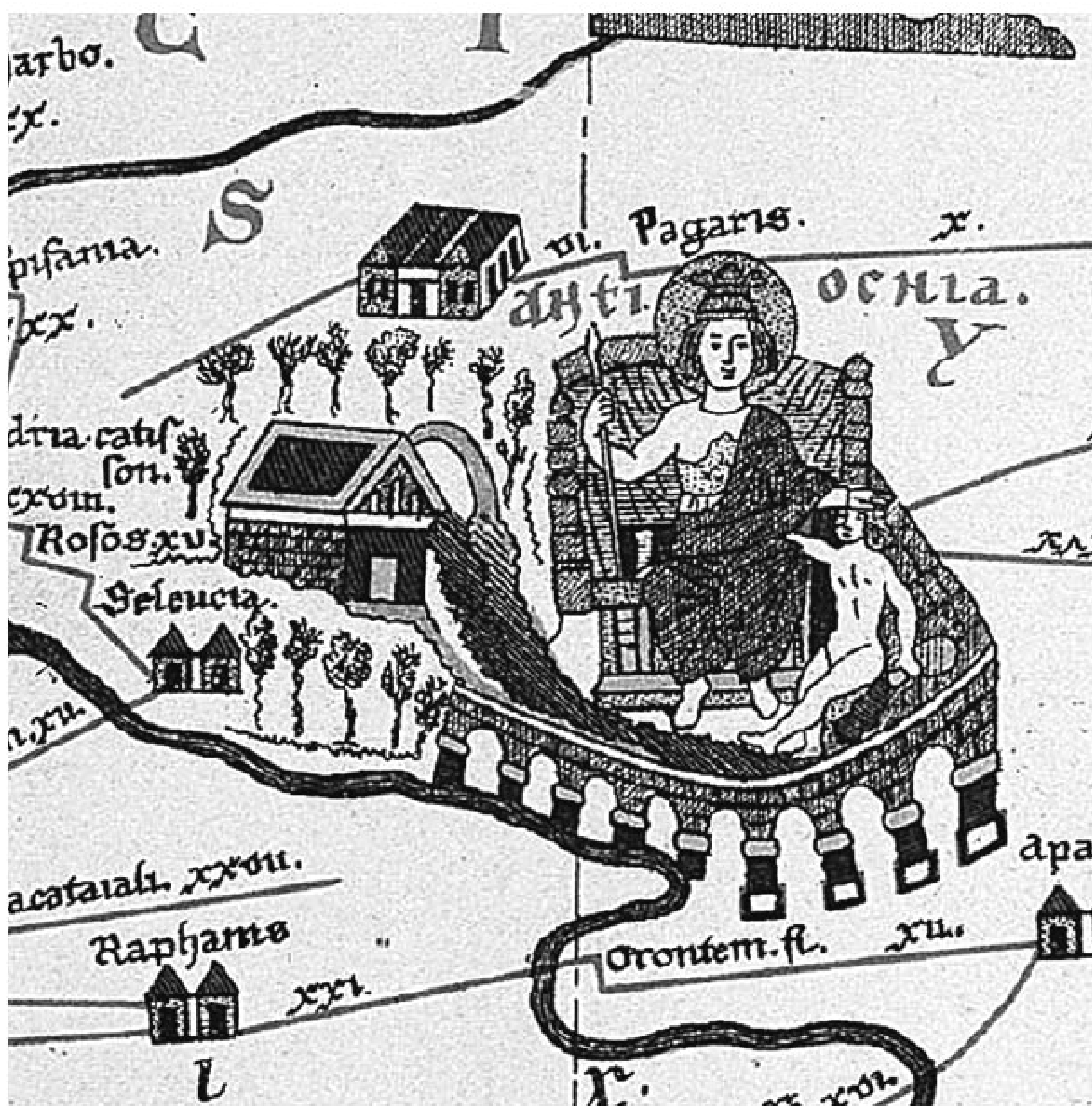
导致尤里安的慈善事业最终失败的另一个要因，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建立起组织架构。不过，更主要的是，这些政策没有得到“地方自治体”以及“个人”的支持。社会福利之所以能在元首制时代持续发挥功效，是因为它名为皇帝主导，实际上是由地方自治体进行实施。除此之外，公共事业还受到了愿意回馈社会的私人的支持。我个人认为，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的架构是一个“小政府”，它巧妙地协调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平衡关系，所以“小政府”才能掌控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以罗马道路为例，正是由于“中央”、“地方”、“个人”三足鼎立的体系，交通网络才能建设得如此完善，并且在相当长时间里维持了正常的运作。

然而，到了帝国后期，中央集权不断强化，地方自治早已是明日黄花。税制的改变，也让个人捐赠财产、回馈社会的观念消失殆尽。

尤里安死后，由国家推动实施的社会福利法案遭到废除，统称为“caritas”的慈善事业，再次被基督教教会独占，这种状况在之后维持了很多年。

安条克

公元361年11月3日，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死亡，让尤里安在不动刀兵的情况下和平登基，以帝国唯一的最高权力者的身份，于同年12月1日进入首都君士坦丁堡。他在君士坦丁堡究竟生活了多久，至今没有一个定论。有些专家认为是到公元362年4月左右，也有人认为可能更晚一些，大概到初夏前后。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证明尤里安前往东方之前，在首都的生活没有超过一年。



他离开首都向东移动的目的非常明确，与波斯王国再打一仗。这个时期罗马帝国的形势非常稳定，辽阔的疆土既没有受到蛮族的侵略，也没发生内战，正是皇帝亲自出征、歼灭宿敌、除去心头大患的好时机。

有一份以最初的所有者名字命名的古代地图，叫波伊廷格古地图（Tabula Peutingeriana）。如今保存的是11世纪制作的复制品，原图是在公元4世纪中叶，即尤里安生活的那个时代制作而成。在这幅地图

上，用了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特殊记号，标注了罗马帝国的三大都市：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条克。

在这三大都市中，罗马从古至今始终保持着世界大都市的地位；君士坦丁堡（英文：Constantinople）在公元1453年遭到奥斯曼土耳其（Ottoman Turks）攻陷后，改名为伊斯坦布尔，以后作为土耳其的首都，一直是一个活力四射、充满东方风情的城市。

与这两个古代大城相比，安条克的生命未免过于短暂。现在，这里土耳其语称为安塔基亚，是一个距离叙利亚国界不到30公里的边境小镇。那些怀着对古城安条克朝拜之心来到这里的人，想必是无一例外地失望而归。

无论是由纵横交错的街道所形成的城市结构，还是长达几公里的中央大道，昔日的风貌荡然无存。街道两侧圆柱林立的中央大道，曾经赫赫有名，甚至成为波伊廷格古地图的记号，当安条克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竞相争做东方第一都市的时代，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这条中央大道。

安条克的城市规模不如罗马，但远远超过了君士坦丁堡。它是在公元前3世纪由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分裂帝国的武将之一塞琉古（Seleukos）所建。因此，相比公元前753年建城的罗马，历史较短，却比公元330年建都的君士坦丁堡悠久许多。塞琉古王朝遭罗马灭亡之后，安条克失去了其首都的地位，但在罗马的统治下仍然继续保持着经济的繁荣，因为这里是东方贸易的中心。

首先，这里占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是经过幼发拉底河从东方运送来的货物的最佳集散地。城附近由东北向西南流淌的奥伦提斯（Orontes）河适于航运，往下游行驶20公里，就是地中海的入口。因此，这里具备了作为贸易城市的所有条件。

其次，安条克的居民结构非常国际化，很符合贸易城市的气氛。上层以及中产阶级主要是希腊裔，而那些比其他民族更善于寻找商机的犹太人，很早之前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犹太经济圈。市民地位处于中下层的，是可以算做原住民的闪米特人（Semites）。城市的东方风情其实并不太浓厚，这主要是因为城中到处都建有罗马人和希腊人喜好的圆柱，在罗马统治的时代，圆柱的数量竟然成了课税的基准。而象征着安条克雄厚的经济实力的长达几公里的圆柱大街，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更是家喻户晓。如果加上奴隶的数量，安条克的人口有百万之多，这一点上，它同样也是劣于罗马，胜于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擅长巧妙地分配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因此也赋予这所东方大城市自治的权力。所有地方政府层面的政策方针等事项，全部由200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安条克议会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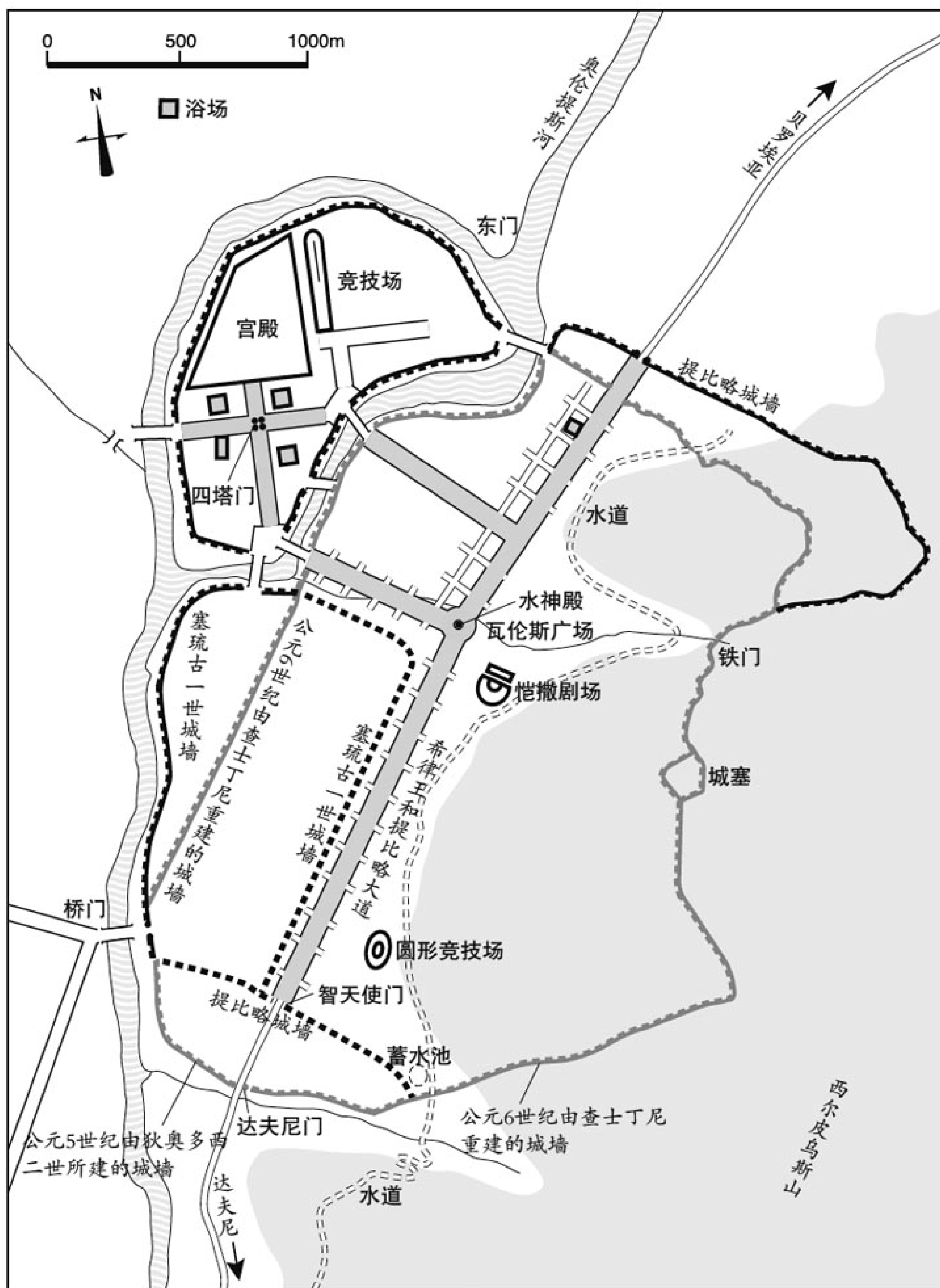
顺便提一下，那位武将出身的文人，因不向基督教妥协终身为异教徒而被称为“罗马最后的历史学家”的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就是在这所国际都市出生、成长的希腊裔安条克人。

繁荣的安条克出现明显的阴影，是在尤里安时代过去百年之后。当时它遭遇了波斯军队的侵略以及地震的重大伤害。但是，波斯军的烧杀抢劫以及地震所带来的破坏并非都集中于公元5世纪。真正的问题，是当地的人民已经失去了重建城市的信心和资金。虽然皇帝推出了修复城市的支援措施，不过，按照罗马人的思考方式，皇帝的作为并非万能，不过是为努力自救的地方自治体及其个人，提供一些帮助而已。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城市要克服过去的不幸重新崛起，最重要的是靠当地居民的意志力和财力。5世纪以后的安条克，已经没有了这些必备的条件。

逐渐走向没落的安条克，在公元638年被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占领之后，彻底丧失了城市的机制。这里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古代世界连接地中海的内海城市。但是到了中世纪时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势不

两立，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文明圈中的“内海”，反而成了两大文明世界的分界线。安条克作为城市的生命，自然也随着古代一同消失。

话说回来，尤里安身处的公元4世纪，安条克还是罗马帝国引以为自豪的一个繁荣的东方城市，没有人会想到它在百年之后将走向没落。这个国际化都市的居民，尤其是上层阶级的人们，天生就是商人。他们相信无论是谁统治，自己都有生活的能力。这种自信心很容易导致他们对统治者所作的努力不屑一顾。安条克人的性格说得好听些，是务实清醒，不客气地说就是老奸巨猾。因此，年轻气盛又是理想家的尤里安注定与他们格格不入。



0
500
1000m
N
浴场
奥伦提斯河
贝罗埃亚
东门
竞技场
宫殿
提比略城墙
四塔门
水道
水神殿
瓦伦斯广场
铁门
塞琉古一世城墙
公元6世纪由查士丁尼重建的城墙
塞琉古一世城墙
希律王和提比略大道
恺撒剧场
城塞
桥门
圆形竞技场
智天使门
提比略城墙
蓄水池
达夫尼门
公元5世纪由狄奥多西二世所建的城墙
公元6世纪由查士丁尼重建的城墙
西尔皮乌斯山
水道
达夫尼

古代安条克

尤里安在安条克的生活，一开始就发生了不幸事件。安条克的东北地区是当地的粮仓地带，就算在收成不佳的年份，也不会像其他城市那样陷入粮食危机。不过，安条克毕竟是一个大都市，而且与行使公权力管理粮食的罗马、君士坦丁堡不同，确保民众粮源这种政治工作，在这里也是交由市场经济自我调节。尤里安来到这里的一年，正好遇上了周边地带发生小麦歉收的问题。

收成不足的消息一传出，市场上的小麦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背后无疑有着投机的行为。

英文speculation的词源来自拉丁语speculatio，可见投机的行为自古存在。speculatio原本是一个哲学用语，意为思索。思索人生的真理是哲学，而思索赚钱的真谛，就成了投机。

希腊哲学的鼻祖泰勒斯（Thals）出生于当时称为爱奥尼亚的位于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利都（Miletus）。这位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的哲学家，曾经有过一段既有现实意义又很反映地中海民风的愉快经历。

话说有一天，边走边思考的泰勒斯，不小心掉进了水沟里。路人见此情景，不禁捧腹大笑，说哲学家真是一个没用的东西。

泰勒斯决定用行动来反驳众人的偏见。我忘了他是用哪一种计算方式，反正他是以某个事物为基准，预测出这一年的橄榄将大获丰收。他事先租下了米利都周边所有的榨油场，业者想销售橄榄油，就必须到泰勒斯的工场榨油，否则就无法成品上市。也就是说，泰勒斯采用了垄断的手法，获得了莫大的利益。

哲学通常会被认为是一门没有实用价值的学问。其实，哲学的精髓并不在于知识，而是思索。如同做体操活络筋骨一般，思索锻炼人的头脑。换言之，哲学就是让人们习惯于思考。泰勒斯用他的行动证

明，只要习惯于思考，不管对象是哲学还是投机买卖，都能获得成功。也就是说，哲学是一个多面手。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泰勒斯真正关注的仍然是哲学，他只是在那一年关注了投机的生意。之后，他思索的对象再次回到哲学上。他不是一位投机高手，他是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巅峰人物的希腊哲学的开山鼻祖。

罗马皇帝尤里安也无时无刻不称自己是一个哲学门徒。然而，哲学对于生活在公元4世纪的他而言，并非像公元前6世纪泰勒斯所追求的那种傲然独立、目空一切的思想，而是变成了灵魂的救赎，含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尤里安身边围绕的都是他喜欢的哲学家，这些人是以利巴尼乌斯（Libanius）为首的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最杰出的学者。当然，他们都不是基督教徒。不过，这些著名的研究人员给人的印象，是站在讲坛上向学生传授知识，像现在大学里的哲学系教授。当时的教授依靠学生缴纳的“礼金”为生，皇帝之友的身份，对广招弟子是很有帮助的。阅读利巴尼乌斯等这些尤里安的友人留下的有关他的文章，无法让人感受到他们对尤里安怀有亲爱之情，甚至在尤里安死后，他们写的那些为其辩护之文，也因为对他的理解不足而缺乏说服力。

当时就有人刻薄地指出这些人是寄生虫，看来并非言过其实。成天与这些人在一起的尤里安，所想的自然都是与哲学有关的内容，他应该是从未思索过投机之类的事情。

私底下尤里安以哲学会友无可非议，不过作为皇帝，市场上小麦骤然消失、面包店无货可售的事态，他不能坐视不理。

尤里安向安条克的市民喊话，希望大家尽量节约，在事态缓和之前暂时忍受一下贫乏的生活。他的这类呼吁以前在高卢遭受蛮族围城

时，曾经振奋过人心，然而对和平形势下的安条克人民完全不起作用。于是，尤里安派遣特使前往小亚细亚和埃及购买了大量小麦，全部投入了市场，并且设定了最高售价的限制。

但是，现状并没有因此改善。那些紧急进口的小麦，在安条克的外港换船装货时，就已经被一些巨贾全部买了下来。这些资金雄厚的商人，几乎全都是安条克元老院的议员。

尤里安这才知道，原来掌握情报是获取暴利的关键。年轻的31岁的皇帝盛怒之下，将200名元老院议员统统关进了大牢，不过当天就释放了他们。无论如何，皇帝强硬的态度总算有了效果，那些商人终于愿意将囤积的小麦投放市场。市民的不满虽然得到了消解，但安条克的上层阶级从此与皇帝结下了怨仇。而因为另一起事件的发生，让中下层人民也对皇帝表示出了敌意和反感。

安条克以南不到10公里处，有一个森林葱郁、泉水潺潺叫做达夫尼（Daphne）的小镇，当地有一座自古以来就闻名遐迩的雄伟的阿波罗神殿。达夫尼就是以神殿为中心逐渐发展起来的。事情发生的起端是尤里安来这里参拜神殿。

要追溯被史学家称为“希腊罗马宗教与基督教决定胜负的最后一个世纪”的公元4世纪的世事变幻，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提。那就是尤里安在位时期，“米兰敕令”已经颁布了半个多世纪。这意味着，表面上所有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承认，实际上皇帝偏向于基督教的政治路线，已经持续了50多年。而另一面，罗马进入帝制时代以后，建造献给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主要出资人又是皇帝。被基督教视为“异教”的多神教，由于没有所谓的教义，所以不存在向信众传播、解释教义的神职阶级，因此也没有必要去建立财源，用以维持相关人员的生活以及举行弥撒、做慈善等。

以上状态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时代发生了变化。失去了皇帝以及地方自治体资助的希腊罗马多神教状况凄凉，原本还可以依靠一些私人援助，但帝国当时接连遭遇危机，人们心中充满了天神离他们而去的不安。希腊罗马的宗教不像基督教，没有什么“不幸是神赐予人类的试炼”这类应变的解释。

试想，在这种形势下，谁还会去关心天神不在的神殿，还有谁愿意主动充当祭司，自己花钱购买献祭用的家畜，来举行出席人数寥寥的献祭仪式。来到达夫尼的尤里安，看到的阿波罗神殿也是一片荒凉，迎接他的是听到皇帝御驾光临，急急放下手中的农活、从田里慌张赶来的祭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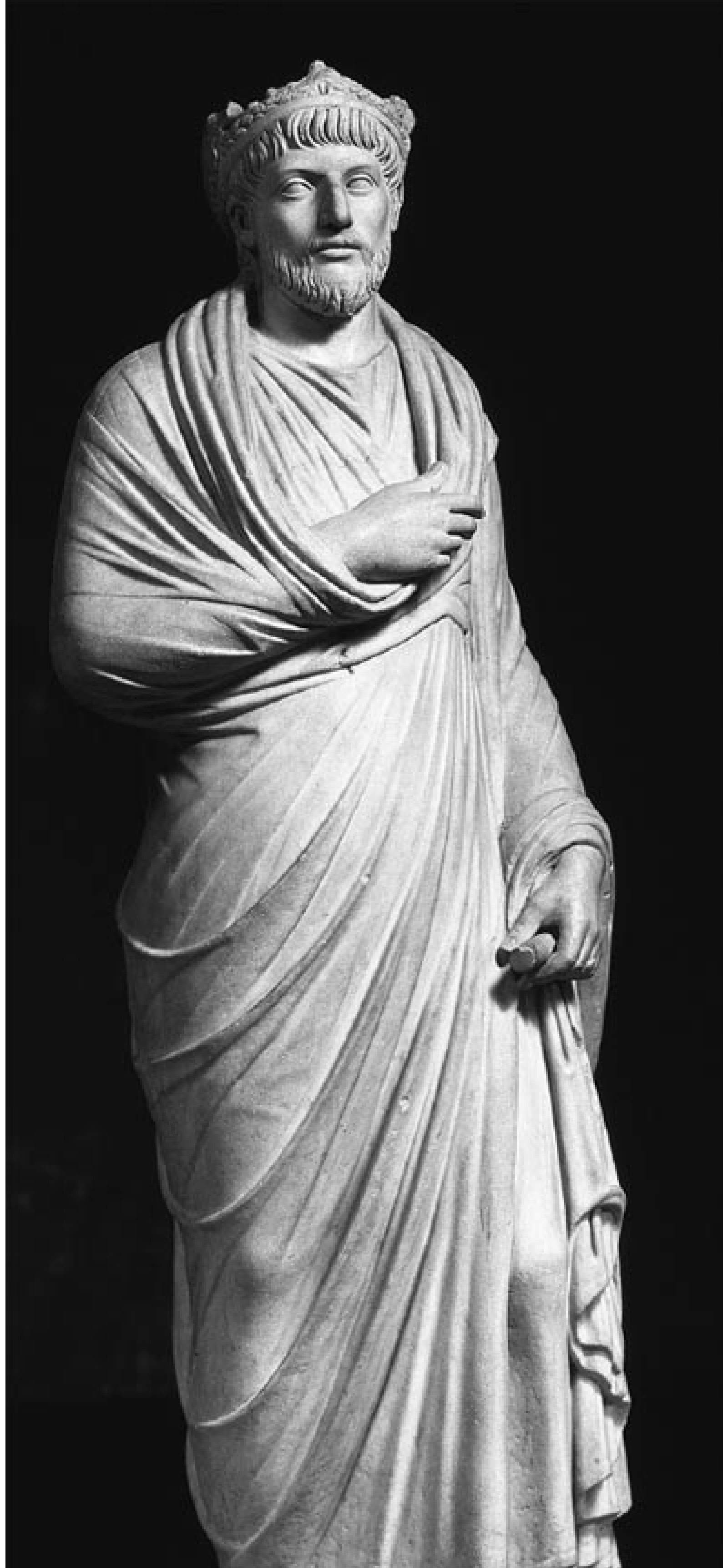


阿波罗和达夫尼雕像（贝尔尼尼作品，17世纪）

在古代，阿波罗神殿一直人头攒动，参拜者络绎不绝。人们来此，倒不是因为这位天神对达夫尼的一片痴情。实在要说的话，大家倒是可能会对为了摆脱阿波罗紧追不舍，毅然化身为月桂树的达夫尼予以同情。阿波罗神殿之所以能聚集众多的信徒，正如德尔斐阿波罗神殿（Delphi Temple of Apollo）闻名于世的理由，是人们希望听到由巫女传达的神谕。达夫尼的阿波罗神殿自古有名的原因同样如此。可是，来到这里的尤里安听说神殿已经听不到神谕的传达，这也是导致参拜者日益稀少的主要原因之一。神谕断绝的时间，似乎与附近森林中建造基督教殉道者墓地的时期相重合，由于前往墓地巡礼的信徒多于去神殿参拜的人，因而惹得阿波罗神不高兴，“罢工”不再发神谕。

上一次那些冠冕堂皇坐在议席上、背后却大搞内部交易获取暴利的安条克元老院议员激怒了皇帝，这一次因无法聆听神谕再次让皇帝勃然大怒。尤里安下令迁走基督教殉道者的墓地，大兴土木重新修建阿波罗神殿，并且要求立即行动。

殉道者的遗骨在唱着赞美歌的信徒们的护送下，平安地移到异地。可是，达夫尼的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





尤里安

当阿波罗神殿的修建工程结束，第二天就可以开门接待参拜者，甚至可以迎接皇帝的前夜，发生了火灾，大火吞噬了整个阿波罗神殿。石造建筑通常会被认为耐火性较强，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尽管柱子、墙壁使用的是大理石或其他石材，但梁架等许多地方还是会用到木材。一旦支撑部分被火烧毁，即便是石造的建筑物一样也会坍塌。达夫尼的阿波罗神殿最终变成一堆废墟。

就在同一时期，正在顺利复建中的犹太教圣地的耶路撒冷神殿，也在夜间突然发生了火灾。这里是尤里安以保障所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名义，下令重新修建的。根据当时的记录，达夫尼的阿波罗神殿和耶路撒冷神殿发生火灾的原因，同样是“原因不明”。要说是偶然巧合，未免也太巧了。

尤里安认定，这一连串火灾事故背后的嫌犯就是基督教徒。他大概是想用大城市作示范来杀一儆百，下令关闭了安条克市内的所有基督教堂，皇帝的这一举动彻底惹恼了中下层阶级。

人们把皇帝叫做山羊，嘲笑他体格瘦弱、头脑欠佳。尤里安登基之后，无须再顾忌别人的眼光，恢复了以前当哲学门徒时的习惯，留起了当时可算做哲学家招牌形象的络腮胡子。他的体型普普通通，没有希腊雕塑般刚健有力的骨骼，百姓把他形容成当地随处可见的山羊，也不算太过分。总之，尤里安移居安条克之后，与当地人民的关系日益恶化。

那个时期的尤里安曾经给他的友人写过以下这封信：

> 我想以皇帝的身份去证明，那些加利利人（Galilean，基督教徒）所祈求的事情，在人间也能达成。他们所赞赏的教义属于穷人，而且认为只有在天国才能实现。我下了决心，一定要让我正在推动的公正的统治以及无关宗教的福利事业，在我在位期间得到确切的落实，实现那些德行和幸福。
>
> 所以，任何人胆敢阻碍，我都会迎头反击，任何人胆敢捣乱，我都会将其绳之以法。不仅要没收他们的财产，还必须让他们承受铁与火的刑罚。

那个时期的帝国东部灾祸不断，上文提到的权贵们的投机造成安条克的粮食不足，以及达夫尼阿波罗神殿和耶路撒冷大神殿的火灾，不过是其中的三例而已。尤里安来到安条克之后，中东各地的形势，就像这个地区时常发生的地震，始终处在动荡不安之中。

首先，借着尤里安登基的势头，“异教徒”向基督教势力频频发起反击。也就是说，在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执政的50年中，被打压的反基督教的情绪终于得到爆发。尤里安只有31岁，那些反基督教的人想当然地相信，他会像前两位皇帝一样，统治天下20年以上。

其次，那些原本隶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如今却被剥夺了利益的基督教教会和教徒对皇帝产生敌意。另外，他们对犹太教的仇恨甚于对罗马皇帝的憎恶。

引发中东地区骚乱的第三个原因，来自基督教内部长久以来对教义的争议。自3世纪以来的有关教义的论争，大体分为两派：

主张神、基督、圣灵三位一体的阿塔纳西乌斯教派，到了公元4世纪时，已经称为天主教。尽管当初君士坦丁大帝在召开尼西亚公会议时，已经把“三位一体”定为正统的教义，然而，现实并非那么单纯。

主张基督不同于人也不等同于神的阿里乌斯派，在尼西亚公会议败北之后，一直努力在挽回局势。给临终的君士坦丁大帝施洗的就是阿里乌斯教派的主教，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在位的24年间，也始终偏袒阿里乌斯教派。

接下来就是尤里安继位。他从尊重所有宗教信仰自由开始，继而进一步认同了基督教内部各宗派的信仰自由。君士坦丁大帝视教会为“统治的工具”，因此教会的统一非常关键，而尤里安却毫无此意，对于希望打破基督教优势的他而言，教会内部的分裂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然而，皇帝这种开放的态度，使得在中东地区原本就占了上风的阿里乌斯教派愈发强势。各种类型的仇恨中，近亲之间的仇恨最容易激化。各教派不仅相互谩骂对方是“异教徒”，而且还频频发生暴力攻击对方主教的事件。名为教理的论争，实际上是为争夺主教的地位。

在基督教教会的组织中，主教有自由使用其所属教区的教会财产的权力，并且掌握着教区的司法权。也就是说，主教是统治世间的权力者。正因为如此，天主教派与阿里乌斯教派的争斗，在一方没有彻底败下阵之前，注定是不会停止的。

中东地区的面积不算大，但经济实力相当于半个帝国。统治帝国的尤里安皇帝，在这里亲手点燃了纷乱之火。这种局势下，安条克这个中东的中心城市，成为波斯战争坚强后盾的可能性也就成了泡影。尤里安继位之后，早早迁居安条克，就是期待能在准备充分之后，展开对波斯的战争，而现实让他满怀失望和愤怒。

尤里安在安条克期间留下了许多书信和著作，其中有一篇题为《厌胡者》（Misopogon）的小品文，按照现代的排版方式，大约不到40页。文章特地使用了希腊文，因为它不是单纯的感发胸怀，而是专门写给安条克市民看的。一贯坚持双语制的罗马帝国，西部的通用语为拉丁语，在东部则是希腊语。这篇文章完成之后之所以能立即公之于世，正是因为安条克的市民完全理解其内容。当然，这原本就是尤里安著文的目的。

历代罗马皇帝亲自撰写的著作如下：

尤里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

奥古斯都去世前写下的《神君奥古斯都功业录》。

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

尤里安所著的、包括上述《厌胡者》在内的作品集。

恺撒把自己亲自指挥的战役刻画得栩栩如生；奥古斯都则轻描淡写地叙述了40年统治期间完成的业绩；马可·奥勒留在与北方蛮族作战期间，写下了自己的心情感受，却对战争只字未提。而尤里安的《厌胡者》从头至尾充满了冷嘲热讽。

从以上这几位最高统治者的文风，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各自迥异的性格特质。堪称拉丁散文之巅峰的恺撒的文采，姑且不谈，其他几位皇帝也都有相当不错的文采。即便是犹如目录般的奥古斯都的《功业录》，也充满了不轻忽现世中微小的幸福，脚踏实地、一步步成功达成“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自信。

同样是皇帝的著作，唯独尤里安的《厌胡者》被归类于讽刺文学。对此，我有异议。因为在这篇文章中缺乏了讽刺文学所必需的两大要素：强烈的批评性和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感。

《厌胡者》的确体现了尤里安视觉敏锐、擅长辩论以及对《圣经》的深刻理解力，但它充其量是一篇在长期压抑之下的泄愤之作。皇帝在文中，对着其读者即安条克的市民们，大声呵斥："忘恩负义!"他愤愤不平地表白自己登基后一直致力于公平的统治，不但没有增加税赋，还减至原来的五分之一，可他得到的回报统统是不满和怨言。只会嘲笑皇帝是长着山羊脸的哲学家的安条克，不配接待皇帝。市民的不满，本应该归咎于那些掌控这个城市的富人的无所作为，而大家却为了一吐怨气而迁怒皇帝。尽管怒气冲天，尤里安还是没有忘记强调，他尊重言论的自由，所有对他的非难或嘲笑，都不会受到压制或处罚。

文章里还出现了他怀念副帝时代的段落："亲爱的鲁特西亚，这个属于巴黎士人的土地，高卢人如此称呼它。"这一段挺有趣，现在的法国人喜欢尤里安的原因说不定就源于此。不过话说回来，年轻的尤里安在文章中除了表现出他的愤怒与失望之外，并没有更深层的意义。当然，这也有好处，因为文章没有经过任何修饰，读者反而能够直接地感受到他的情绪。

我个人对这篇文章，除了感觉到尤里安的痛苦之外，没有什么太多的共鸣。其实，最高权力者应该很清楚，他从来都是批判的对象。对于无权者而言，批判是他们能够反击的唯一手段。然而，要让尤里安像伯里克利（Pericles）或者是尤里乌斯·恺撒那样，对这些非议一笑了之，恐怕是做不到的。毕竟与壮年时期的古希腊政治家以及古罗马将军的人生历练相比，尤里安才30岁出头。

当我阅读尤里安留下的书信和著作时，并不会联想到同为异教徒的伯里克利或者恺撒，反而是基督耶稣。当年年轻的耶稣对那些身处耶路撒冷大神殿之中、仍然一心只想着生意的同胞深感愤怒，一气之下将神殿中的摊位砸个精光。被犹太商人激怒的耶稣，与猛烈抨击安条克的市民的尤里安，正好是差不多的年龄。

《厌胡者》的结尾处，留下了一段令人玩味的文字：

> 提笔至此，我想说的话都已说完。这些不过是我本人的期待而已。
>
> 对于我的责难，理应由我承担。因为这些有利于你们的政策，正是由我本人立意推行。即使无法获得感谢，我也无权强制于民。我只能将大家对我的批评和指责归结于我的思考不周，我保证今后会更加谨慎行事。你们对我的“敬意”，诸神将会代我讨回。

尤里安不仅写下了《厌胡者》，而且将之公之于世，因此他离开这座城市出征波斯时，的确如文中所述，带着“不再踏上安条克土地”的决意。他相信，诸神会为他从忘恩负义的安条克人那里讨回公道，在神的庇佑之下，一定能战胜波斯国王，令安条克的人民对他刮目相看。

波斯战争

公元363年3月5日，31岁的尤里安离开安条克，前往美索不达米亚中部，那里是波斯王国的中枢之地。临行当日，安条克元老院的议员们恭送皇帝至城门外，皇帝向这些安条克的权贵发表了感谢之言，但语气相当冷淡。既然他已经公开言明不再踏上安条克的土地，自然是不会有好态度的。而那些权贵尽管表现得恭恭敬敬，却很明显的是在应付场面。麻烦的人物离开了这里，想来他们心中甚感欢喜。

这里提一下，有关尤里安的波斯战争，我们后世之人能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要归功于那位出生于安条克的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留下的详细记录。这个人在罗马军团经历了戎马生涯之后，改行成为历史学家。他和尤里安属于同一个时代，当时32岁。阿米阿努斯的老

长官乌尔希西努斯并没有参加这次波斯战争，这位一人挑起帝国东部军队重任的罗马大将，没有出现在参战的名单上，估计已经自然死亡，因为事前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在波斯战争中，阿米阿努斯所属的部队及其军阶都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他应该位居高位，或者接近于军中高层。

皇帝御驾亲征的仪式看似太平无事地结束了，但安条克的权贵们以及在远处观望的民众，一定会对一件事情感到惊讶不已。沿用了半个世纪、人们早已熟悉了的带有“☧”符号的军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顶端装饰着银制老鹰的军团旗。由X和P组成的“☧”符号代表了基督徒，如果是这面军旗引领队伍，意味着这是一支基督教的军队。自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决定将“☧”符号放到军旗上之后，它一直作为罗马军的领军旗帜。尤里安把军旗改回从前的银鹫旗，是要向世人表明，他率领的是传统的罗马帝国军团，而不是基督教国教化后的罗马军。

据称，尤里安的军队超过了6.5万人。军队中包括了当年以契约规定勤务地仅限阿尔卑斯山脉西侧为由，拒绝了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出征东方之令，继而促成尤里安登基的关键角色高卢士兵。他们应该属于内维塔指挥的右翼部队。这些士兵曾经拒绝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出征东方，结果却跟着反君士坦提乌斯的尤里安，进入了君士坦丁堡，现在又一次在尤里安的率领下，出发去美索不达米亚。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尽管尤里安如今成了帝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在紧要关头能够依靠的，还是他们这些曾经在高卢为驱逐蛮族并肩奋战了5年的战友。

罗马军离开安条克之后，向东行军100公里左右，首先进入了贝罗埃亚城（Beroea）。贝罗埃亚后来改名为阿勒颇（Aleppo），与如今只是土耳其边境的小镇安条克不同，阿勒颇在后世逐渐发展为叙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不过在古代，这里只是连接地中海与幼发拉底河商

路的一个中转站，属于安条克周边的卫星城市之一。据说军队用了两天的时间到达阿勒颇，按此推算，一天的行军距离大约50公里。通常罗马军一天的行军距离在20—30公里，因为每天都有宿营歇脚的时间，两天行走100公里，可以说是急行军了。中东地区铺设的罗马式道路网，越是靠近地中海一带越是密集，道路的宽度及路况也更好。前往波斯的军队正好是逆向而行，逐渐远离地中海。开拔的最初几日实行急行军，想必不是因为形势紧迫，而是要把握机会，在路况较好的地区多走一些。



银鹫旗

在阿勒颇迎接皇帝的是一位年老的豪绅，他是这个城镇实质的统领。此人是基督徒，因此整个阿勒颇属于基督教的城市。有意思的是，这位老人的儿子却十分崇拜尤里安，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造成父子对立的情况，在公元3世纪以后的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社会现象。

离开阿勒颇之后，部队朝着东北方向，前往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亦译海拉波利斯）。这里正好与阿勒颇相反，是著名的异教徒都市。可能是这个缘故，尤里安及其军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在尤里安率领的军队中，估计有一半以上的士兵是基督徒，这也是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特征之一。

罗马军从希拉波利斯渡过幼发拉底河，渡河之后直到底格里斯河一带的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基本上都是异教徒的城市。这些城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及其身后的希腊化时代（Hellenism）。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名本身就是希腊语，意为两河之间的地带。不过，这些希腊裔的城镇中也存在着基督教社区，同样基督教的都市也生活着异教徒。即使君士坦丁大帝推行的基督教优惠政策执行了50年，罗马帝国东部的宗教形态，也没有变成清一色的基督教，仍然保持着不同宗教混杂的现状。

幼发拉底河是罗马人唯一没有建过永久性石桥的一条大河。罗马人可以在多瑙河上建桥，证明这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幼发拉底河长年以来担当着罗马帝国国界之河的角色，而北美索不达米亚被罗马占据之后，为夺回失去的土地，波斯频频发起攻击，这里成了双方争夺之地。所以，尤里安的军队渡河时，将小船并列连接，再在上面铺上木板，搭成舟桥，等全军渡河完成之后即刻拆除。这并非代表罗马军准备决一死战、自断后路，而是因为在上游的萨摩萨塔（Samosata）基地正在建造大型的船队，留下舟桥，以后大船顺流而下时，它反而会成为障碍。

渡过了幼发拉底河的军队，先后经过了巴托纳耶、卡雷（Carrhae）等地，按现代地理位置，相当于由现在的叙利亚北端向土耳其的南端行军。

卡雷，就算是过了400年，罗马人也不会忘记这个地方。公元前53年，克拉苏及其部下就葬身于卡雷的近郊。当时有2万名罗马士兵战死，1万人做了俘虏，他们被押送到遥远的里海东部的山岳地带梅尔夫（Merv），服终身兵役，从此再也没有返回祖国，形同终身流放。另外一件惨痛的事件发生在公元260年，大约在尤里安统治时代的百年之前。时任罗马皇帝的瓦勒良（Valerianus）战败被俘，波斯人将俘虏送往波斯东北部服苦役，负责修建兼有桥梁功能的水坝，也没有罗马人能活着离开波斯。在那个时代，不管对手是东方的大国，还是北方的蛮族，一旦打输了仗，等待军人的就是残酷的命运，就算是一名小卒也能深切地体会到国破家亡的滋味。

卡雷的近郊也是卡拉卡拉皇帝远征东方途中遭到卫兵杀害的地方，这里似乎是罗马皇帝的鬼门关。然而人们总是相信自己能够避开不幸。何况，也不是所有的罗马皇帝都败走美索不达米亚，图拉真、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以及戴克里先皇帝的副帝伽列里乌斯都在这里获得过胜利。因此，尤里安皇帝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也能打赢这场战争。

无论哪一个年代，军人都比较迷信。为了消除士兵的不安，军中常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占卜问卦，通常最后出现的结果都不会是偶然的，因为事前早已有人动了手脚。比方说，用动物内脏占卜时，会特地去挑选健康的动物，这样内脏的色泽看上去会比较鲜艳；用鸡占卜时，事前会让它饿着肚子，那么占卜时，鸡就会不停地啄食。如果是一名头脑清醒的司令官，他一定不会疏忽这些有助于提振军心的把戏。但是尤里安很当真，会跟着忧心忡忡的士兵一起，为出现的结果忐忑不安。或许是因为他信仰神秘哲学，对超自然的现象深信不疑。

话说回来，那时在卡雷的罗马官兵士气高涨，因为皇帝发放了临时奖金。

罗马军在卡雷兵分两路：

尤里安与内维塔率领的第一军，从卡雷南下至幼发拉底河，之后沿着河流向东南前进，最终目标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中部的敌人的首都泰西封。第一军总共1.5万人，在萨摩萨塔建造完成的大型船队顺幼发拉底河南下时的护卫，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这只大型的船队由50艘军用船、64艘搭建舟桥用的小船、1403艘运输船编制而成。运输船装载了多种的军粮和武器，以及攻城用的重兵器。

由3万人组成的第二军从卡雷向东前进，首要目标是边防城市尼西比斯。第二军的主要任务有两项：第一是将波斯的势力赶出北美索不达米亚，保证正向美索不达米亚中部行军的尤里安及其军队不会腹背受敌。第二，等待从北边过来的亚美尼亚王的支援部队，两军会合后渡过底格里斯河，继续南下，在泰西封附近与尤里安的第一军会合，攻打波斯的首都。第二军的指挥官，一位是尤里安的亲戚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另一位是长期驻守埃及、熟知东方情况、经验丰富的武将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罗马军的规模以及战前的准备，都符合攻打大国波斯的作战标准。亚美尼亚国王答应派出2万名步兵和4000人的骑兵团，加上这些人，参加战役的士兵总人数有8.9万。由此可见，尤里安是孤注一掷，赌上自己的未来命运来打这场仗的。其实，战役的成败关键，在于从东南方向沿幼发拉底河而下的第一军，与从北沿着底格里斯河向南的第二军，是否能够成功地会合。在尤里安率领的第一军中，出现了流亡的波斯国王子奥米斯达的身影，当年，先帝君士坦提乌斯造访罗马时他曾同行。

第一军与向东的第二军分道之后，向南行进，当他们到达幼发拉底河河岸边时，自萨摩萨塔顺流而下的大船队，已经布满了河面，整装待发。

有关第一军到达幼发拉底河的具体时间，史料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从前后发生的事情来推测，行军大约用了20多天。陆军以及船队顺河而下，在4月7日进入了与波斯为邻的奇尔切西乌姆（Circesium）。军队从安条克出发，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到达了边境，可谓是开局顺利。

不过，我个人认为，在这段期间尤里安已经犯下了以下几点过失：

一、事前对亚美尼亚国王的怀柔政策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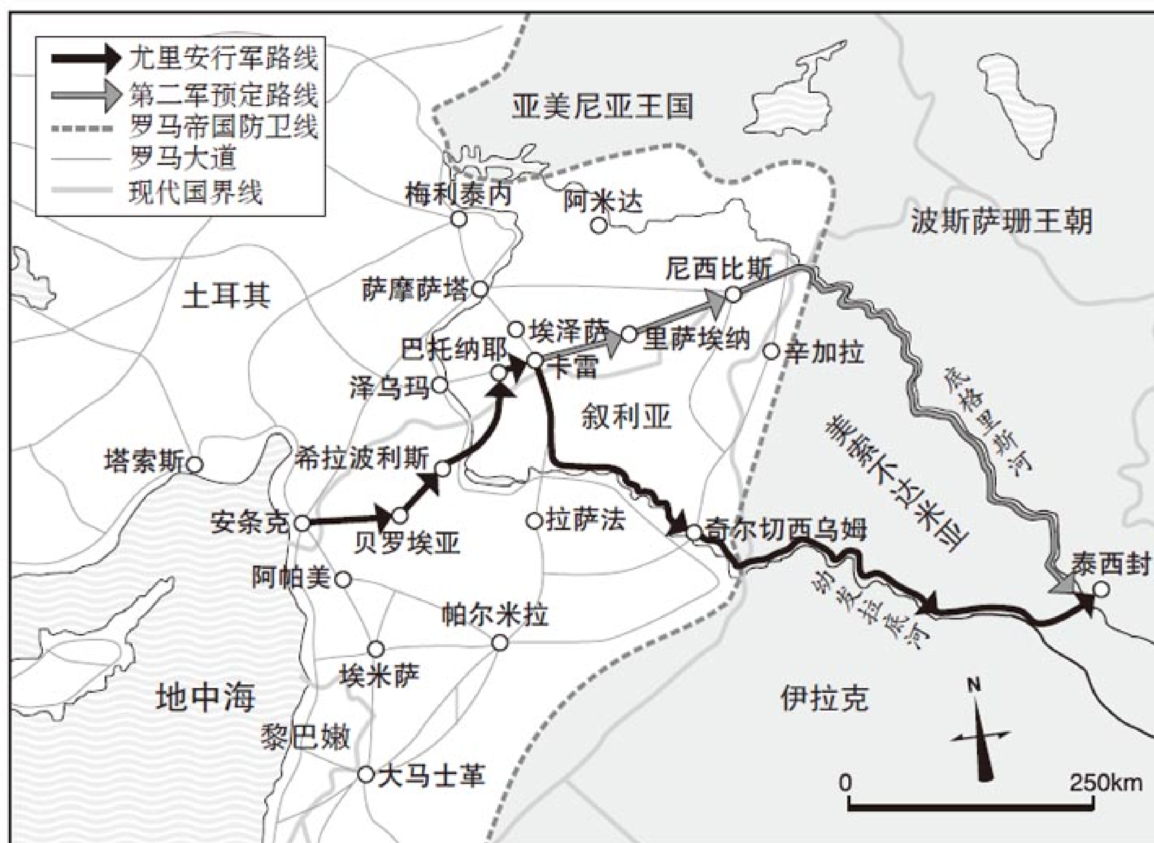
二、兵站即后勤补给完全依赖船队。

三、高估了波斯流亡王子的利用价值。

现在位于土耳其东部的古代亚美尼亚王国，是疆域辽阔的罗马帝国最东面的一个邻国。因此，它在帝国东部的防卫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纵使罗马的敌对国从帕提亚变成了波斯王国，亚美尼亚对于帝国的重要性依然不变。当年尼禄皇帝为了与帕提亚改善关系，曾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认为建立防卫体制是保证和平的先决条件，因此积极地与帕提亚邻国的亚美尼亚建立友好关系。亚美尼亚国王造访罗马时，所受到的礼遇如同大国的国君，又因为年龄相近，尼禄皇帝把他看做知己。

尼禄之后的历任皇帝，延续了对亚美尼亚的特别优待政策。亚美尼亚是一个完全属于东方文明的国家，对于西方国家的罗马而言，必须提供有别于他国的特殊待遇，才能笼络住这个东方之国。正因为历

代罗马皇帝的努力，亚美尼亚王国长久以来一直与罗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尤里安的行军路线以及第二军的预定路线

罗马帝国进入基督教国教化时代之后，基于战略上的需要，对亚美尼亚仍然是另眼相看。君士坦丁大帝甚至打算让侄子，即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儿子汉尼拔利阿努斯成为亚美尼亚的国王。大帝死后，其子君士坦提乌斯屠杀皇族，汉尼拔利阿努斯遭受其害，大帝吞并亚美尼亚王国的计划才未能实现。不过，君士坦提乌斯也深知这个东方小国的重要性，他将原本要嫁给他本人的一位高官的女儿，嫁给了因汉尼拔利阿努斯之死侥幸保住王位的亚美尼亚国王，借此增强两国的关系。

为感谢罗马皇帝，亚美尼亚国王决定改宗信仰基督教，而且还选择了君士坦提乌斯笃信的阿里乌斯派。由于尼西亚大公会将三位一体

派定为正统教派，鉴于皇帝之立场，君士坦提乌斯不能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亚美尼亚的国王对他的善意可见一斑。两国君主的这种亲密关系也因此持续了30年以上。

而尤里安对于亚美尼亚国王而言，首先，他是举兵造反，最终导致君士坦提乌斯死亡的罪人。

其次，他推行的一系列反基督教教会的政策，在基督徒的国王看来，完全是“叛教者”对基督教的迫害行径。和其他基督徒一样，国王也把尤里安视为“基督教之敌”。

第三则是出于一国之主的考虑。亚美尼亚王的确允诺尤里安，他会亲自率领2.4万人的军队参加波斯战争。然而，正如后世的马基雅弗利所言，人与人之间，能否信守约定是道义问题，国与国之间，能否遵守协定则取决于国家利益。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阿米达，在波斯军队猛攻之下沦陷，这使得亚美尼亚国王不得不重新考虑迄今为止的亲罗马的外交政策。因为阿米达紧贴着亚美尼亚，而波斯的沙普尔王誓死夺回亚美尼亚以南的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决心，又是众所周知的。

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亚美尼亚会去投靠信仰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波斯吗？其实琐罗亚斯德教并不排他，不会强迫他人去改变信仰。另一方的罗马皇帝尤里安尽管不反对其他宗教，但明显地对基督教没有好感。亚美尼亚国王和出身于希腊的王妃据说都是虔诚的阿里乌斯派的信徒，想来他们的心中一定不是滋味。尤里安曾在邻近亚美尼亚的安条克待了半年以上，但在对亚美尼亚政策上，似乎并没有特别用心，尽管这比他写《厌胡者》此类的文章远为重要。

我认为尤里安的第二项过失是在军队的后勤问题上。他认为1500艘以上的大船装载物资，足以应付全军的供给。如果不发生意外，这些装备的确是够了。然而，只有一种选择，犹如危险的赌博，凡事本

应多留些余地。罗马人不满足只有一条路的现状，才会建设起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始终保持多种选择，是罗马人的生活哲学。罗马军团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也正是因为既确保了后勤补给路线的充足，又将士兵情绪等不确切的因素也考虑了进去。

图拉真皇帝时代是罗马军团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图拉真皇帝也曾经攻打过美索不达米亚，成功地占领了泰西封。当时，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作战的罗马军团，不仅利用水上的船只运送物资，中东一带的整个罗马道路网都配备了完善的兵站即后勤补给系统，成为军队的强大后盾。连他们的对手都不得不承认："罗马军是靠兵站取胜的。"尤里安难道没有考虑过补给路线水陆并用吗？当时中东地区的罗马式道路网依然存在，如果他真有此打算的话，无疑可以分散补给方面的危险。

尤里安带着流亡的波斯王子奥米斯达随行的目的，是为了在攻下泰西封、赶走沙普尔之后，让奥米斯达坐上皇位。奥米斯达不知何故与沙普尔结下了怨恨，最后只能抛弃祖国远走罗马。他受到了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热情欢迎，之后的20余年一直在罗马皇帝的身边，享受着国宾级的待遇。奥米斯达气质高贵，言语机智风趣，然而他之所以能赢得罗马皇帝的喜爱，并非因为他个人的魅力。对收容国而言，流亡人物在其祖国的地位越高，可利用的政治筹码就越大。只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始终没有机会利用这张政治王牌，让奥米斯达在罗马皇宫中虚度了年华。

终于尤里安皇帝决定利用这张王牌。不过，奥米斯达并非被沙普尔抢了王位才流亡，也就是说，没有特别正当的理由。何况他离开祖国20余年，要扶持这样的人物登基，必须有一个绝对的前提，那就是当朝国王沙普尔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错。只有出现这个结果，波斯的统治阶层才会同意将王位传给他人。然而，沙普尔二世因少年丧父而早早登基，并且成功地持续了50多年的统治。论战场上的才华，他并

没有什么令人刮目相看的战略战术，但却是一位内政的高手，始终能够维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对外方面，自公元279年北美索不达米亚成为罗马领地之后，他一直雄心勃勃地欲夺回失地，陆续攻下阿米达以及辛格拉，正朝着最终目标一步步地前进。难道波斯的民众会赶走这样的君王，而将王位拱手让给一位在敌国生活了多年的流亡贵族吗?

罗马帝国早在元首制时代，就曾经有依靠军事武力攻占他国、让流亡在外的王子登上皇位的经验，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因为维持王位的长期安稳，需要派出相当规模的军队驻守当地。之后，罗马接受了失败的教训，修正了外交政策，尝试着与新继位者建立友好关系。尤里安难道是对这些先例一无所知吗？还是说，他虽然知道，但未觉察到其重要性?

我认为，尤里安在波斯战争前的第三个过失，是没有带弗拉维乌斯·塞孔杜斯这位忠臣同行。

与尤里安共赴波斯战场的高官中，有一位负责帝国东部的长官叫萨鲁斯特·塞孔杜斯（Salutius Secundus）。不过，我这里要说的塞孔杜斯，是尤里安当年在高卢担任副帝时，给予他最多帮助的那位。尤里安登基掌握了人事大权之后，立刻将他无法亲自掌管的西部交给了塞孔杜斯管理。以高卢为中心的帝国西部，在这位贤能、公正的长官的治理之下，经历了一段安全、繁荣的时期。然而，这项人事决定，却让尤里安在拿生涯当赌注、不惜与波斯一战的重要关头，身边少了一位能够全面信赖又富有军事和政治才华、敢于向皇帝直言不讳的忠臣。

参战的另一位塞孔杜斯，与尤里安有些相似，也是一位颇有哲学造诣的“异教徒”。大家一致公认他为人公道，做事深思熟虑，即使是基督教徒，对他的评价也相当不错。不过，像塞孔杜斯这样性格的人，为了表现自己的公正和谨慎的态度，通常都不太会吐露心声、直抒己见。面对皇帝，他同样也是采取了这种看似无懈可击的态度，结

果就是说了等于没说。对于随时都必须作出决定的人而言，这样的部下算不上是得力助手。

对自高卢时期就一同出生入死的内维塔将军，在军事指挥上，尤里安完全可以放心。不过，战场上同样需要对人的心理有高度的洞察力，而出身于法兰克人的内维塔缺乏这种才能。

除了这些人以外，其余人都是先帝君士坦提乌斯时代成长起来的高官或将军，大多是基督徒。对尤里安的反基督教政策，他们当然不能接受。不过，如今尤里安是皇帝，忠于皇帝是他们的职责，而且这些基督徒的高官也愿意履行职责。

尤里安的一些哲学家朋友也跟随他参加了战役。他们唯一的用处就是在饭桌上陪皇帝聊聊天。

可以说，尤里安是在身边没有一个完全可以信任和依靠的部下的状况下，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在整个行军过程中，他不像一个稳如泰山的皇帝，而是骑着马四处奔跑，不断地给士兵打气，似乎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拭去心中的不安。或许他是不想一个人安静地思考，生怕自己会越想越不安，掉进恐惧的迷宫中，找不到出口。

“直言”在词典中的解释是“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然而，直言并非只有以书面或口述，即用语言的方式才能表达。领袖注定是孤独的，但仍然可以拥有一些无须言表就能心领神会的伙伴。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尤里乌斯·恺撒有这样的伙伴，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皇帝也有这样的挚友。如果塞孔杜斯不是身处莱茵河畔，而是在幼发拉底河附近，想必他会对军队进入波斯境内之后一路无阻的异常状况产生怀疑，并直言不讳地告诉尤里安。因为这位忠臣曾经特意从高卢写信给渡过幼发拉底河向东进发的皇帝，希望他暂缓远征波斯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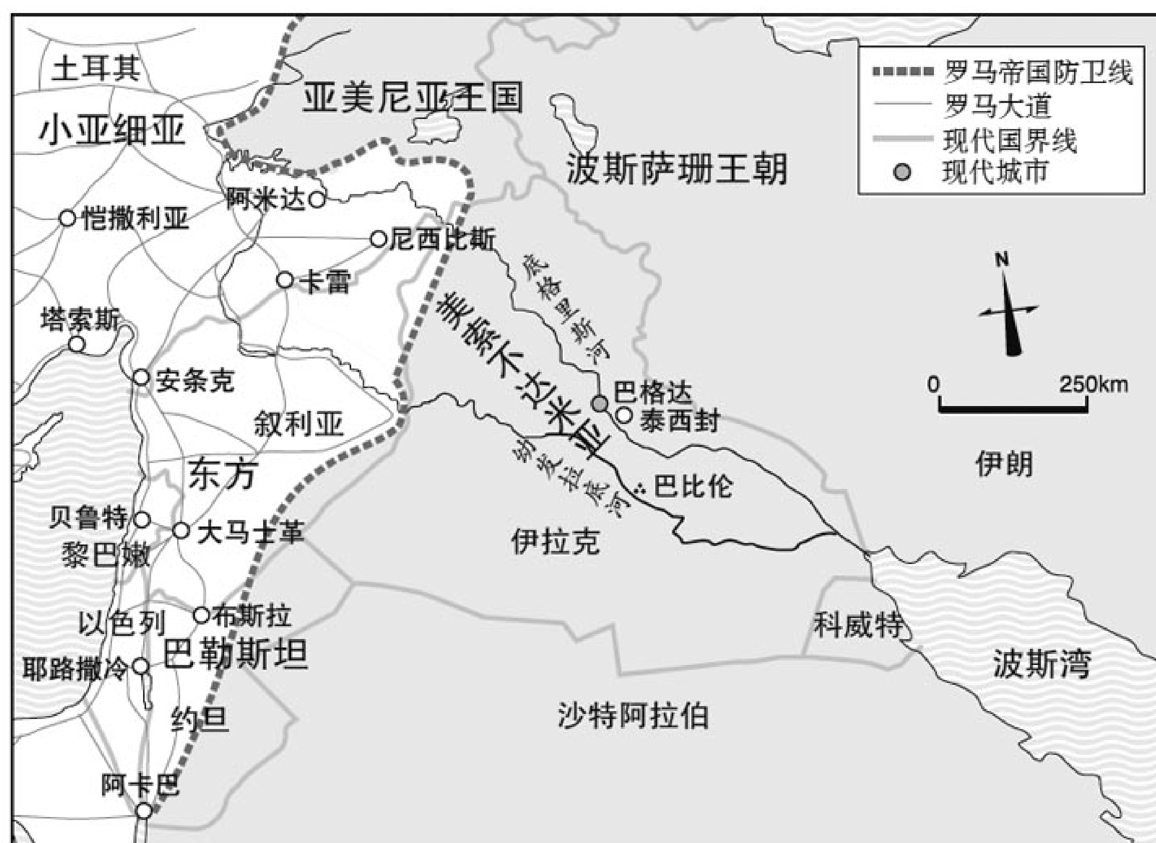
波斯首都泰西封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条大河，虽然在上游一带相隔甚远，但随后逐渐靠近，首都泰西封附近是两河之间距离最短之处。进入下游之后两河再度分流，最终合流注入波斯湾。无论国家、统治者或是宗教如何变化，两条大河相距最近的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一带，作为国家首都的地位从来没有改变。顺便提一下，300年后的公元7世纪兴起的伊斯兰教的都市巴格达，距离原来帕提亚以及波斯的首都泰西封，往北不到40公里。攻打美索不达米亚，就意味着要占领这一带，因为由此向南至波斯湾的下游流域并非重要的战略之地。图拉真皇帝曾经到过下游的河口，不过那只是他在成功占领泰西封后的一时兴起。

罗马无论是在共和时期，还是之后的帝制时代，似乎从来都没有动过真格要彻底征服东方大国。其理由一如前述，无论是之前的帕提亚，还是之后的波斯萨珊王朝，其领土面积相当于现代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四个国家的总和。如果要彻底征服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并将之纳为行省，罗马就必须征服包括印度在内的整个地区。能够成就如此宏伟大业的，除了亚历山大大帝，别无他人。因此罗马统治者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政策，时不时地出兵东方打击一下，以挫败对方企图蚕食西方的野心。然而，古代男人们痴迷亚历山大大帝的神话，尤里安也是其中之一，在他的著作中，无数次提及亚历山大大帝。

尤里安指挥的波斯战争，进入5月之后，仍然可以用所向披靡来形容。虽然有一些躲在沙丘之中的盗匪会搞一些突然袭击，但遇害的仅是一些因疏忽大意而走散的小分队，整体而言，罗马军没有什么损失。军队沿着幼发拉底河顺流而下时，尽管沿途的城镇大多建有防护城墙，但这些地方，要么立刻就缴械投降，要么是作一些轻度的抵抗，波斯国王似乎完全没有派兵来保卫的意图。

行军途中所经过的各个城镇以及要塞，尤里安一开始并没有使用武力攻击。他会先让波斯的流亡王子奥米斯达和平喊话，希望当地人能够自己打开城门。可是，不管是一见到罗马军就举手投降的城镇民众，还是抵抗之后遭降服的要塞士兵，见到这位与国王有血亲关系的王子，都破口大骂："叛徒！""卖国贼！"坚决将他拒之于门外。



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地区

如上所述，波斯的首都泰西封是两大河相距最近的地带，毗邻底格里斯河的东岸。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早在久远的年代，就开凿出无数的运河以及沟渠。罗马军要攻打波斯首都，就得设法让装载着攻城器械、沿着幼发拉底河顺流而下的船队，尽量地靠近底格里斯河附近的首都一带。可是大型的船只根本无法通过那些运河和河渠。正当尤里安一筹莫展之际，军团的技师前来报告，说发现了当年图拉真皇帝远征时挖掘的运

河的遗迹，只要稍作整修，船队就能通行。250年前的旧址依然在，再次证明了古罗马人基础建设的完善和彻底。图拉真皇帝时代，又是罗马基础建设的黄金时期。事隔250年的运河，只要稍作整修就能重新使用，由此可见，当年罗马军撤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帕提亚以及波斯人都利用过这条运河。总而言之，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罗马军团士兵放下武器，转行为工兵，全力整修河道。终于，尤里安的大型船队可以通过图拉真运河，将大型武器运送到了波斯首都附近的岸边。

5月27日，在首都泰西封城门前，罗马军与波斯军正式展开了首次会战。攻城的罗马军总指挥是31岁的尤里安，而站在波斯军后方观望的是年龄长他一倍的沙普尔二世。1.5万人的罗马军团将对决波斯10万大军。沙普尔似乎从一开始就计划好，要将尤里安引到首都附近，在波斯军最熟悉的地方，与罗马军一决胜负。之前完全不见踪影的波斯军人，此刻正守在首都的城墙后等待着罗马军的到来。

会战自始至终都打得异常激烈，但罗马军从头至尾占据了上风。尽管波斯军在人数上拥有绝对优势，但每一位士兵的战斗力以及整个军队的组织能力劣于罗马军团。这样的军队往往会因某一处的失利而造成全线崩溃。事实上，罗马军的确有过绝好的机会。眼看着敌人一步步往城门撤退，此刻原本该乘胜追击直捣城内。然而有一位将领担心入城后会遭到敌军的围剿，发出了停止追击的命令，这等于是应该踩油门，却踩了刹车。如果尤里安是亚历山大大帝或者尤里乌斯·恺撒一般的天才武将，他会很快地察觉到部下的失误，快马扬鞭亲自赶到第一线，激励军心，命令全军强行冲进城内。

战场上瞬息万变，胜负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当机立断。哪怕是5分钟的犹豫，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结局。这天的战斗，最终以罗马军目送着波斯军撤入城内的形式而告终。尤里安白白地浪费了一个大好机会。

这一天双方阵亡的士兵人数，分别是罗马军75人，波斯军2.5万人。

看到这个数字，让人不得不相信，沙普尔在当天深夜派了密使向罗马求和的传说。同样，对于尤里安拒绝接见、赶走密使的说法也能够理解。然而，尤里安这天的大胜，却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

罗马军在首场会战中失去了绝好的机会，接下来只有展开攻城战了。不过，要攻下有数道坚固城墙的大城市，必须作好打长期战的准备。罗马当年攻打迦太基时，在后无敌情的形势之下，也用了3年的时间。如果面临敌军从背后袭击的危险，除非有着充足的兵力，可以同时应付两面夹攻，否则，再会打仗的军队，也很难成功地攻下城池。汉尼拔当年打到罗马城下却放弃了攻城，就是因为担心罗马会从意大利各地的殖民城市调来援兵，而他手中的兵力不足以对付城外和城内两边的敌人。

因此，亚历山大大帝以及恺撒都会极力避免攻城战，而是将敌人引出城外进行会战。这两位名将所指挥过的战役，几乎都是在敌区展开，而且兵力远远劣于对方。尤里安目前面临同样的局面，他没有在敌人阵脚大乱时，乘势攻进泰西封城内，实在是太可惜了。

阿米阿努斯记述了当日的战况，指出了这个失误。然而一介武官的阿米阿努斯能够发现的事实，在罗马军的作战会议上，竟然没有一位高官或将军看到此事的严重性。话说回来，即使清楚也是木已成舟。以尤里安为中心的作战会议，也只能围绕着接下来该怎么办的话题展开了。

普罗科皮乌斯指挥的第二军，原本应该与亚美尼亚军会合之后一起南下，却至今不见踪影。不可思议的是，如此重大的事情，直到如今才第一次成为军中讨论的议题。

兵分两路的军队，相互之间应该时刻掌握着对方的行踪。否则，就会失去分头行动的意义，只留下兵力分散的不利。很明显，那位除了是皇帝远亲一无所长的普罗科皮乌斯怠忽职守，没有及时地报告军情。不过，尤里安之前似乎也没有积极地去追踪第二军的行迹。两军自卡雷分开之后，已经超过了50天。难道在这50天里，尤里安从来没有对两军在泰西封附近会合的约定产生过任何的怀疑?

作战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仅靠第一军的1.5万人不可能攻下泰西封。其实，攻城不行，但对周边的城镇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将敌军逼出城外，展开罗马军擅长的会战，与此同时寻找第二军，尽量拖延时间的战略还是可行的。奇怪的是，会议上没有任何人提出类似的建议。或许是皇帝在场，官员们俯首听命，不敢多言。总而言之，会议达成了以下的结论:

仅凭第一军1.5万人的军力无法攻城。

与第二军的3万人会合是攻打泰西封的先决条件。

问题是第二军行踪不明。

就算派遣侦察小队去寻找第二军，也不知道他们究竟何时能够到达美索不达米亚中部。

会议最终决定，以两军会师为先决条件，第一军暂时先撤离泰西封，全军1.5万人北上寻找第二军。

这个决定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总数超过1000艘的大小船只？由于图拉真运河的重新启用，船队已经集结于底格里斯河上。虽说底格里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都是大河，但船下行容易，可逆流而上，除非是特别走运能够一路顺风，否则需要依靠众多的人手相助。当初建船的目的并非为航海之用，配备的船桨数量只够用于靠岸，船

桨的功效相当于现代船只的马达，因此，逆水而行就必须在河的两岸用水牛以及人力来牵引。如果让大批的士兵去拉船，那么行军中的队伍肯定会遭遇敌人的袭击。

最后商议的结果，是留下30艘当舟桥用的小船，其余的全部烧毁。船上所装载的物资也几乎全数焚烧。武器、攻城器械以及粮食的数量过于庞大，靠人工携带以及牛车运送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将各种物资尽可能地分发给士兵之后，烧船行动开始。1000多艘船冒出的熊熊火焰，遮掩了夏日炽烈的阳光，笼罩着整个底格里斯河的河面。

面对如此景象，士兵目瞪口呆。那些基督徒出身的士兵喃喃地发出怨语，说尤里安疯了，这是上帝给他的惩罚。如果不想让武器和粮草落到敌人的手里，除此之外别无对策。那些非基督徒的士兵，虽然理智上能够理解，但感情上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对于在敌境作战的士兵而言，他们所需的物资都在这些船上。底格里斯河上漂满的船只，是他们心灵的保障，是与祖国相连的命脉。如今，这一切都在眼前化为灰烬。烧毁船队给士兵的心理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如果尤里安能够像图拉真皇帝那样，水陆两路都配置了后勤补给的话，那么水上兵站被毁，最多让士兵感觉物资供给可能会吃紧，但不会影响到精神层面。保持多种选择，即有效地分散风险的意义正在于此。

北上底格里斯河

相较于不知手下队伍行踪的尤里安，波斯国王沙普尔掌握情报的能力似乎略胜一筹。他不仅对罗马军销毁船队、沿着底格里斯河东岸

北上的动态了如指掌，而且不错过任何机会及时发起攻击。罗马军不得不边走边打，所幸每一次都能够成功脱身。

不过，沙普尔并不在乎他手下人的性命。对他而言，如果牺牲1000名波斯军人能换来100名罗马兵的死，就是莫大的战绩。因此，罗马军的成功突围实属“皮洛士的胜利”。行军过程中，死伤人数不断增加，整个军团充斥着厌战的情绪。

随着罗马军逐渐向北撤退，波斯军轮番进攻的次数越来越密集。甚至在搭帐篷准备宿营时，听到敌军来袭，罗马军人也不得不扔下手中的锯子，拿起长剑迎敌，连睡一个安稳觉的时间都没有。

话说回来，沙普尔除了懂得收集情报的重要之外，作为武将他并没有太多的才华。如果他能持续地发动轮番攻击，让对手不得安宁，阻止他们渡过底格里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那么陷入绝境的罗马军，迟早会坐以待毙。沙普尔下令对底格里斯河左岸一带实施焦土化战术，这里是罗马军北上的必经之地。目的自然是断敌粮草。时逢夏季，又是中东地区，而罗马军的主力部队大多是来自北欧的士兵。

按理说，沙普尔占尽了天时地利。但是，他更希望立即看到辉煌的战果，而不是循序渐进地获取最终的胜利。不久前，他在泰西封城门前输给了罗马军，在人民面前失了颜面，他要一雪前耻，决心与罗马军打一场正规的会战。与前一次相同，波斯国王亲自率军，众多的王室成员参战，还特地从印度调来了战象。

尤里安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罗马军从皇帝到士兵，上下一心，既然已无路可退，不如拼死一搏。



描绘沙普尔二世的银盘

两军对决发生在6月16日。战斗形式一旦变成了会战，就是罗马军的天下。连续激战的结果，波斯军陈尸累累，最终不得不撤兵离去。据说在大量阵亡的波斯军人中，包括了代替国王担任前线指挥的司令官，以及沙普尔众多子嗣中的两个儿子。横死沙场的除了士兵，还有战象，它们巨大的身躯像小山一般矗立在战场上。

两次的败北，给沙普尔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又重新打回游击战，继续搞轮番袭击。这对罗马军而言，简直是一场没完没了的苦行。原本以为只要渡过幼发拉底河，就能回到罗马领地，如今别说是幼发拉底河，连眼前的底格里斯河都过不去。

官兵们对皇帝的看法开始有了变化，特别是那些基督徒的态度尤为明显。如果设想一下他们信仰的教义，便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在基督教的教诲中，皇帝的威信和权力是上帝所赐予。而上帝已经用烧毁

船队、阵前撤兵、烈日之下不断遭受敌军侵袭等方式，惩罚了皇帝，因此臣子们没有义务再服从皇帝。士兵的情绪变化，对尤里安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带着3万多人马集体撤退，困难度远远高于正常的行军。

英年早逝

公元363年6月26日，这一天，盛夏灼热的阳光依然无情地照在遥望着底格里斯河西岸继续北上的罗马官兵的身上。这一天，波斯军照例在战象的引领下，向罗马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还在主帅帐篷中的尤里安接到的第一个情报，是后卫遭到了敌军的突然袭击。皇帝连甲胄都没有穿，拿起骑兵用的圆盾和长剑，跳上战马，直奔队尾而去。跟随他的只有平日负责保护的近卫队。

根据阿米阿努斯的记载，皇帝没有穿甲胄是因为事情发生得紧急。不过，这让人有些难以释怀。毕竟，尤里安不是一介士卒，他既是最高司令官，又是皇帝。在戈尔·维达尔的小说里，将其原因归咎于信仰基督的侍从，是他故意破坏了皇帝甲胄上的扣环，又存心拖延着不去修理，无奈之下皇帝才铤而走险。尤里安不可思议的举动，让人不由得感觉小说家的这个假想似乎能够成立。

在罗马军团中，别说是皇帝，就连大队长级别的将官，身边都配有侍从或奴隶，负责照料日常起居。为主人准备武器以及平时的保养，是他们不能懈怠的工作。出战前，只要主人站直身体，侍从们立即就会替他戴上甲胄和护脚套。所以，尤里安在没有护甲的状况下出战，一定另有隐情。

罗马军人的甲胄，是穿在短袍外面的，不佩戴甲胄出战就等于是穿着一件汗衫打仗，这有违军人上战场的仪容规范。如果尤里安只穿

着短袍就跳上马背，那说明他身边所有的侍从都消极怠工，联手反抗皇帝。不管怎么说，事情的真相已成了千古之谜，我们无从知晓。

话说回来，被敌人的突然袭击打乱了阵脚的后卫部队，在尤里安的激励之下重新恢复了战斗力，成功地击退了来敌。就在此刻，传来了第二封报告，前卫部队又遭遇敌人袭击。

尤里安立即掉转马头，带着近卫队，直奔队伍的前方。与后卫部队一样，前卫也打得异常激烈，眼看着就要决出胜负了。

这时，不知从哪儿飞来一根标枪，深深地刺中了骑在马上的尤里安的腹部。他想用右手拔出标枪，手掌却被锋利的矛头割伤。可能是伤到了重要的部位，血不停地往外流。身上两处伤口造成了大量失血，失去知觉的尤里安从马背上摔下倒在了地上。顷刻间，白色的短袍被鲜血染得通红。

侍卫们抬起躺在血泊中的皇帝，回到帐篷，让他平躺在折叠式的行军床上。闻讯赶来的御医奥里巴西尔斯（Oribasius）查看皇帝伤势，这才发现已伤及内脏。在尤里安还是一介哲学门徒时，奥里巴西尔斯就与他相识相交，之后在高卢的5年始终陪伴左右，两人是亲密无间的朋友。面对伤势严重的皇帝，这位医术高明的希腊医生也无计可施，只能采取一些紧急止血的措施，用绷带包扎住伤口。

外面的喧嚣声传到了躺在床上的尤里安以及帐篷内其他人的耳中。大汗淋漓的传令兵进来报告，说战况有了转机，波斯军遭到重创，2名司令官以及50位以上的贵族阵亡。听到捷报，尤里安想起身下床，刚包扎好的伤口再度被撕开，又开始流血不止。

尤里安在半昏迷之中，得到了罗马军取得最终胜利的消息。尤其是听到战斗结束后赶来的将军报告说，这次的战果远远超过了之前，忍受着流血和高烧双重痛苦的皇帝，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皇帝的笑容并没有维持多久。当他发现站在他病榻前的高官和将军中少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便问安纳托里乌斯（Anatolius）人在哪里，萨鲁斯特回答，他阵亡了。听闻此言，尤里安的脸上流下了一行眼泪。安纳托里乌斯的地位类似于现代的内阁长官，在尤里安因下令烧毁船队而陷入孤立之后，他是为数不多的仍然对皇帝忠心耿耿的高官之一。

夜幕降临，万籁俱寂，经过了一日激战的罗马军，决定就地宿营。几乎全体高官都来到皇帝的面前。尤里安睡在床上，向臣子们交代后事：

> 告别人生的时刻好像到了。我一直希望能回报养育我的大自然，现在我做到了，备感欣慰。哲学说，生为苦，死为解脱，因此是快乐。哲学还告诉我，死是神明赐给在现世建下功德之人的最后的奖励。
>
> 对于迄今为止的所为，我没有任何后悔。我从未有过谋杀及其他卑劣之举，这让我感到欣慰。
>
> 无论是与世隔绝的时期，还是日后集大权于一身，我始终忠实于自己，没有背叛自己的信念。我尽力顺应神明之期待而活，施善政兴利安民。遇战争，事前必深思熟虑，不得已才为之。尽管如此，结果未必尽如人意。像人间诸事，结果良善是神明之援助，欠佳则归咎于人之过失。
>
> 我坚信帝国存在之意义，在于保证人民的安全与繁荣，并为之付出努力。我可以问心无愧地断言，为政后我所推行的一切政策，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说到这里，尤里安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说道：

不能再多说了，我精力不济，感到死亡即将降临。唯有一事须作最后的交代。关于继任皇帝的人选，我不作提名。我的抉择可能考虑不够周延，或不够明智。若无法获得军队的支持，我的推荐会危及他的性命。人选委由诸位决定。我仅祝福罗马帝国的百姓，能在贤明的君主的统治下，过上安全幸福的生活。

尤里安留下皇帝的遗言之后，将哲学家利巴尼乌斯和普里斯库斯（Priscus）叫到床前，倾听着两位友人讲论生死之议题。午夜时分，他感到口渴，要饮冷水。侍从端着淡紫色的玻璃器皿到他面前，尤里安喝下一口水之后，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31岁零7个月，在位1年零9个月。

他去世的这一天，波斯战争开战3个月零20天，是罗马军烧毁船队向北撤退的第25天。

尤里安行军路线

尤里安之后

尤里安过世之后，将领们立刻举行了会议，商议继位人选。会议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前朝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时代的人马，另一派则是尤里安登基后提拔的官员。前者大多是基督徒，后者则多为异教徒。

两派势力相当，难分高下，最终焦点落到了两派都能接受，虽是异教徒但也不遭基督徒疏离的萨鲁斯特身上。他正好在这一年，与尤里安共同担任着执政官。尤里安去世之后，由另一名执政官递补空缺，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这位稳重又极富良知的高官，以年迈为由婉言拒绝了继位。

一旦陷入僵局，浮出水面的往往是最为平庸但最不具破坏性的一类人物。结果，虽有强健体格却毫无建树、在军中默默无闻的约维安（Jovian），成了尤里安的后任。第二天，6月27日，新任的罗马皇帝约维安出现在全体官兵的面前。可能是将领们事先作了指示，士兵步调一致地用长剑敲打盾牌，向新帝宣誓效忠。这里提一句，约维安是基督徒。

约维安登基之后，军中传得沸沸扬扬的流言，像被大水彻底浇灭了的火焰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传说中，插进尤里安腹部的那根标枪，不是来自波斯兵，而是皇帝近卫队中的一个队员，从近距离射出的。说此话的士兵表示，那根标枪不是波斯军的武器，他从地上捡起时，发现上面刻着罗马骑兵团的标志。约维安之前的职务，正是近卫队队长，他登基之后，这个传言自然就消失殆尽。

不知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第二军的3万人南下赶来会师。对于他们的延误，尤里安任命的两位长官普罗科皮乌斯和塞巴斯蒂安给出的解释是，为说服亚美尼亚国王参战消耗了大量的时间。三个月中音讯全无，理当死罪，何况亚美尼亚国王最终还是拒绝参战，选择了中

立，白白地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不过，事到如今，已无人再去追究两位将官的责任。无能的普罗科皮乌斯接受了新的任务，负责护送尤里安的遗体回罗马领地，而身为基督徒的塞巴斯蒂安，因战场经验丰富，则继续留在军中。

尤里安不是基督徒。他的遗体不需要土葬，更不用在入土前作任何保全的措施。想来应该是按照罗马传统的习俗，举行了火葬，所以，普罗科皮乌斯护送的是先帝的骨灰盒。尤里安墓地的选择，让众人颇费了一番苦心。作为基督教首都而建立的君士坦丁堡，没有他的容身之处，可异教徒色彩浓厚的罗马又过于遥远，而距离较近的安条克，他生前曾发誓从此不来，自然也不合适。

最后，位于小亚细亚东南的塔尔索斯（Tarsus）成了尤里安长眠之地。这个城镇的人民对尤里安一直心怀善意。不过，在波斯军连日袭击的状况下，即使有护卫队保驾，还是无法让先帝的骨灰先行一步，早于大部队回到罗马的领地。结果，已经化为灰烬的尤里安，与军队同行，和他们一起回到了罗马的土地。尤里安在塔尔索斯下葬后没多久，他的坟墓就不知去向。塔尔索斯是基督教圣人保罗的诞生地，在基督教教会中，他与另一位圣人彼得拥有同样崇高的地位。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国教化路线日益推进的形势下，塔尔索斯终究不能成为“叛教者”尤里安的长眠之地。

我很纳闷，竟然会没有人提议将尤里安安葬于希腊。他是那么热爱希腊，生前总是称自己是一个哲学门徒。不过，公元4世纪的当时，宗教势力不断强大，而哲学却日渐式微，那些高官大概对他的话从来没有认真过吧。

缔结和约

两军会合后，罗马军团的总人数达到了6万以上。可是，在新帝约维安接任最高司令官以后，依然手足无措，钉死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动弹不得。

仅第一军1.5万人的撤退，已饱受粮草不足的苦境，6万人集体撤退，的确会带来诸多问题。不过，6万人的军队，大可分成几个纵队，声东击西，迫使波斯军分散兵力，再进行各个击破。迄今为止，罗马军尽管频频遭受波斯军的袭击，但每一次都能成功退敌。由此可见，他们的战斗力绝对超过了对手。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能够承受多少牺牲。一旦下了决心，就必须以有限的兵力来获取最大的胜利。而如何充分地利用兵力，或者说能否采用出其不意的战术，需要意志坚强、足智多谋和当机立断。难道是因为尤里安死后，整个罗马军团彻底丧失了应敌的能力？还是因为迫不及待地想要脱身回国，没有余力考虑其他对策?

事情的真相似乎属于后者。尤里安死后的第5天，即约维安继位的第4天，在新帝以及全体将官出席的作战会议上，大家一致决定派遣使者，向波斯国王沙普尔求和。

萨鲁斯特被任命为皇帝特使。当初推辞了皇位的他，这一次没有拒绝。受命后的第二天，即7月1日，萨鲁斯特立刻与沙普尔派来的使节展开了交涉。

事实上，这根本称不上是谈判，因为罗马一方全盘地接受了波斯国王提出的条件。

不过，沙普尔似乎是一位公平游戏的爱好者。他除了要求罗马归还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以及底格里斯河东岸的5个行省之外，没有提出更多的条件。66年前，即公元297年，当时罗马帝国的副帝伽列里乌斯赢得战争后，强迫波斯国王割让了这些土地。对罗马而言，这个地区属于军事防卫的重地，对波斯亦是如此，更何况这里原本就属于他们。

其实，这次战争是在波斯境内进行的，沙普尔完全可以以战争损失为由，向罗马索取赔款。此外，被俘的罗马兵一直对波斯国内的基础建设贡献甚大，他也可以要求罗马提供相关人员。然而，这位波斯国王除了提出归还失地之外，并无他求。也就是说，归还66年前抢去的土地，罗马军即可平安无事地回国。对于这次和谈的结果，波斯方面大肆宣扬，称之为"沙普尔的宽容"。讲到宽容，立刻令人联想到"恺撒的宽容"。宽容曾是罗马人的专利品，而如今他们却要被波斯人宽容。

罗马军中仍然还是有不少人认为与波斯的和谈是奇耻大辱，其中包括记录下整个战役经过的阿米阿努斯。然而，以约维安皇帝为首的罗马高层一致决定接受波斯提出的条件，缔结和约。结果，波斯方面派出特使来到罗马的阵营，迅速地举行了签字仪式。新帝随后派出急使，前往第二天就要变成波斯领土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各个城市，以及底格里斯河以东的5个行省，向那里的驻军及其相关人员传达撤军的命令。而当地的居民则可以自由地选择，或迁往罗马领地，或原地不动接受波斯的统治。曾经多次成功地抵御住波斯军猛烈攻击的尼西比斯的居民，主张抗争到底，但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

缔结和约之后，罗马军终于能够渡过底格里斯河，抵达西岸。6万人马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后，究竟是在何时渡过幼发拉底河回到罗马领地，具体情况不详。撤退中的罗马军虽然不再遭遇波斯军队的袭击，但仍然会时不时地受到阿拉伯强盗团伙的骚扰。这些强盗既不隶属于波斯国王，也不接近罗马一方，夹在两大势力之间自谋生路。罗马军这一路走得并不顺利，似乎在初秋时节才到达安条克。安条克人不喜欢尤里安，就连非基督徒的居民也把他的死讯看做好事，因此对于新皇帝的到来，全城上下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约维安皇帝在安条克一直住到年底，看来这地方让他感觉不错。他滞留期间，前来陈情的人络绎不绝，为数最多的就是基督教教会的

神职人员。尤里安当政期间，自动隐身修道院的阿塔纳西乌斯，特地从埃及的沙漠地区长途跋涉来到叙利亚的安条克觐见新帝。他对约维安皇帝说了这样一句预言：“您对正统的宗教信仰虔诚，上天必定会赐予您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

尤里安的前任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倾向于阿里乌斯派，而他的后任皇帝约维安正好相反，属于阿塔纳西乌斯教派，即信仰三位一体说的天主教。因此，阿塔纳西乌斯所谓“正统的宗教”指的就是主张三位一体说的教派，不过，这位“正统宗教”的代表者的预言，完全落了空。

约维安在安条克期间，积极地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所有内容都是用于废除先帝尤里安所推行的政策。在尤里安颁布的各项法令中，也有一部分被保留下来，后来收录进了《狄奥多西法典》，因为这些法令对基督教国教化不断深入的罗马帝国，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然而，能延续的都属于行政法，而其他那些以抑制基督教势力为目的的法律，都遭到了废除。

废除的法令中还包括了减税法。事实上，尤里安通过大幅度的减税从而搞活经济的政策，已经在高卢地区成功地得到了证明，但这项政策似乎仍然被视做不利于基督教国教化的路线，遭到了废止。

经过了一连串的修法之后，一切又回到了尤里安执政之前的状态。这位年轻皇帝生前所作的所有努力，都付之于流水。

约维安完成了上述的各项改革之后，于公元363年的年末离开安条克，前往君士坦丁堡。途中在小亚细亚的南岸，迎来了公元364年的元旦。随后，他按照尤里安之前的皇帝们的豪华排场，率领着大批人马，一路畅游。2月17日的早晨，在他留宿的某地方豪绅的公馆的一角，发现了他的尸体。官方公布的皇帝死因是由于前一天晚上的暴饮暴食。

虽然在朝只有短短的7个月，但约维安完成了所有他应该做的事情。

首先是与波斯国王沙普尔缔结和约，给罗马帝国东部的安全保障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这无疑是要在罗马史上留下一笔的。

其次，废除了尤里安颁布的几乎所有的政策和法规。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约维安之死。这位前近卫队队长已经完成了他被赋予的任务，失去了利用价值，不能以皇帝的身份进入首都。

跟随约维安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高官们随即举行会议，决定继位的人选。这一次很快就得出了结论。由于约维安的亲基督教政策，异教徒一派元气大伤，势力不比上一次决定新帝的会议。

新选出来的皇帝叫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us），是一位武将，曾在多瑙河防线作战，建立了骁勇剽悍的名声。他出身于北方蛮族，也就是说日耳曼人成了罗马帝国的皇帝。正如当时的记录所述，迄今为止的罗马皇帝中，虽然有人混杂着蛮族的血统，但像瓦伦提尼安这样纯种的异族人皇帝，还是史上第一位。

当年马格嫩提乌斯举兵造反，野心勃勃地欲称帝登基时，他的蛮族血统给他带来了诸多不利。不过才过去14年，与马格嫩提乌斯同样来自日耳曼的瓦伦提尼安，毫无障碍地当选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因为高官们一致认为，新任的皇帝只要信仰基督，哪怕来自蛮族也不是问题。

日耳曼出身的新帝瓦伦提尼安，在尤里安当政时期没有受到冷遇，但也没得到特别的重用。所以他才被反尤里安一派看中，视做自己人。

自此，这位在当时被称为“近乎纯蛮族”的瓦伦提尼安皇帝长达11年的统治时代正式开始。而所有的人似乎都希望尤里安治世的那19个月是一场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梦幻。

尤里安皇帝的生与死

在还没有认真研究尤里安之前，我以为这位年轻的皇帝是一个“不合潮流的人”（Anachronism）的代表。他的所作所为似乎都那么不合时宜，一心逆时代潮流而行，思想简单。

现在，我不再持有这样的观点。我甚至会想，如果尤里安在位不是19个月，而是19年的话，之后的罗马帝国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国家。

在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并不像后世所认定的那样，充满了基督教的色彩。即使在基督教势力强大的帝国东半部，异教的势力仍然不可小觑。有关这一点，从尤里安登基之后，各地频频发生的异教徒攻击基督教区的事件中，已经得到证明。何况，当时基督教教会的内部矛盾也十分激烈，阿里乌斯派与阿塔纳西乌斯派之间的恶斗，让人不得不承认近亲相恶这个事实。甚至在同一教派内，也因为对教义的解释不同等一些小问题，不断地发生同仁之间的抗争。令人玩味的是，这种现象在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之后，反而愈发严重。总而言之，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宗教情势，基督教或者异教都有着独占鳌头的可能性。当时的基督教著作中，也经常提到这个情况。这些著作中充满了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些危机既来自异教，同时也来自教会内部的“异端”。

尤里安就是向这样一个乱世投下了一颗探路石。如果他的统治时期不是19个月而是19年，那时他也不过才50岁，因此我的这个假设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假若他能做19年的皇帝，他应该会不断地丢出各种

的探路石，历史的走向或许会因此而改变。罗马人或许不再认为做基督徒可以从中得益，而宗教也可能脱离现世的利益，重新回到拯救人类灵魂的至高无上的存在。

尤里安强烈反对宗教支配现实世界，他可能是唯一一位发现一神教弊病的古人。



尤里安

古代的有识之士之所以没能看出一神教的问题，是因为古代信仰多神教，大家即使彼此信仰不同，也可以相互包容。没有经历过唯我独尊的宗教世界，当然也无法知道它的症结所在。在信仰多神教的古代社会中，唯有犹太教属于一神教。不过犹太教徒相信自己是神的选民，不会强行要求他人入教。那个时候，只有基督教才热衷于向观念不同的人传教布道。

而这些连罗马元首制时代的精英都没有看清的问题，却被尤里安发现了。这是因为他是致力于振兴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亲戚，又在大帝之子君士坦提乌斯的执政时期成长，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这位堂兄的所作所为。正因为是近亲，所以才能看到旁人看不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尤里安所背负的，如今已成为通称的“叛教者”之蔑称，其实背后含藏了许多的意义。对于这位只活了31年的反叛者而言，或许这是一个最光彩的称呼。



第三章
安布罗西乌斯主教

（公元374—397年在任）

10年过去了。

这是从公元364年到374年的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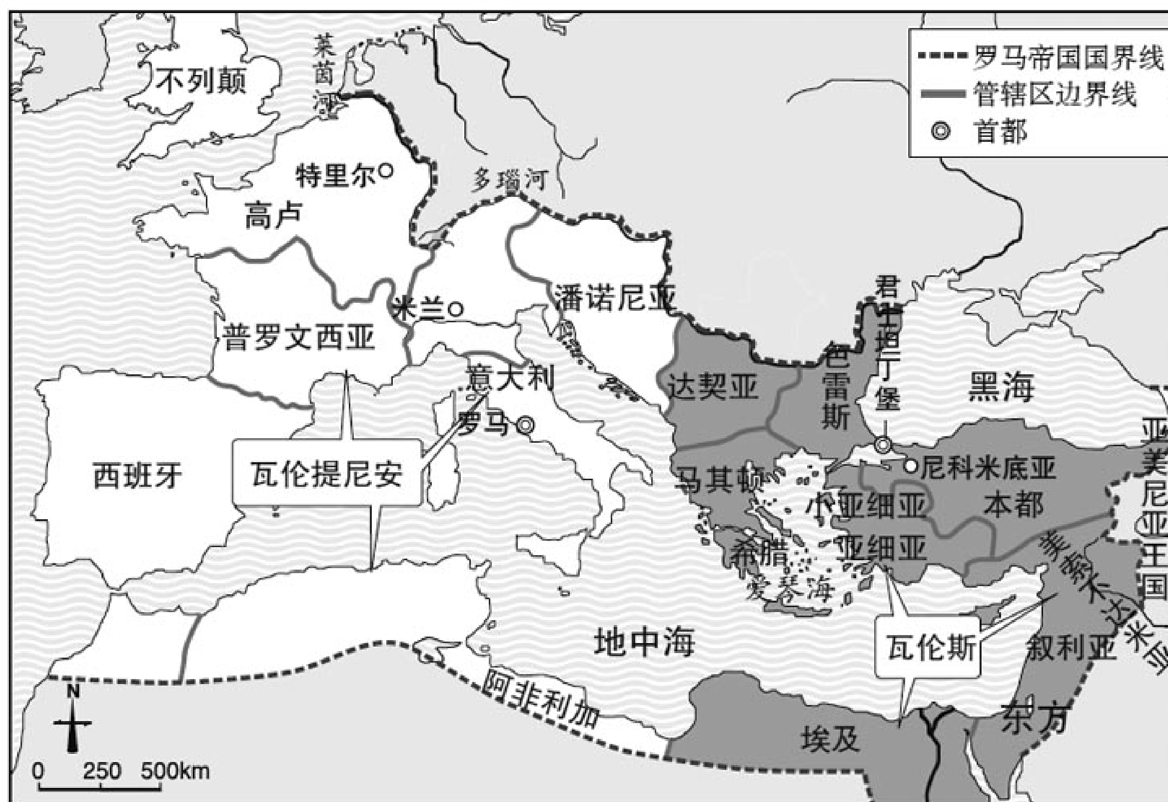
尤里安死后，继位的约维安也在7个月后猝死。紧接着瓦伦提尼安替补，成为罗马皇帝。公元374年，瓦伦提尼安迎来了在位的第10个年头。

这10年，罗马帝国的局势其实并不平静。一些在元首制时代少有发生、被视为非常的状态，如今已成为常态。社会问题严重，积重难返。整个国家好像一条衰朽不堪的堤坝，哪里破了补哪里，刚补完这里抵御了洪流，别的地方又出现了裂口。帝国在这种状态下，之所以还能撑过10年，一是由于强敌波斯的沙普尔国王年事已高，二是因为瓦伦提尼安皇帝是一位颇具才华的武将。

蛮族出身的皇帝

瓦伦提尼安虽然身上流着日耳曼人的血液，却是在罗马领地潘诺尼亚行省出生长大。他出生于公元321年前后，出生地点位于现在匈牙利或塞尔维亚和黑山一带的多瑙河流域。他父亲是驻守多瑙河的罗马军人，作为长子，他在成年后很自然地就加入了军队。同时代的君士坦提乌斯在位的24年，正好与他的从军时间相重叠。瓦伦提尼安42岁时，跟随尤里安皇帝远征波斯，经历了那一场充满荣光也饱受屈辱的战争。在当时的武将中，他应该是属于经验丰富的前线指挥官之一。瓦伦提尼安非常清楚，光凭战场上的经验，无法独自承担起整个帝国的重任。所以，登基刚满一个月，他就任命自己的弟弟瓦伦斯（Valens）与他共治皇帝，而不是副帝。

比瓦伦提尼安小7岁的瓦伦斯，在36岁当上皇帝之前的经历不详，即使也是军人，也不能与曾经担任过北非以及不列颠司令官的长兄相比。对于瓦伦提尼安而言，只要这个弟弟能忠心不二就足够了。



兄弟俩统治下的帝国版图

如上图所示，帝国一分为二，由兄弟俩分治。兄长掌管帝国西部，东部则由弟弟负责。兄长分管西部的理由，纯粹是因为当时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这一边。对罗马皇帝而言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防御外敌的侵略。

弟弟瓦伦斯为人厚道，但才华平平。他之所以能够担当起保卫帝国东部的重任，理由只有一个：波斯国王沙普尔的斗志日渐衰退。

沙普尔的气势不断减弱，说来也是自然的结果。他已经实现了继位以来最大的心愿——从罗马人的手里夺回了被强占70年之久的美索

不达米亚北部地区。不仅如此，他趁着尤里安战死，继位的约维安的精力集中于复兴基督教之际，攻击了长年成为罗马与波斯争端的亚美尼亚，杀死国王，使之成了事实上的波斯附属国。亚美尼亚国王的王妃也被贬为奴隶，赐给了一位将军。她来自君士坦丁堡高贵的家族，曾经是君士坦提乌斯的未婚妻，后来嫁给了亚美尼亚国王。当初不肯听从尤里安皇帝的劝说，拒绝参加波斯战争，而选择了中立的亚美尼亚国王，最终还是没有保住他的皇位和国家。



瓦伦提尼安

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是一位令罗马人难忘的人物。他的出生年月没有详细的历史记录。如果公元309年他继位时还是一个少年的说法无误的话，那么，他利用拖延战术，视尤里安如掌中之物时，应该已年近70岁。在他完成此生最大心愿，从罗马手中夺回失地时，已经过了70岁。在接下来的这10年中，他的战斗力不断削减，的确属于正常的现象。

北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亚美尼亚王国被波斯占领之后，罗马帝国东部的防卫机制变得支离破碎，正是由于波斯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侵略举动，罗马帝国的东部才能因此幸免。公元379年沙普尔二世去世，波

斯王国就像一棵被掏空的大树，静静地倒了下来。要在统治国家70年之久的明君之后继位，对哪一个新主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沙普尔二世死后的波斯王国，王位争夺战不断，局势动荡，这对防卫机制濒临瓦解的帝国东部而言，的确是一件幸事。

与平静的帝国东部相反，这10年来西部纷扰不断。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不是瓦伦提尼安皇帝治国的能力问题，而是对手的素质不同。

与东部的对手波斯不同，西部的敌人是来自北方的蛮族。无论罗马出手反击还是利诱拉拢，敌人的数量始终有增无减。贫穷的人向往富裕之地，属人之常情。北方气候严峻，当地人又不懂得土地的利用，生产力低下。与之相反，西南地区气候温和，土地利用完善，物产富饶，因此，北方民族向南迁移，是历史的必然规律。简单地说，人是会移动的。不仅如此，而且在迁移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暴力。公元4世纪人们向往的移居地，东方是波斯王国，西方则是罗马帝国。

这种人口移动现象，往往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旦背后遭到后来者的推挤，那些原本早已定居在罗马边境附近的蛮族人，就不得不进一步向罗马国内移动。罗马帝国曾经成功地与居住在边境附近的蛮族维持着良好关系，却始终不能彻底解决北方蛮族的入侵问题。其理由就是因为进入公元4世纪之后，这种多米诺骨牌现象愈演愈烈。

瓦伦提尼安皇帝这10年来对付过的蛮族，按地域划分见下：

越过莱茵河入侵高卢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Burgundians）、汪达尔人（Vandal）、阿勒曼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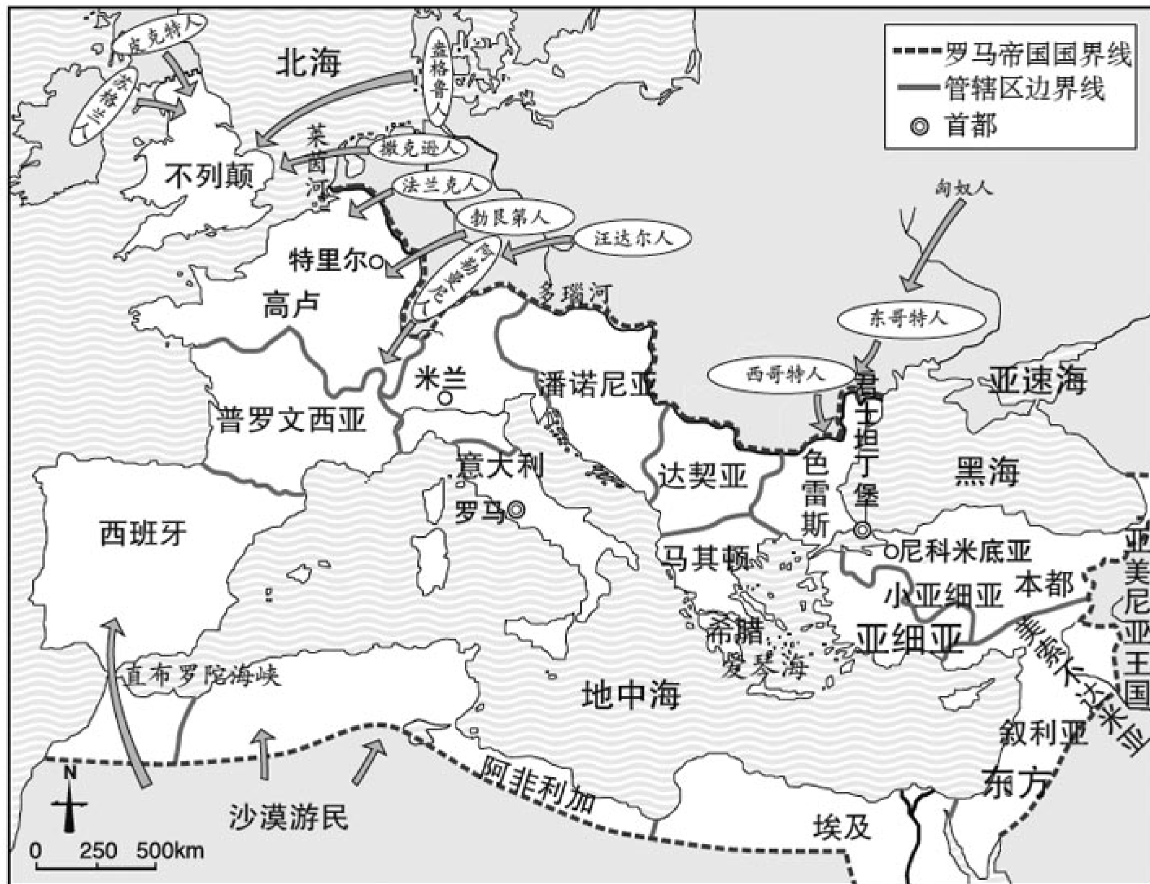
从北海入侵不列颠行省的：皮克特人（Picts）、苏格兰人（Scots）、盎格鲁人（Angles）、撒克逊人（Saxons）。

越过多瑙河入侵的：哥特人。有时，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各自行动，有时候则是东、西两大族联手。在这条战线上，又新添了一个从亚洲迁移而来的匈奴人（Hun）。

入侵北非的：沙漠游民。这些人有时候会乘势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因此不能视之为散兵游勇而掉以轻心。

百年之后，帝国遭受蛮族大举侵略。而此时，各路角色已经纷纷登场。两个世纪唯一不同的是，4世纪的蛮族属于盗匪，突然发动袭击，烧杀抢掠之后，扬长而去，而5世纪的蛮族，不仅杀人放火、巧取豪夺，而且占地为王。

尽管帝国西部的全境都遭遇了蛮族的侵略，但瓦伦提尼安皇帝还是成功地击退了来敌。他马不停蹄地转战各地前线，亲自指挥战役。一旦发现有用之才，不问出身立即提拔重用，将一些他本人无法亲赴的地区交给他们。由于皇帝本人出身于北方蛮族，因此这10年来，罗马军中蛮族将官的数量不断增加。这里必须郑重说明，即使对手来自故乡，这些蛮族出身的将领和士兵，仍然忠实地履行着保卫罗马帝国的职责，极少有人做叛军。



4世纪后期蛮族的分布及其入侵路线

罗马在元首制时代，行省居民热衷于罗马化。而到了帝国后期，蛮族血统的人则希望成为真正的罗马人。瓦伦提尼安也是其中之一。罗马帝国的魅力究竟何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由于瓦伦提尼安长年驰骋于战场，有关他政治方面的记录少之又少。当初约维安推翻尤里安的改革政策，恢复了旧制度，之后，帝国的体制始终维持不变，即一切回到了君士坦提乌斯时代。不过，瓦伦提尼安日理万机，无暇待在皇宫内搞什么阴谋诡计，皇帝及其周遭在这方面还是干干净净、稳重行事。皇宫内宦官们既没有横行霸道的机会，皇帝也没有时间去享受东方君主一般的奢侈生活。虽然瓦伦提尼安是一位基督教徒，不过，正如恺撒利亚的主教优西比乌悲叹的那样，他入教的动机，似乎也是出于利益。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与教会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愿卷入阿里乌斯派与阿塔纳西乌斯派之间的争斗。教会屡次恳请他召集各地的主教，举行大公会议，他一概拒绝，吩咐他们自行其是。瓦伦提尼安重新颁布了承认所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米兰敕令”，托这位蛮族出身的皇帝之福，异教徒们过上了一段神殿不遭破坏、祭祀活动不受禁止的安宁日子。

不过，瓦伦提尼安没有接受过教育，因此他对接受过教育，尤其是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极其厌恶。在那个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半都不是基督徒，而是所谓的“异教徒”，这些人心目中的“圣城麦加”就是罗马元老院。多位来自元老院世家的议员被控反叛罪，瓦伦提尼安皇帝用物理的方式让他们彻底消失。据称，罗马元老院的人数因此减少了三分之一。消失的这些人也并非统统都被处死，其中的大多数人眼看形势不利，便辞去代代相传的议员席位，做回一介平民。瓦伦提尼安的行为，从结果而言，对削减异教徒的势力，同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即便出身蛮族，一旦成了皇帝，似乎也会考虑血统继位的问题。瓦伦提尼安与亡妻玛利亚·赛维拉之间育有一子格拉提安（Gratianus）。瓦伦提尼安在位第10年时，这个男孩已经15岁。这位皇帝的长子很早就获得了“皇帝”（奥古斯都）的称号。为了淡化蛮族出身的印象，强调其正统性，瓦伦提尼安皇帝还让儿子迎娶了君士坦提乌斯的遗腹女。这位在父亲死后出生的公主，虽然只有12岁，但她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孙女——大帝唯一一位在世的血亲。

尽管没有教养的瓦伦提尼安厌恶知识阶层，其周边鲜有此类人物出现，但他找来了帝国西部屈指可数的专家当家庭教师，指导日后准备继位的儿子学习罗马人传统的教养学科。

然而，教育的成果往往取决于被教导的一方。格拉提安虽然热衷于罗马化，却倾心于基督教。这也难怪，对一个不知道共和时代以及元首制时代的蛮族人而言，他所认知的罗马就是在君士坦丁大帝倡导

之下，逐渐走向基督教国教化的罗马，要做一个真正的罗马人，就是成为基督徒。

与只会说拉丁语的父亲不同，格拉提安还学习了希腊文，这一点算是意外的收获。当初瓦伦提尼安与胞弟瓦伦斯分治帝国，之所以将富饶的帝国东部交给弟弟，据说就是因为他不擅长东部通用的希腊语。

瓦伦提尼安与后妻之间还有一子，因为孩子是在他登基之后出生，所以与父亲同名，叫瓦伦提尼安二世。这个孩子在其父登基第10年，即公元374年，只有3岁。瓦伦提尼安二世深受母亲的影响，其母贾斯蒂娜（Justina）是一位狂热的基督徒，而且笃信阿里乌斯派。

除了以上两个儿子之外，瓦伦提尼安皇帝还有一个女儿，叫加拉（Galla）。

瓦伦提尼安皇帝统治的罗马帝国，在一个相对安定的局势下走过了10年。然而，到了第11年时，形势突然发生了巨变。

公元375年11月17日，瓦伦提尼安皇帝猝死。这一年在与北方蛮族战斗中，皇帝率领的罗马军再次取得了胜利。事情发生在冬季休战期皇帝接见蛮族代表的时候。近年来蛮族人屡战屡败，除了向罗马投降别无生路。尽管如此，蛮族族长的态度依然十分桀骜不驯。也许是他觉得，眼前的这位罗马皇帝和自己一样都是日耳曼人。

不知道是不是看穿了族长的心思，瓦伦提尼安皇帝勃然大怒，脸涨得通红，站着的腿不停地发抖，突然间整个人倒了下去。昏迷不醒的瓦伦提尼安在当晚就离开了人世，享年54岁。

如果说但凡继位多有纷争，那么这次皇位的继承不仅非常顺利，甚至可以称为光明正大。

47岁的瓦伦斯，依旧维持其帝国东部皇帝的地位。

帝国西部则理所当然地由拥有“皇帝”称号的格拉提安继承。这位16岁的新帝又把“皇帝”的称号赐予了只有4岁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瓦伦提尼安二世，并且将意大利本土从帝国西部分割出来，作为这位4岁的皇帝的领地。4岁的孩子自然需要监护人，当瓦伦提尼安二世前往大本营米兰时，他的刚成为未亡人的母亲阿里乌斯派狂热信徒的贾斯蒂娜也随之同行。



瓦伦斯皇帝及其两位侄子帝国分治图

帝国西部的和平局势就这样又维持了两年。在国内，没有争夺皇位的内斗，对外，因先帝瓦伦提尼安10年奋战的结果，北方蛮族似乎也偃旗息鼓，不再发起攻击。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正酝酿着即将爆发的凶事。

匈奴登场

一切都始于匈奴人的崛起。匈奴人来自中亚草原，他们与罗马帝国迄今为止交往过的所有北方蛮族迥然不同。从此之后的百年内，他们的名字会频频出现在罗马史上，而他们的首次亮相，是在公元4世纪只剩下四分之一时间的这个时期。当时的人对这个不仅让罗马人，甚至连北方蛮族都深感恐惧的民族，曾留下这样一段记述：

> 匈奴人是蛮族中的蛮族。他们不懂得用火烹煮食物，也不知道佐以其他食材。他们骑马时，将肉夹在两腿之间，捂热后生吃。
>
> 他们身材矮小，体格健壮，动作敏捷。他们的脸，与其说是人类的面孔，不如说更像一块平坦的肉块。只有两个会动的黑点，才让人知道是一双眼睛。他们几乎没有胡须，大概是因为还在吃奶的时候，就经常被短剑刮脸，习惯了受伤和流血。
>
> 他们像祭拜神灵一般，祭拜插在地上的剑。无论如何，他们是一群长成人样的动物，是从前住在森林中的恶魔与被赶出哥特人的魔女媾和而生。
>
> 匈奴人的恶魔父亲教导他们，如何去攻击哥特人。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
>
> 几个匈奴男子去附近的山上打猎山猪。他们追赶着一头母猪，母猪一步步往后退，仿佛在诱惑这些男人。在追逐的过程中，男人们自然而然地掌握了周围的地形，他们知道要袭击对岸的哥特人，该从哪里渡过麦奥提克沼泽（黑海北面的亚速海）而不至于溺死。看到男人们已经学会了本领，母猪便消失了身影。这头神秘的猪，就是哥特人的敌人——恶魔。

公元4世纪时，黑海西北部居住着哥特人的分支东哥特人。以上这段文字就是当时某位东哥特人留下的，可以称之为蛮族人的蛮族评

论。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匈奴人刚出现，就给其他族群带来了不小的威胁。

东哥特人遭到匈奴人袭击后，往西南方向逃离。当然，他们不是和平撤退，而是随身携带着武器。这使得那些原本居住在多瑙河注入黑海流域的西哥特人失去了土地。

丧失了家园的西哥特人，派遣特使去罗马，恳请罗马皇帝将属于罗马领地的多瑙河南岸划给他们居住。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愿意放下武器，适龄的男子加入罗马军队，其他人以及妇孺则会在这片土地上休养生息、辛勤耕作。

多瑙河下游地区属于帝国东部皇帝瓦伦斯管辖。西哥特人提出的条件对他极有吸引力。其理由见下：

第一，可以扩充防守多瑙河的罗马军的兵力。

第二，因长年遭受蛮族袭击等原因而日益凋零的国界线一带，可以重新恢复为富饶的农耕地带。

被以上两大魅力吸引住的瓦伦斯皇帝，从叙利亚的安条克皇宫，向色雷斯的行政长官发出公文，批准西哥特人迁居罗马境内。这些蛮族人的迁居地，就定在多瑙河以南的色雷斯行省内。

政治与行政不同。一些事情，即使在行政实施上难度极高，有时候也不得不服从政治。遇到这种特殊的情况，作决定的不应该是行政长官，而是掌管政治的领袖，也就是说，这属于政治上的决定。而当政策具体实施时，作出决定的一方必须始终留意着政策执行的情况。可是，瓦伦斯皇帝向色雷斯的行政长官发了公文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事实上，大量的移民势必会引发一些意料之外的状况，而这些状况，往往超出了一介地方长官所能掌控的范围。

公元376年深秋之际，大批的西哥特人从北而下，渡过多瑙河，向南方迁移。多瑙河原本就是一条大河，到了下游，河床尤为宽阔。蛮族人乘坐的小船和木筏，布满了河面，多达数公里。由于数量过于密集，造成小船、木筏相互间碰撞，不少船因此沉没。然而，蛮族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差异之一，就是重视生命的程度。对于北方蛮族而言，少许的牺牲算不上什么。尽管有同胞葬身于河底，蛮族人使用小船以及木筏渡河的行动却没有因此而中断。

那时候哥特人的迁移究竟有多大规模，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当初他们请求瓦伦斯皇帝批准他们移居罗马境内时，答应提供1万名成年男子参加罗马军，而当迁移结束之后，人数增加到3万人。蛮族人通常多产，如果说部落十分之一的人口符合参军条件，那么就有30万人左右的蛮族人进入了罗马境内。而最初估计的移民数量只在10万人左右。这意味着一些没有得到罗马皇帝移居许可的哥特人部落也混入其中。想来这也在情理之中，以前这些蛮族人只要接近多瑙河南岸，就会遭到阻击，现在罗马同意开放，周遭的部落自然不会错过机会。然而，大批蛮族人的到来，却使得色雷斯行省的收容机制彻底崩溃。

鉴于以上理由，北方蛮族向罗马帝国境内合法性的迁居行动，当然不会出现一个良好的趋势

首先，蛮族人大规模的迁移发生在秋季。秋天是收割的季节，然而事前没有播种，自然是颗粒无收。因此，国家必须为这些移民提供整整一年的口粮，直到第二年开春播种再到秋季收割为止。不仅是口粮，政府还需要为这些生活水平低下的蛮族人提供各种日常生活品。不知为何，移民们似乎总是希望能够与移居地的居民获得同等的待遇。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迫不得已离开祖国的难民吧。被匈奴人赶出家园的哥特人，的确称得上是难民，只不过他们是一群携带着武器的难民。

解除蛮族人武装的问题，始终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这是因为罗马帝国当初答应的生活保障，迟迟不能到位。特别是入冬之后，生活条件愈发恶化，眼看着妻儿们吃苦受难，男人们更不愿意交出武器。有研究者指出，问题在于实际操作的行政官员办事不力，我则认为，主要是因为移民的人口超出了预期的数量，当地政府应付意外状况的措施不够完善。而对此要负起责任的，就是当初轻率答应了蛮族移民的瓦伦斯皇帝。要接受大批移民，政府必须建立起相当规模的应对机制，然而，色雷斯管辖区既没有这样的机构，也没有从国家那里获得所需的特别经费。再加上那些中介移民生活物资的不良商人乘机敛财，使得事态不断地恶化，影响不断地扩大。提供给移民的物资不仅质量低劣，而且数量上也比当初承诺的少了很多。

哥特移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渐渐地，他们又恢复了原本打算放弃的蛮族精神。所谓蛮族精神，就是相对于吃苦耐劳、辛勤劳作的生活方式，宁愿选择抢夺他人的财产，占为己有。哥特移民回归蛮族精神的现象，首先从袭击周边的村落开始。紧接着，这股掠夺浪潮，从色雷斯席卷到西面的达契亚，直至南部的马其顿。此时此刻，罗马帝国的敌人，不再是从北方越境入侵，而是已经在罗马境内向西及向南一路烧杀抢劫。当哥特人袭击色雷斯地区的主要城市马奇亚诺波利斯（Marcianopolis），突破了罗马军防线之时，这股掠夺潮的速度与气势达到了最高点。形势至此，罗马皇帝再也无法不闻不问、袖手旁观了。

哈德良堡战役大败

第二年，公元378年开春之后，瓦伦斯皇帝终于有了动静。他动身离开叙利亚的安条克，在5月底，抵达了帝国东部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个行军速度实在称不上快捷，估计是一路在沿途招兵买马，消耗了

时间。就在罗马军以缓慢的速度向着色雷斯进军之际，哥特人也向留在多瑙河北岸的同胞喊话，增强战斗力。

即使自己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也可以袭击敌方的薄弱之处，这是速攻的长处。而瓦伦斯皇帝在做好了万全之策的同时，也给敌人提供了充足的备战时间。

不过，仍然还有取胜之道，就是采用从东、西两面夹击的战术。哥特人想渡过多瑙河向北逃离，其实非常困难。因此罗马军把守住东、西两方，夹击战必定有效。如果这个战术能在实战中得到运用，那么，瓦伦斯皇帝迄今为止所犯下的任凭形势恶化而无所作为以及行军速度迟缓浪费了宝贵时间等错误，都可以一笔勾销。而实施这个战术，必须要有帝国西部格拉提安皇帝的协助。

瓦伦斯皇帝的侄子格拉提安，虽然只有19岁，但在抗击越过莱茵河入侵高卢的蛮族人的战斗中，获得了不菲的战绩。而且，他为人善良，不会对叔父的请求置若罔闻。问题出在做叔叔的瓦伦斯身上。

瓦伦斯似乎不了解北方蛮族的情况，也不懂打仗。这个50岁的人，从来没有指挥过战斗，在做皇帝之前，说不定连参战的经验都没有。对他个人来说，这样的经历是幸运，但作为最高司令官，就是一个悲剧。

经常是在这种时候，有害无益的虚荣心往往会跑出来作祟。色雷斯地区属于瓦伦斯的管辖范围，解决那里发生的问题，是他的职责所在。恐怕就是这个想法促使瓦伦斯没有向年轻的侄子提出协助的请求。

不过，无论瓦伦斯皇帝是否开口求援，人在高卢的格拉提安皇帝还是会知道他的行动。帝国东部编组大军，连退伍军人都重新召回的消息自然会传到阿尔卑斯山脉的西侧。格拉提安火速向叔叔派去了信

使。他在信中表示，一旦击退了阿勒曼尼人，他会立即赶去支援，在此之前，千万不要挑起战事。收到信件的瓦伦斯皇帝，紧接着听到的消息，是比自己年轻30岁的侄子击退了蛮族的捷报。

就在罗马一方拖延之际，哥特人开始行动，从色雷斯南下。不管双方是否有心一战，向东行军的罗马军与南下的哥特军，注定要在哈德良堡的近郊遭遇。

瓦伦斯皇帝召集军中将领和高官，举行作战会议。他询问手下，是该等待格拉提安皇帝的援军，还是自己先发起攻击。众人的意见分成两派，皇帝本人也没有当机立断。就在瓦伦斯犹豫不决的当口，接到了两份内容截然相反的情报。

一份是来自侦察兵的报告，附近的敌军不超过1万人。

另一份，哥特人大王派来一位哥特基督徒，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事端，并提出了相应的条件。



瓦伦斯

这让作为阿里乌斯派虔诚信徒的瓦伦斯皇帝，再次犹豫不决。或许一方面他觉得解决1万人的敌军轻而易举，另一方面又被哥特人提出全体改宗信仰基督教的条件深深地吸引。不过，瓦伦斯皇帝与基督徒特使的会谈并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因为后来发现，派来特使的这位大王，并不能代表全体哥特人，他只是众多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首领而已。虽然谈判未果，但瓦伦斯皇帝至少应该从中了解到，哥特人只是一个族群的总称，族群全体并非在某一个人的指挥下统一行动的。如果他真能学有所得，就会采取相应的战术。可是，瓦伦斯皇帝决定不再等待侄子的援兵，先发起进攻。而且，连作战方案都还没有制订，就向哥特人开战。

公元378年8月9日的早上，瓦伦斯及其麾下的军队，离开哈德良堡（现土耳其的埃迪尔内），朝着西北方向一路寻找从色雷斯南下的敌军。就在太阳高照、气温不断上升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敌人。哥特人使用他们的标准防御战术，用四轮车围成一个圆阵，等待着罗马军。这些人只是哥特的一个部落，而罗马军打头阵的右翼部队，却在中央以及左翼部队到达之前，就率先发起了攻击。

来自北方的日耳曼民族，很少会出现统率全族的强势的领袖人物，大多情况下都是散沙一盘。各个部落倾向独自行动，几乎所有的战斗都是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的。因此，与多部落组成的哥特人打仗时，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从四面八方压进，将他们逼到一处，一举歼灭；二是把大部队分散成几支，采取各个歼灭的方式。然而，在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哈德良堡战役”中的罗马军，依然按照右翼、中央、左翼以及轻骑兵的传统的会战方式，而其对手哥特人则分散四处，伺机从不同的方向发起攻击。

光看两军的阵型就能预见胜负，何况，罗马军没有充分地调动起各部门的机制。虽然不乏英勇作战的官兵，可是仗还没打到太阳落山，输赢已成定局。



巴尔干、小亚细亚及其周边

这场战役中，罗马军损失了2位高官、35个大队长，以及占整个部队三分之二人数的官兵。

瓦伦斯皇帝与几位大臣也葬身于火海。当时，他受了伤，被人搀扶着逃进了附近的小屋，紧追而来的哥特士兵不知屋里藏着的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因多次破门未果，一怒之下，放火烧了小屋。瓦伦斯皇帝享年50岁，在位14年。

出门作战时习惯带上全副身家的哥特人，以为罗马人也同样如此。当他们发现那些战败的罗马官兵身上除了武器，没有任何钱财时，大失所望。他们只好先从阵亡的罗马官兵身上剥下头盔和胸甲穿

在身上，拿着缴获的枪和剑，准备攻打哈德良堡，他们相信罗马军把金银财宝都留在了那里。

站在第一线誓死保卫哈德良堡的，是侥幸脱身的剩余的三分之一罗马军。哥特人即便在野战获胜，但对于重新恢复了强盗本性的他们而言，这些罗马军人是一群很难对付的对手。蛮族人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不擅长打持久战。最终，哥特人放弃了攻打哈德良堡，沿着罗马大道，朝着东南方向行进，目标转向君士坦丁堡。然而，君士坦丁堡是帝国东部的首都，无论在防御力量上还是地形上，罗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很快哥特人就放弃了攻城的计划，不过，他们原地不动地留在了多瑙河以南的帝国的中部。这就是说，由于中部地区盘踞着北方蛮族，罗马帝国被分割成东、西两块。

哈德良堡战役的惨败，给许多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人民，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是出生于安条克的希腊人，不信仰基督教。他在军中度过了前半生，后半生则专心于写作。由他所著的涅尔瓦皇帝时代之后的罗马帝国通史，就是以哈德良堡战役作为最后的篇章。仿佛身为罗马帝国的一员，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值得叙述的历史。

除了阿米阿努斯，罗马哲学家、尤里安皇帝的老师利巴尼乌斯，得知哈德良堡战役战败的消息之后，写了以下这段文字：

> 请不要再抱怨罗马官兵胆怯、意志薄弱或者是偷懒。也不想听到蛮族人更像优秀的士兵之类的言语。
>
>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士气、战术以及精心备战上，敌人都达到了与我们同等的水准。而且，他们比我们更重视名誉，更渴望荣耀。他们能够忍受酷暑和饥渴，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熊熊烈火，都

不能让他们放弃战斗。仿佛战死沙场比侥幸逃离是一件更美妙的事情。

这样的敌人，总有一天会超越我们。他们不可一世的气焰，让我不由得想到，是不是那些被我们疏离、排挤的古代诸神中的某位天神，站在了蛮族一边，以示愤怒之意。

哈德良堡战役并非罗马人第一次被蛮族人打败。然而，总司令同时又是皇帝死于战场的惨败，还是首例。而且，皇帝的阵亡之地不是在敌国他乡，而是在自己的国土上。

百年前的德基乌斯皇帝，同样输给了哥特人。这场让皇帝及其儿子都丧命的战场，也在巴尔干地区。但是，迄今为止的罗马人，在遭到重创之后，一定会将敌人赶出境外，成功雪耻。然而，哈德良堡战役之后，情况有变。公元378年发生的这场战役，充分显示了罗马帝国日耳曼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武力威胁下日耳曼化，还是和平地走向日耳曼化。无论如何，要将日耳曼人驱除出境，已经不可能了。

狄奥多西皇帝

作为知识人，可以冷静地分析现状，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去观察世间的动态。这是因为知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并没有常人想象的那么大。在元首制时代，“言”“行”为一体，而到了帝国后期，“言”与“行”就分离了。发表意见的和实际做事的，是不同的人，“热爱知识的人”的影响力一落千丈。

然而，掌握着他人命运的统治者却不能只会空发感叹。得知哈德良堡战役失败的格拉提安皇帝，必须承担起收拾残局的责任。

帝国东部的皇位，因瓦伦斯皇帝之死而空缺。而曾经在瓦伦斯皇帝统治之下的西部地区巴尔干，如今被以哥特人为主的蛮族占据，连罗马皇帝也插不上手，几乎是处于无政府状态。这种时候，应该站在政治与军事前沿阵地的皇帝，除了19岁的格拉提安，就只有刚满7岁的瓦伦提尼安二世。

格拉提安秘密派人去西班牙，命令他们把狄奥多西（Theodosius）带回罗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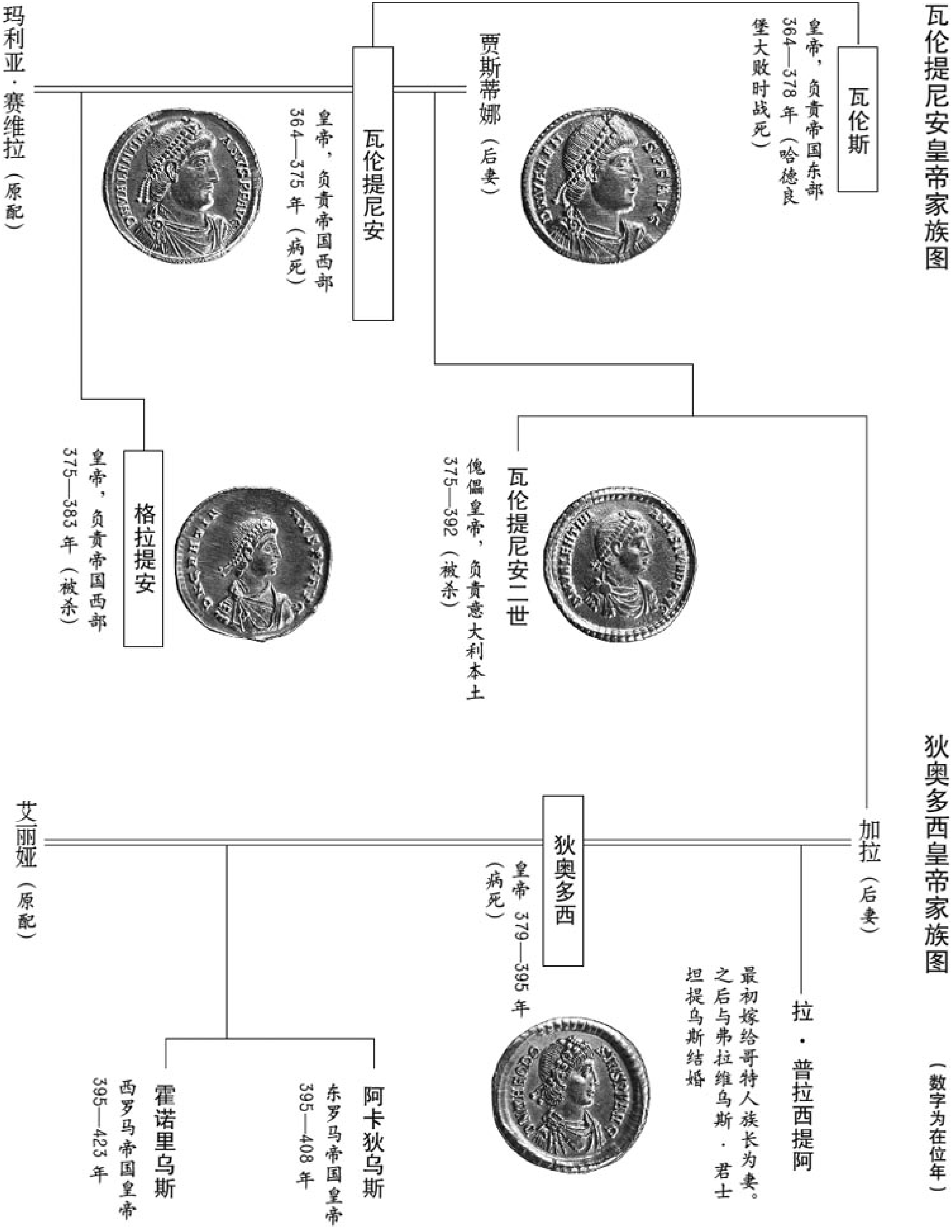
格拉提安与当时31岁的狄奥多西并非素不相识。狄奥多西的父亲是格拉提安的父亲瓦伦提尼安一世手下的武将，曾经多次立下赫赫战功。在瓦伦提尼安一世统治的10年间，每当高卢、不列颠、北非等地区发生问题，能够临危受命，并且在短时间内击退来敌、胜利完成任务的将官，只有他一人。因此，当他晋升到地位仅次于最高司令官的“骑兵长官”（magister equitum）时，军中没有出现任何反对的声音。

可是，当他被派到北非去执行任务时，虽然军事上获得了成功，却在政治上中了当地行政长官的奸计。这位行政长官控告他通敌，时间又不巧，正好碰上瓦伦提尼安一世猝死，刚满16岁的格拉提安继位。年轻的新帝在没有详细调查的情况下，就给这位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定了死罪。北非地方政府接到命令后，立即执行了死刑。那是公元376年发生的事情。

跟随父亲一同征战的狄奥多西，积累下丰富的军事经验。在29岁那年，他失去了守护他的父亲以及靠自己实力得来的地位。一无所有的狄奥多西，只好返回位于西班牙北部的故乡考卡（Cauca），他没有因父亲之罪而受到牵连，已经算不幸中的万幸。

两年之后，狄奥多西受到了当初判他父亲死刑的那个人的召见。当然，格拉提安也没有忘记两年前的事情。他召回罪人之子的做法就

够奇特，这位19岁的皇帝，面对应召而来的31岁的狄奥多西所说的话更有意思。



不知道年轻的皇帝有没有对狄奥多西讲了两年前的事情付诸流水之类的话，但他很直率地提出，准备任命狄奥多西为与他地位同等的皇帝，将瓦伦斯先帝管辖的帝国东部托付给他，希望他能协助重建因哈德良堡战役而受到重创的帝国大业。当时狄奥多西已经结婚，皇帝甚至没有提出让他与妻子艾丽娅（Aelia）离婚，改娶自己的妹妹加拉。狄奥多西是在艾丽娅死后，才续弦娶了加拉。从他的第二个孩子霍诺里乌斯（Honorius）诞生的时间推算，他再婚至少是7年之后的事情。总而言之，哈德良堡战役大败的这一年，格拉提安皇帝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把帝国的东半部交给了失业的前军官狄奥多西。何况这个人比自己年长12岁。这是普通人很难有勇气作出的决定，而且做得干净利落。

至于狄奥多西，同样也没有异议地接受了皇帝的请托。只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为他含冤而死的父亲恢复名誉。格拉提安皇帝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立即作了公开的声明。

罗马帝国不存在什么皇帝的加冕、登基等仪式。那个时期，基督教尚未全面国教化，因此，统治者的权力并非上帝所赐，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形式，来自帝国这个共同体（Res Publica）的全体公民的授权。皇帝的治世，也就是从“受托人”介绍给“委托人”的那一刻开始。

狄奥多西也是从他在多瑙河防线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希尔米乌姆与官兵们见面的那一刻开始，正式成为东部皇帝。因为军人也是罗马公民、国家的主人。这一天是公元379年1月19日，中欧地区特有的冷风夹杂着冬雨的天气，刺得人皮肤一阵阵地发痛。这一天距离哈德良堡战役的战败5个月。继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另一位被基督教教会奉为“大帝”的罗马皇帝正式登场。

由于狄奥多西皇帝曾经是罪人之子，因此他没有所谓的嫡系。这位最高司令官仿佛坐着降落伞，空降到官兵面前。而且他出身于西班牙行省，这个地区罗马化的历史与帝国的帝政时期同样久远。相比之

下，整齐列队站在他面前的士兵，情况好一点的是罗马化的蛮族的第三代，差一些的是刚罗马化的蛮族人。他不得不带领这样一支军队打仗抗敌，而且还是一支彻底被哥特人打败了的军队。要让这些尚未走出阴影的士兵，再次去和打赢自己的哥特人打仗，仅仅这一点，就极度困难。

所幸的是，狄奥多西才30岁出头，还很年轻，而且从他被格拉提安钦点之前的生活状况来看，不管今后他怎么做，都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东西。不仅如此，格拉提安也向他保证，无论他怎么决定，都会毫无条件地给予全面的支持。这三项条件，让他成了一个果断的男人。换言之，他在行使强权时，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哈德良堡战役”后的罗马帝国

狄奥多西在他受托管辖的帝国东部全境张贴布告，募集现役士兵以及退伍老兵的儿子。子承父业，职业世袭制的法令虽然已经出台很

久，但一直没有贯彻到社会基层。不过，这次是皇帝亲自下令，形同征兵。

另外，他所管辖的地区还包括了多瑙河南岸一带。这里因为哈德良堡战役失去了大量的士兵，军队因人手不足而处于贫血状态。因此，当地的募兵对象分成两类：

第一，以没有服过兵役的罗马公民为对象，保证每年发放一次赏金。由于条件丰厚，应征者源源不断，从厨师、面包师到店铺伙计，来自各行各业。不过大多数愿意入伍的，还是因蛮族的侵害以及重税的负担，不得不放弃农耕的农民，以及那些由于主人家的经济状况难以维持而被解放的奴隶。



狄奥多西

第二，以北方蛮族日耳曼人为对象。狄奥多西也向他们提供了一项相当不错的条件。只要他们能够找到接替自己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退伍，返回部落。

在优惠条件的吸引下，募兵的目的是达到了，不过遵守军纪的观念，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养成。这些人对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既没有太多的忠诚心，也不怎么服从直属长官的命令，因此，军团内外常有问题产生。

狄奥多西发现，没有足够的时间通过训练来解决问题。因此，他打破以往的惯例，强制性地将在东部招募的士兵调往西部，同时把集结于西部的士兵派去东部。

士兵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被派遣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但他们已经宣誓效忠皇帝，如果拒绝命令，立即会以反叛罪被处死。因此，军人们尽管心怀不满，还是开始了调防的行动。东西两拨人马在小亚细亚相遇时，曾经发生激烈的冲突，虽然事件很快得到了平息，但还是有人因此丧生。

狄奥多西管理军队，如果只有强行换防这一招，他不过就是一个暴君。然而，事实证明他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一支情绪不稳定的军队，是不可能频频赢得胜利的。虽然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我认为，狄奥多西作为最高司令官，最终还是采用了最单纯也是最正当的手法，消减了士兵的不满情绪。那就是奖罚分明、公平以及打胜仗。战场上生死在一瞬之间，因此士兵对司令官的评价，要比外人想象的更为严格。哪怕是侥幸存活，但如果被俘，不管对方是波斯人还是日耳曼人，都逃脱不了一生为奴、过猪狗不如的生活的悲惨命运。

公元379年，狄奥多西率领的军队创下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战绩。罗马军不仅攻打了哥特人盘踞的色雷斯和达契亚等位于多瑙河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而且一路追击，一直打到伊利里亚。伊利里亚不属于狄奥多西的管辖范围，但他没有一丝放弃的意思。按照这个势头，罗马军完全有能力彻底地将哥特人赶回多瑙河北岸。

然而，这时的狄奥多西变得焦躁不安。因为就在这一年，历经50年统治、创下辉煌业绩的波斯国王沙普尔去世。沙普尔死后的波斯王国，进入了动荡不安的时期，不过这情况要到之后才有所显示，当时狄奥多西则担心波斯王国会再出现一位与沙普尔同样强悍的国王，那么波斯军极有可能会越过幼发拉底河，侵入罗马境内。如果形势发展果真如此，狄奥多西就不能把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多瑙河地区了。

公认蛮族迁移

狄奥多西皇帝作出了决定，不是把哥特人赶回多瑙河的北岸，而是为他们在南岸提供居住地。这个决定得到了格拉提安皇帝的许可，所以这项措施是以两位皇帝的名义颁布的。

西哥特人获得了临近多瑙河下游的色雷斯北部的地区，现在这里相当于保加利亚。

东哥特人虽然进入罗马境内的时间稍迟，但他们与西哥特人共同参与了哈德良堡战役。他们的定居地位于多瑙河中游的潘诺尼亚行省东部一带，相当于如今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塞黑联邦已于2006年6月3日正式解体。——译者注）。

作为交换条件，两部落保证会在指定地区居住，专心务农。同时，罗马帝国也作出承诺，在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之前，会提供足够的粮食。

以上的条件与瓦伦斯先帝和哥特人缔结的条约内容一致，接下来是不同之处：

首先，哥特人的居住地获得了法律上的承认。拉丁语称之为foedus，意为“同盟”。这些同盟部落在居住区内拥有完全的自治权。

由于只是同盟，并非帝国的子民，因此这些哥特人不必像其他居民那样，承担纳税的义务。但是如果从军，可以获得与其他士兵同等的俸禄。

罗马皇帝与哥特人签署的这份协定，无论是在短时期内还是长期，都给帝国带来了重大影响。

从短时期来讲，由于哥特人大量入伍，加速了罗马军蛮族化即日耳曼化的进程。在此之前，蛮族人加入罗马军，意味着彻底与其部落断绝关系。而从今以后，他们既可以保留部落一员的身份，同时又可以作为罗马士兵，享受军人才拥有的多种待遇。如此丰厚的条件，难怪哥特人会蜂拥而至地进入军队。

然而，这种状况对罗马皇帝而言，是喜忧参半。作为军队的最高司令官，的确是件好事，但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则是忧心忡忡。

哥特人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在罗马人眼里，日耳曼民族是未开化的蛮族。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的差别，不仅仅是前者身着布衣、住石头建造的房子，而后者披毛戴角、住木屋那么单纯。就算穿上布衣，住进了石造的房子子，但在希腊人的定义里，不会说希腊语的外国人，就是“蛮族”（希腊语：barbaros，拉丁语：barbarus）。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他们衡量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的标准，不是会不会说拉丁语，而是看是否能接受多民族共存共荣所必需的规则，即接受法律，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换句话说，如果与邻人发生冲突，是依据法律还是凭借武力来解决问题。若要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差异，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同。文明人靠辛勤劳作为生，而野蛮人则是强取掠夺。

现在，哥特人也穿上了布衣，住进了石造的房子。不过，按上述标准衡量的话，他们仍然是蛮族。哥特人的文明化历史尚浅，因此，如果同时有务农和从军两个选择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从手持武器这个行为上来看，掠夺和从军的确有相似之处。

正因为如此，留在那些皇帝特别赐予的土地上的，全都是没有资格服兵役的老人、妇女和孩子。罗马方面原本希望通过哥特人的迁入，让国界线多瑙河附近地区荒芜已久的农耕地，重新恢复生产力，如今这希望成了泡影。

除此之外，农地有所收获，这些境内的哥特人的经济就可以独立，罗马也就无须再向他们提供援助。现在看来，罗马人的这个如意算盘也落了空。罗马当初承诺的粮食保障时间，是到农作物收获为止，结果却变成了年年都得援助的情形。罗马提供粮食援助的时间究竟维持了多久，由于缺乏详细的史料，没有精确的结论，只能依靠推理。从以后频频出现在协定书中的“保证会根据情况，提供相应的数量”的字眼推断，经济援助恐怕是变成了恒久性的。若真如此，那罗马帝国不仅是允许日耳曼人迁入罗马境内，而且还负担了他们生活所需的费用。由于这种状况的持续，哥特人迁居给罗马带来的原本属于短时期的影响，就变成了长期的影响。

说到长期影响，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而且它不是靠金钱就能解决的。

罗马在元首制时代，就很积极地去建立与蛮族的友好关系，而且将它定为帝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因此，上述的经济援助并非史无前例。然而，这种友好的态度，仅限于“防线”以外的蛮族人，并不是同意他们集体移民至“防线”以内。这好比是同围墙隔壁的邻居交好，但不会把邻人带回家里来住。何况，就算把邻人领进自家围墙内，墙外也不会就此变得冷冷清清，紧接着会有新的邻居搬迁而来，而且这墙内墙外的邻人都是日耳曼人。这种现象，后世的学者称为“和平下的

蛮族化”，不过，对当时的罗马人而言，大概会发出“多瑙河不再是国界线”的唏嘘。事实上，已经久未提及的“防线”（limes）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个时期之后彻底消失的。

那么，蛮族移民政策是否给帝国境内其他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安定呢？回答是完全没有。虽然哥特人的袭击暂时告一段落，但多瑙河以北仍然居住着大批的日耳曼人，他们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侵略行径。边境附近居民的生活依然苦不堪言，不管怎么辛苦劳作，收获的成果总是被蛮族人抢走，父母兄弟乃至帮工的奴隶还是不断地遭到绑架。

另一方面，无论换成哪一位皇帝，国家支出始终不减。当年尤里安皇帝实施的“裁员”政策犹如昙花一现，军事与行政这两大国家机构臃肿不堪，人浮于事，情况完全又回到了前文所述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时代。

在蛮族入侵和国家重税的双重压迫之下，农民的生活日益困苦。他们宁愿放弃自由之身，选择做一个被保护者，从农民变为农奴。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农业是古代的基础产业，农民形成了罗马社会的中产阶级。所以，不管是格拉古（Gracchus）兄弟，还是尤里乌斯·恺撒，都会如此地重视《农地法》。《农地法》的被重视，意味着农民的权益受到保护，罗马社会健全的状态得以维持。一个没有形成中产阶层的人类社会，不但不健全，而且不能维持正常的运作。

然而，当下的罗马社会，agricultor即“耕种自己土地的人”，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colonus，即“耕种他人土地的人”。他们既不算农民，也不是奴隶，是农奴。这个翻译真是绝妙。以前从事耕作的是奴隶，现在大多变成了自由民。他们从事的工作内容、法律上的地位一如奴隶。地主在出售农地时通常都会附带农奴一起变卖。

提笔至此，我渐渐地发现，罗马帝国灭亡，或者说罗马帝国崩溃等表现方式似乎并不贴切。如果要说灭亡或者崩溃，那么在此之前，必须要有一个罗马帝国存在。如果没有存在过，也就没有什么灭亡或者崩溃一说了。不过，我也不能接受分化、解体之类的表现方式。因为整体分解成个别物体之后，变小的只是规模，本质是应该不变的。

那么，是不是应该用溶解来形容呢？罗马帝国溶解了。

我认为，至少在宗教方面，“溶解”一词是妥当的。因为罗马人不是输给了基督徒，而是变成了基督徒。

不知是因为敌视罗马的波斯国王离世，还是引入蛮族移民措施有了效果，罗马帝国东西部人民都能维持着小康的生活。或许是政局比较稳定的缘故，格拉提安皇帝重新恢复了曾经因尤里安皇帝而一度中止的亲基督教、反异教的宗教路线。格拉提安的父亲瓦伦提尼安是一位形式上的基督徒，而他则完全不同。紧随其后的是分管帝国东部的另一位皇帝狄奥多西。这两位皇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深受一位人物的影响，这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

亲基督教路线的恢复

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Teatro alla Scala）演出季节的开幕式，定在每年的12月7日。因为这一天是米兰的守护神——圣安布罗吉奥的纪念日。安布罗吉奥（Ambrogio）是意大利语的叫法，在原文拉丁语中称安布罗西乌斯。

意大利语里有一句常用语：“Uono di tutte le stagioni.”按照字面翻译是：“适合任何季节的男子。”其真正的含义，是指可以在任何时代

和环境下生存，并且能取得不凡成就的人。每当我听到“安布罗西乌斯”这个名字，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这句话。

安布罗西乌斯的全名叫什么，如今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罗马人的名字由个人名（praenomen）、家门名（nomen）、家族名（cognomen）三个部分组成，虽然他是一个出生在罗马的罗马公民，但被基督教教会奉为圣人之后，只称呼其家族名。因此，历史上称他为圣安布罗西乌斯。他出生于公元330年，与尤里安皇帝属于同一时代。

安布罗西乌斯出身于罗马名门，祖上代代都是元老院议员。他的父亲曾经历任各地方长官，之后晋升为“首都长官”（praefectus urbi），一生都是帝国的高级官僚。

在元首制时代，首都长官的地位类似于警察局局长，到了帝国后期，由于皇帝经常不在首都，其职责逐渐转向皇帝的代理，这就是说，在首都罗马处于最高权威和权力的地位。作为首都长官长子的安布罗西乌斯，在接受了名门之后所必需的教养科目（拉丁语：artes liberals，英语：liberal arts）的教育之后，很自然地走上了与父亲同样的仕途。

在他43岁那年，命运发生了转变。这一年，他担任意大利西北部的利古里亚（Liguria）和埃米利亚（Emilia）两行省的长官，米兰属于他的管辖区。在那里，阿里乌斯派与其敌对的三位一体派，爆发了武装冲突。这样的冲突在当时并非罕见，不过，长年在阿里乌斯派的主教压制之下遭受冷遇的三位一体派，乘主教去世之际借机泄愤，发起了激烈的反击，整个米兰的中心部陷入一片混乱。

安布罗西乌斯地位犹如州长，解决动乱是其职责所在。他按规矩办事，解决了问题，却不料受到了三位一体派的青睐。信徒们一致认为，唯有这个头脑清晰、擅长言辞，又有执行力的人，才能保护他们

的权益。为了不让阿里乌斯派横刀夺爱，三位一体派迅速召开了信徒大会，在众人的掌声中，“州长”被推选为主教。

安布罗西乌斯对此深感惊讶。最初他以不是基督徒为由，婉言谢绝了主教的职位，基督教教会是禁止俗人担任主教的。不过，三位一体派并没有轻易放弃，如果再让阿里乌斯派的人担任主教，他们将永无出头之日。他们表示，只要立即接受洗礼，就可以成为基督徒。

当时的安布罗西乌斯40多岁，对古罗马的男人来说，正处于黄金时期。他对自己受到基督徒拥戴的真实感受，我们完全不知。比他晚一代的圣奥古斯丁曾经写下他在壮年时期改宗的动机，但这位圣安布罗西乌斯没有留下过只言片语。奥古斯丁被称为教会之父，是解释教义的第一权威。以现代语言来说，属于学者型的宗教家。而给奥古斯丁带来深远影响的安布罗西乌斯，或许应该称为政治型的宗教家。因为以行动来证明自己思想的人，大多情况下是不会吐露心声的。

那时，力图阻止基督教势力扩大的尤里安皇帝已经去世10年，基督教的普及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何况安布罗西乌斯所在的高级官僚圈子中，由于皇帝倾心于基督教，做基督徒确实有助于仕途。不过，尽管异教徒再次处于社会劣势的状态，但安布罗西乌斯一直到42岁之前，都没有改变信仰。可是，当他得到主教的职位之后，立即成了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为何不能如实地坦白改宗的动机。

总而言之，安布罗西乌斯最终答应了三位一体派信徒们的要求。根据教会的规定，在成为主教之前，必须积累一些基层的经验，可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安布罗西乌斯接受洗礼之后，从副祭司开始做起，以飞快的速度通过了各个阶段，一口气登上了主教的位置，据说整个过程前后时间不到一周。公元374年12月7日，安布罗西乌斯就任主教的仪式在米兰举行。意大利虽属南国，但北方城市米兰此时依然寒风

凛冽。斯卡拉歌剧院演出季节的开幕式，定在12月7日的由来，正是为了庆祝安布罗西乌斯就任主教。

成为主教后的安布罗西乌斯，拥有了呼风唤雨的影响力。不过，他认为，在使用影响力之前，自己必须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人。安布罗西乌斯出身于罗马名门，又曾经担任过至少20年的高级官僚，祖上的财产加上20年的薪酬，他应该是一个相当富裕的社会名流。根据君士坦提乌斯皇帝颁布的法令，神职人员有权拥有私人财产，但安布罗西乌斯担任主教之后，立即宣布，将所有的财产都捐给教会。

据说，当时最富有的教区是首都罗马。君士坦丁大帝为了在这个异教徒的首都振兴基督教，用足了心思。除了兴建圣彼得大教堂等诸多教堂送给教会之外，他还捐赠了农田、其他不动产以及服务人员，作为教区各种活动的经济来源。人一旦有了钱，就会想花钱。在这一点上，凡夫俗子与神职人员没有什么差异。事实上，罗马主教以奢侈生活而闻名。有一次，罗马当时最有钱的富豪对罗马主教说：“如果能让我当罗马的主教，明天我就改信基督教。”

而就在距离罗马不远的米兰，新任主教安布罗西乌斯把所有的私产都捐给了教会，没留下一分一毫。他的这个举动，让米兰的基督徒不分阿里乌斯派和三位一体派，全体都站在了他的一边。

讲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提出疑问，为何米兰的主教可以对皇帝产生巨大的影响？有这个疑问实属正常。因为论信徒的人数，当属埃及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条克以及帝国东部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论财力，帝国西部的首都罗马居首。无论在信徒的人数还是经济实力上，米兰教区都排在这些城市之后。

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米兰教区的主教比那些大教区的主教，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皇帝。

埃及在历史上属于罗马皇帝的私人领地，由皇帝的代理人负责治理，因此罗马皇帝几乎没有前往首都亚历山大的必要。此外，亚历山大教区的主教亚大纳西（Athanasius）始终主张三位一体，该派在当地势力强大，这让倾向于阿里乌斯派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和瓦伦斯皇帝根本不想到那里去。

叙利亚的安条克，罗马皇帝不会在此停留，除了与波斯关系恶化的时期。因为一旦与波斯开战，这里会成为后方基地。

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东部的首都，当然是皇帝的大本营。不过，帝国东部所管辖的地域，还包括了多瑙河以南广大的巴尔干地区。这一带是直接遭受北方蛮族侵略最严重的地区。皇帝作为军队的最高司令官，首要任务是保卫国民的安全，必须经常奔赴前线，没有闲暇留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享清福。

至于首都罗马，其作为帝国首都的地位早已有名无实。长期以来，只有举行凯旋仪式时，才能在这里见到皇帝的身影，而罗马军长期以来与胜利也失去了缘分。

话说回来，即使以上这些城市皇帝少有光顾，也不意味着米兰就是他们的常住地。帝国西部的皇帝在高卢特里尔的时间较长，而帝国东部的皇帝更多时候会留在希尔米乌姆。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生前住在米兰的时间的确比较久。不过，并没有任何史料证明，这位忠实继承了父皇亲基督教路线的大帝之子，曾经受到过米兰主教的影响。当然，那时的米兰主教还不是安布罗西乌斯。

这就是说，米兰教区并不存在与皇帝保持亲密关系的绝对性，而是安布罗西乌斯个人拥有这个绝对的条件。

我们来观察一下安布罗西乌斯就任主教后的帝国动态。

公元374年：安布罗西乌斯就任主教。

公元375年：瓦伦提尼安皇帝猝死。同年，瓦伦提尼安之子格拉提安继位，出任帝国西部的皇帝。帝国东部继续由瓦伦斯皇帝统治。

公元378年：哈德良堡战役，罗马军惨败在哥特人手下，瓦伦斯皇帝战死。

公元379年：狄奥多西代替战死的瓦伦斯皇帝，担任帝国东部的皇帝。帝国西部仍然由格拉提安统治。格拉提安同父异母的弟弟瓦伦提尼安二世，虽然是意大利地区的皇帝，但因年纪尚幼，实际由其生母贾斯蒂娜摄政。这位前皇妃除了是阿里乌斯派狂热的信徒之外，别无所长，因此，年幼的皇帝并不具备政治上的意义。

因此，对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而言，关键人物只有两位——帝国西部的皇帝格拉提安和帝国东部的皇帝狄奥多西。这两位皇帝排挤异教徒的态度趋向明朗化，是从公元380年开始的。以这一年为基准，主要政治人物的年龄分别是：

格拉提安皇帝：21岁。

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9岁。

狄奥多西皇帝：32岁。

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50岁。

此外，还需要附加以下的条件：

格拉提安皇帝：这位年轻的罗马皇帝，是罗马化蛮族的第三代，生长在罗马皇帝理当皈依基督教的时代。在当时，通常成人后才接受

洗礼，因此不清楚他是否受过洗礼。他在年幼时就对基督教怀有好感，成为皇帝之后，更倾向于三位一体派。据说这也是因为三位一体派的安布罗西乌斯的影响。

狄奥多西皇帝：这一位原本并非基督徒，他登基后的第一年，在与蛮族作战时，可能是辛劳过度，入冬后得了重病。他在希腊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过冬时，塞萨洛尼基的主教前来探望，就在他徘徊于生死边缘之际，主教紧握着他的手，为他施了洗。

我本人是一个不会被什么真神的教诲所打动的顽固的无神论者。即便是被威胁说死后会下地狱，也不为所动，因为没有人见过地狱，又何以证明它的存在。不过，这对古代人来说，可能行不通。希腊人相信有一个阴暗冷寂的冥府存在，罗马人则相信，人死后灵魂会被两位天使抬着，升向天堂。对于习惯于这种思维的古人而言，下地狱受难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新概念。正因为以前没听说过，才会更有恐惧感。尽管在战场上狄奥多西是一位勇敢的总司令，但他毕竟还不到33岁，也许是死后下地狱的不安和恐惧，让他接受了主教巧妙的宣导。

总之，狄奥多西接受了洗礼，成了基督徒，即成了上帝的“羔羊”。他必须听从主教这个“牧羊人”的引导，因为上帝赋予主教向信徒传达他的指示的资格。

此外，皇帝与主教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信徒。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皇帝的权威和权力，并非人类赋予，而是上帝所赐。而传达天意的资格，又掌握在主教的手中。换言之，只要主教愿意，可以以上帝的名义更换皇帝。如果想避免这类事情发生，就得像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那样，临终前才接受洗礼。

可是，狄奥多西在33岁之前，就接受了洗礼。不知真是上帝保佑，还是因为年轻体质好，他的身体没过多久就痊愈了。第二年又精

神抖擞地投入治国大业的狄奥多西，深信这是因为受洗而蒙受了上帝的恩宠。

虽说形势良好，有利于安布罗西乌斯同帝国两位最高权力者建立起紧密的关系，但如果他只是坐享其成，就不会对两位皇帝产生太大的影响。安布罗西乌斯曾经担任高级官僚20年，他非常清楚，应该从哪里下手才能深深地影响权力者，那就是找出权力者最需要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有着其他主教无法比拟的高超技艺。

在那个年代，即使贵为主教，也有不少人出身贫贱，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教养。在这些人中间，安布罗西乌斯简直就是鹤立鸡群。他不是凭借容貌，而是靠着良好的教养、清晰的头脑以及使用精妙的语言说服众人的能力。那个时代的皇帝们，除了尤里安之外，全都是不靠书记官连一篇文章都写不了的人物。

这样的皇帝需要优秀的外交官。不管是向其他皇帝派遣使节，还是与反叛的军团长交涉，或者是和蛮族人的首领谈判，都需要优秀的人才，能让对方折服，从心底发出“不愧是罗马皇帝的特使”的感叹。而安布罗西乌斯在世俗之人的眼中，是立场中立的神职人员，再加上他20年的官僚经验，无论是作为使节出访，还是书面交涉，对他而言，不过是以前工作的延续，驾轻就熟。因此，他首先以担任外交使节的方式，向皇帝卖了个人情。

除此之外，统治者经常会面临定夺决断的情况。在决策前，最好能有一位既能给出意见，但又不是家臣的人物。作为主教，安布罗西乌斯的立场脱离了世俗上的利害关系，是最适合的顾问人选。这项顾问工作，他同样做得得心应手。

从特里尔沿着摩泽尔河顺流而下，就可到达莱茵河。因此，长久以来，这里一直是莱茵河防线的后方基地。安布罗西乌斯有时候会去特里尔，拜访在那里的格拉提安皇帝，有时候又会前往希尔米乌姆，

晋见狄奥多西皇帝。如果两位皇帝中的一位去米兰，安布罗西乌斯一定会亲自迎接大驾。只要皇帝开口，他会毫不迟疑地接下外交使节的任务。这就是两位皇帝与米兰主教之间的关系。不过，安布罗西乌斯与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之间，没有形成如此紧密的关系。因为少年皇帝被信仰阿里乌斯派的母亲所操控，对于一心想排除阿里乌斯派的安布罗西乌斯而言，见面也是白费工夫。

“异教”和“异端”

公元380年到395年的15年，是基督教获得全面胜利的最后阶段。拉开这场胜利序幕的，就是被安布罗西乌斯操纵的格拉提安和狄奥多西皇帝，向“异教”和“异端”同时全面宣战。

有关“异教”，想来无须再作说明，就是基督教以外的其他所有的宗教。希腊罗马的传统宗教、诞生于叙利亚的太阳神以及同样起源于叙利亚的密特拉神（Mithras）、来自埃及的诸神、迦太基的塔尼特（Tanit）女神等，毫无疑问,都属于“异教”。除了这些多神教之外，一神教的犹太教，在基督教眼中也属“异教”。

而“异端”则是指除了信仰三位一体说的天主教以外的基督教内部的其他宗派。一神教的教义（Dogma）就是神的旨意。然而，有多少人解释教义，就会出现多少种教派。聚集主教召开大公会议，目的就在于统一对教义的解释。然而，大公会议的决定并不能消除纷争，因为这不仅是信仰的问题，还涉及对教区支配权这种世俗权力的争斗。

因对教义的解释不同而产生的宗派数量众多，仅目前了解的就超过10个派系。其中势力最强大的，当属三位一体派和阿里乌斯派。

三位一体派从这个时期开始，改称天主教。它主张圣父及其儿子耶稣同质，再加上圣灵，合为三位一体。在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公会议上，君士坦丁大帝将三位一体定为正统的教义。

另一派的阿里乌斯派，由阿里乌斯主教所提出，认为耶稣接近于神的存在，但不是一个完全的神。在尼西亚公会议上，阿里乌斯教派一败涂地，阿里乌斯及其同志遭到流放，但教派的势力并没有从此衰退，因为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以及瓦伦斯等统治帝国东部的皇帝，都是阿里乌斯派的信徒。

但之后在帝国西部崭露头角的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属于三位一体派，而且当朝的两位皇帝——格拉提安和狄奥多西都深受他的影响。对这三位而言，首先要除去的“异端”，非阿里乌斯派莫属。

我个人认为，安布罗西乌斯加入三位一体派，并非出于他本人对教义的理解，认定三位一体说正确，阿里乌斯教派是谬论。这位原本是高级官僚的主教，试图以“牧羊人”的身份，引导帝国走向基督教国教化。要达到目的，必须壮大基督教教会的势力，而强化教会的关键就是内部的统一。他的这个想法，与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亚公会议上的态度相似。安布罗西乌斯选择三位一体教派，恐怕不是站在宗教的立场，而是以政治家的角度作出的决定。从此人一贯的言行来看，无论怎么分析，都找不到任何对宗教的狂热性。

基于上述原因，在阿里乌斯教派占上风、当朝皇帝狄奥多西却是天主教徒的帝国东部，爆发了排除异端的行动。事件的导火线是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阿里乌斯派独占了半个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席位。

首先，狄奥多西皇帝逼迫这位阿里乌斯派的主教，改宗信仰三位一体。拒绝改宗的主教遭到流放。

可是，虽然如愿地赶走了阿里乌斯派的主教，却找不到三位一体派的人来接替位置。帝国东部传统上一直属于阿里乌斯派的阵营，三位一体派的信徒甚少，要找到一位适合担任帝国东部首都的主教人选，并非易事。结果一位元老院议员被选中，他匆忙接受洗礼后，像安布罗西乌斯一样，从教会金字塔的底部迅速登上顶端，坐上了主教的位子。

君士坦丁堡主教易主，意味着天主教在阿里乌斯派长期占有优势的帝国东部，重重地打下一根桩子。这也使得帝国东部不得不颠倒行动顺序，先排除“异端”，再对付“异教”。

排斥“异端”

狄奥多西皇帝视“异端”为破坏基督教教会团结的罪魁祸首。从公元380年到395年的15年间，仅是针对排除“异端”，就颁布了15道法令。根据研究人员的讲法，实际颁布的法令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可见，他铲除“异端”的意志有多么坚定。

首先，他要求“异端”者改宗，当然是要求他们改信正统的天主教。但他面对的，是一批对自己的信仰确信无疑的信徒，很少有人屈服于强权而改变信仰。狄奥多西皇帝不得不连发几道敕令，严厉惩罚违反者。

敕令中严令禁止的“罪状”，有以下几条：

传播异端教诲。

聆听异端教诲。

聚众聆听异端教诲。

向聆听异端教诲的信徒提供场地。

得知异端者聚会，却知情不报（司法相关人员）。

除以上几条之外，无论是“异端”还是“异教”，场合不分公开或私下，所有相关的弥撒或祭拜活动，一律禁止。违反者将没收所有的财产，上缴国库。敕令公布之后，在实际中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违法者不仅财产充公，而且还会遭到流放。不过神职人员和一般信徒的处罚形式有所不同。

对神职人员，主要是剥夺其免税等优惠待遇，以及流放远疆。针对一般的信徒，以罚金为主。一个人犯规一次，必须缴纳10罗马磅的黄金。但如果屡次违法，无论神职人员还是一般信徒，都会被处以死刑。随着法令的出台以及实施，渐渐地出现了基督徒遭受同门迫害甚至产生殉教的现象。

仅以上这些现象，就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中世纪，而实际情况更为严重。

敕令规定：不服法规者，禁止与他人交往。用日语来形容，就是断六亲。之后在中世纪横行猖獗的“破门令”，正是源自这条敕令。

另外一项，是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搜寻、告发和审判异端者。这个叫“圣公所”的机构，就是在中世纪兴风作浪的异端审判和女巫审判的前身。与中世纪唯一不同的，就是当时的法官还不是神职人员。

这就是在狄奥多西统治下的帝国东部对“异端”打压和迫害的事实真相。阿里乌斯教派虽然没有被彻底消灭，但受到致命性的打击，彻底丧失了支配教会的势力。

另一方面，在格拉提安统治的帝国西部，基督教的渗透速度原本就比较缓慢，势力相对于东部较弱。在教会内部，各宗派围绕教义的抗争，始终是三位一体派处于优势。因此，帝国西部打压异己的行动，矛头直指“异教”。

这一切是从格拉提安拒绝出任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开始的。

排斥“异教”

罗马人以及人民共同体罗马的三大守护神分别是：最高神朱庇特、朱庇特之妻朱诺和智慧女神雅典娜。而在主持罗马国家宗教活动的大祭司、祭司中，地位最高的就是大祭司。这个官职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罗马建国时期。进入共和时期之后，唯有经历过所有其他公职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这个唯一的终身职务。共和时期的官职是复数制。即便是执政官也必须由两人担任。唯有大祭司是一个人担任的特殊职务，而且通常都是由德高望重、功成名就的老人担任。当年，刚满37岁的尤里乌斯·恺撒竞选此职并且当选时，元老院上下一片惊讶。大家惊讶，说明没有发现其中的特别之处。恺撒之所以要做大祭司，是他看到了它是唯一的终身职位，没有同僚，同时又站在管理罗马公民宗教意识的立场，非常有利于他在政治上的推进。



格拉提安

恺撒的政治谋略，不折不扣地被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所继承。从他开始，罗马皇帝兼任大祭司成了传统。就连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被教会尊奉为“大帝”的君士坦丁，在担任一国之君的同时也兼任大祭司。不仅如此，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等亲基督教的皇帝们，无一例外，都出任这个负责拜祭异教神的最高长官。因为，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的那些亲教会的皇帝，至少在公开场合，还遵照“米兰敕令”的原则，承认所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正因为如此，格拉提安皇帝拒绝出任大祭司的决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首先，在信奉多神教的古代世界，个人的信仰与个体组成的国家信仰是同时存在的。换言之，在古代没有不信仰神灵的个人，也不存在没有国家宗教的国家。

作为古代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拒绝出任掌管国家宗教的大祭司，意味着这个宗教已经不再是国家的宗教。同时，也代表皇帝要用其他宗教取而代之的决心。皇帝的这一举动，推动社会向否定信仰自由的时代迈出了明确且关键性的一步。

虽然那时的格拉提安皇帝尚未发表宣言，将主张三位一体的天主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他只是用行动向世间表明，罗马传统的宗教不再是国教。不过，因为他的这个决定，基督教成为国教可以说是指日可待。

紧接着，格拉提安皇帝废除了自罗马建国以来就存在的女祭司制度。从此之后，维持女祭司体系所需的经费，不再从国库中支出。这些将处子之身奉献给天神、备受人民尊重的女祭司，除了消失别无他选。与她们一起消失的，还有另外一件东西，那就是在古罗马广场中央一座圆形的小神殿中燃烧的“圣火”。它在经历了1 135年的岁月之后，终于熄灭。

格拉提安皇帝针对“异教”的宣战，没有就此收手。他又没收了“异教”神殿的经济来源。罗马的传统宗教没有专业的祭司阶层，大祭司、祭司都是由市民兼职，因此，它不像拥有专门的神职人员的基督教教会那样，需要庞大的经费。传统宗教的基本经济来源，主要是一些果园和葡萄园，就连这些不起眼的财产，也统统遭到没收。

形势发展至此，接下来的目标就很显而易见。所有的神殿，不管祭拜的是哪一方天神，一律关闭，就连街头巷尾的寺庙也无一幸免。那时，举办祭祀仪式将被处以死刑的对象，还仅限于官方，即国家、地方自治体以及各行业工会等，尚未涉及私人，也就是说，允许个人在家中举办祭祀，不过，这个许可也没能维持多久。

格拉提安皇帝以排除“异教”为目的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的最后一项，是拆除胜利女神像。自共和时代开始，女神像就放置在元老院议

事厅的正前方。当初，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就想撤了这尊雕像，结果没有行动，就这样又过了30年。

根据史料的描述，女神站在圆形的地球上，伸展双翅，左手拿笏，右手握着长枪。每当元老院举行会议时，议员们先在这座象征罗马胜利的女神像前面，焚香祈祷，祭拜之后，才正式开始会议。这项保持了至少500年的传统，如今要遭格拉提安皇帝的废除。元老院议员上书请愿，请求皇帝撤销这个命令，可信并没有传到皇帝的手中。

公元383年，驻守不列颠的军团司令官马克西穆斯（Maximus）举兵造反，那时正好在巴黎的格拉提安皇帝逃跑时，遭遇叛军围攻，被杀身亡，年仅24岁。

帝国西部的皇位，因格拉提安的死亡出现空缺，而有资格的继承人瓦伦提尼安二世只有12岁，帝国东西两部，事实上变成了由36岁的狄奥多西一个人统治的局面。这也意味着，帝国不分东西，全境都如安布罗西乌斯所愿，继续向基督教国教化的目标迈进。

公元383年，西部皇帝格拉提安被杀时，东部的皇帝狄奥多西36岁。12岁的瓦伦提尼安二世继承皇位，成了形式上的西部皇帝。这位少年皇帝一向软弱无能，最终被人赶出了意大利。他向东逃跑，打算向狄奥多西求救，在抵达希腊的塞萨洛尼基时，却因为一点小事，结果被家臣杀害。据传，与家臣激烈地争吵之后，皇帝进入卧室就寝。第二天早晨，他被发现时已经是冰冷的尸体。瓦伦提尼安二世死于公元392年，年仅21岁。这位4岁就坐上皇位的儿皇帝，一直在其母贾斯蒂娜的操控之下。而阿里乌斯派的狂热信徒贾斯蒂娜，也因阿里乌斯派遭到打压和迫害，在几年前郁郁寡欢地离开了人世。

不少研究者认为，狄奥多西一人统管帝国全境的时期，应该从瓦伦提尼安二世被杀的公元392年开始，到他去世的395年，总共3年时间。

而我则认为，应该是从格拉提安被杀的公元383年到公元395年的12年。在不列颠发动叛乱并杀死了格拉提安皇帝的马克西穆斯将军及其手下势力，要到5年后，即公元388年才被歼灭，马克西穆斯被杀，叛乱事件正式告一段落。而当时率领军队去镇压叛军的，是狄奥多西，而不是瓦伦提尼安二世。

狄奥多西尊重遇害的格拉提安的意志，没有夺取瓦伦提尼安二世的皇位，一直到公元392年，这位傀儡皇帝被杀之后，他才收获了西部皇帝的位子。话说回来，在这9年里，罗马帝国实际上掌握在狄奥多西一个人的手里。这也意味着，格拉提安皇帝生前实施的基督教国教化的政策，并没有因他的死亡而中断，在狄奥多西的统治之下，继续贯彻落实。前文所提到的拆除元老院议会厅前的胜利女神像，就是一个例子。围绕这个问题，公元4世纪末期，罗马帝国最有代表性的两位知识精英，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其中一位站在异教徒的立场，而另一位则站在基督教一边。

论战

昆图斯·奥勒里乌斯·西马库斯（Quintus Aurelius Symmachus）公元340年出身于首都罗马。他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公职经历，与比他年长10岁的安布罗西乌斯极其相似。不过，我们知道他的全名，即个人名加家门名和家族名，这说明他与安布罗西乌斯不同，在任职期间没有被基督教教会“挖角”，变成基督徒。

他们两人有一点不同，安布罗西乌斯是在他担任高官的父亲的赴任地特里尔出生的。而西马库斯虽然出生在首都罗马，父亲却是高卢出身的高级官僚，用罗马人的说法，属于“高卢裔罗马人”。

不过，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歧视之意。被同代人称为“黄金世纪”（Saeculum Auureum）、被后世称做“五贤帝时代”的公元2世纪的5位皇帝当中，有4人出身于行省。图拉真、哈德良、马可·奥勒留是“西班牙裔罗马人”，安敦尼·庇护则是“高卢裔罗马人”。所以，在罗马帝国，行省出身并不算什么大的缺陷。

与安布罗西乌斯出身于首都的父亲一样，西马库斯的父亲最后也成了“首都长官”，这个位子在当时是高级官僚中的最高阶位。由于皇帝不常在首都，“首都长官”就成了皇帝的“代理人”，也就是说，西马库斯和安布罗西乌斯都是皇帝“代理人”（vicarius）的儿子。

当然，西马库斯也接受了被后世称为“教养科目”的全套教育，之后走上公职之路。这是出身于统治阶层的年轻人的必由之路。因为是良家子弟回馈社会，不取俸禄，所以，在共和时期以及元首制时期，都被称做“光荣职务”（cursus honorum）。到了帝国后期，整个情况有所改变，以下是4世纪时，“光荣职务”的一个过程：

首先，在20多岁时，从财务检察官（quaestor）开始，期满后进入元老院，成为元老院议员（senator），之后竞选法务官（praetor），当选后去地方上工作。在经历了意大利半岛内的总督（governatore）职务之后，升任执政官（consul）。尽管执政官这个位子如今已有名无实，不过，帝国的各个行省是由总督（proconsul）统治的，而担任总督需要有当过执政官的经验，即获得“前执政官”的身份。经历了以上这一系列的公职之后，最后攀升至官僚阶位的最高峰——首都长官。

安布罗西乌斯就是在意大利半岛内担任州长时，被基督教教会看中，“光荣职务”生涯因此中断。而没有被基督教看上的西马库斯，在他44岁时抵达了“光荣职务”生涯的终点站，就任“首都长官”。不过，他还在20多岁担任财务检察官、尚未有资格进入元老院时，就被皇帝

看中了。如果只对比“光荣职务”，西马库斯的起步要比安布罗西乌斯来得光鲜亮丽。

被皇帝选中的西马库斯所担任的官职，拉丁语称为“comes tertii ordinis”。“comes”，原意是皇帝的友人，不过那时已经是一个类似“内阁幕僚”机构的代名词，所以他的职位大概相当于“内阁幕僚直属秘书”。尽管阶位不高，但随时能见到皇帝，皇帝去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当年提拔年轻的西马库斯的，是瓦伦提尼安一世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将帝国东部交给弟弟瓦伦斯，自己负责动乱的西部，10年的在位时间，都是在与蛮族作战中度过。西马库斯是在瓦伦提尼安一世在位最后的6年担任秘书的，因此，他经历过与蛮族对决的战争场面。不过，那时文官与武官职务分离的制度，已经实施了80年，即便是上战场，他也是以文官的身份，因此没有率军打仗的经验。尽管如此，西马库斯还是和从来没有见过战场的安布罗西乌斯不同，他在很年轻时，就目睹了总称北方蛮族的日耳曼人起兵获胜、失败投降，乃至于愿意与罗马人和平共生的光景。

西马库斯与皇帝如影相伴的生活，最终也是由瓦伦提尼安一世给画上了句号。公元373年，33岁的西马库斯被任命为阿非利加行省总督，前往迦太基赴任。当时的北非，正处于沙漠游民侵袭和居民叛乱的困难时期。军事上的问题，需要被派来的狄奥多西的父亲去解决，而民政则是担任总督的西马库斯负责。

西马库斯在北非没多久，瓦伦提尼安一世皇帝猝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年轻有为的他在卸任阿非利加行省总督之后，再也没受到重用。目前唯一清楚的，是他之后担任了卢卡尼亚·布鲁蒂姆（Lucania Bruttium）州的州长，这个地区位于长靴形的意大利半岛的鞋尖。除此之外，他还担当过“祭司长”（Pontifice Maiore）的宗教职务。格拉提安皇帝拒绝出任大祭司，导致祭司们的威信扫地。而西马库斯不仅

没有扔掉异教徒这件日渐破旧的外衣，而且堂堂正正地把它穿在了身上。难怪他会被后人称为“罗马古老异教最后的荣耀之火”。

公元384年，44岁的西马库斯被任命为首都长官。由于委任者是皇帝，相信狄奥多西只打算让西马库斯做一个自己的“代理人”而已。不过，首都长官同时也是首都罗马的最高行政负责人，他必须顺应民意，实施政务。从西马库斯上任后的表现来看，他似乎是努力去做一个行政官，而不是“代理人”。

首都长官西马库斯与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的论战，并不是两人同时站在狄奥多西皇帝的面前，唇枪舌剑地直接辩论，而是西马库斯上书请愿，恳请皇帝将从元老院议事厅拆走的胜利女神像，重新搬回原地。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对此反对，也写信给皇帝。就这样，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安布罗西乌斯在信中，针对西马库斯的陈述内容，一条一条地进行了反驳，可见，他通过某些渠道，事先得知了西马库斯信的内容。

总之，这是一场公元4世纪罗马两位知识精英的论战。他们的出身背景、所受的教育以及前半生的经历，几乎完全一样。一位代表即将消失的文明，另一位代表正在蓬勃升起的文明，以言论为武器，开辟战场。我用“战场”而不是用“法庭”来形容，是因为在这次论战中，没有保持中立的裁判官。双方诉诸的对象都是皇帝，而这位皇帝，又与类似检察官角色的安布罗西乌斯关系密切。

对两人的书信，我将省略开头的寒暄部分，全文介绍给大家。虽然内容冗长，但仅作简要介绍就失去了意义。只有对两人的论点以及修辞技巧，作一个忠实的回顾，才能了解罗马帝国末期思想发展的状况。

以下是首都长官西马库斯上书皇帝的信件内容：

除了对荣光的强烈追求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对我们祖先所创立的法律、以法律为基准的卫国行为有所帮助？只要您不违背我们父辈们所理解的事情，相信荣光将继续与您同在。

我们（罗马元老院）在此向您（皇帝）郑重请求，宗教是祖国长享荣光的重要原因之一，请您务必慎重考虑。

历代所有的皇帝都明确公开自己的宗教之心。从前的皇帝，像他们前任一样，尊敬传统之神。而近年的皇帝，即使没有敬意，也不排斥。如果您不愿承袭过去的传统，那么依照近来的惯例行事，应该不是难事。

不尊重胜利女神所象征的思想之人，如同蛮族。即使您不承认它的神性，也应该体恤我们长年以来对女神之敬意。恳请您归还神像，让其回归原本之地。

皇位安泰之根本，是对敌的胜利。这个事实将来也不会有所改变。看到胜利女神的微笑，相信也是您心中所盼。每一个人都希望胜利女神保佑自己，如果有机会向它祈求，谁都不会拒绝。既然是众人所望，那么无论是谁，都没有权力去妨碍和排斥。坚持拆除胜利女神像，会成为打击众人希望的挑衅之举。女神像作为元老院的象征，历史久远。无论您信奉与否，至少应该对长久以来慰藉我们祖祖辈辈心灵的神像，心存敬意。

我们上书，不仅是请求您撤销拆除神像的命令，也希望能够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将幼年时父亲教导我们的事情，继续教给我们的孩子。对于期望终生行善者而言，没有比热爱传统更伟大的事情。我们虔诚地祝福您流芳百世，对于您作出的有伤名誉的决断，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必须高声疾呼敬请改正。

胜利女神不在的元老院，我们如何发誓忠于国法？以何等权威来震慑伪善之辈？如果人人都私自滥用权威，权威本身将毁于一旦，虚伪的誓言将充斥于世。解救我们脱离这种毫无权威的无政府状态的，就是胜利女神像。

即使在首都以外的帝国各地，人们也在奉献给这座神像的祭坛前，相互承认各自的存在，个人向国家宣誓效忠，统治者为其政策赋予权威。没有比在祭拜前宣誓，更有助于帝国的完整。

缺少了象征的元老院会场，迟早会变成虚伪与不正的巢穴。集臣民敬意于一身的皇帝势必不愿见此情形。臣民对您的忠诚，要有所本才能有效。

根据传闻，最初考虑撤走神像的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然而，不是所有的前例都需要遵循。君士坦提乌斯创下的业绩中，还有很多可以依循的政策，您不妨斟酌考虑。

例如，他没有取消女祭司享有的特惠。他视祭司为诸多公职中最高贵的职位，予以尊重。对罗马国宗教所需的费用，从不拒绝支付。当他访问首都罗马时，走遍了这永恒之都的每一个角落。出席元老院会议，四处拜访神殿，朗诵神殿正面墙上刻着的天神的名字。当他拜访那些朝拜者络绎不绝的圣殿时，会问其渊源，对建造这些神殿捐赠给民众的先人，赞不绝口。他个人的信仰已经不是秘密。但他仍然决定，为了帝国的民众，有必要留下这些记载帝国荣光的纪念碑。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有相应的信仰对象。每个城市也有各自的守护神。正如每个人在出生时就具有独自的精神，各个民族都存在着不同的“神灵”（拉丁语：genius），掌控着民族的命运。而国家宗教，就是统合个人精神和各民族的神灵，引导它们通向至高无上的天神。

人的理性存在极限。除了回顾自己的历史，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弥补理性的不足？要建立未来的繁荣，最好的方法就是回顾以往的成就。而这些光荣的过去，都是在我们的祖先敬仰的诸神的庇护之下功成名就的。

现在，所有的罗马人都希望您能深思熟虑，恳求您这位出类拔萃的皇帝、国家之父，尊重古往的历史。

这一切对我个人而言，意味着我可以继续奉行古老的仪式，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毫无遗憾和羞耻地走完人生。

罗马自古以来的宗教促进了帝国的统合。我们在信仰的支配下奉献牺牲，让汉尼拔远离罗马的城墙，将高卢人赶出卡匹托尔山（Campidoglio）。我在这样的教诲下长大成人，为何要在鬓白如霜的年纪否认自己的过去？即使这些想法不合时宜，但对我这样的人而言，如今改宗为时已晚，更不能忍受的是有损自尊心。

我向您乞求，让长年以来成为我们精神食粮的罗马诸神保留原样。我认为，把一尊神作为所有人的精神食粮，不符合自然的人性。

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星空之下，受到同一个苍天的庇护，被同一个宇宙包围。生活在此之下的每一个人，即使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有所不同，又能造成多大的问题呢？我以为，光凭一条通道，不能解开如此巨大的生命秘密。

如果在天上的君士坦丁大帝，看到祭司们掉下的眼泪，不知会作何感想。会不会认为这违背了他曾经的宣言，一切宗教信仰平等的宽容精神受到了侮辱？如果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真的是第一个提出拆除胜利女神像的人，那么他一定是轻信了近臣的谗言，那些人不懂得女神像对元老院之意义。修正轻率的决断，是一个正确的举动，不会损害先帝之名誉。因为倾听公民的心声，修正以往的政策，是皇帝责任所在，也是我帝国优良的传统。

以上就是被称为“罗马古老异教最后的荣耀之火”的44岁的男人的心声。以后世的眼光来评判，他反对拆除胜利女神像的这番言论，似乎是陈词滥调，与公元4世纪罗马的现状格格不入。当时的罗马与胜利的缘分愈来愈少，而元老院已很久不问国政。让胜利女神一如元首制时代那样，继续站在元老院议事厅前，等着议员们祭拜，然后这些人再去讨论一些毫无实质性的话题，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

难道说西马库斯不知道这是时代错误吗？其实他是知道的。但他明知如此，还是做了超出职责范围的事情，给皇帝写了信。因为他对拆除女神像的行径，如果置之不理，就等于是在最后一道堤防面临崩溃时袖手旁观。一旦决堤，滚滚的洪水就会汹涌而来，所有的东西都将付诸东流。这是他奋笔疾书的动机。而他的这番心思，被安布罗西乌斯彻底看透。

米兰主教的信是呈给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的。这位高官出身的人，是不会不知道国家的大权实际掌握在谁的手里。因此，这封信名义上写给12岁的傀儡皇帝，实际上是给当时掌权的36岁的狄奥多西皇帝看的。事实上，12岁的皇帝收到信后只字未读，而36岁的皇帝倒是真的看了全文。4年前，狄奥多西接受洗礼，正式成了基督徒。当他听说身为引领教徒的“牧羊人”、传达天意的主教有书信呈上，他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当时54岁的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写给皇帝的信件，是这样开始的：

> 听闻声名显赫的首都长官阁下，以永远之都的名义向您请愿，哭诉着要坚守古代宗教，我也禁不住提笔。
>
> 首先，我想问他，当年是依靠什么神技，守住了被汉尼拔围攻的罗马城？又是如何将高卢人赶出了卡匹托尔山？
>
> 再者，他列举了所谓的优秀宗教的有效性，却不言及其弱点。倘若真是那些天神与汉尼拔战斗，那么他们怎么会容忍汉尼拔攻打至首都罗马的城下？高卢人放弃卡匹托尔山，不是因为在他们准备进攻时，鹅的鸣叫声让罗马人发现了敌情吗？那时候守护神朱庇特在哪儿？难道说是朱庇特化身为鹅，保护了罗马？
>
> 退一步说，就算他们长年信仰的诸神帮助了罗马军团。可是，汉尼拔也信仰诸神中的一尊天神。这就是说，天神应该平等地保佑罗马和迦太基，为什么最终是罗马获胜，而迦太基失败了？

另外，他强调的所谓收到民众含泪请愿，没有什么事实根据。他完全不了解民众的心声。民众常问，为何每逢祭拜日，都要将贵重的家畜，用在那些毫无效力的牺牲仪式上?

胜利不是藏在那些成为祭品的家畜的内脏中，是战士们奋勇作战赢得的。它靠的不是诸神的保佑，而是坚强的意志。

把攻打卡匹托尔山的高卢人踢下悬崖，拔下他们插在卡匹托尔山上旗帜的，不是献祭仪式，而是当年罗马人的勇气。战胜汉尼拔，同样不是祈求诸神保佑的结果，是那个时代的罗马人大胆果断地进攻了汉尼拔的故国。

还有，西马库斯的话题为何总是围绕着以往罗马如何的伟大?我可不想和尼禄皇帝信仰同一个神明。

此外，蛮族问题并非一日之寒。那些苦于蛮族入侵的皇帝，难道是他们藐视传统，才因此受苦受难? 其中一位瓦勒良皇帝成了敌国波斯的俘虏，另一位皇帝伽列里乌斯让帝国支离破碎。在那些不幸的日子里，伫立在元老院议事厅前的胜利女神又做了些什么?

我为自己的祖先犯下的过错感到羞耻。但更感羞耻的是不愿改变的心情。从失败中学习教训，永远不晚。然而，勇气有年龄之限制。一旦老化，就再也没有勇气去纠正错误。

他们举办的牺牲仪式，不过是在祭坛上屠宰家畜，喷洒热血。似乎只有牺牲的家畜，才能传达神的声音。

探求世界的秘密，应该交给创造世界的唯一真神，不能依靠对自身都一无所知的人类。

西马库斯说，仅一条通道不足以探索世界的秘密。然而，他所谓的秘密，对我们基督徒而言，通过神的声音已知晓答案，不再是什么秘密。他们试图寻求的事实真相，我们在神的智慧和真理的赐教下已经明晰。他们异教徒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向皇帝祈求，给予他们的神明以安宁，我们则向基督祈祷，赐福和平于皇帝。这些人有资格谴责抛弃旧习的我们吗?

> 一日之始，不是立即就能获得阳光的恩惠，等到太阳渐渐升起，光芒灿烂，才备感温暖。四季之初，大地荒芜尚未播种，但只要我们沉住心神努力耕种，必有丰硕的收获。非难我们基督徒的人，总有一天会后悔不已，破灭的日子即将到来，因为太阳终会驱赶黑暗。
>
> 对基督教教会而言，收获是满怀喜悦的希望，是圣人们所讴歌的春天时代的开始。这般喜悦将传遍整个世界。
>
> 基督教信仰不能救赎无知的灵魂。相信法律代表真理的那个文明已走向没落，光明属于勇于改过自新的人们。

我不是基督徒，因此对安布罗西乌斯的书信不作评判。只是有一个愉快的感觉，当初基督教教会选中这位没有受洗过的高级官僚当领袖，的确是慧眼识人。不过，他这种强硬的论调，也只有在事物刚起步、尚未暴露缺点时，才会有效。

至于这场“论战”的结果，相信不用说大家也清楚。狄奥多西采纳了安布罗西乌斯的意见，胜利女神像再也没有回到元老院。

这尊女神像至今下落不明，想必是在之后席卷整个帝国的破坏神像、雕像的风暴中，与其他物品一起遇难。不过，模仿地球制作的圆形雕像体积巨大，一个成年男子也很难抱起，它不是那么容易被破坏的，何况球形的物体非常坚固。说不定这个大圆球被遗弃在什么地方，至今还发挥着意义完全不同的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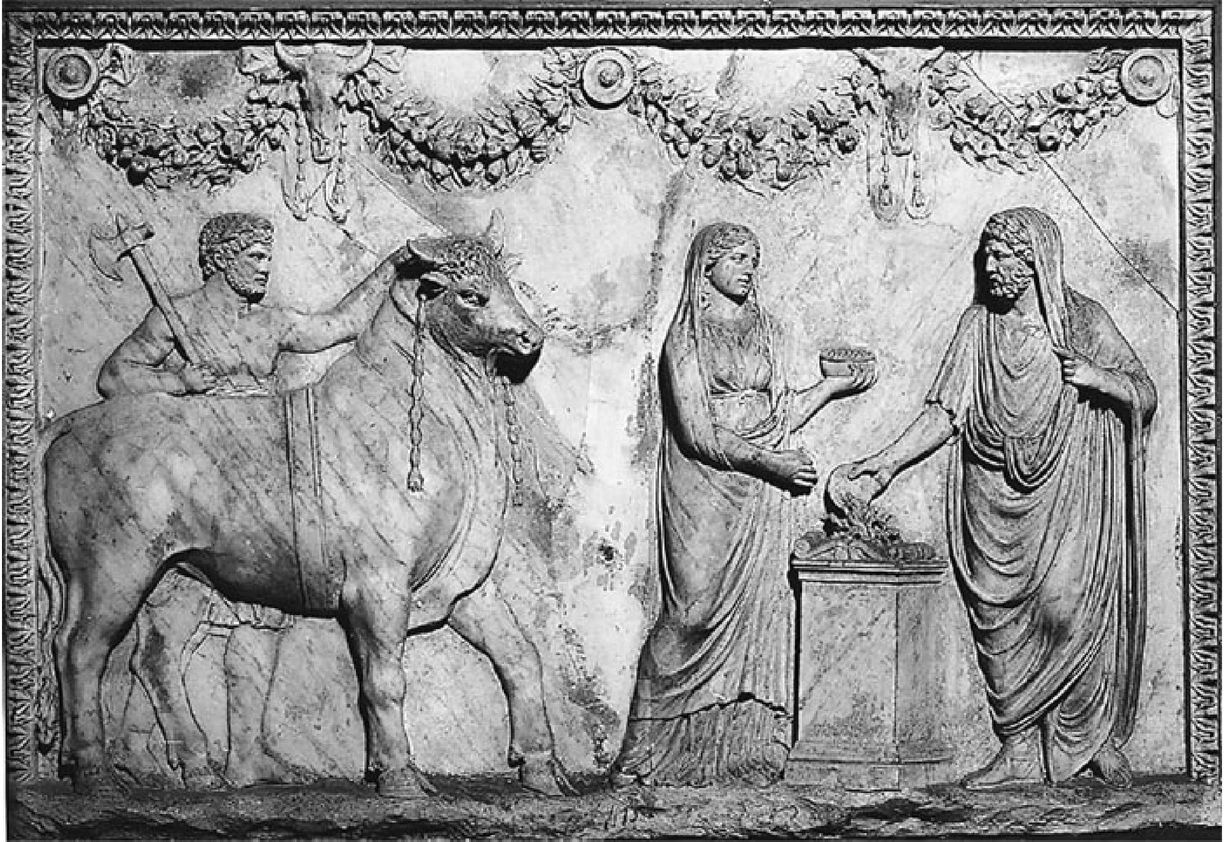
从大竞技场（Circo Massimo，又译马西莫竞技场）的遗址前往台伯河的途中，会经过柯斯梅丁圣母教堂（Basilica di Santa Maria in Cosmedin，又译希腊圣母堂）。这座教堂和其他教堂一样是在公元4世纪末，由原来的公共建筑改为教堂的。教堂入口处的前廊墙上，有一个称为“真理之口”的浮雕，据说撒谎的人把手伸进去，会被咬住不放。这个传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这里，排着长队跃跃欲试。

其实，这原本是古罗马时代把积在青石板路面上的雨水引入下水道的水沟上的盖子，在这个大圆盘上雕刻着河神的头像，而河神的嘴巴在2000年后就变成了“真理之口”。元老院门前胜利女神站着的那个圆球，说不定如今也在哪个广场或教会前，默默无闻地度着漫漫岁月。在现代的罗马寻找古时代的踪影，是一个不错的休闲方式。

基督（对异教）的胜利

接下来的话题要回到公元384年。这一年发生的西马库斯与安布罗西乌斯“论战”的最终结果，果真如西马库斯担忧的那样发生了。元老院议事厅前的胜利女神像被拆掉，这意味着异教罗马的最后一道堤防决堤。米兰主教的言论促使狄奥多西皇帝作出了违反君士坦丁大帝“米兰敕令”的决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反异教、反异端的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首先，原本被禁止的官方祭典，对象扩大到个人，从此，私人也不得举行祭祀活动。罗马人聚集家族各分支，祭拜家族保护神、共同缅怀祖先的传统活动，在信仰一神教的基督教看来，是崇拜异教的集会。另外，罗马人的家中一定会在面对中庭的一角，搭建一个祭拜家族守护神以及祖先的场所，类似于我们的供台。它也被视为偶像崇拜，强行拆除。如果有人敢于违抗，等待他们的是死刑。后人在庞贝古城遗址中，挖掘出数量庞大的各种小神像，如果火山爆发的时间不是在公元1世纪，而是4世纪，肯定是找不到神像的。



装饰花环的浮雕（献祭的场面）

以排除异教的名义所颁布的各种敕令中，还包括以下禁令：

在祭坛前点灯、焚香。

在墙面装饰鲜花。

向诸神以及先祖们敬酒。

罗马人特别喜欢花饰，他们用树叶和鲜花编织成花环，不是圆形的那种，而是长长地呈带状，色彩斑斓的花环放在白色的大理石或灰色的墙壁上，显得异常耀眼。只要有机会，罗马人就会把花环装饰在各种地方，它不仅仅是用来装饰祭坛，但从希腊时代开始，祭拜活动必有花环。

违反了以上这些禁令的人，虽然罪不及死，但会被处以罚金，而且必须用不受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的黄金支付。

当年基督教教会因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敕令”而向他奉献了“大帝”的尊称，他们又将此称号献给狄奥多西，因为他是首位将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即所谓的“异教”定义为“邪教”的皇帝。“异教”不过是与自己信仰的宗教不同的宗教，而“邪教”则是不当的、有害的、有违国家制度和道德必须铲除的宗教。

尽管基督教日益盛行，但罗马人仍然是一个尊重法律的民族。狄奥多西颁布的反异教、反异端的敕令，在半个世纪后被收录进狄奥多西二世编撰的《狄奥多西法典》。由此可见，这些敕令是作为国法制定的。对于法律民族的罗马人而言，“违法”比“邪教”的概念更容易理解。因此，公元4世纪之后，那些曾经频繁出现于文学、美术作品上的希腊或罗马诸神，全体都变成了“不法者”（outlaw）。既然是“不法者”，那么警察就完全有理由抓他们。

祭拜的神明成了不法分子，神殿的命运也就有了定局。根据狄奥多西的敕令，所有的神殿一律变成教堂。围绕内堂的圆柱间的空隙部分，用墙堵上，改造成封闭的空间。由于改造的部分只限于圆柱间的部分，因此原本意为“会堂”的basilica一词，一字不改地变成了教堂的意思。以往开庭审判的basilica，从此就是向上帝祈祷之地。

不过，在神殿改为教堂的事情上产生了一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供过于求。

罗马时代的诸神数，在鼎盛时期多达30万尊左右。供奉这些神明的神殿数不胜数，再加上街头巷尾的那些小祠堂，数量更是惊人。

而另一方的基督教，由于信奉的是一神教，而且当时尚未发展到像以后那样全体公民皆是基督徒的程度，所以，神殿改建成教堂之

后，却没有足够的信徒，出现空有建筑不见人影的情况。因此，狄奥多西皇帝同意拆毁那些无用的神殿。既然要打击非法分子，那么破坏他们的住所，就是理所当然了。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神殿内的材料就被允许挪作他用。然而，狄奥多西的这道敕令，为这些事实上的破坏冠上了宗教正义的大名。那些遍及罗马帝国全域、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丽的神殿，要么彻底消失了踪影，要么就是留下一个破落不堪的遗址。除了用来祭拜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之外，那些埃及、叙利亚的神殿同样也难逃厄运。

能够侥幸保存下来的，是那些变成了基督教堂的神殿。其中，万神殿就是最好的一例。这座雄伟的神殿，堪称是公元2世纪罗马建筑的顶峰之作。因为它是奉献给天地间所有的神灵，所以命名为“万神殿”。公元4世纪末之后，它也化身为献给一位天神的教堂。

神殿的命运如此，神像自然也是落得同样下场。在比公元4世纪末早60年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希腊罗马的各类神像，虽然已经渐渐地不再成为民众信仰的对象，但作为艺术品的价值还是得到认可的。

君士坦丁大帝建设了君士坦丁堡，将之打造成基督教的首都。因此在那里只有教堂，没有神殿。然而，大帝在建设这座冠以自己名字的城市时，始终以罗马作为参照，甚至把它叫做“新罗马”。他希望君士坦丁堡能够像充满了神像雕塑的罗马城那样，到处装饰着“古典之美”。根据当时的记录，他在整个帝国的东部搜罗了数以万计的雕像。原本安放在雅典帕特农（Parthenon）神庙中的雅典女神像，据说那时也被搬到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女神像由菲狄亚斯（Phidias）制作，堪称希腊雕像的巅峰之作。可见，雕像即使不再是神的像，艺术价值还是得到充分肯定的。

但是，到了狄奥多西时代，一切都发生了转变。神像成了当时基督教教会严禁的偶像崇拜的代表、邪教的象征，更是“不法者”的具体

形象。

当时的基督教教会禁止公共场合出现裸体，而绝大多数的神像又都是裸体。在希腊人及其继承者罗马人的美学定义中，裸体是人体美的极致，所以，这个至高之美，首先是奉献给诸神。除了神之外，也有裸体的罗马皇帝像，不过这要等他死后才会制作。过世的皇帝被神格化，所以与诸神拥有同等的资格。

基于上述原因，希腊罗马的雕像大多以全裸或半裸的形象出现，大街小巷简直就是裸体的长列，要将它们全数拆除，实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削去神像的鼻子，算是比较温和的做法，大多雕像被打断了头颅和手腕，分解了四肢。连这样的作业都嫌麻烦时，人们会直接将雕像从山上往山下的岩石上摔，或从桥上扔进河里，增大销毁的数量和速度。罗马人喜欢到处摆放雕像，只要是两侧竖着圆柱，中间呈拱形的场所，一定会放上雕塑。如果没有雕像，那就说明此地是供人通行的过道，或者拉上薄纱，享受着吹来的西风，乘凉休息。

除神像之外，罗马人重视历史，向来有纪念国家有功之臣的习惯。对于罗马男人而言，自己的雕像能够放在公共场合，是人生最高荣誉。因此，这类雕塑的需求量也不少，不仅首都，在帝国其他主要城市也随处可见。它们属于安布罗西乌斯所谓的“应该纠正的过去”，对于正在走向基督教国教化的帝国而言，同样是必须排除、销毁的对象。一旦抱有这样的观点，所有的东西就没什么艺术价值可言了。

罗马依仗着军事武力征服了希腊，将之归为属下的行省。然而，他们从心里赞赏希腊伟大的文化和文明，甚至留下了“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她野蛮的征服者”（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出自贺拉斯。——译者注）之名言。然而，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为止的古典

希腊的优秀作品，由于当时希腊的版图及其人口有限，无法满足罗马人的大量需求。

因此，罗马人除了模仿菲狄亚斯、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利西波斯（Lysippos）等天才艺术家的作品之外，也尽量忠实地复制了那些并非出名的希腊艺术品。虽然是复制品，却也不是谁都能制作。想得到最高级的复制品，就得依靠一流的艺术家。尽管进入公元之后，希腊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逐渐衰退，不过在制作复制品这个领域，希腊人始终独占鳌头。

罗马时代的复制技术极其高超，作品的质量已经超越了模仿的层次。这主要源自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热爱，以及长久以来始终保持的不问出身只看能力的宽容精神。正因为如此，在古典希腊作品的真迹出世两千四五百年之后，我们现代人还能够有机会见识与欣赏。即使这些作品标着“罗马时代的仿作”，它们还是有充分的艺术价值，摆放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中，向世人展示。

罗马复制艺术品的技术，据说在哈德良时代达到了最高峰。然而，才过了200年，到了公元4世纪，同样是罗马人，却要将以往花费了大量金钱购买的极其珍贵的艺术品，扔进河里，破坏殆尽。“宽容”（clementia）一词，词典解释为胸襟开阔，能够接受他人的想法。曾经是罗马人心目中德行之一的“宽容”，如今也随着艺术品一起，被丢弃、被毁灭。

在罗马列车的终点站附近，有一座被称为马西莫宫（Museo Nazionale Romano Palazzo Massimo alle Terme）的国立古代罗马美术馆，其中最精美的一件收藏品，就是哈德良时代复制的普拉克西特列斯的阿波罗神像。这尊神像虽然精美，但全身布满了现代技术也无法除去的暗斑。它在1891年从台伯河中打捞起来时，已经在河底的泥塘里沉睡了1500年。全身的斑点就是这千年来的污垢所造成的。

馆中其他的雕像，大多是在以复古为旗帜的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与阿波罗神像相比，它们苏醒的时间早了不少，但也在地下长眠了1000多年。而我们现代人专门去美术馆的目的，就是为了观赏这些从长眠中苏醒的艺术品。至少现在，这些雕像就算不再是人们信仰的对象，也可以作为美的对象被大家欣赏。而且，我们不会因为有这种想法，就被异教异端审判所判以死刑。

长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何在这些沉睡千年后被挖掘的艺术品之中，有一部分作品会保存得如此完好？它们毫发无损、没有瑕疵、四肢健全地留存至今。而大多的雕像不是断了手臂，就是少了一条腿，都需要在后世修补复原。

罗马卡皮托利尼美术馆（Musei Capitolini）中展示的“卡皮托利尼的维纳斯”雕像就是最好的一例，而且维纳斯像并非唯一的特例。尽管大多数展品都有明显的破损痕迹，但还是有少量的作品保存完好，只要将各个部位组装起来，就能恢复原状，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它们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



卡匹托尔山上的维纳斯



阿波罗（马西莫宫收藏）

每次看到这些作品，我脑海中总会出现一个假想，假想在公元4世纪末，有一些人将这些艺术品藏在石棺内，深深地埋入地下。

作为邪教的象征，成了不法分子的神像，根据皇帝的命令必须全部废弃。违令者将被没收财产并处以死刑。但持有人又不忍破坏或丢弃这些精美的作品，于是就在家中的院子里深挖一个大洞，用布将它们包好，或者是放在上流家庭用来作为装饰的石棺中，然后放进洞内，盖上土，装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心中暗暗期待，这股宗教狂潮能够早日过去，杰作重见天日的时代能够到来。

不过，要举例证明我的这个假设非常困难。虽然说对古代遗迹的挖掘，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在很长一段时期，挖掘工作都不是以学术性的态度、在严谨的操作下进行的，所以没有留下古迹出土时的有关资料。一直要到20世纪之后，才对挖掘经过作详细的记录。要证明这个假设，只有留待将来，等到现代的考古学家幸运地挖掘到近乎完整的神像的那一天。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只能眺望着完好无损或者说鲜有瑕疵的雕刻，猜想它们为何能在近乎完整的状态下，度过千百年的时光。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公元388年，是西马库斯和安布罗西乌斯以上书狄奥多西皇帝的形式，展开论战的4年之后。这一年，狄奥多西终于镇压了挑起内战、害死格拉提安皇帝的不列颠驻军司令马克西穆斯的叛军，结束了耗时5年的战争。自此，帝国东西两方，完全掌握在狄奥多西一个人的手里。虽然当时少年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还在世，不过，当名义上属于他管辖的不列颠和高卢发生动乱时，他还是不得不向负责帝国东部的狄奥多西讨救兵。因此，帝国的东部和西部实质上都属于狄奥多西一个人的天下。

这一年，41岁的狄奥多西带着镇压叛乱、处死叛军将领马克西穆斯的功绩，首次造访了首都罗马。不过，与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不同，狄奥多西对观赏名胜古迹完全没有兴趣。抵达罗马后他直奔元老院，面对聚集一堂的议员们，以提问的形式，逼迫他们作出选择：

诸位认为，罗马人的宗教，应该是信仰朱庇特神，还是基督？

西马库斯似乎当时不在现场。自4年前书信论战之后，尽管只有44岁，未到引退的年龄，但他依然辞去了所有的公职，全身而退。不过，那些与他出身背景、教育以及公职经历相似的高贵的元老院议员，全体出席了皇帝的接见。

当天讨论的过程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在元首制时代，元老院会议的详细内容，会记录在《元老院纪事》（Acta Senatus）中，并公之于世，然而这项制度已经废除了很多年。总而言之，无论议员们如何讨论，最终不得不给出一个让皇帝满意的答案，结果，议员们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选择了“基督”。

1000多年以来被罗马人奉为最高神的朱庇特，仿佛真人一般，被宣判有罪。从此以后，基督代替朱庇特坐上了罗马人信仰的宗教宝座，宣告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这同时也意味着作为多神教最后一座城堡的元老院，彻底被基督教教会攻陷。从建国初期以来，与罗马人民共同走过风风雨雨的元老院，历经1411年的岁月之后，在基督教面前缴械投降。既然认输，那么掌控失败者命运的，就是赢的那一方。投票结束之后，大多数的元老院议员按照皇帝的要求，抛弃了罗马传统的诸神，转身变为基督徒。

在那天的元老院会议上出现了一位牺牲者，他的地位类似于元老院议长，是一位备受大家尊敬的人物。据说他选择了自杀。不清楚他是死在投票前，还是投票之后。如果在投票之前，那么他是以死抗议，如果是在之后，是不堪屈辱，两者性质不同。不过，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详情。

仅一名元老院议员自杀的这个事实，引发出另一个问题。当基督徒被胁迫要求他们放弃信仰时，很多人誓死不从，宁可选择殉教。相比之下，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却很少出现殉教者，这是为什么?

有关这个答案，不少的研究者认为，主要是异教徒对信仰不够虔诚。我个人觉得原因不仅于此。关键问题似乎不在信仰是否坚定，而是信仰的对象，即宗教的性质不同。

有关宗教的差异，简单来说，有以下几个不同:

一神教深信自己信仰的是正确的教义，所有人都应该信从。

相反，多神教则认为，尽管自己不信某类宗教，但只要有人相信，那么就应该承认它的存在。

“殉教”一词，正如字面所示，是为自己的信仰而死的殉道行为，以示誓死捍卫宗教的决心。

综观两者的不同，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殉教只会发生在一神教信徒的身上，而多神教则很难接受这种行为。希腊、罗马人在面临不得不放弃信仰时，他们最多就是选择脱身而出，远离时代的旋涡。

公元19世纪有一位叫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历史学家，写过许多有关古希腊、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罗马以及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脍炙人口的著作。对于希腊罗马宗教的性质，他曾经说过:

如果从君士坦丁到狄奥多西等历代皇帝，没有立法承认基督教是唯一的宗教、将其他宗教视为邪教的话，或许希腊罗马多神教可以延续至今。

说到布克哈特，又让我想到另一件事情，因基督教的胜利而成了“牺牲者”的不仅有美术，还有文艺。罗马帝国境内数量繁多的图书馆，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陆续遭到关闭，其中包括首都罗马的28所公共图书馆。罗马时代公共图书馆的藏书，充分体现了帝国双语文化的社会状况，按照希腊文和拉丁文分门别类，公开展示。这些书籍的内容，几乎全部是对异教世界的叙述，伴随着图书馆的关闭，藏书不断流失，古代文化遗产就这样消失殆尽。这些散落的书籍，同样也是要等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被发现。

在异教与基督教抗争的历史上，公元393年除了发生了元老院判决朱庇特神有罪的事件之外，另外还颁布了一条象征性的法律，那就是全面禁止奥林匹克运动会。禁止的理由是因为这个四年一次在希腊奥林匹亚举行的运动会的目的，是奉献给众神之王宙斯（拉丁语称做朱庇特）的。希腊城邦之间平素纷争不断，只有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大家相聚奥林匹亚，不论战场上的输赢，以体育竞技的方式一比高下，这是古代奥林匹克的意义所在。据说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在公元前776年举行的。这项历史悠久的体育竞赛，也在一千一百六十九年后落下了帷幕。因此，西洋史上称公元393年为“希腊与罗马文明正式终结的一年”。

顺便提一句，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排斥战争中的国家以及战败国的选手，我认为这种行径完全违背了古代奥林匹克的精神。

基督（对皇帝）的胜利

形势的发展，一切如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所愿。受洗后的狄奥多西皇帝，像一只温顺的小绵羊，在牧羊人安布罗西乌斯的引导下，利用皇帝特别的权力立法成章，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但这还不能让安布罗西乌斯满足。在信徒面前，明确上帝与皇帝从属关系的议题，尚未解决。也就是说，必须保证基督教教会高于皇帝权力之上的优势。为达到目的，安布罗西乌斯不惜超越了米兰教区主教的权限。

公元392年，21岁的傀儡皇帝瓦伦提安尼二世被杀，自此，狄奥多西名副其实地成了一人主宰帝国的罗马皇帝。那个时候的他，似乎还心怀抱负，希望做一个对帝国公民公正无私的皇帝。一次事件的发生，让他有机会表现出公正执法的态度。

在帝国东部的叙利亚东北部，天主教徒借着狄奥多西皇帝排除异教徒的势头，乘机放火烧毁了犹太教的犹太教堂（Synagogue）。狄奥多西命令当地的行政官严惩罪犯，同时，他要求当地的主教用教会的费用，重建犹太教堂，捐赠给犹太教徒。

得知此事的米兰主教，立即向皇帝递上了严厉的抗议信。他在文中指出，使用基督教教会的财产兴建异教设施的行为，是对基督教的冒犯，是对教会全体的侮辱。

然而，狄奥多西确信自己作出的是公正的裁决，不予理会。不久，他因事必须前往米兰，这下给米兰主教逮着了机会。

等狄奥多西在贵宾席上坐稳之后，米兰主教开始向挤满教堂的信徒们，发表了猛烈抨击犹太教的演说。他说，因基督牺牲而获得救赎的不包括犹太教徒，因为他们是一群盲目的教徒。然后，他又用坚定的语气向狄奥多西强调，任何人都不能忘记上帝赐予的恩惠。“不能忘记上帝赐予的恩惠”，换句话说，就是“你靠谁才坐上了这个皇位”。

狄奥多西不得不撤回了严惩犯人以及用基督教教会的财产重建犹太教堂的命令，而且在撤回命令的公文中，还特地注明，这是听从了米兰主教忠告后所作的决定。这等于是宣告，从今以后，罗马帝国的法律，对非基督徒的保障是有限制的。换言之，非基督徒的罗马公民，不能再期待与基督徒公民获得同等的法律保护。不问宗教信仰保护全体公民的罗马法，已成为过去的历史。

主教对皇帝的威慑力，日后在其他场合也有所表现。发生在希腊塞萨洛尼基的事件，又给安布罗西乌斯提供了机会。



狄奥多西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深受民众喜爱的赛车手，因一些小事而被捕入狱。大批的粉丝涌向警局，要求释放他们的偶像。在要求遭到拒绝

之后，民众怒火冲天，情绪失控之下，杀害了包括塞萨洛尼基长官在内的多名行政官。

狄奥多西接到报告后，认定是民众的暴动，下令出兵武装镇压。暴动虽然成功地被压制下去，但许多人因此丧生。

安布罗西乌斯再一次给皇帝写了严厉的抗议信。他指出，军事行动超出了限度，手段残酷，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亡，下达命令的皇帝理应为此负责。为了补偿所犯下的过失，皇帝必须在公开场合表明赎罪的诚意，在此之前，不得接近祭坛。这就是说，如果不公开认罪，就禁止皇帝进入作为上帝居所的教堂。

狄奥多西皇帝接到信后，抵抗了8个月。不过，8个月过去之后，他主动提出了和解。

犯错的人公开承认有罪，请求宽恕，基督教称为“公开忏悔”。必须经过这一关，才能得到宽恕，重新有机会朝拜圣体。普通的信徒通常要用很久的时间才能完成这种忏悔，过程中必须做很多事情来证明赎罪之心。

罗马帝国的皇帝狄奥多西，除去了身上所有象征皇帝的饰物，比如绣着皇印的衣服、头上的皇冠、镶嵌着宝石的长剑等，一身素衣出现在教会前，请求得到宽恕。他在门口等了一阵子之后，门才被打开，主教走了出来。安布罗西乌斯头戴镶满宝石的主教高冠，披着用金银丝线织成的豪华披风，一级大礼服的装束。主教走到跪着的罪人前面，问他是否有悔改之心，罪人用谦卑的口吻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之意。仪式结束后，罪人再次得以进入上帝之家，在祭坛前，由主教赐给一小片面包，即朝拜圣体。



安布罗西乌斯

教会内外挤满了民众，观看着这场罗马皇帝与米兰主教之间上演的戏码。此时此刻，这里成了向世人展示上帝威力的最好舞台。

这个场景，让人联想到中世纪发生的著名的事件“卡诺莎的屈辱”（Umiliazione di Canossa，又译卡诺莎之行）。公元1077年，为了得到教宗格里高利七世（Gregorius VII）的宽恕，罗马皇帝亨利四世（Heinrich IV）不得不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在雪中站立了三天三夜。这场史上称为“卡诺莎的屈辱”的前奏，原来早在七百年前就开始了。

正因为皇帝可能会面临诸如此类的威胁，所以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都是等到临死前才接受洗礼。可是狄奥多西在病魔缠身、意志薄弱的时候，受到塞萨洛尼基主教的劝诱，30岁刚出头就接受了洗礼。一旦成为基督徒，即使贵为皇帝，也还是上帝的一只羔羊。而“羔羊”是无论如何战胜不了“牧羊人”的。

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势必是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基督教与世俗皇权之间的关系。皇帝的地位及其权力，都是拜上帝所赐，而向人间传达上帝意志的则是主教。因此即便是皇帝，也不能违背主教的意志。40岁之后才受洗，从高级官僚变身为主教的安布罗西乌斯，能够透彻地看到两者间关系的真相，实属难得。或许正因为前半生的经历，才让他具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

公元395年，48岁的狄奥多西一世因病去世。即使在那个年代，48岁死亡也算不上是享受天年。比皇帝年长17岁的安布罗西乌斯，写了一篇充满深情的祭文，大力赞颂了狄奥多西为基督教所作的贡献。阅读此文，让我禁不住苦笑。

当被自己操纵的玩偶死去之后，可以不留任何痕迹地将所有的功绩都归功于死者，不惜美誉，安布罗西乌斯的这篇祭文可谓是背后操纵者的最佳范文。这篇祭文也成了狄奥多西皇帝的“身份证明书”，因

为是米兰主教，这位公元4世纪末期基督教教会的实际掌门人出面担保，所以教会毫不犹豫地将原本只赠予君士坦丁一个人的“大帝”称号，又送给了狄奥多西。

在狄奥多西皇帝去世后两年，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在大批含着伤心泪水的信徒的目送之下，在他生活了20多年的大本营米兰，以67岁的高龄离开了人世。从他44岁被基督教教会选中成为主教之后，坐拥了当时任何一个主教都无法保持的长达23年的至高地位。这位卓越的实干家，在这23年中，不仅对皇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之后许多成为基督教教会基础的教规，也是由他一手奠定的。

虽然安布罗西乌斯促成了教会中的很多事情，但这一切并非他的原创，他不过是将原本就单独存在的东西重新整理、统合，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架构。不过，必须承认，经过他改造之后，基督教教会变成了一个崭新的组织机构。以下是他的主要事迹：

一、针对异端者，以及尚未成为异端但思想有异于基督教的人，制订了论争与斗争的方法。

这就像一本理论武装用的教战手册。无论古今中外，使用手册永远是一件便利的工具。曾经有位主教对圣母玛利亚的处女之身表示怀疑，安布罗西乌斯就是根据这本手册，狠狠驳倒了对方，印证了手册的实效性。

二、制订了修行的方法，提高神职人员伦理道德标准。

三、确立制度，将修道士和隐士编入教会组织。

四、针对普通民众，制订了宗教教育的方式。

五、汇总教会中各种形式的祭拜，确立了教会仪式制度。

六、重新调整了以无业人员以及孤儿为对象的教会慈善事业的架构。

七、确立了殉教者信仰的理论。

除上述内容外，最具独创性而且有助于基督教普及的，是安布罗西乌斯创立的圣人信仰。

人们在遇到问题时会求助于宗教。不过希望得到唯一真神帮助的，大多又是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以前，连夫妻吵架都有专门的保护神，只要向它祈求帮助就足够了。在一神教当道的眼下，负责调解夫妻矛盾的维里普拉卡女神也成了不法分子，民众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祈求至高无上的天父及其儿子基督，似乎有些难以启齿，难道就没有更轻松开口求助的神明吗?

针对民众这个单纯合理的愿望，安布罗西乌斯想出了一套因应的方法。

基督教只承认一位神明，因此不可能让以前的诸神复活，所以必须找到新的保护神。虽然基督教被迫害时期殉教者的信仰开始得到承认，但过去历任罗马皇帝打压基督教的政策并没有持续性，而且也不彻底。唯一例外的是戴克里先皇帝。即使如此，也不过持续了三四年而已。因此，就算把所有的殉教者集中起来，也无法满足民众的各种愿望。

于是，安布罗西乌斯想出了一个方法：大量制造圣人。不过，升格为圣人，需要得到教会的认可，认可的标准当然是看此人是否能成为信徒们的表率。

由于这些人物是一神教世界所崇敬的对象，因此不能像多神教时代那样，称为“保护神”，所以叫“守护圣人”（拉丁语：patronus，又译

主保圣人）。不管怎样，安布罗西乌斯通过这个手段，既成功地坚守住了一神教的信仰，又满足了民众的淳朴愿望。

随着时代的推进，圣人的数量逐渐增加，到了近代，甚至连老婆通奸的丈夫都有专门的守护圣人。由于圣人数量不断上升，就是把一年中的每一天都定为一位圣人的纪念日也不够。于是，教会定了一个专门的日子，纪念所有没能单独享受纪念日的圣人，那就是我们叫做“万圣节”的11月1日。

为教会打下良好基础之后，安布罗西乌斯离开了人世，想必他应该是走得非常安详。这位创建了圣人体系的非凡的实干家，身后不久便成了自创体系中的一员。鉴于他对教会作出的巨大贡献，教会奉他为圣人。因此，他的名字史称“圣安布罗西乌斯”。

因为与至尊的圣人展开论战而留名史上的西马库斯，据说在他的对手安布罗西乌斯去世的5年之后死去。从他辞去公职到离世，已经有整整14年的时间。

西马库斯生前，应该知道元老院宣判最高神朱庇特有罪的决定，更清楚基督教成了帝国国教。至于罗马皇帝向一介主教屈膝下跪之事，势必也有所耳闻。而且，他还目睹了罗马帝国在狄奥多西死后，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

尽管最后一败涂地，但西马库斯终究是捍卫希腊罗马文明的最后一位旗手

他是怎样看待这一时代潮流的变迁，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虽然说信仰只能藏在心底，不过，即使说出来，那个时代也不会有人去在意一个异教徒男人的感受。



西马库斯墓碑

与西马库斯有关的东西，只留下了一座墓碑，是在罗马七丘山之一的西里欧山（Celio）中被发现的。石碑是西马库斯去世后，他的儿子为纪念亡父所建。研究人员认为，西马库斯的住宅可能就在西里欧

山上。他长年远离政坛，又曾经给皇帝写过充满异教色彩的书信，他的纪念碑确实不会出现在公共场所。

这块墓碑如今被转移到了卡匹托尔山，放在卡匹托尔美术馆的地下。博物馆被罗马市政厅一分为二，市政厅的地下、联结两馆的通道之处，有一个由古罗马时代的“古文书库”（Tabularium，又译罗马国家档案馆）改建的画廊，展示着大量的古石碑，西马库斯的石碑也在其中。不过，除了一些特别喜欢罗马史的人之外，一般人不会知道西马库斯是何许人。因此，他的石碑被放置在楼梯下的一个角落。从这里登梯往上走，最高处就是眺望罗马广场的大平台。当我的手触碰到那些冰冷的石碑时，似乎瞬间从现代回到了古代。寂静地竖立在一角的西马库斯石碑，让人愈发感到恍如隔世。尤其是在秋天将尽，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即将开幕的季节，更是令人唏嘘不已。

东西分裂

在公元395年去世的狄奥多西皇帝，死前将帝国一分为二，分给了两个儿子。18岁的长子阿卡狄乌斯（Arcadius）继承了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则归年仅10岁的小儿子霍诺里乌斯（Honorius）所有。

这一次是罗马帝国真正的分裂。以往的皇帝们虽然分管东、西两地，但只是职务分工的不同，帝国还是完整的一个。因此，我不得不在文中反复强调“负责帝国东部的皇帝”、“负责帝国西部的皇帝”等。不过，在叙述公元395年之后的历史时，我只需要直接写“东罗马帝国皇帝”、“西罗马帝国皇帝”。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虽然不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国家，但已经失去了以往的衔接性，实质上成了两个独立的国家。就在帝国分裂的状态之下，时代来到了公元5世纪。对罗马帝国而言，这是最后一个世纪，同时也是皇帝的女儿嫁给蛮族首领的一个世纪。



为纪念狄奥多西登基10周年制作的银盘（自狄奥多西以后，罗马皇帝们的形象犹如圣人，头顶光环）

大事年表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帝国东方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帝国西方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北非）	
324	7月3日，在土耳其的埃迪尔内，君士坦丁的军队打败了李锡尼的军队，在拜占庭，君士坦丁军再次获胜，李锡尼投降，退出正帝的职位，隐居塞萨洛尼基，君士坦丁成为唯一的正帝。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着手进行新首都的建设		（日本）弥生时代
325	李锡尼以勾结蛮族、密谋反叛罪被处死。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召集基督教教会的主教，举行大公会议，将“三位一体”论定为正统，阿里乌斯派则被视为异端		
326		君士坦丁的长子克里斯普斯，因与继母法乌斯塔私通之罪遭逮捕，死于伊斯特里亚半岛的波拉城堡。法乌斯塔也遭谋杀	
330	5月11日，举行了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落成典礼。安布罗西乌斯于罗马出生		
335	君士坦丁授予侄子德鲁马特乌斯与汉尼拔利阿努斯“恺撒”的称号		
337	5月22日，君士坦丁前往波斯战争的途中，在尼科米底亚病逝。君士坦丁堡皇宫发生血案，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兄弟及其儿子被杀。同父异母兄弟之一的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加卢斯和尤里安侥幸逃脱。9月，君士坦丁的三个亲生儿子在潘诺尼亚举行会谈。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提乌斯、君士坦斯分别就任“奥古斯都”。元老院追认了这个人事决定		（中国）慕容皝自立为燕王（前燕）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帝国东方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帝国西方**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北非）	
340		君士坦丁二世与君士坦斯就北非归属权产生对立。君士坦丁二世率军前往潘诺尼亚，途中遭遇君士坦斯军队的阻击，战败身亡	（中国）东晋，首度实施土断法(341)。（朝鲜）高句丽遭受前燕的攻击，丸都城陷落
346	君士坦提乌斯将优待基督教教会的免税范围，扩大至所有教会相关人员		
350	君士坦提乌斯与波斯签订休战协议，率军向西部进军。伊利里亚驻军司令官维特拉尼奥被手下拥立称帝。君士坦提乌斯与维特拉尼奥在撒尔底迦（现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举行会谈。维特拉尼奥作出退让，其军队并入君士坦提乌斯的旗下	君士坦斯手下的将官马格嫩提乌斯反叛，拥立马塞利努斯为皇帝。君士坦斯在逃往西班牙的途中被捕遭到杀害。不久，马格嫩提乌斯自封皇帝	（日本）这个时期，在奈良盆地一带，兴建樱井茶臼山古坟、钵卷山古坟、景行陵古坟等大型前方后圆坟
351	3 月，君士坦提乌斯任命堂弟加卢斯为“恺撒”，令其负责帝国东部的治理。9 月 28 日，君士坦提乌斯及其军队在多瑙河畔的穆尔萨，与马格嫩提乌斯的军队展开会战。马格嫩提乌斯战败，逃往意大利本土。君士坦提乌斯重新夺回了西班牙及北非		
353		8 月 11 日，马格嫩提乌斯在里昂自杀。君士坦提乌斯对马格嫩提乌斯派进行血腥清洗。	
354		12 月，君士坦提乌斯召加卢斯回米兰。加卢斯在前往米兰的途中，被转送到波拉城堡，以图谋杀害君士坦提乌斯的罪名被处死	
355	5 月，尤里安在雅典开始了学者生活	2 月，君士坦提乌斯命令加卢斯的弟弟尤里安，来米兰接受召见。君士坦提乌斯平定了驻高卢的骑兵团长西尔瓦的叛乱，西尔瓦被处死。11 月，君士坦提乌斯再次召回尤里安，任命其为“恺撒”。尤里安与君士坦提乌斯的胞妹海伦娜成	

		婚。尤里安前往高卢的维埃纳赴任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帝国东方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帝国西方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北非）	
356	君士坦提乌斯在多瑙河流域，击退萨尔马提亚人、夸地人等日耳曼民族（～357年）	尤里安从高卢北上，迎击跨过莱茵河侵入境内的蛮族	（日本）古坟时代
357		春天，尤里安在阿勒曼尼人的根据地斯特拉斯堡，与阿勒曼尼人决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赢得胜利。阿勒曼尼人族长克诺多马被俘。4月28日，君士坦提乌斯为举行凯旋仪式，进入罗马	
358		尤里安在莱茵河下游一带，战胜法兰克人。（～359年）	
359	波斯军进攻美索不达米亚的阿米达。罗马军顽强抵抗，终不敌，阿米达城失守。君士坦提乌斯命令尤里安派遣军团前往东部。尤里安遭军团反对，拒绝执行命令		
360		2月，尤里安被其麾下的军团拥立为“奥古斯都”，尤里安接受了众人的拥立	
361	君士坦提乌斯离开安条克，率军向西部进军，讨伐尤里安。尤里安向东部挺进，成功地召集整编了多瑙河防线的驻军。11月3日，君士坦提乌斯死去，临终前指定尤里安为其继承人。12月11日，尤里安进入君士坦丁堡。废除了一系列优待基督教的政策，力图复兴希腊罗马传统宗教		
362	为准备与波斯开战，尤里安离开君士坦丁堡，向东移动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帝国东方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帝国西方**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北非）	
363	尤里安进入安条克，著有《厌胡者》并公开发行。3月5日，尤里安离开安条克，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尤里安二度击退了波斯军，但因后勤补给不足，被迫撤军。6月26日，尤里安在行军途中，遭遇波斯军的袭击而受伤，于当夜去世。在将军和高官出席的会议上，**近卫队队长约维安被推举为皇帝**。约维安皇帝与波斯缔结和约，割让北美索不达米亚给波斯。秋天，约维安进入安条克，废除了尤里安制定的政策		
364	约维安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死去。**日耳曼人出身的瓦伦提尼安将军当选为皇帝**。瓦伦提尼安任命胞弟瓦伦斯为共治皇帝		（日本）倭国的斯摩宿祢到卓淳国，派遣使者去百济
367	瓦伦提尼安授予长子格拉提安“奥古斯都”的称号		
373		瓦伦提尼安任命西马库斯为北非总督。	（朝鲜）高句丽初定律令
374		12月7日，安布罗西乌斯当选为米兰主教	
375	11月17日，瓦伦提尼安在接见蛮族代表时猝死。自此，**帝国东部由瓦伦斯、西部由格拉提安统治**。格拉提安的胞弟瓦伦提尼安二世被授予“奥古斯都”的称号，分管意大利本土地区		（印度）这个时期，旃陀罗·笈多二世继位。笈多王朝迎来鼎盛时期
376	瓦伦斯皇帝同意西哥特人移居多瑙河南岸	格拉提安怀疑狄奥多西的父亲通敌，下令处死	
377	西哥特人对移居后的生活深感不满，发起暴动		
378	瓦伦斯为镇压暴乱的西哥特人，离开安条克。8月9日，瓦伦斯在哈德良堡与哥特人的战争中大败，瓦伦斯被杀。**西部皇帝格拉提安召见狄奥多西，**		

	任命他为东部帝国的正帝		

公元	罗马帝国		其他地方
	帝国东方 （中东、小亚细亚、埃及、巴尔干、多瑙河流域）	帝国西方 （意大利、莱茵河流域、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北非）	
379	狄奥多西平定哥特人叛乱，与哥特人重新签订了移居多瑙河南岸的协议。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去世。冬天，病中的狄奥多西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380	格拉提安与狄奥多西正式启动了打压基督教以外的异教的政策		
383	从这一年开始，狄奥多西成为帝国全境实质上的统治者	格拉提安遭叛乱的不列颠驻军司令官马克西穆斯杀害	（日本）古坟时代
384		西马库斯担任首都罗马长官。围绕元老院议事厅前的“胜利女神像”的议题，西马库斯与安布罗西乌斯通过各自向皇帝上书的形式，展开论战	
388		狄奥多西平定马克西穆斯的叛乱，前往罗马。狄奥多西向元老院提出废除希腊罗马多神教的建议，元老院投票表示赞同	
390	4 月，因军方镇压塞萨洛尼基暴乱时，滥杀无辜，安布罗西乌斯要求狄奥多西公开谢罪。在完成赎罪前，禁止其进入教堂	12 月，狄奥多西在米兰教会前公开向安布罗西乌斯谢罪。	
392	瓦伦提尼安二世逃离意大利，前往东部投奔狄奥多西。途中，在希腊的塞萨洛尼基遭家臣杀害		
393	奥林匹克运动会被废除		
395	狄奥多西病逝。其长子阿卡狄乌斯继承了帝国东方，小儿子霍诺里乌斯继承了帝国西方。之后，帝国东西两部正式分裂		（日本、朝鲜）百济、倭国联手攻打新罗。新罗请求高句丽救援（399）
397		安布罗西乌斯去世	
402		西马库斯去世	（日本、朝鲜）高句丽向新罗派出援兵，击退了倭国

参考文献

一、原始资料

同时代人的证言

圣安布罗西乌斯（Ambrosius）：米兰主教。

De obitu Thecodosii，悼念狄奥多西皇帝的祭文以及Epistulae书信集，收录于Patrologia Latina vol. XVI。

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出生于安条克的罗马人。从军队退役后，着手撰写历史。与尤里安生于同一时代，是一位稳健的异教徒。

Rerum gestraum（Res Cestae）96—378，《罗马史，公元96—378年》。但现存的只有公元353—378年的第11卷（Berlin，1910和Bologna，1974）。

奥勒里乌斯·维克托（Aurelius Victor）：北非出身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公元389年担任首都长官。

Liber de Caesaribus，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提乌斯为止的皇帝传记（Leipzig，1970）。

Epitome de Caesaribus，作者不详，估计写于公元4世纪末期（Leipzig，1970）。

尤纳皮乌斯（Eunapius）：历史学家。

Historiae Fragmenta，目前仅有残篇留存。文章中引用了曾是尤里安御医的奥里巴西尔斯的回忆录（失传），因而具有历史价值。收录于Historicorum Gracecorum vol. IV（Paris，1885）和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I & II（Liverpool 1983）。

Vitae Sophistarum（被叫做“哲学家”们的生活实况写照）。

优西比乌（Eusebius）：叙利亚恺撒利亚的主教。从阿里乌斯派转为三位一体派。

Historia Ecclesiastica，从基督死去到4世纪为止的教会史（Berlin，1909），译为《教会史》1—3（秦刚平译，山本书店，1986—1988）。

Vita Costantini（Napoli，1985），译为《君士坦丁的生涯》（秦刚平译，西洋古典丛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

尤特罗匹乌斯（Eutropius）：历史学家。

Breviarium ad Urbe condita，为基督教阿里乌斯派的信徒所撰写的从建国到4世纪的罗马简史（Stuttgart，1985）。

斐洛斯托杰乌斯（Philostorgius）：阿里乌斯派主教。

Historia Ecclesiastical，基督教教会史。后因遭到查禁，仅有残篇留存。收录于Die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Schriftsteller（Berlin，1972）。

格列高利（Gregorius）：纳西昂出生的主教。与尤里安同辈。在雅典修行时与尤里安是同窗。

Oratio IV&V，攻击、毁谤尤里安皇帝的文章。收录于Sources Chrétiennes（Paris，1983）。

利巴尼乌斯（Libanius）：出生于安条克的哲学家。尤里安的亲信和支持者。

Oratio XII，XIII，XV-XVIII，XXIV，写给尤里安的信件（Cambridge，Mass，1967）

马梅提努斯（Mamertinus）：公元362年的执政官。

《当选的执政官按惯例向皇帝致谢辞》，因为对象是尤里安，因此这份致谢辞具有历史价值。收录于Panegyrici Latini（Oxford，1964）。

奥勒里乌斯·西马库斯（Aurelius Symmachus）：异教的最后一位旗手。因与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论战而留名青史。

Relationes（Berlin，1880）。

克劳狄乌斯·克劳狄安（Claudius Claudianus）：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的拉丁诗人。

现今留存的都是公元395年以后的作品。是在异教变成非法化后，依旧保持着自由的个人灵魂的一例。但是以外表伪装成基督徒，实际是异教徒的形式。与本书中的主角之一斯提利科关系密切，与这位将军同生共死。

圣哲罗姆（Hieronymus）：出生于北意大利（公元347年前后），死于伯利恒（公元420年）。以在中东沙漠地带创建修道院以及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而闻名。另外，他也是罗马上流社会贵妇们的偶像。

Epistolae，154封书信（Wien，1918）。

与冷酷的圣安布罗西乌斯相比，圣哲罗姆比较能够激起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的画家们的创作欲望，因此留下许多肖像画。曾经画过圣哲罗姆肖像的画家有：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洛伦佐·洛托、列奥纳多·达·芬奇、吉兰达约、提香、卡拉瓦乔等。肖像中的圣哲罗姆都是以半裸体的姿态出现在洞穴里。

为基督徒所著的圣人传（公元3、4、5世纪各一位代表人物）

Pontii，Vita Cypriani，《奚普里安传》（Milano，1975）。

Paulini，Vita Ambrosii，《安布罗西乌斯传》（Milano，1975）。

Possidii，Vita Augustini，《奥古斯丁传》（Milano，1975）。

尤里安皇帝（Iulianus）

著作选集，Jacques Fontaine注解，收录有《给哲学家泰米斯丢斯的信》、《大地母神的赞诗》、《太阳神》、《厌胡者》（Milano，1990）。

《政治·哲学相关著作集》（Genova，1988）。

《书简集》（Napoli，1991）。

泰米斯丢斯（Themistius）：从君士坦丁皇帝到狄奥多西皇帝时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属于当权者喜欢的学者。

《皇帝赞辞集》（Torino，1995）。

苏格拉底（Socrates）：君士坦丁堡出生的基督教学者。

《基督教教会史，306—439年》（Berlin，1960）。

法律・行政関係の原史料

「Codex Theodosianus」テオドシウス二世によって438年発行。Mommsen, Th. & Meyer, P.M. 編纂版（Berlin, 1905）とKrueger, P. 編纂版（Berlin, 1923）：英訳は「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Princeton, 1952）

「Imp. Caesaris Flavii Claudii Juliani Epistulae Leges Poematia Fragmenta Varia」（Paris-Oxford, 1922）

「Corpus Iuris civilis」Mommsen, Krueger, Schoell 編纂（Berlin, 1922）

「Fontes iuris anteiustiniani」Riccobono他編纂（Firenze, 1900）

「Notitia Dignitatum」Seeck, O. 編纂（Berlin, 1876）

「Regesten der Kaiser und Papste」Seeck, O.（Stuttgart, 1919）

碑文史料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Berlin, 1863）

「Inscriptiones Graecae」(Berlin, 1873)
「Inscriptiones christianae urbis Romae」(Roma, 1861)
「Sylloge inscriptionum graecarum」(Leipzig, 1924)
「Orientis graeci inscriptiones selectae」(Leipzig, 1905)
「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Berlin, 1916)
「Inscriptiones christianae latinae」(Berlin, 1922)
「Epigraphica」(Milano, 1939)

パピルス史料

「Manuale di Papirologia」Calderini, A. (Milano, 1938)

地理史料

「Grande atlante geografico, storico, fisico, politico, economico」Baratta, M.他編集 (Novara, 1939)
「Barrington Atlas of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Tabula Peutingeriana」(Bologna, 1978)

通貨史料

「Description historique des monnaies frappées sous l'Empire Romain」Cohen, H. (Paris, 1892)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Byzantine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Wroth, W. (London, 1908)
「I medaglioni romani」Gnecchi, F. (Milano, 1912)
「Roman Coinage」Crawford, M.H. (London, 1974～)
「Roma e la moneta」イタリア中央銀行発行 (Roma, 1993)

二、后世研究资料

Andreotti, R., *Il regno dell'imperatore Giuliano*, Bologna, 1946.

Bidez, J., *La Vie de L'Empereur Julien*, Paris, 1930.

Bouffaritigue, J., *L'Empereur Julien et la culture de son temps*, Paris, 1992.

Bowder, D. (ed.), *Who Was Who in the Roman World*, Oxford, 1980.

Bowersock, G.W., *Julian the Apostate*, Cambridge (Mass.), 1978.

Braun, R. & Richer, J. (eds.), *L'Empereur Julien vol. I: De l'histoire à la légende (331-1715)*, Paris, 1978.

Browning, R., *The Emperor Julian*, London, 1975.

Burckhardt, J., *L'età di Costantino (1853)*, Firenze, 1957 (伊訳).

Demandt, A., *Die Spätantike. Römische Geschichte von Diocletian bis Justinian 284-565*, München, 1989.

Dodds, E.R.,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Oxford, 1950.

Dodgeon, M.H. & Lieu, N.C.,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s (226-363)*, London-New York, 1991.

Étienne, R., *Flavius Sallustius et Secundus Salutius*, 《Revue des études anciennes》 65, 1963.

Fraschetti, A., *La conversione. Da Roma pagana a Roma cristiana*, Roma-Bari, 1999.

Geffcken, J., *Kaiser Julianus*, Leipzig, 1914.

Giardina, A. (ed.), *Società romana e impero tardoantico*, Roma-Bari, 1986.

Gibbon, E., *Declino e caduta dell'impero romano*, Milano, 1992 (伊訳).

Jones, A.H.M., *Constantine and the Conversion of Europe*, London, 1964; *The Cities of the Eastern Roman Provinces*, Oxford, 1971;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Oxford, 1984.

Lane Fox, R., *Pagans and Christians*, London, 1986.

Liebeschuetz, J.W.H.G., *Antiochia. City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Oxford, 1972.

Lieu, N.C., *The Emperor Julian. Panegyric and Polemic*, Liverpool, 1982.

MacMullen, R., *Paganism in the Roman Empire*, New Haven-London, 1981.

Marrou, H.I., *Histoire de l'education dans l'antiquité*, Paris, 1965.

Matthews, J.E., *The Roman Empire of Ammianus*, London, 1989.

Mazzarino, S., *Aspetti sociali del IV secolo. Ricerche di storia tardo-romano*, Roma, 1951; *L'impero romano* (3 vols.), Roma-Bari, 1984.

Momigliano, A. (ed.), *Il conflitto fra paganesimo e cristianesimo nel IV secolo*, Torino, 1971.

Monteserrat, D., *From Constantine to Julian*, London, 1996.

Murdoch, A., *The Last Pagan*, Stroud, 2003.
Paribeni, R., *Da Diocleziano alla caduta dell'Impero d'occidente.* 《Storia di Roma》 8, Bologna, 1941.
Piganiol, A., *L'Empire Chrétien*, Paris, 1972.
Pighi, G.B., *Studia Ammianea*, Milano, 1935; *Nuovi Studi Ammianei*, Milano, 1936; *I discorsi nelle storie di Ammiano Marcellino*, Milano, 1936.
Rochefort, G. & Lacombrade, C., *L'Empereur Julian*, Paris, 1963.
Smith, R., *Julian's Gods.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the Thought and Action of Julian the Apostate*, London-New York, 1995.
Stallknecht, B., *Untersuchungen zur römischen Aussenpolitik in der Spätantike* (*306-395*), Bonn, 1969.
Stein, E., *Histoire du Bas-Empire*, Paris, 1949.
Tantillo, I., *La prima orazionedi Giuliano a Costanzo*, Roma, 1997; *L'imperatore Giuliano*, Bari, 2001.
著者多数,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XII: The Imperial Crisis and Recovery A.D. 193-324;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XIII: The Late Empire A.D. 337-425; Cambridge Mediaeval History: The Christian Roman Empire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eutonic Kingdoms.*